

# 德语国家资讯与研究

## 第一辑

*Information und Forschung über  
deutschsprachige Länder*

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国家资讯与研究》编辑部 编

顾 问 梅兆荣 顾俊礼  
主 编 殷桐生 刘立群  
副 主 编 姚晓舟 姚 燕 吴 江  
执行编辑 包葛耿 周海霞  
德语编辑 李 克 (Patrick Kühnel)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北京

# 《德语国家资讯与研究》简介

2006年开始我们出版《德意志文化研究》集刊，先后已达9辑。岁月的荏苒使我们深深感到，我们的工作已经跟不上飞速发展的形势。为了满足国家、国家机关发展对德关系和中国企业走向德语国家的需要，发挥智库的作用，突出我校区域研究的教学和科研方针，推动德语系的学科发展和复合型、高质量德语人才的培养，我们决定将《德意志文化研究》集刊改为《德语国家资讯与研究》。

## 一、办刊的指导思想

1. 紧扣时代脉搏和满足国家战略的需要，重在研究战略问题；
2. 充分重视智库是一国的第五大力量的作用；
3. 主要任务是：通报、出招、解惑和指路；
4. 提供最新资讯，研究最新问题；
5. 出好刊物，出好人才。

## 二、服务对象

中央和国务院外事研究、决策机构；中央各有关部委以及各大型企业、相关高校和广大读者。

## 三、本刊的内涵和形式

主要包括五大板块：德语国家的政治、经济、外交、社会和文教。其中再分采访精撷、新闻鸟瞰、热词诠释、政治舞台、外交观察、经济视野、文教论坛等栏目。

形式是（中期）资讯、评论和对策建议。

从2013年6月底出版第1辑，一年出版两辑，每辑15万字左右，中德文均可撰稿。

## 四、撰稿人

为了保证刊物的质量，本刊坚持1/2以上的稿件要由国内外教授、副教授、研究员、副研究员和博士撰稿；同时又坚持给中青年学者、博士研究生和硕士研究生提供科研的空间，让他们在撰写稿件中进一步培养自己的创新、分析问题的能力，施展才华。

编者

2013年4月30日

# 卷首语

## 祝贺《德语国家资讯与研究》创刊问世

梅兆荣

《德语国家资讯与研究》创刊问世，是北京外国语大学资深学者为服务于国家发展事业而发挥智库作用的新举措，值得庆贺。

德语国家是欧洲地区经济技术、科学文化、管理经验比较发达的地区，在许多领域具有独特的长处。本刊将紧扣时代特点和满足国家战略的需要，广泛而及时地提供德语国家的最新资讯，并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有助于解决我国实际问题的参考性建议，这对我国实现党的十八大提出的两个百年目标将具有重要意义。

衷心祝愿《德语国家资讯与研究》在各方人士，特别是德语界同仁的大力支持下，办成国内各方人士、各个部门、各个地区喜爱的一流读物，为中国与德语国家的交流与合作发挥桥梁作用，也为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2013年4月28日

作者简介：梅兆荣，教授，中国驻统一前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最后一任大使，也是德国统一后的第一任中国驻德国大使，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曾任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兼党组书记，现任外交部外交政策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国际战略学会副会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名誉所长和中国德国研究会名誉会长。



## 目 录

## 采访精撷

- 对中国驻德大使史明德教授的访谈录·····本刊记者 3  
 对德国驻华大使施明贤博士的采访·····吴江 李晓璇 熊雁 6  
 对欧盟驻华大使艾德和博士的采访·····张凯 袁洁 王海涛 15

## 新闻鸟瞰

- 外交新闻·····吴江 于芳 29  
 经济新闻·····殷桐生 于芳 35  
 媒体新闻：德国媒体对中国新领导层的评价·····周海霞 41  
 政治、社会与文教新闻·····于芳 45

## 热词诠释

- LTRO与SMP ·····关海霞 51  
 OMT与SSM ·····徐四季 53

## 政治舞台

- 德国联邦议院大选介绍·····袁洁 57  
 德国重要政党简介·····谢昕 熊雁 田佳峰 沈淋容 李晓璇 古丽格娜·艾尔肯 唐卓娅 60  
 从各党竞选纲领看德国大选·····李微 65  
 2013年德国大选前景评析·····刘立群 于冬冰 72

## 外交观察

德国外交的三大节点·····	潘琪昌	83
德国青睐非洲·····	李文红	89
德国与欧洲导弹防御系统·····	于冬冰	94
联邦总统高克关于欧洲的演说（摘要）·····	王海涛	101

## 经济视野

欧债危机背景下的中国对欧、对德投资战略·····	殷桐生	107
奥地利经济体制特色·····	邓志全	114
瑞士金融监管的变革、发展与前景·····	任丁秋	117
利益相关者——中德跨文化经济交往伦理的重要原则·····	姚燕	125
剖析德国在欧债危机中能独善其身的原因·····	关海霞	133
经济全球化对德国社会福利国家的影响·····	徐四季	140
德国城镇化道路与启示·····	黄萌萌	147
德国对希腊债务的方针·····	罗然	156

## 文教论坛

用德语指导德国外交与经济专业博士生·····	殷桐生	165
对德国学生学习方式的跨文化研究·····	史笑艳	171
维也纳大学孔子学院——中奥两国教育合作的典范·····	王静	176
国情课及其理念·····	潘学范	179
谈译者的跨文化沟通能力·····	张彦娜	188

# Inhaltsverzeichnis

## Interviews

Interview mit Herrn Prof. Shi Mingde, Botschafter der Volksrepublik China in Deutschland .....	Eigene Korrespondenten	3
Interview mit Herrn Dr. Schäfer, Botschafter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in China .....	WU Jiang, LI Xiaoxuan, XIONG Yan	6
Interview mit Herrn Dr. Ederer, Botschafter der EU in China .....	ZHANG Kai, YUAN Jie, WANG Haitao	15

## News aus der Vogelperspektive

Außenpolitik .....	WU Jiang, YU Fang	29
Wirtschaft .....	YIN Tongsheng, YU Fang	35
Pressemeldungen.....	ZHOU Haixia	41
Politik, Gesellschaft, Kultur und Bildung .....	YU Fang	45

## Modewörter und was sie bedeuten

LTRO und SMP .....	GUAN Haixia	51
OMT und SSM .....	XU Siji	53

## Innenpolitisches

Die Bundestagswahl in Deutschland .....	YUAN Jie	57
---	----------	----

Die wichtigsten Parteien in Deutschland

··· XIE Xin, XIONG Yan, TIAN Jiafeng, SHEN Linrong, LI Xiaoxuan, ARKIN Gulgina, TANG Zhuoya	60
Bundestagswahl im Spiegel der Wahlprogramme	LI Wei 65
Ausblick auf die Bundestagswahl 2013	LIU Liqun, YU Dongbing 72

**Außenpolitik im Fokus**

Drei Wendepunkte der deutschen Außenpolitik	PAN Qichang 83
Deutschlands Gunst für Afrika	Li Wenhong 89
Deutschland und das Europäische Raketenabwehrsystem	YU Dongbing 94
Die Europa-Rede des Bundespräsidenten Gauck (Auszug)	WANG Haitao 101

**Wirtschaftliche Horizonte**

Chinas Investitionstrategie in Deutschland und Europa vor dem Hintergrund der EU-Schuldenkrise	YIN Tongsheng 107
Profile des österreichischen Wirtschaftssystems	DENG Zhiqian 114
Reform, Entwicklung und Zukunft der schweizer Finanzkontrolle	REN Dingqiu 117
Das Stakeholderprinzip — Ein wichtiges ethisches Prinzip in der interkulturellen Wirtschaftskommunikation zwischen China und Deutschland	YAO Yan 125
Der Einfluss der Finanzkrise auf das deutsche Selbstverständnis	GUAN Haixia 133
Die Auswirkung der wirtschaftlichen Globalisierung auf das deutsche Sozialstaatsmodell	XU Siji 140
Deutschlands Weg zur Urbanisierung	HUANG Mengmeng 147
Deutschlands Politik zur Schuldenkrise in Griechenland	LUO Ran 156

**Kultur- und Bildungsforum**

Deutschsprachige Anleitung der Doktoranden im Fach Deutsche Diplomatie und Ökonomie	YIN Tongsheng 165
Interkulturelle Studie über die Studienmethoden der deutschen Studenten	SHI Xiaoyan 171
Das Konfuzius-Institut an der Universität Wien—Vorbild für die Bildungskooperation zwischen China und Österreich	WANG Jing 176
Verschiedene Ansätze in der Landeskunde	PAN Xuefan 179
Zur Kulturkompetenz eines Translators	ZHANG Yanna 188

# 采访精撷



# 对中国驻德大使史明德教授的访谈录

本刊记者

## 一、请您就中德关系作一总体评价！

中德都是有重要影响的国家，2012年两国建交40周年，举行了庆祝活动。40多年来，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两国友好合作关系从无到有，交流从少到多，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走在中欧关系前列，处于历史最好时期。2010年，两国将双边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2011年、2012年又分别举行政府磋商，这是我与欧美国家建立的最高级别政治磋商机制。两国高层保持密切接触，默克尔总理六次访华，温家宝总理也六次访德。李克强总理当选后，默克尔总理第一个与李总理通话表示祝贺。德国外长韦斯特韦勒也分别与杨洁篪国务委员和王毅外长通电话。中德关系基础牢固，潜力巨大，前景广阔。

## 二、请您就中德关系近期的快速发展作一些分析，特别是李克强总理所讲中德关系已成为中欧关系领跑者的内涵以及中德关系在中欧关系中的地位！

中德两国的实力地位、相同处境及利益取向是两国关系得以持续发展的动力。冷战

结束，德国统一，德国在欧洲的综合实力首屈一指，影响大大提升。与此同时，中国也发展成为亚洲最有影响力的国家，国际地位不断提高。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全球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爆发以来，中德作为世界第二、第四大经济体和贸易大国，在各自地区和世界经济贸易中的作用凸现。危机中两国携手应对，深化合作关系，进入发展的“快车道”。中德关系广泛、深入、富有活力，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两国政治关系和战略互信不断增强。两国领导人互访频繁，建立了密切的工作关系和良好的个人关系。两国之间已建立40多个各类双边交流机制，包括政府磋商机制，这是中国与西方国家少有的。

第二，两国的经贸互利合作日益扩大。德国是中国在欧洲最大的贸易、投资和技术合作伙伴。2012年，中德贸易额达1611.3亿美元，占我对欧盟（27国）贸易额的29.5%，超过我国与英、法、意三国贸易额之和（1558.6亿美元）。

第三，人文交流大大加强。前几年德国在华举办“德中同行”、“启蒙的艺术展”，中国在德举办“文化年”活动，增进了两国人民的相互认知和了解。双方在文化、科

技、教育、旅游等各领域的交流合作及人员往来日趋密切，为两国友好奠定了坚实的民意基础。

第四，国际合作、协作增强。两国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在联合国和二十国集团等重要组织和机制中保持良好的沟通与协调，致力于推动解决一系列重大地区和国际热点问题，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为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推动经济复苏与增长发挥了重要积极的作用。

可以说，中德关系的发展证明了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发展阶段、不同历史文化背景的国家间，只要相互尊重，平等互利，求同存异，相互间的关系就完全可以实现平稳、健康、持续的发展。

### 三、德国高层及社会各界对中国领导层更迭有何反应和期待？

同国际社会一样，德国各界对中国共产党十八大及不久前召开的两会和中国新一届领导集体给予了高度关注，成为大家热议的中心话题，媒体报道十分广泛。要我去作报告的邀请接踵而至，令我应接不暇。各界关注的焦点主要是我新一届领导集体的执政理念、中国今后的发展方向及政策调整、中国对外政策的走向等。德社会各界和舆论普遍积极评价中国新一届领导集体经验丰富，求真务实，开拓进取，展现了应对挑战和战胜困难的决心和勇气。普遍认为，中国新一届政府致力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改善民生、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这将有利于中国的发展，也会给中德合作带来更多机遇。

德方的期待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德方高层期待着与中国新一届领导人保持高层交往，加强务实合作，推动德中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二是期待中国继续保持良好发展，德国能从中更多受益；三是期待中国在国际

上发挥更大作用，中德和中欧能够在国际事务中保持良好沟通与合作，共同致力于解决全球性问题，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

### 四、如何进一步推动中德战略伙伴关系和两国友好关系的发展？

中德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面临新的发展机遇。我们应抓住机遇，进一步充实和深化中德战略伙伴关系。

一是要不断提升中德关系的战略性，继续深化两国战略互信。国与国关系的基础在于互信，相互信任的程度越高，合作空间就越大。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仍未解决，地区热点问题频发，各种挑战层出不穷。中德两国有相似的处境和立场，共同挑战增多了，共同利益增加了，合作需求增强了。中德务实合作更具战略性、全局性。两国之间应继续保持密切的高层互访，用好用实包括政府磋商在内的各层次的对话磋商机制，切实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为发展双边关系奠定更加坚实的政治基础。

二是要进一步扩大务实合作，实现互利共赢。中德两国经济互补性大于竞争性，经贸合作潜力巨大，两国完全可以把合作的蛋糕越做越大，使双方获得更多的实惠。中国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阶段，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大力推进城镇化建设，加强重视科技创新和生态文明建设，这必将为中德经贸合作提供新的领域和提升增长点。近年来中国对德投资增长势头很快，但尚属起步阶段，中国企业对德投资累计金额 22.3 亿美元，只占德国对华投资的 10.7%，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三是密切人文交流。人文交流是推动中德关系持久发展的坚实基础。两国应大力推动建立长期青年交流机制、地方合作论坛、高校战略伙伴关系、职教联盟等机制和项目，

支持孔子学院、文化中心和歌德学院工作的开展。两国政府决定今明两年为中德“语言年”。目前中国在德留学人员3万多人，是外国在德留学的最大群体，我在德有14家孔子学院，两国高校间有500多对合作关系。近年来，德国掀起了“汉语热”，除了大学的汉语专业，还有300多所中学都开设了中文课，中德语言教学必将进一步增进两国人民之间的更多了解和理解。

四是加强国际协作。当前国际形势变化复杂，国际经济、金融困难重重，中德作为在各自地区和世界上有重要影响的国家更需要在重大国际问题上加强沟通与协作，尤其是加强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中的协调，密切在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的磋商，双方应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方面进一步加强合作协调，共同推进全球经济治理改革。

五是客观看待双方存在的差异和分歧，始终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包容互鉴，互利共赢。

## 五、中欧光伏产品争执的现状和发展以及德国的立场和态度如何？

2012年9月，欧盟宣布对中国光伏电池发起反倾销调查，11月对中国光伏产品发起反补贴调查。此次欧盟光伏“双反”调查案涉及中国企业200多亿美元的出口，40多万就业人口，对中国光伏产业的发展造成严重损害。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中欧光伏贸易摩擦案，多次与欧方在政治层面和技术层面进行沟通 and 磋商。

德国政府和默克尔总理多次公开表示，反对贸易保护主义，主张通过对话协商解决中欧贸易争端，与中国协商寻求共同解决办法。

我们希望，欧盟能够遵循自由贸易、公平竞争的原则，通过产业对话和互利合作解决发展和竞争中出现的问题，从中欧经贸合

作的大局出发，与中方一起找到解决办法。我们反对任何单方行动和任何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也希望德国在欧盟内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 六、9月22日德国大选会对中德关系的未来发展有哪些影响？

重视发展对华关系始终是历届德国政府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德国跨党派的共识。中德关系能有今天的发展水平，是两国人民的选择，是两国历届政府共同努力的结果，也是双方根本利益所在，是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与发展。近年来国际上的各种挑战和危机增多了，但中德两国的共同利益却增加了。两国相互依存，双边关系更加成熟稳定，发展前景广阔。今年9月德国将举行大选，但我相信，中德关系都会沿着既定轨道发展、深化。

## 七、对本刊有何期望，对中国的德国问题研究有何期望？

《德语国家资讯与研究》是从事德语国家研究中有特色、有深度的刊物。作为长期从事德语国家工作和研究的一员，我非常关注贵刊的创刊。当前，国际形势风云多变，德语国家也在经历着冲击，我国与这些国家关系中也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变化。我希望，国内德语国家问题研究能紧跟形势发展，不断加强对德语国家政治、经济、外交、人文、社会等各领域研究，既注重学术的理论深度，也注重应用的实际效果，为增进相互了解和促进双边关系发展提供更重要的信息和决策参考。

# 对德国驻华大使施明贤博士的采访<sup>①</sup>

吴 江 李晓璇 熊 雁

2013年4月15日，德国驻华大使施明贤博士在大使官邸办公室接受了本刊的采访，以下是这次访谈内容的中文摘要：

## 欧洲的德国

欧债危机背景下的欧盟各国，一方面希望德国担负起领导者的重任，而另一方面却害怕被德国“支配”。在被问到如何看待德国在欧洲面临的这种两难困境时，大使首先认为这种两难困境是很自然的。德国是欧洲人口最多、经济实力最强的国家，其他国家自然期待德国在重大的欧洲问题上扮演领导者或共同领导者之一的角色。但是在欧债危机的背景下必须看到：这并非是因为德国比其他国家更聪明，而是因为统一的原因使得德国较早地经历了其他国家现在可能还未进行的改革。德国历时15年艰难进行的结构性改革以及施罗德政府时期实施的“2010议程”使德国逐渐摆脱了“欧洲病夫”的称号。德国的经验证明欧盟必须采取措施使其经济能够长期稳定发展，而不是仅仅解决眼前的债务危机。为此需从三个层面采取措施：一是

各个国家必须走改革之路以及从结构上提高其竞争力；二是统一的货币要求欧盟各国在经济和财政政策上进行协调；三是欧盟应团结一致。至于说到欧盟一些国家害怕被德国“支配”，大使认为虽然从历史的角度可以理解这些国家的担心，但是也必须看到这种担心是毫无根据的：当今的德国不会谋求欧洲的霸权地位。大使指出，德国总理默克尔在克服欧债危机的进程中试图团结法国和波兰等邻国，并在民族国家改革和欧洲团结中进行平衡，德国将担当起一个团结的德国和一个欧洲的德国的角色。

## 德国在阿富汗驻军

2002年年底，德国前国防部长斯图鲁克曾说过“德国的国防也在兴都库什山麓进行”。在被问到斯图鲁克的这句话在11年后的今天是否仍然适用以及如何评价德国在阿富汗驻军时，大使认为斯图鲁克的这句话要放在“9·11”恐怖袭击的特定背景下来理解。德国的阿富汗驻军有联合国的授权和北约的领导，这一点对德国而言至关重要。11

① 此文为本刊对德国驻华大使施明贤博士德文采访的中文摘要，懂德文的读者请直接阅读德文采访全文。

年以来，德国的阿富汗派驻取得了进展，在阿富汗安全力量部分接管责任后，德国将更多扮演辅助的角色。阿富汗的和平与稳定不能通过外界，更不能通过武装暴力来实现。军事干涉只能助长消除或降低稳定发展的风险，接下来需要阿富汗人民自己在一个安全的环境下建设国家，这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阿富汗人民还会不断地需要德国提供帮助。德国愿意在 2014 年以后继续在培训警察和军队以及贯彻政策领域上积极促进阿富汗的发展，大使期望中国与德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一起共同帮助阿富汗建设稳定的社会结构。

### 价值观导向的利益政策

德国外交的基本准则是以价值观为取向并以利益为导向，在被问及作为德国驻华大使如何践行这一外交准则时，大使首先认为价值观和利益之间并无冲突，价值观是利益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德国实行的是价值观导向的利益政策。接着大使通过分析德国的历史经验教训指明人权并非奢侈品，也不是西方国家的发明，而是一个稳定、健康社会的一部分。大使指出通过 30 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也带来了诸如贫富差距等问题。这些类似问题发达国家也曾经历过，只有通过“社会公正”来解决。大使赞赏中国新任国家主席习近平打击腐败、创造公正的决心。作为驻华大使，施明贤博士上任伊始就把法治作为工作的中心任务之一，因为法治是打击腐败的最佳手段，也是保障社会稳定发展的前提。在大使的心中，没有什么能比中国继续稳定发展更为重要。因为稳定的中国对于亚洲的和平至关重要，同时会给中德两国的经贸关系继续释放积极的信号。

### 德国智库的作用

在被问到德国智库在德国对华政策中扮

演的角色时，大使认为德国有一些重要的智库与大学关系非常密切，这些智库专业上非常出色并与政界保持着紧密的对话。德国智库的政策影响力不如美国智库的政策影响力大，不过德国智库的作用还处在上升态势，例如德国的麦卡托基金会出资在柏林创建了一个新的中国研究中心，这个中心或许会成为研究中国和东亚的一个核心机构。

### 大使的中国观

2007 年 8 月起，施明贤博士出任德国驻华大使。这次在被问到出任大使的这 6 年里，他的中国观是否多少发生改变时，大使作了肯定的回答。大使认为中国是一个美丽的国家，也是世界上最复杂、最矛盾、最具多样性的国度。大使任职以来足迹几乎遍布中国的大江南北，他接触了不同的人 and 事。这些经历使得大使能够更好地理解要使拥有接近 14 亿人口的这个巨大的国家相对稳定地发展有多难。大使认为中国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就，拥有如此灿烂的文化，无需惧怕批评，而应学会妥善处理内部和外部的批评，更加自信地倾听不同的意见。他还表示对中国新一届领导班子满怀希望，因为中国正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 中德战略伙伴关系

在被问到“中德战略伙伴关系”的特殊之处时，大使认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德关系目前处于最好的时期，因为双方不仅将“中德战略伙伴关系”作为一个概念，而且身体力行。“战略”意味着着眼长远、全方位发展以及“战略互信”。德国是世界上唯一与中国进行法治国家对话的国家，前不久两国在杭州成功地召开了“中德法治国家对话第十三届法律研讨会”，类似这样围绕棘手的社会话题所展开的交流增进了双方的互信。德国希望看到一个稳定的、经济和社会全方位

发展的中国。当今世界面临的种种问题与挑战都需国际社会共同解决，因此，“战略互信”意味着中德两国要肩并肩寻找共同发展的道路。

### 德国将竭尽全力推动中欧关系发展

访谈的最后，大使谈到了中欧关系。大使表示德国是欧盟的一部分，德国希望看到一个强大和稳定的欧盟。大使本人对于欧盟

的设想是希望欧盟继续深化，最终发展成为一个政治联盟。中国和欧盟必将成为强有力的合作伙伴。在过去几年里召开的一系列峰会已经证明中欧关系处于良好的发展态势。目前中欧之间出现的例如在贸易领域的争端需要双方通过国际社会的现有手段解决。从根本上看，中欧关系正走在正确的道路上，德国将竭尽全力推动中欧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采访者简介：吴江，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系副教授，博士。

李晓璇、熊雁，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系硕士研究生。

# Interview mit Herrn Dr. Schäfer, Botschafter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in China

WU Jiang, LI Xiaoxuan, XIONG Yan



**Wu:** Vor dem Hintergrund der europäischen Schuldenkrise steckt Deutschland in einem Dilemma. Einerseits wird deutsche Führung erwartet, andererseits haben viele europäische Länder Angst vor einem „Diktat aus Deutschland“. Wie erklären Sie dieses Dilemma?

**Dr. Schäfer:** Das ist—wenn man so will—ein ganz natürliches Dilemma. Deutschland ist das bevölkerungsreichste und wirtschaftsstärkste Land Europas. Daher gibt es eine natürliche

Erwartung an Deutschland, in wichtigen europäischen Fragen Führung oder Mitführung zu übernehmen.

Aber in dieser europäischen Schuldenkrise kommt ein zweiter Aspekt hinzu: Deutschland hat die Reformprozesse, die andere Länder noch vor sich haben, bereits hinter sich gebracht. Nicht weil wir klüger waren, sondern weil uns die deutsche Wiedervereinigung dazu gezwungen hat. Es war ein großer Kraftakt, die neuen Bundesländer zu integrieren. Dafür

mussten wir über 15 Jahre hinweg schwierige Strukturreformen in Deutschland durchführen, zuletzt durch die „Agenda 2010“ unter Kanzler Gerhard Schröder. Deutschland galt während dieser Zeit als „kranker Mann“ Europas.

Heute sind wir in einer Position relativer Stärke und wissen aus eigener Erfahrung, dass es bestimmter Strukturreformen bedarf, um die Schuldenkrise innerhalb der EU nicht nur kurzfristig zu lösen, sondern die europäischen Volkswirtschaften auch langfristig zu stabilisieren.

Dazu sind Maßnahmen auf drei Ebenen notwendig: Jedes Land muss die eigene Wettbewerbsfähigkeit strukturell und durch eigene Reformprozesse sichern. Weiter müssen die europäischen Prozesse angepasst werden – eine einheitliche Währung bedarf einer Abstimmung der Wirtschafts- und Finanzpolitiken. Das dritte Element ist die Solidarität der wirtschaftlich potenteren mit den schwächeren Partnern. Wir müssen sparen, strukturelle Reformen durchführen und gleichzeitig Impulse für Wachstum setzen. Genau hier hat sich das von Ihnen bezeichnete „Dilemma“ entwickelt: Die Bundesregierung hat deutlich gemacht, dass die beiden Elemente – Sparen und Strukturreformen – sehr wichtig sind; gleichzeitig wurde das ebenso wichtige Element – die deutsche Bereitschaft Solidarität zu zeigen – häufig nicht mehr gehört. Es handelt sich also nicht im Entferntesten um ein deutsches „Diktat“, sondern ganz im Gegensatz um die tiefe Überzeugung einer Regierung mit ehemals den gleichen Problemen, aus den eigenen Erfahrungen zu lernen. Es ist verständlich, dass diese Ratschläge, die aus einem großen, jetzt wirtschaftlich wieder stabilen Deutschland kommen, Sorge auslösen können,

insbesondere vor dem Hintergrund der deutschen Geschichte. Diese Sorgen sind aber unberechtigt. Es gibt heute in Deutschland kein hegemoniales Streben mehr.

Bundeskanzlerin Merkel versucht zusammen mit unseren französischen und polnischen Nachbarn, eine vernünftige Balance zwischen nationalen Strukturreformen, Wachstumsimpulsen und europäischer Solidarität, von der Deutschland selbstverständlich einen großen Teil schultern muss, zu schaffen. Ich glaube, wir werden unserer Rolle als ein solidarisches und als ein europäisches Deutschland gerecht.

**Wu:** Ende 2002 hat der damalige deutsche Verteidigungsminister Peter Struck gesagt: *„Die deutsche Verteidigung findet auch am Hindukusch statt.“* Jetzt steht schon fest, dass der Afghanistan-Einsatz Ende 2014 enden wird. Gilt der Satz von Peter Struck immer noch? Wie bewerten Sie den Bundeswehreinsatz in Afghanistan?

**Dr. Schäfer:** Der Satz des damaligen Verteidigungsministers muss natürlich aus der Situation im Jahr 2002 verstanden werden. Der Angriff auf das World Trade Center, auf das Pentagon sowie die anderen terroristischen Aktivitäten im September 2001 kamen aus Afghanistan. Neben unserer Solidarität mit den USA war es die Sorge, dass diese terroristische Gewalt den Westen insgesamt und damit auch uns bedrohte. Deshalb war der Satz richtig.

Obwohl ich diesen Satz nicht beliebig in die Zukunft gerichtet wiederholen möchte, gilt weiter, dass unsere Sicherheit immer dort gewährleistet werden muss, wo Sicherheitsrisiken für unser

Land entstehen. Mittlerweile haben wir 11 Jahre Afghanistan-Einsatz unter Führung der NATO und unter einem UNO-Mandat – beides war uns sehr wichtig – hinter uns. Die Bundeswehr hat große Verantwortung übernommen, vor allem im Norden des Landes. Es geht für uns darum, den Afghanen Schutz zu geben und es den afghanischen Sicherheitskräften durch Ausbildung zu ermöglichen, Verantwortung selbst zu übernehmen.

Wir haben dabei große Fortschritte gemacht. Nach der teilweise bereits erfolgten Übernahme der Verantwortung durch die afghanischen Sicherheitskräfte können wir zunehmend eine subsidiäre Rolle einnehmen. Die Situation in manchen Teilen Afghanistans ist jedoch nach wie vor labil. Dies sieht man an den immer wieder zu beklagenden Zwischenfällen, bei denen Angehörige der afghanischen Sicherheitskräfte und NATO-Einsatzkräfte, darunter auch Deutsche, ums Leben kommen.

Dennoch ist die Basis gelegt für einen Prozess, bei dem die Afghanen selbst Stabilität und Sicherheit in ihrem Land gewährleisten können und müssen. Stabilität und Frieden in Afghanistan können langfristig nicht von außen und mit Waffengewalt hergestellt werden. Militärische Interventionen können nur helfen, die Gefahren für eine stabile Entwicklung einzudämmen oder abzubauen. In einem sicheren Umfeld muss „nation building“, das heißt die Schaffung von staatlichen Strukturen und Institutionen und der Aufbau einer funktionierenden Zivilgesellschaft, durch die Menschen im Land selbst geschehen.

Das ist ein langer Weg, bei dem die Afghanen auf unsere Hilfe bauen können. Wir engagieren uns über 2014 hinaus bei der

Ausbildung von Polizei und Militär oder auch im entwicklungspolitischen Bereich. Wir unterstützen Afghanistan zunächst bis 2016 mit bis zu 430 Mio. Euro jährlich und sind damit einer der größten Entwicklungsgeber vor Ort. Wichtig ist vor allem die Stärkung der Zivilgesellschaft und des Bildungssektors. Ich hoffe sehr, dass China als Nachbar Afghanistans zusammen mit uns und anderen Europäern mithelfen wird, stabile gesellschaftliche Strukturen in Afghanistan zu fördern.

**Wu:** Die deutsche Außenpolitik ist wertegebunden und interessengeleitet. Wie haben Sie sich als deutscher Botschafter in China von diesem Prinzip der deutschen Außenpolitik leiten lassen?

**Dr. Schäfer:** Ich glaube, es gibt keinen Gegensatz von Interessen und Werten. Werte sind integraler Bestandteil unserer Interessen. Es ist daher wichtig, dass wir eine wertegesteuerte Interessenpolitik verfolgen.

Es ist sehr wichtig zu verstehen, warum Werte Teil unserer Interessen sind. Deutschland hat im 20. Jahrhundert durch zwei Diktaturen im eigenen Land schreckliche Erfahrungen gemacht. Wir haben in Deutschland gelernt, dass stabile Gesellschaften nur entstehen können, wenn die Rechte der Gemeinschaft ebenso wie die Rechte des Einzelnen durchgesetzt werden. Menschenrechte sind daher für uns kein Luxusgut und schon gar keine westliche Erfindung, sondern sind wichtiger Teil einer stabilen, gesunden gesellschaftlichen Entwicklung. Stabilität in einer Gesellschaft ist die Voraussetzung für Prosperität und wirtschaftliche Entwicklung.

China steht nach der rasanten Entwicklung während der letzten 30 Jahre vor gewaltigen Herausforderungen. Die Schere zwischen dem bereits wohlhabenderen Teil der Bevölkerung und den Menschen, die noch arm sind, ist sehr groß. Noch immer leben etwa 250 Mio. Menschen in Armut oder am Rande der Armut, während rund 1/4 der chinesischen Bevölkerung bereits dem Mittelstand angehört. Letzteres stellt natürlich einen enormen Fortschritt dar. Dieses Problem, mit dem sich die chinesische Gesellschaft konfrontiert sieht, ist den Problemen anderer sich entwickelnder Gesellschaften nicht unähnlich.

Das Schlüsselwort hier heißt „soziale Gerechtigkeit“. Soziale Gerechtigkeit bedeutet die Gewährleistung gleicher Chancen und die Garantie gleicher Behandlung bei der Umsetzung des jeweiligen persönlichen Lebensentwurfs. Derartige individuelle Kreativität kann sich nur über Gerechtigkeit entfalten. Der neue Staatspräsident und Generalsekretär der Kommunistischen Partei der Volksrepublik China, Xi Jinping, hat genau dies in seinen ersten Reden deutlich gemacht: Um Gerechtigkeit herzustellen, müsse Korruption bekämpft werden. Wird Gerechtigkeit empfunden, gewinnt eine Regierung Glaubwürdigkeit und Legitimität und hat damit die Möglichkeit, Reformen durchzusetzen.

Rechtsstaatlichkeit ist im Kampf gegen Korruption das beste Mittel. Rechtsstaatlichkeit bedeutet, dass jeder Mensch – egal wie mächtig – vor dem Gesetz gleichbehandelt wird. Dies ist auch der Kern unserer Wertepolitik, die die Balance zwischen den Ansprüchen der Gesellschaft und jedes Einzelnen in ein vernünftiges Verhältnis stellt, um damit Stabilität in einer Gesellschaft

zu erreichen. Das Thema Rechtsstaatlichkeit war deshalb von Anfang an einer der Schwerpunkte meiner Amtszeit als Botschafter. Gerechtigkeit, Rechtsstaatlichkeit und dabei insbesondere unabhängige Gerichte, die das Recht jedes Einzelnen ohne Druck von außen umsetzen, sind Voraussetzungen für eine stabile Entwicklung. Nichts liegt mir mehr am Herzen als eine stabile Entwicklung Chinas, die wichtig ist für ein friedliches Asien und weiterhin positive Vorzeichen für unsere Wirtschaftsbeziehungen und unseren Handel setzt.

**Frau Li:** Was für eine Rolle spielen die think tanks in Deutschland für die deutsche China-Politik?

**Dr. Schäfer:** Wir haben einige wichtige think tanks, die meist auch sehr gut mit den Universitäten vernetzt sind. Diese think tanks sind fachlich hervorragend aufgestellt und befinden sich in einem engen Dialog mit der Politik. Think tanks haben aber nicht den starken Einfluss auf die Politik wie dies vor allem in den USA zu beobachten ist. Dort gibt es sehr starke und spezialisierte think tanks, die in ihren Bereichen die Politik häufig wesentlich mitbestimmen. Dennoch werden think tanks auch in Deutschland zunehmend wichtiger. Beispielsweise entsteht ein von der Mercator-Stiftung finanziertes, neues China-Zentrum in Berlin, das möglicherweise einen neuen Nukleus für Verstand, Wissen und Analyse hinsichtlich China und Ostasien bilden kann.

**Frau Xiong:** Sie arbeiten schon 6 Jahre als Botschafter in China, hat sich Ihr China-Bild zum Teil geändert?

**Dr. Schäfer:** Während einer so langen Zeit verändert sich natürlich auch das eigene Bild eines Landes. China ist das komplexeste, das widersprüchlichste und das vielschichtigste Land, das ich kenne. Es ist schwer für die Außenwelt, diese große Komplexität der Gesellschaft in dieser Nuanciertheit wahrzunehmen. China ist Industrie- und Entwicklungsland zugleich. Dem muss die Politik natürlich Rechnung tragen und begreifen, dass China mindestens noch zwei oder drei Generationen in seiner Entwicklung benötigt, um sich stabil zu einer bürgerlichen Gesellschaft zu entwickeln.

Überraschend war für mich auch die unglaubliche Dynamik in China, vor allem die der jungen Generation. Der Wunsch nach einer besseren Zukunft und die manchmal fehlende Gelassenheit sind dabei zwei Seiten der gleichen Medaille.

Die Dynamik und Vielfalt in der chinesischen Kunstszene hat mich überrascht und beeindruckt. Auf ganz eigene Art und Weise ist hier ein kreatives Potential entstanden, das von großer Bedeutung für China ist.

China ist ein wunderbar schönes Land. Ich habe fast alle Provinzen Chinas bereisen können. Leider konnte ich nur nicht nach Tibet reisen. Vom Nordosten bis zum Südwesten des Landes habe ich viel Schönheit und eine unglaubliche Vielfalt von Menschen erlebt. Ich verstehe die Schwierigkeiten viel besser, ein so riesiges Land mit fast 1,4 Milliarden Menschen stabil zu entwickeln. Die Menschen in China stehen vor praktischen und meist lokalen Herausforderungen: verschmutztes Wasser, ungesunde Luft, Landnahme und fehlender Schutz bei Infrastrukturprojekten. Man sollte

daher Verständnis für ihre Empörung haben, Petitionen ernst nehmen und anhören. China hat so großen Erfolg und so viel kulturelle und zivilisatorische Substanz, dass man vor Kritik keine Angst haben muss. Um ein respektierter Spieler in der Welt zu werden, muss China lernen, mit Kritik von innen und von außen umzugehen. Ich bin sehr hoffnungsvoll, dass die neue politische Führung in China genau das spürt und genau diesen Wunsch hat, mehr Meinungen und Kritik zuzulassen. Gerade im Internet findet eine lebhaftere Diskussion statt. China ist auf dem richtigen Weg, könnte aber noch mehr Vertrauen in sich selbst haben und mehr unterschiedliche Meinungen zulassen.

**Wu:** China und Deutschland wollen die strategische Partnerschaft kontinuierlich ausbauen. Was ist das Besondere an dieser strategischen Partnerschaft?

**Dr. Schäfer:** Man kann heute ohne Übertreibung sagen, die Beziehungen zwischen Deutschland und China waren nie besser als im Augenblick. Der Grund dafür ist, dass wir es geschafft haben, strategische Partnerschaft nicht nur als Begriff zu nutzen, sondern diesen Begriff mit Leben zu erfüllen.

„Strategisch“ heißt, dass wir die Beziehungen langfristig ausrichten. Weiter zeichnen sich die Beziehungen durch ihre Breite in allen gesellschaftlichen Bereichen aus. Dabei stellt die Politik den Rahmen bereit, der ausgefüllt wird von Unternehmen, Organisationen, Künstlern, Wissenschaftlern und allgemein Menschen, die ein Interesse aneinander haben und voneinander profitieren.

Ein weiteres wesentliches Element ist „strategisches Vertrauen“. Ein solches Vertrauen erfordert, dass man unabhängig von der eigenen Position zuhört und sich gegenseitig auch bei kontroversen Themen als Partner wahrnimmt. Hier haben China und Deutschland erhebliche Fortschritte gemacht.

Deutschland ist das einzige Land der Welt, das mit China einen Rechtsstaatsdialog führt. Das erfordert die Bereitschaft, auf Augenhöhe miteinander umzugehen. In diesem Jahr haben wir in Hangzhou, unter Vorsitz der deutschen Justizministerin und des Leiters des chinesischen Rechtsamts des Staatsrats, das 13. Rechtsstaats-symposium beendet. Das Thema war Verwaltungsprozessrecht. Dabei wurde mit großem Ernst und erstaunlichem Konsens über gerechtes und transparentes staatliches Handeln, unabhängige Gerichte und die Notwendigkeit einer Orientierung am Gesetz diskutiert. Diese Art von Diskussionen über schwierige gesellschaftliche Themen schafft Vertrauen.

Deutschland hat ein Interesse an einem stabilen China. Wir freuen uns, wenn China seine positive dynamische, nicht nur wirtschaftliche, sondern auch gesellschaftliche Entwicklung fortsetzt und eine stabile Gesellschaft aufbaut. In einer sich neu formierenden und multipolaren Welt gibt es große Herausforderungen wie Klimaschutz, Energiesicherheit oder die Bekämpfung der Armut, die nicht allein von China, Deutschland oder Europa gelöst werden können. Wir können dies nur gemeinsam als Partner lösen. Wir als strategische Partner sollten Vertrauen zueinander haben und Schulter an Schulter diese Herausforderungen in Angriff

nehmen. Dabei haben wir in den letzten Jahren einen richtigen Schritt nach vorne gemacht.

**Wu:** Als Botschafter haben Sie viel zu diesem Vertrauen beigetragen. Ich glaube, dieses Vertrauen gilt auch für die Beziehungen zwischen China und der EU.

**Dr. Schäfer:** Deutschland ist ein Teil der EU. Für uns ist die Europäische Union nicht ein Wirtschaftsraum, für uns hat die Europäische Union eine wichtige politische Finalität. In einer zunehmend multipolaren Welt muss Europa einer der tragenden Pole sein; ein Zurück in das 19. Jahrhundert der Nationalstaaten ist keine Alternative. Die Europäische Union ist ein Ziel, zu dem es keine Alternative gibt. Wir wollen eine starke und stabile EU. Meine Vision ist eine EU, die weiter zusammenwächst, sich weiter integriert und sich schließlich zu einer politischen Union entwickelt.

Europa und China müssen starke Partner sein. Mit den Gipfeln der letzten Jahre sind wir hier auf einem guten Weg. Die auftretenden Kontroversen, etwa im Handelsbereich, müssen wir mit den vorhandenen Instrumenten der internationalen Gemeinschaft lösen. Grundsätzlich entwickeln sich die europäisch-chinesischen Beziehungen in die richtige Richtung und Deutschland wird alles in unseren Möglichkeiten stehende tun, um dabei zu helfen.

**Wu:** Herr Botschafter, wir danken Ihnen für das Gespräch.

## 对欧盟驻华大使艾德和博士的采访<sup>①</sup>

张 凯 袁 洁 王海涛

2013年5月8日，欧盟驻华大使艾德和博士在大使官邸办公室接受了本刊的采访，以下是这次访谈内容的中文摘要：

大使在评价中欧关系时指出，双边关系发展势头良好，特别是在经贸领域，欧洲是中国最大的经济伙伴，同时中国是欧盟第二大经济伙伴。中欧在许多其他领域也有紧密的合作，如能源问题、环境保护及扶贫问题等。

大使认为，中欧经贸关系发展迅猛的主要原因在于：第一，两大经济体互补性强；第二，其他领域的关系与经贸关系密不可分。欧洲有世界上最大的内部大市场，而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也极大地推动了双边经济关系的发展。

大使主要从三个方面总结了欧洲的出口商和投资者在中国遇到的障碍或困难，即市场准入问题、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以及对合资企业的投资限制。如根据合资企业相关法规，欧洲的汽车制造商占有的股份不能超过50%。中欧正通过双边对话致力于解决这些问题，为中国和欧洲的出口商和投资者创建公平的竞争环境。大使还指出，这不是中欧之间特有的问题，而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

近年来，大量中国投资者涌入欧洲。欧洲商会的一项研究表明，中国投资者对欧洲的投资环境非常满意。2012年，中国对外投资最重要的目的地是欧洲，对欧投资达到130亿美元。同时，欧洲也欢迎中国企业到欧洲投资。但是，根据这项研究，中国企业在欧洲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是众多的、不同层次的规章制度。因此，欧盟大使建议，中国应该设立类似于欧洲商会这样的机构，为本国的投资者和出口商提供相应的咨询和服务。另外，在欧债危机的背景下，许多欧洲国家实行紧缩政策，被迫出售国有企业，大力推行“私有化”。目前，外国投资者也可以收购欧洲的国有企业，但是本身是国有企业的投资者除外，因为在欧洲人看来，私有经济能更好地完成经济指标。由于中国在欧洲的投资者主要是国有企业，因此，艾德和大使表示，如果让更多的私有企业来欧投资，会取得更丰硕的成果。

针对欧洲对中国的一些产品征收惩罚性关税或采取反倾销措施以及中国的应对措施，艾德和大使表示，与这些措施本身相比，他

① 此文为本刊对欧盟驻华大使艾德和德文采访的中文摘要，懂德文的读者请直接阅读德文采访全文。

更担心公众对这些措施的反应。因为这些措施是在世贸组织的框架下实行的，是合法的。而报复性措施在这一体系中并没有预先规定。大使认为，人们无论如何也不能进行贸易战、保护主义或者采取报复性措施，因为这会激发一些与法律和技术程序无关的情绪的产生，并造成关系的恶化，意图将正常的贸易争端政治化的人要对此负责。大使指出，中国也对欧盟采取类似的措施，这是非常正常的事情。只有在世贸组织的框架下行事，才能为所有的企业创造平等的竞争环境。同时，由于成员国之间存在不同的利益，欧洲企业内部也存在矛盾。在这种情况下，欧盟委员会有权处理这些贸易问题，他们将尝试通过召开听证会听取各方利益以寻求平衡的处理方式。在贸易问题中，总有成者、败者。

在谈到双边政治关系时，大使指出，经济关系是政治关系的前提，正如欧洲从经济联盟走向政治联盟一样，中欧关系也是如此。因此，政治关系没有经济关系紧密是可以理解的。但不能忽视的是，中欧在一些重要的政治问题上也有紧密的合作，如打击索马里海盗、伊朗核会谈等，双边政治关系变得越来越紧密。虽然中国的外交重点在美国，但是在许多政治问题上，中国与欧洲之间的相互支持要比中美之间更多。比如在发展援助方面，欧洲是世界上提供发展援助最多的地区，同时，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也开始向较弱的发展中国家提供发展援助。因此，中国和欧洲将来可以在这个领域加强合作，这里蕴藏着尚未开发的潜能。

大使对“战略伙伴关系”中的“战略”一词的理解是，如果没有另外一方的帮助，任何一方都无法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如中欧作为多极化世界中的重要两极，中国谋求

的可持续发展与欧洲谋求的摆脱危机的目标单靠一己之力是无法实现的。这同样适用于全球性的挑战，如气候保护、能源安全、网络安全等。因此，欧盟需要战略伙伴，这样才有足够的能力和影响力共同应对挑战、实现各自的目标。

在被问及欧美之间是否有竞争关系时，例如，在经济危机中美国和欧盟都很需要中国的投资，大使先生首先解释了三个不同的概念，即：竞争、伙伴关系和相互依存。中国和美国、欧盟既是伙伴，例如在环境保护问题上；同时也有竞争关系，例如在光伏板生产领域。但是更重要的是保持关系的平衡。随着全球化深入，国家间的相互依赖性增强。如果欧元区解体，也会影响中国经济，目前欧洲经济的短暂不景气也已经影响到了中国对欧盟出口。中国和欧盟的经济健康是双方的福祉，是保持双方关系的稳定因素。同样，美国和欧盟既是合作伙伴，也存在竞争关系，例如中国购买空客还是波音飞机，会引起美国与欧盟的竞争。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和欧盟不是对手，对手和竞争关系有很大区别，“对手”更多的是冷战时期形成的意识形态。

在被问及欧盟迟迟不愿废除对华武器禁运的原因以及美国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大使先生回答，美国在欧盟对华武器禁运问题上并没有起到重要作用，因为这是欧盟对华武器禁运。事实上，欧盟已经出现解除对华武器禁运的迹象，但是还没有达成共识。在这个问题上中国需要做出更多的努力，例如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sup>②</sup>。这个问题需要逐步得到解决，具体时间目前仍无法预测。

在关于欧盟拒绝承认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的问题上，大使先生指出，市场经济地

<sup>②</sup> 我国政府于1998年10月5日在联合国总部签署了该公约，但由于它与我国现行法律有诸多冲突之处，所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未批准该公约。

位问题是一个复杂的技术问题。虽然中国取得了巨大进步，但是欧盟认为中国还没有达到世界贸易组织所规定的关于市场经济地位的标准，例如政府要尽量少地干预经济。而且在中欧双方的对话中，中国政府不太愿意作出让步。大使认为这个问题更多地取决于中国自身。

对于欧债危机的发展情况，大使先生认为欧债危机是欧盟自成立以来所面临的最严重的危机，但是所采取的措施给成员国提供了很大的支持。欧洲稳定机制投入了数千亿欧元，欧洲央行也表示会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拯救欧元区。而且也有迹象表明，欧洲经济正在复苏，但是现在的情况仍然很严峻。大使先生认为，欧盟已经跨过了欧债危机的低谷，他对欧盟的前景充满信心。因为欧盟就是诞生于第二次大战后的危机之中，危机会

提供改革动力，使欧盟变得更强大。

在关于欧元区前景的问题上，大使先生表示欧元区国家需要达到特定的稳定标准，例如国家预算要达到平衡，各国要提高自己的竞争力。欧元区内不会再搞汇率，否则欧元也将不复存在。在危机中，大使的工作重点是致力于提高人们对欧元的信任。中国提供了重要的支持，也始终保持了对欧元的信任，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大使先生对欧元的前景持乐观态度，认为欧元不会和欧盟一起消失。

李克强总理曾对德国总理默克尔讲到，中德关系是中欧关系的领跑者。对此，大使先生认为，德国是欧盟人口最多的成员国和最大的经济体，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因此中国对德国的这一定位是可以理解的，而德国在此所承担的角色是基于其在欧洲的责任。

采访者简介：张凯，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系讲师，博士。

袁洁、王海涛，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系硕士研究生。

# Interview mit Herrn Dr. Ederer, Botschafter der EU in China

ZHANG Kai, YUAN Jie, WANG Haitao



**Zhang:** Herr Botschafter! Könnten Sie uns eine kurze Gesamteinschätzung zur Entwicklung der beiderseitigen Beziehungen zwischen China und der EU geben?

**Dr. Ederer:** Die Beziehungen sind sehr gut. Europa ist für China der größte Wirtschaftspartner, China ist für die EU der zweitgrößte Wirtschaftspartner. Das spricht schon für sich. Wir arbeiten sehr eng zusammen in vielen Gebieten, Energiefragen, Klimaschutz, Armutsfragen. Wir feiern dieses Jahr 10 Jahre strategische Partnerschaft. Und wir wollen auch

im Dezember beim Gipfel zwischen China und Europa nach vorne schauen für weitere 10 Jahre.

**Zhang:** Warum können sich die Wirtschaftsbeziehungen zwischen China und der EU Ihrer Meinung nach so schnell entwickeln?

**Dr. Ederer:** Ich glaube, es gibt verschiedene Gründe. Einer davon ist, dass unsere Wirtschaften stark komplementär sind. Ein anderer Grund ist, dass die Beziehungen häufig mit den Wirtschaftsbeziehungen verbinden. Europa bildet

den größten Binnenmarkt der Welt, der sehr offen ist, also offen für ausländische Dienstleister und Produzenten. Und umgekehrt hat Chinas Beitritt zur Welthandelsorganisation auch einen richtigen Schub für die bilateralen Wirtschaftsbeziehungen gegeben.

**Zhang:** Haben sich Besucher aus Europa jemals darüber beschwert, dass sie hier in China Hindernissen oder Schwierigkeiten begegnet sind?

**Dr. Ederer:** Wir beschäftigen uns sehr intensiv mit der Frage der Offenheit beider Märkte. Fragen des Marktzugangs sind für beide Seiten sehr wichtig. Wir glauben, dass Chinas Markt, zum Beispiel im Bereich der öffentlichen Ausstattungen, im Bereich der Dienstleistungen, der Markt ist weitgehend noch geschlossen. Es gibt auch Fragen des Schutzes des geistigen Eigentums. Und wir versuchen, im Gespräch mit der chinesischen Regierung diese Dinge anzugehen und zu verbessern. Es gibt auch Investitionsbeschränkungen bei Joint Ventures. Wie Sie wissen, gibt es Joint Venture-Bestimmungen, wonach eine europäische Autofirma nicht mehr als 50% übernehmen könnte. Und wir arbeiten daran, dass diese Investitionsbedingungen und Handelsbedingungen auf beiden Seiten gleich sind, dass wir unseren offenen Markt beibehalten und China auch seinen Markt öffnet.

Wir haben mit verschiedenen Ministerien auf verschiedenen Ebenen Dialoge geführt zu teilweise sehr technischen Fragen. In letzter Zeit fanden in China multilaterale Gespräche statt zur Frage, wie stark man Exportkredite zur Förderung der Ausfuhren einsetzen kann, denn es gibt verschiedene Standards in der

OECD, in Europa und in anderen Ländern. Und man möchte einfach ein level playing field, ein Spielfeld herstellen, auf dem für alle Exporteure die gleichen Regeln gelten. Das ist kein EU-China-spezifisches Thema, sondern ein globales Thema, auch mit Brasilien, auch mit anderen Ländern.

**Zhang:** Inzwischen sind auch viele chinesische Investoren in Europa aktiv. Neben den Erfolgen gibt es aber auch viele Misserfolge. Welche Ratschläge könnten Sie auch für die chinesischen Investoren geben?

**Dr. Ederer:** Also, ich glaube, grundsätzlich ist es so, dass die chinesischen Investoren erstens gute Investitionsbedingungen in Europa finden, und zweitens sie eigentlich ganz zufrieden sind. Es gibt eine Studie der europäischen Handelskammer über die Erfahrungen chinesischer Investoren in Europa, in der die chinesischen Investoren eigentlich ganz zufrieden sind mit den Investitionsbedingungen in Europa. Es ist deshalb nicht erstaunlich, dass 2012 die wichtigste Investitionsdestination für chinesische Investitionen im Ausland Europa war. Ein Drittel aller chinesischen Investitionen 2012 im Ausland ist nach Europa gegangen, etwa 13 Milliarden Dollar, so ist es doppelt so viel wie die Investitionen in den USA. Das ist ein gutes Zeichen, ich will auch sagen, dass die chinesischen Investitionen in Europa sehr willkommen sind. Womit die chinesischen Investoren auch nach der Studie der europäischen Handelskammer sehr zu kämpfen haben, ist die sehr starke Regulierungsdichte. Europa ist ein sehr regulierter Markt, viele Regeln, und wir müssen alle kennen, ja? Es gibt auch

verschiedene Niveaus von Regeln. Und da ist mein Ratschlag an die chinesische Seite, dass man etwas schafft, die Europäer hier in China haben, nämlich nationale Handelskammern und auch eine europäische Handelskammer. Und die Handelskammern sind Institutionen, die europäische Exporteure und europäische Investoren praktisch bei der Hand nehmen und ihnen erklären, wie der chinesische Markt funktioniert. Ich glaube, dass diese Art von Dienstleistung für chinesische Exporteure und Investoren in Europa fehlt. Da wären Handelskammern in verschiedenen europäischen Ländern vom Vorteil, die den chinesischen Investoren auch den Weg weisen können.

Es gibt auch ein anderes Thema, wenn es um die Investitionen in Europa geht, sind viele Länder jetzt aufgrund der Austeritätspolitik gezwungen, staatliche Unternehmen zu verkaufen. Es gibt sehr viele Möglichkeiten für ausländische Investoren, die Staatsunternehmen einzukaufen. Das ganze läuft in Europa unter dem Stichwort „Privatisierung“, aber es gibt gewisse Vorbehalte gegen die Investoren, die selbst Staatsunternehmen sind, warum? Weil man glaubt, dass der Staat diese wirtschaftlichen Aufgaben nicht so gut erfüllt wie private Wirtschaft. Und deshalb schaue ich auch auf die Struktur der chinesischen Investitionen in Europa, die sehr stark von Staatsunternehmen geprägt sind. Ich glaube, wenn mehr Privatunternehmen aus China sich in Europa engagieren würden, würde das Bild vielleicht noch freundlicher sein, weil diese Regierungen in Europa, die staatliche Unternehmen verkaufen, glaube ich, positiver sind gegenüber den privaten Investitionen, denn sie wollen die Unternehmen privatisieren.

**Zhang:** Ich habe Anfang dieses Jahres in

der Zeitung etwas zu den Strafzöllen der EU gegen die chinesischen Stahlprodukte gelesen. In diesem Zusammenhang haben Sie gesagt, es sollte zu keinem Handelskrieg zwischen China und der EU kommen. Auf die Strafzölle und die Anti-Dumping-Maßnahmen reagieren die chinesische Regierung und Unternehmen auch mit entsprechenden Gegenmaßnahmen. Machen Sie sich Sorgen wegen eines möglichen Handelsstreites zwischen China und der EU?

**Dr. Ederer:** Ehrlich gesagt mache ich mir weniger Sorgen über die Maßnahmen als über die Behandlung der Maßnahmen in der Öffentlichkeit. Die Maßnahmen, die sowohl Europa, auch Länder wie China und die USA ergreifen, sind eigentlich Maßnahmen im Rahmen der Welthandelsorganisation. Das Verfahren ist sehr stark verrechlicht. Das tun eigentlich alle. Warum tun es alle? Wenn sie nämlich glauben, dass die andere Seite unfaire Preise verlangt, oder dass der Staat die andere Seite, die Industrie zu stark subventioniert. Insofern ist es eigentlich ein gesunder Teil des gesamten Handelsgefüges weltweit. Die Vergeltungsmaßnahmen sind in diesem System nicht vorgesehen. Wenn ich aber höre, dass auf der politischen Ebene oder in der öffentlichen Meinung von Handelskrieg gesprochen wird, von Protektionismus oder von Vergeltungsmaßnahmen, dann glaube ich, das tun wir alle auf keinen Fall, weil damit Emotionen geweckt werden, die eigentlich mit diesem Verfahren, das relativ rechtlich und technisch ist, nichts zu tun haben. Und je nachdem wie man das behandelt, kann es zur Verschlechterung der Beziehungen führen, aber ich glaube, dass diejenigen, die die Sachen politisch hoch spielen, die Verantwortung für eine Verschlechterung

tragen. Weil es kein Geheimnis ist, dass auch China solche Verfahren hat gegen die EU, und wir halten es für eine normale Sache. Ich finde, es sollte uns einfach den Verfahren der Welthandelsorganisation unterwerfen, so dass wir ein Spielfeld schaffen, wo alle Unternehmen gleiche Bedingungen haben.

**Zhang:** Inzwischen gibt es bestimmt auch innere Konflikte zwischen den verschiedenen europäischen Unternehmen, wie könnten solche Interessenkonflikte innerhalb der EU ausgeglichen werden?

**Dr. Ederer:** Wenn es so unterschiedliche Industrieinteressen gibt, auch vielleicht nach Mitgliedsstaaten verschieden, dann ist es so, dass die Europäische Kommission die Kompetenzen für diese Handelsfragen übernimmt, versucht durch öffentliche Anhörungen alle Interessen, so zu sagen, aufzunehmen, und dann eine balancierte Vorgehensweise zu schaffen. Und so war das auch in der Frage der Solarpolitik. Bei anderen Handelsfragen gibt es immer auch in den Ländern Gewinner und Verlierer.

**Zhang:** Zurzeit bestehen zwischen China und Europa keine großen Probleme. Aber die politischen Beziehungen beider Seiten bleiben immer hinter den schnell entwickelten wirtschaftlichen Beziehungen zurück. Könnten Sie zu diesem Thema Stellung nehmen?

**Dr. Ederer:** Die Wirtschaftsbeziehungen gehen häufig den politischen voraus. Auch Europa ist erst die Wirtschaftsunion, und am Ende die politische Union. Das war sogar das Verständnis der Gründerväter von Europa, dass man erst

technische Materien übereinander verbindet, und erst auf dieser Basis dann politische Beziehungen baut. Ich glaube, es ist ähnlich, wenn wir China und EU betrachten. Insofern stimmt das, dass die politischen Beziehungen nicht die Dichte erreicht haben wie die Wirtschaftsbeziehungen. Aber man muss auch sehen, dass China und die EU in einigen wichtigen politischen Fragen schon sehr eng zusammenarbeiten. Die Beispiele sind die Piraterie vor der Küste von Afrika, Somalia zu bekämpfen und die Verhandlung mit dem Iran. Und insofern glaube ich, dass wir eigentlich ein immer dichteres Netz zu politischen Beziehungen bekommen. Ich glaube, dass China, wenn es um politische Beziehungen geht, sehr stark auf die USA fixiert ist, dessen Gründe wir wenig zu diskutieren brauchen. Gleichzeitig ist es aber so, dass in vielen politischen Fragen die EU und China eigentlich mehr beieinander sind als China und die USA. Zum Beispiel, China sagt immer, es ist das größte Entwicklungsland, und gleichzeitig ist die EU der größte Geber von Entwicklungshilfe weltweit. Wiederum gleichzeitig hat China aber auch angefangen, selbst Entwicklungshilfe zu leisten an schwächere Entwicklungsländer. Und wir können z.B. bei der Entwicklungshilfe auch zum Teil gemeinsam was machen. Das sind ungenutzte Potentiale.

**Zhang:** Am Anfang haben Sie schon gesagt, in diesem Jahr ist das zehnjährige Jubiläum für die strategische Partnerschaft. Was verstehen Sie unter dem Attribut „strategisch“?

**Dr. Ederer:** Ich glaube, dass eine strategische Partnerschaft dann besteht, wenn keiner der Partner seine eigenen strategischen Ziele ohne den anderen erreichen kann. Und ich

glaube, dass die EU und China als große Pole in einer multilateralen Welt, viele Ziele, die sie sowohl selbst gesetzt haben, beispielsweise China das Ziel, eine nachhaltige Globalisierung, nicht die getrennte Entwicklung oder auch Europa die Gesundung nach der Finanzkrise nicht erreichen können, ohne die Unterstützung der anderen Seite. Das Gleiche gilt für globale Herausforderungen, Klimaschutz, Sicherheit im Cyberspace, Energiesicherheit. Ehrlich gesagt kann keiner von uns das alleine regeln, sondern wir brauchen diese strategischen Partner, die genügend Macht haben, und Einfluss, diese Dinge gemeinsam an andere zu legen. Und das ist, glaube ich, der Kern einer strategischen Partnerschaft. Es wird immer mehr Versuche geben, die Gemeinsamkeit zwischen der Diversifizierung auch gemeinsam zu behandeln.

**Zhang:** Eben haben Sie auch mal über die USA gesagt, dass China bei der Außenpolitik zu stark auf die USA fixiert sei. Haben Sie sich bei Ihrer Arbeit im Wettbewerb mit den USA gefühlt? Zum Beispiel brauchen die USA bei der Bewältigung der Schuldenkrise bzw. Finanzkrise chinesische Investitionen, während gleichzeitig Frankreich, Deutschland, natürlich auch andere europäische Staaten ebenfalls um diese Investitionen werben.

**Dr. Ederer:** Also die Welt ist für mich ein bisschen komplizierter als noch vor zwanzig Jahren. Hier möchte ich drei Begriffe für den Rahmen stellen, einer ist Wettbewerb, der andere ist Partnerschaft und der dritte ist die gegenseitige Abhängigkeit, die Interdependenz. China und die USA, China und Europa sind sowohl Partner, als auch Wettbewerber, z.B. bei

der Produktion von Solarplatten. Gleichzeitig sind wir aber politische Partner. Wir sind Partner z.B. bei der Frage Klimaschutz. Und diese Polarität, diesen Widerspruch müssen wir in Beziehungen ständig aushalten, balancieren. Und was uns hilft, ist, glaube ich, ein neues Paradigma in internationalen Beziehungen, das ist eine zunehmende Interdependenz. Das heißt, wir sind in keinem Nullsummenspiel, wo einer aufsteigt, und der andere absteigt, sondern ändern entweder schöner zusammen oder gehen gemeinsam herunter. Die Finanzkrise ist ein gutes Beispiel. Wenn Europa als Markt oder die Eurozone als Währungszone, zusammenbräche, hätte es massive negative Auswirkungen auf die chinesische Wirtschaft. Schon jetzt ist das so, dass durch die leichte Rezession in Europa die chinesischen Exporte nach Europa leiden. Das heißt, China hat das Interesse, dass Europa gesund ist, und Europa hat großes Interesse auf seine Wirtschaft und Politik, dass China gesund ist. Und das ist ein stabilisierender Faktor in diesem Spiel zwischen Wettbewerb und Partnerschaft. Wir müssen anerkennen, dass es sowohl Wettbewerb, als auch Partnerschaft gleichzeitig gibt. Und auch mal die USA und die EU sind Partner und Wettbewerber, auch in wirtschaftlichen Bereichen sind wir Wettbewerber. Die Frage, ob China Airbus kauft oder Boeing, die Frage ist Wettbewerb auch zwischen den USA und Europa. Aber eins ist auch klar. China und die EU sind keine Gegner. Und da ist ein großer Unterschied zwischen Wettbewerbern und Gegnern. Und das Konzept von Gegnern ist eher ein Konzept aus dem Kalten Krieg, wie im Kalten Krieg in Europa.

**Yuan:** Das folgende ist vielleicht

ein sensibles Problem, nämlich das EU-Waffenembargo gegenüber China. China betrachtet das Waffenembargo als eine Diskriminierung. Bis heute will die EU das Embargo leider nicht aufheben. Was ist Ihrer Meinung nach der Hauptgrund dafür? Und was für eine Rolle spielen die USA dabei?

**Dr. Ederer:** Eigentlich spielen die USA bei der Frage der Aufhebung des Waffenembargos der EU keine große Rolle, weil es ein Waffenembargo der EU ist. Um ganz offen zu sein, das Waffenembargo geht zurück auf eine Zeit des nationalen Ereignisses 1989 auf dem Tian'anmen-Platz. In der Tat gibt es seither zwar einen Willen in der EU, zu einer Aufhebung zu kommen, aber keine Einigkeit zurzeit in der EU. Ich denke, dass einige chinesische Handlungen diese Lage erleichtern könnten, wie z.B. die Ratifizierungen internationaler Übereinkommens über bürgerliches Zivilrecht. Aber ich denke, es wird ein schrittweiser Prozess sein. Ehrlich gesagt, kann ich aber nicht vorhersagen, wie lange es dauert.

**Wang:** Wie schätzen Sie die Nichtanerkennung des chinesischen Marktwirtschaftsstatus durch die EU ein? Nach fünfzehnjähriger Mitgliedschaft in der WTO wird China diesen Status 2016 auf jeden Fall erhalten. Warum kann die EU dies nicht früher zugestehen?

**Dr. Ederer:** Also, die Frage des Marktwirtschaftsstatus ist eine ziemlich technische Frage, ich glaube. Während Europa der Meinung ist, dass China große Fortschritte gemacht hat, aber Europa ist völlig überzeugt, dass nicht alle Kriterien der WTO erfüllt sind, z.B. das

Kriterium eines möglichst geringen Einflusses des Staates auf die Wirtschaft. Ehrlich gesagt, in unseren Gesprächen mit dem chinesischen Ton hat man wenig den Eindruck, dass die chinesische Führung wenig Zugeständnisse machen wollte, deshalb sehen wir dazu, dass der Marktwirtschaftsstatus 2016 grundsätzlich von China relevant ist

**Zhang:** Die Finanzkrise ist ein sehr aktuelles Problem in Europa. Meinen Sie, dass die EU die Talsohle hinter sich hat oder glauben Sie, dass diese vielleicht noch vor der EU liegt?

**Dr. Ederer:** Also erstens, kann man sagen, dass diese Finanzkrise oder Schuldenkrise vielleicht die größte Krise war, der die EU bis jetzt begegnet. Zweitens glaube ich, dass inzwischen die wichtigsten Maßnahmen durch die Mitgliedsstaaten ergriffen wurden. Der europäische Stabilitätsmechanismus hat Milliarden Euro aufgesetzt. Die Europäische Zentralbank hat gesetzt, alles zu tun, was notwendig ist, um die Eurozone, den Euro zu retten. Es gibt auch erste Anzeichen dafür, dass die Wirtschaft sich erholt, aber wir sind noch in schwieriger Situation. Ich glaube, dass wir die Talsohle überschritten haben, aber dass es auch immer wieder Schwierigkeiten auf dem Weg aus der Krise heraus geben wird. Ich bin aber trotzdem zuversichtlich, weil die EU ja aus der größten Krise des zwanzigsten Jahrhunderts geboren worden ist nach dem zweiten Weltkrieg. Wann immer die EU danach in Krisen geraten ist, kam sie stärker aus der Krise heraus als sie hinein gegangen ist, weil jede Krise der Integration Schub gegeben hat. Deshalb bin ich überzeugt, dass die EU auch dieses Mal gestärkt aus der

Krise hervorgeht.

**Zhang:** Ich bin jedoch nicht ganz so optimistisch. Ich habe stets den Eindruck, als würden nur die Symptome behandelt, zum Beispiel mit Hilfe der Stabilitätsmechanismen. Die tiefliegenden Ursachen, z.B. die Ungleichgewichte zwischen den verschiedenen EU-Ländern, werden selten von Grund auf angegangen. Kommt Ihnen nicht manchmal der Gedanke, dass sich das Euro-System unter dem Druck eines Tages zu einem flexiblen Wechselkurs-System verändern oder sogar zusammenbrechen könnte wie das Bretton-Woods-System?

**Dr. Ederer:** Das erste möchte ich sagen, dass seit vier Jahren, insbesondere die angelsächsische Presse fast täglich darüber berichtet, dass morgen die Euro-Zone auseinander bricht und der Euro verschwindet. Tatsache ist, dass nach vier Jahren der Euro immer noch da ist, dass der Euro einen relativ stabilen Wechselkurs zum Dollar hat. Das heißt, dass alle dieser Pessimisten nicht Recht hatten. Zweitens, alle Länder müssen jetzt innerhalb der nächsten Jahre bestimmte Stabilitätskriterien erfüllen. Und sie müssen auch, was ihre Wirtschafts- und Sozialpolitiken betrifft, sich den sogenannten europäischen Semestern unterwerfen, d.h., sie müssen ihre Budgets nach Brüssel schicken, damit diese Ungleichgewichte, die Sie beschreiben, ausgeglichen werden. Ich meine, wenn die Wettbewerbsfähigkeiten in verschiedenen Ländern auch wieder angeglichen sind, dann wird es auch nicht zur Spannung gehen. Es gibt keine Wechselkurse, es gibt noch den Euro. Wenn es wieder Wechselkurse innerhalb der Euro-Zone gäbe, dann gäbe es

auch keinen Euro mehr. Dass das System nichts an seiner Anziehungskraft verloren hat, sieht man daran, dass der nächste Kandidat Lettland dem Euro angehören will. Ich bin auf jeden Fall weiter optimistisch.

**Zhang:** Haben Sie auch Ihren Arbeitsschwerpunkt damit ein bisschen geändert?

**Dr. Ederer:** Ja, natürlich. Wir haben sehr stark um Vertrauen in den Euro geworben. China war eine große Unterstützung. China hat immer sein Vertrauen in den Euro ausgedrückt und hat auch bei der Aufstockung der Ressourcen des Internationalen Währungsfonds einen wichtigen Anteil geleistet. Sofern haben wir natürlich schon versucht, dem Eindruck entgegenzuwirken, dass Europa morgen von der Landkarte verschwindet zusammen mit dem Euro. Und ich glaube, dass es nicht passieren wird.

**Zhang:** Sicher sind Sie darüber informiert, dass der damalige chinesische Vize-Premier und heutige Ministerpräsident Li Keqiang zu Bundeskanzlerin sagte, dass die chinesisch-deutsche Beziehung bereits zur Vorreiterin der China-EU-Beziehung geworden ist. Ich wäre Ihnen sehr dankbar, wenn Sie auch dazu Stellung nehmen könnten.

**Dr. Ederer:** Ja, gerne. Ich kenne das Zitat eigentlich nicht. Deutschland ist der größte Mitgliedsstaat in Bezug auf die Bevölkerungszahl und die größte Volkswirtschaft in der EU. China ist der weltweit größte Exporteur von Waren und Dienstleistungen. Deshalb ist es aus meiner Sicht verständlich, dass China Deutschland eine Vorreiter-Rolle zubilligt. Und ich finde auch,

dass Deutschland diese Rolle in europäischer Verantwortung war. Gleichzeitig ist es für mich wichtig, dass wir in Europa natürlich aus 27 Mitgliedstaaten, ab 1. Juli aus 28 bestehen. Und unser Motto lautet ja „Einheit in Vielfalt“, auf Englisch „Unity in Diversity“. Und Europa besteht aus der Kombination der verschiedenen Stärken. Und gleichzeitig haben alle Europäer ihre eigenen Schwächen. Deshalb habe ich Ihnen die Tasse mitgebracht. (Herr Botschafter zeigt uns eine Tasse). Darauf steht z.B. „Der perfekte Europäer sollte sein“, und dann steht hier z.B. „Humorvoll

wie ein Deutscher“ oder „Großzügig wie ein Holländer“ oder „Sollte kochen können wie ein Brite“ oder „Ist organisiert wie ein Grieche“. Damit will ich sagen, dass wir Europäer alle unsere Stärken und Schwächen haben. Ich trinke jeden Morgen meinen Kaffee aus der Tasse und erfreue mich daran.

**Zhang:** Herr Botschafter, wir danken Ihnen für das Gespräch.



# 新闻鸟瞰



# 外交新闻

吴 江 于 芳

## 一、喜迎德法年

签署于1963年1月22日的《爱丽舍条约》又称《德法合作条约》，它奠定了德法友谊和欧洲一体化的基础，既是德法和解的象征，又为两国朝着欧洲一体化方向发展指明了道路。历史证明，德法和解、德法友谊对欧洲的和平与稳定产生了巨大积极的影响，两国的合作是推进欧洲一体化的重要动力，成为国与国之间摒弃前嫌、建立密切又充满信任的合作关系的典范。

2013年，《德法合作条约》喜迎50周年庆典，德国外交部为此组建了专门的工作小组进行筹备。根据德国外交部官方网站的介绍<sup>①</sup>，德法年的主要大型活动为：

**2012年9月9日 纪念法国总统戴高乐向德国青年发表讲话50周年（德国路德维希港）**

德国总理默克尔和法国总统奥朗德在德国路德维希港共同宣布德法年开幕，两位领导人盛赞戴高乐总统当年的远见卓识，德国总理默克尔在讲话中强调“欧洲的未来在年

轻人的手上”。

**2013年1月21至22日 纪念《爱丽舍条约》签订50周年（德国柏林）**

此次活动的高潮是1月22日德法两国议会的议员和部长在德国联邦议院召开的共同会议。会上德国联邦议会议长拉默特强调：“正是因为两国有着不同的利益、传统和设想才使得德法的谅解对欧洲的未来不可或缺。”德国总理默克尔认为重要的是保持对邻国的好奇心并世代相传，因为对他人的兴趣不能通过条约来维系。法国总统奥朗德则强调德法的友谊也面向其他国家，不具有排他性。会后两国议会发表了共同宣言。

**2013年7月 纪念德法青年组织创建50周年（法国巴黎）**

《爱丽舍条约》无疑为战后德法两国的和解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从宿敌到世交的转变凝聚着两国几代领导人的心血。50年来，来自两国共约800万年轻人参与了德法青年组织交流项目，年轻人的交流使得两国的和解不仅限于官方，更深深植根于民间。和解的

<sup>①</sup> “50 Jahre Élysée-Vertrag-50 Jahre deutsch-französische Freundschaft”, [http://www.auswaertiges-amt.de/DE/Europa/DeutschlandInEuropa/BilateraleBeziehungen/Frankreich/Elysee\\_50/130108-50JahreElyseeVertrag.html](http://www.auswaertiges-amt.de/DE/Europa/DeutschlandInEuropa/BilateraleBeziehungen/Frankreich/Elysee_50/130108-50JahreElyseeVertrag.html), 最后访问时间为2013-4-27。

模式虽然无法照搬，但是推动年轻人交流的可持续发展却值得他国借鉴。50年后的欧洲受到债务危机的重创，但愿德法两国能借助德法年的契机减少分歧，发挥“双缸发动机”的作用，共同促使欧洲走出债务危机的阴影。

## 二、德国参与北约在土耳其部署“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

鉴于日益升级的叙利亚冲突对土耳其的安全造成威胁，北约在2012年12月4日作出决议向土耳其部署“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由美国、德国和荷兰共同承担。两天后，德国政府表示同意参与北约的部署行动，德国议会也在2012年12月14日批准了这项决议。

根据德国国防军官方网站的报道<sup>②</sup>，这一部署的目的在于防御，而非建立禁飞区。德国参与这项部署行动的士兵人数最多为400人（其中包括德国参与的北约部署在土耳其的空中预警侦察机士兵人数），任期到2014年1月31日。德国的“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并未直接部署在土叙边界，而是部署在土耳其边界以北100公里开外的卡赫拉曼马拉什省。

2013年2月24至25日德国总理默克尔对土耳其进行了正式访问。此次访问的主要目的正是慰问驻扎在靠近叙利亚边境的北约驻地的德国士兵以及视察德国部署在土耳其的“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默克尔称赞德

国联邦国防军在土耳其的派驻具有很高的政治价值。当北约伙伴国遇到危险时，这一派驻从军事上和政治上释放出同舟共济的信号。<sup>③</sup>

然而，德国联邦国防军委托人柯尼希豪斯在有关德国此次派驻土耳其的报告中指出“德国和土耳其士兵之间的合作很成问题”，德国和土耳其士兵之间的交流明显受到干扰，德国士兵甚至对土耳其兵营的卫生条件怨声载道。在接受《星期日图片报》采访时，德国国防部长德梅齐埃也证实了两国士兵之间存在问题。德梅齐埃承诺将改善驻地的条件，但是同时指出必须认识到两国的传统不一样。<sup>④</sup>

在土耳其部署“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是北约自叙利亚危机爆发以来作出的一项重要决定。北约虽以集体防御为由称此举完全是应土耳其这一北约成员国的自卫要求，但俄罗斯认为北约这一决定可能导致冲突的升级，不利于解决目前的危机，德国军方也存在类似质疑的声音。此次派驻是否能有效地预防冲突还需拭目以待。

## 三、德国武器出口引发争议

按照瑞典斯德哥尔摩和平研究所2012年年鉴的数据，德国的武器出口目前占全球武器总出口量的9%左右，成为排在美国和俄罗斯之后的第三大武器出口国。<sup>⑤</sup>

数据一公布，德国各主流媒体相继报道德国的武器出口贸易。2013年1月2日《汉

② “Der Türkei-Einsatz im Überblick”, [http://www.bundeswehr.de/portal/a/bwde/tut/p/c4/Dcq7DYAw\\_DAXA WVjA7unYAujS8ISsBIPyIRLTe117vPPg8top1W6XxCtvwWbtpP0Awbw16ge6rJQx4FQbcoRRgyJrshD5icv0A57XX5k/](http://www.bundeswehr.de/portal/a/bwde/tut/p/c4/Dcq7DYAw_DAXA WVjA7unYAujS8ISsBIPyIRLTe117vPPg8top1W6XxCtvwWbtpP0Awbw16ge6rJQx4FQbcoRRgyJrshD5icv0A57XX5k/), 最后访问时间为2013-4-21。

③ “Dank an die Bundeswehr-Warnung an Syrien”, <http://www.tagesschau.de/ausland/merkel-tuerkei-102.html>, 最后访问时间为2013-4-23。

④ “Bundeswehreinsatz mit Hindernissen”, <http://www.tagesschau.de/inland/patrioteinsatz100.html>, 最后访问时间为2013-4-25。

⑤ “SIPRI YEARBOOK 2012, Armaments, Disarmament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Kurzfassung auf Deutsch, <http://www.sipri.org/yearbook/2012/files/SIPRIYB12SummaryDE.pdf>, 最后访问时间为2013-4-21。

堡晚报》一篇题为《秘密的武器出口》的报道，2011年德国有总计价值为125亿欧元的军工产品用于出口，这几乎占德国当年军工产量的一半。除了传统的欧盟和北约国家之外，购买德国武器的新客户来自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阿曼、文莱、埃及以及新加坡等国。<sup>⑥</sup>

德国武器出口的决定权在于联邦安全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由德国总理、总理府部长、外交部长、国防部长、财政部长、经济部长、内务部长、发展援助部长以及司法部长等9人组成，委员会一般不定期以秘密方式召开会议，其章程及决策并不向外界公开，同时也不接受德国议会的监督。正是联邦安全委员会的秘密属性加剧了德国媒体对于德国武器出口政策透明度的质疑。

2013年2月22日，德国《明镜》周刊的一篇题为《德国公司同海湾国家的武器贸易实现倍增》的报道称德国向海湾地区的武器出口大幅度上升，最大的买家是沙特阿拉伯。由于沙特阿拉伯的人权状况堪忧，这就使德国的这一武器出口贸易从一开始就颇受争议，尤其是来自绿党、左翼党等反对党的政治家对此进行了猛烈攻击。左翼党议员阿肯对《南德意志报》表示：“海湾国家不断地扩充武力，德国政府一点也不忌讳让这些国家武装到牙齿。再没有更清楚的事例证明‘严重

践踏人权显然已不再是拒绝出口的理由’。”<sup>⑦</sup>对此默克尔政府一位发言人则表示“沙特阿拉伯是一支保持地区稳定的力量”。<sup>⑧</sup>在反对党的压力下，德国执政党内部已经开始有政治家呼吁政府在武器出口问题上应更加透明，例如来自基民盟（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的议员勒特根认为：“如果德国这样的民主国家销售武器，就必须承认事实并在公众范围内证明其决策的正确性。”<sup>⑨</sup>遗憾的是，类似呼吁目前而言在德国执政党内部仅占少数。

日前，德国前总理施密特对德国武器出口贸易的繁荣表示了担忧。<sup>⑩</sup>施密特希望这个话题成为今年德国大选的话题之一，并强调热爱和平必须是每个政治家的基本素质。一方面德国以人权状况的改善作为对中国解除武器禁运的前提之一；而另一方面德国却并没有严格执行这一标准。无论是媒体揭露的德国向沙特阿拉伯提供“欧洲战斗机”，还是向智利提供“豹II”坦克，抑或向以色列提供潜艇，德国政府在武器出售问题上的双重标准不言而喻。倒是94岁高龄的前总理施密特仍在为和平呼吁，让人肃然起敬。

#### 四、德国阿富汗驻军迎来“历史性转折”

2012年10月联邦国防军将把阿富汗 Faisabad 地区的驻地移交给阿富汗警方。

⑥ Jungholt, Thorsten: “Geheimer Waffenexport”, [http://www.abendblatt.de/politik/deutschland/article\\_112338065/Geheimsache-Waffenexport.html](http://www.abendblatt.de/politik/deutschland/article_112338065/Geheimsache-Waffenexport.html), 最后访问时间为2013-4-21。

⑦ “Deutsche Firmen verdoppeln Rüstungsdeals mit Golf-Staaten”, <http://www.spiegel.de/politik/deutschland/waffen-deutsche-firmen-verdoppeln-ruistungsexporte-mit-golfstaaten-a-884887-druck.html>, 最后访问时间为2013-4-21。

⑧ Ebenda.

⑨ Jungholt, Thorsten: “Geheimer Waffenexport”, [http://www.abendblatt.de/politik/deutschland/article\\_112338065/Geheimsache-Waffenexport.html](http://www.abendblatt.de/politik/deutschland/article_112338065/Geheimsache-Waffenexport.html), 最后访问时间为2013-4-21。

⑩ “Helmut Schmidt sieht in Waffenexport-Boom ‘ganz schlimme Entwicklung’”, [http://www.t-online.de/nachrichten/deutschland/parteien/id\\_61383226/helmut-schmidt-sieht-in-waffenexport-boom-ganz-schlimme-entwicklung-.html](http://www.t-online.de/nachrichten/deutschland/parteien/id_61383226/helmut-schmidt-sieht-in-waffenexport-boom-ganz-schlimme-entwicklung-.html), 最后访问时间为2013-4-20。

2013年3月底，联邦国防军再次向阿富汗东北地区派遣士兵，原因是当地局势非常紧张。阿富汗武装力量受到挑战，很多走私团伙行经此处，每当阿富汗警察试图维持秩序时，走私团伙觉得自己的生意受阻，便会攻击当地的武装力量，阿富汗请求联邦国防军予以支援。

根据德国外交部官方网站的报道<sup>①</sup>，北约国际安全援助部队（ISAF）计划至2014年年底全部撤离阿富汗，不过德国将在民事和军事领域继续留在阿富汗执行任务。2013年4月18日，德国外长韦斯特韦勒和国防部长德梅齐埃在德国外交部给公众介绍了德国将来在阿富汗军事派驻的要点。2014年后国际阿富汗驻军的任务将发生根本性转变：迄今为止的作战任务将转变为培训阿富汗军事力量以及为其提供咨询。德国外长韦斯特韦勒称这一转变为“历史性转折”。德国准备2015年开始先向阿富汗派驻600—800名士兵执行为期两年的有关培训、咨询以及援助的任务，不过前提是阿富汗政府正式发出邀请以及拥有联合国安理会的相关决议，同时还需要德国和阿富汗之间达成驻军章程以及北约其他盟国在阿富汗其他地域也进行相应的支援，此外阿富汗的安全状况需能保证派驻的顺利进行。由于2013年是德国的大选年，正式的派驻决议将由新当选的德国联邦政府以及新一届德国议会作出。

众多高官黯然离职，士兵伤亡人数增加，国内支持率下降，阿富汗驻军问题在过去的十年里成为让德国政府最为纠结的话题之一。如何使阿富汗驻军实现“历史性转折”，德国新一届政府注定会面临挑战。

## 五、中德关系走过“四十不惑”

在中德关系中，德国媒体十分关注中国领导人的换届选举以及两会召开情况，即时予以报道，评论中对新的领导人充满期待。除此以外，德国媒体也十分关注中国的社会 and 经济发展状况，如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中国关于南方是否应当安装暖气的争论。

2013年3月15日，新当选的中国国家总理李克强应约同德国总理默克尔通话。默克尔祝贺李克强当选中国国务院总理，默克尔对自己成为李克强总理当选后第一个同他通话的外国领导人表示很高兴。她表示，中国的发展对德国、对世界至关重要。德国高度重视对华关系，作为中国的朋友和伙伴，德国希望同中国保持高层交往，加强务实合作，实现共同发展，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李克强对默克尔的祝贺表示感谢，他说中德都是有重要影响的国家，他愿与德国总理默克尔保持密切沟通，共同推动双方加强各领域合作和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促进中德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发展中欧关系是中方战略选择和长期政策，中方愿与包括德国在内的欧方一道，把中欧政治、经济、人文等方面合作的潜力进一步发挥出来，为推动世界和平繁荣发展作出贡献。默克尔感谢中国给予欧洲的宝贵支持和帮助。双方还就欧洲国家应对主权债务问题交换了看法。<sup>②</sup>

2013年4月8日至9日，中德法治国家对话第十三届法律研讨会在杭州开幕。这次研讨会的主题是“预防与化解行政争议的制度和机制”。在为期两天的研讨会中，来自中德两国的90余位立法工作者、政府官员、法

<sup>①</sup> Afghanistan: Engagement nach 2014, <http://www.auswaertiges-amt.de/DE/Aussenpolitik/RegionaleSchwerpunkte/AfghanistanZentralasien/AktuelleArtikel/130418-AFG-post-2014.html>, 最后访问时间为2013-4-25。

<sup>②</sup> 《李克强同默克尔通电话》，<http://www.oushinet.com/172-5411-219189.aspx>, 最后访问时间为2013-4-25。

官、律师和专家学者围绕“规范重大行政决策程序、预防行政的争议”，“化解行政争议的非诉讼程序”和“化解行政争议的诉讼程序”三个专题进行了深入交流和探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法制办主任宋大涵与德国联邦司法部长施纳伦贝格共同为论坛揭幕。宋大涵表示，中德两国在2000年建立的法治国家对话机制，开创了不同社会制度和文化传统的国家在建设法治国家方面开展平等对话和友好交流的先例，为两国双边关系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在今后完善相关法律制度的过程中，中国将在坚持立足国情实际的基础上，继续借鉴其他国家包括德国法治建设的有益经验。施纳伦贝格表示，重视通过法治方式预防和化解行政争议是中德两国的共识，希望中德法治国家对话在增进两国互信与互利合作方面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sup>⑬</sup>

根据德国外交部官方网站的报道<sup>⑭</sup>，2013年德国同中国在文教政策上的重点是推广德语。2012年中德两国在第二届政府磋商会议上已达成一致，将2013年和2014年定为中德语言年。为了从根本上在中国推广德语，两国计划到2013年年底将目前的两国中学间的友好合作从81所增加至146所，与此同时将从机制上完善德语教师培训并承认德语语言证书（DSD I 和 DSD II）。

无论是中德总理热线，还是中德法治国家对话，抑或是中德语言合作和交流，中德

关系2013年开局良好，但愿中德关系带着“四十不惑”的成熟继续走向深入。

## 六、激辩德国外交

2013年2月21日，德国记者和出版人劳在德国主流媒体《时代》周报上发表题为《德国对专制者的爱》的文章，批评德国与许多非民主体制的国家关系过于密切，指出德国外交在利益驱动和道德导向之间存在冲突。<sup>⑮</sup>

2013年2月28日，德国知名智库——德国外交政策协会会长桑德施耐德教授对此在《时代》周报上撰文《有关德国外交的辩论：从道德角落中走出来！》进行了回应。桑德施耐德指出：“价值观和利益从不允许被孤立地看待。刚好相反，值得信赖的外交建立在谨慎权衡二者关系的基础之上。值得信赖和有效率的外交建立在可行性之上，而非刚愎自用。欧洲和西方必需痛苦地接受并克服的一个认识就是：世界政治追随西方的道德和价值观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作为欧洲人可能会对这一点表示遗憾，但是对21世纪的全新现实熟视无睹则是轻率和缺乏经验的。”<sup>⑯</sup>

2013年3月21日，劳和《时代》周报的其他几名记者一起联合撰文《我们一无所成……》<sup>⑰</sup>，表达了对德国外交的失望。

2013年4月11日，桑德施耐德教授和记

<sup>⑬</sup> 《中德法治国家对话第十三届法律研讨会举行》，[http://news.xinhuanet.com/legal/2013-04/08/c\\_115311142.htm](http://news.xinhuanet.com/legal/2013-04/08/c_115311142.htm)，最后访问时间为2013-4-25。

<sup>⑭</sup> “China, ein Land mit vielen Gesichtern”，[http://www.auswaertiges-amt.de/DE/Aussenpolitik/Regionale\\_Schwerpunkte/Asien/China/Regionalschwerpunkt\\_China\\_node.html](http://www.auswaertiges-amt.de/DE/Aussenpolitik/Regionale_Schwerpunkte/Asien/China/Regionalschwerpunkt_China_node.html)，最后访问时间为2013-4-25。

<sup>⑮</sup> Lau, Jörg: “Die deutsche Liebe zu den Diktatoren”，[http://blog.zeit.de/joerglau/2013/02/21/schurken-die-wir-brauchen\\_5889](http://blog.zeit.de/joerglau/2013/02/21/schurken-die-wir-brauchen_5889)，最后访问时间为2013-4-23。

<sup>⑯</sup> Sandschneider, Eberhard: “Debatte zur deutschen Außenpolitik: Raus aus der Moralecke!”，<https://dgap.org/de/think-tank/publikationen/weitere-publikationen/debatte-zur-deutschen-au%C3%9Fenpolitik-raus-aus-der>，最后访问时间为2013-4-20。

<sup>⑰</sup> Bittner, Jochen / Geis, Matthias / Lau, Jörg / Ulrich, Bernd / Wurmb-Seibel, Ronja: “Wir tun doch nix ...”，<http://www.zeit.de/2013/13/Deutschland-Aussenpolitik>，最后访问时间为2013-4-20。

者劳面对面在德国外交政策协会举办了一场辩论<sup>⑧</sup>，双方围绕价值观和利益在德国外交中的作用唇枪舌剑，各执一词。桑德施耐德教授建议“通过静默的外交促使自身的价值观获得突破”。劳则警告不能轻率地为了纯粹的利益而牺牲价值观。看来，有关德国外交的激辩仍将继续，本刊将持续关注。

人权一直是横亘在德国和一些（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之间难以解开的结。一旦这些国家对于德国的经济而言起着关键性作用时，“道义”和“利益”的权衡就会使德国外交面临两难。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已经证明，西方的民主价值观无法简单输出或复制，一个国家的人权状况必须和该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历史传统相挂钩。脱离实际国情空谈人权无疑是“空中楼阁”。人权外交方面德国应该通过加强同发展中国家的法治国家对话，提高发展援助等手段施加影响，促进国际关系的民主化。

## 七、其他

3月下旬，俄罗斯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检查国外的非政府组织，德国的政治基金会也难免接受审查，德国认为此种做法并非常规审查，会摧毁俄罗斯建立民主、形成公民社会的努力，德国外交部召见俄罗斯公使，表明阻止德国基金会在俄罗斯的活动将会有损

两国关系。德国的各个党派也担心各自的基金会在俄罗斯的活动会被视为犯罪活动，与俄罗斯民间组织的联系将会中断。相对于联盟党和绿党的反应，社民党人则建议通过对话解决此事。4月8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出席汉诺威博览会时遇到了对其政府路线的明确批评。德国总理表示，俄罗斯对本国境内的非政府组织进行了大规模检查，希望在俄罗斯的德国基金会不会因此而影响到工作，并表示希望俄罗斯能形成活跃的公民社会。普京用俄罗斯需要检查外国非政府组织的资金来源作为对此问题的回复。

4月9日，联邦政府总理默克尔接见了印度总理。德国是印度在欧洲最大的贸易伙伴，不过在印度市场上最受欢迎的德国产品并非价格昂贵的宝马汽车等豪华产品，更多是较为实用的产品，如生活类的啤酒，或机械制造类的火花塞等。印度人十分信任德国产品，同时，越来越多的德国公司开始进军印度市场。

截止到2013年3月，德国共接收了8000名来自叙利亚的难民，在今年将会再接收5000名叙利亚难民，这些难民（主要是有孩子的家庭以及无人照顾的儿童）会分散到16个联邦州。此举受到了欧盟的高度称赞，欧盟一方面会立刻审核对德国的资金资助，另一方面也号召欧盟其他成员国以德国为榜样。

作者简介：吴江，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系副教授，博士。

于芳，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系讲师，博士研究生。

<sup>⑧</sup> “Werte und Interessen in der deutschen Außenpolitik. Streitgespräch zwischen Eberhard Sandschneider und Jörg Lau in der DGAP”, <https://dgap.org/de/node/23569>, 最后访问时间为2013-4-20。

# 经济新闻

殷桐生 于 芳

截至本刊发稿时，德国在经济领域的新信息爆棚、举措盈庭、方案如山，集中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 一、2012 年主要经济数据<sup>①</sup>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0.8%，出口增长 3.9%，进口增长 2.5%，就业达 4156.9 万人，失业率 6.8%，消费价格上涨 2.0%，财政结余 0.1%，国债总额占 BIP 的 80% 以上，基本建设总投资 -2.1%，其中设备投资 -4.4%，建筑投资 -1.1%，私人消费增长 0.8%，国家消费增长 1.0%。

数据显示：就业率上升，失业率下降，财政有了结余，消除了多年的财政赤字，但国债总额依然在高位运转，国内生产总值、外贸和私人消费的增长都放慢了速度，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基本建设总投资，特别是设备投资大幅度下滑，这是多年没有过的现象，它显示投资者对其经济发展的近景正在失去信心。

## 二、应对欧债危机

2012 年 6 月 29 日德国联邦议院以超过 2/3 的多数票分别批准了“财政契约”和欧洲稳定机制（ESM）。

“财政契约”全称是《欧洲经济货币联盟稳定、协调和治理公约》，2012 年 3 月签署；“欧洲稳定机制”是 2012 年 1 月 23 日由欧元区 17 国通过成立的，并于 2 月 2 日获得签署，但德国和爱沙尼亚均未批准。

为确保该两项议案在联邦议院和联邦参议院获得 2/3 的多数票支持，德国政府此前与反对党社民党和绿党达成妥协，同意引入金融交易税以及实施推动经济增长和就业计划。但考虑到有人会向联邦宪法法院起诉，联邦总统便没有立即批准该条约。9 月 12 日，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对“欧洲稳定机制”附加了一些条件后对其予以放行。这一利好消息大大提振了市场信心，欧美股指一路上扬，各界好评如潮。欧元区 17 国常设代表便签署了《联合声明》，以满足联邦宪法法院的要求。9

<sup>①</sup> “Jahreswirtschaftsbericht 2012/2013”。

月26日德国内阁通过了《解释性声明》，于是9月27日该欧洲稳定机制便正式宣布生效，比原计划提前了9个多月。“财政契约”也于2013年1月1日正式生效。

欧洲稳定机制是欧元区成员国依照国际公法成立的政府间组织，总部设在卢森堡，它将取代现有的欧洲金融稳定基金这一临时机构，放贷能力达到5000亿欧元（约合6644亿美元），现在有可能增加到20,000亿欧元，被称为欧洲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主要任务是为陷入资金困难的欧元区国家提供金融救助。在欧洲稳定机制总共7000亿欧元的认缴本金中，德国应出资1900亿欧元。葡、希、爱、西、意应承担2615亿欧元。如上述5国无力承担，则德国还要再承担1130亿欧元。此外，德国还需提供约7780亿欧元的担保。但德国通过此举获得了25%的表决权，实际上也就是获得了关键决策权，因为该机制规定重大决策必须获得80%的表决权。由此可见，德国在建立并运用欧洲稳定机制中所起的重大作用。

9月6日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宣布了该行新的购债计划。德国一向反对欧洲央行的购债计划，反对欧洲央行成为最后贷款人，反对发行欧洲债券，坚持各国要实行财政紧缩计划。但在“财政契约”正式签署时，欧洲央行又强调必须提交完整的财政紧缩计划，并在接受各方监督的情况下，总理默克尔和财长朔伊布勒均软化了他们对解决欧债危机的强硬立场，支持欧洲央行的购债计划。

### 三、加强、加快发展德中经贸关系

默克尔总理2012年2月访华，这是她当

年首次对欧盟以外国家的访问。4月又与访德的温家宝总理在汉诺威工业博览会上会晤，8月两国总理再次在北京举行第二轮政府磋商。

据统计，2011年中德双边贸易额达到1692亿美元，占中欧贸易的30%，<sup>②</sup>与1972年建交时的2.74亿美元相比增长了617倍。

2011年中国在德国的直接投资额为12.8亿美元，约合10.2亿欧元，投资项目达到158个，首次超过美国的110个，成为德国外资第一大来源国。根据安永咨询公司（Ernst & Young）的一项对812位国际企业经理的问卷调查，他们认为，德国是欧洲最有吸引力的投资地。<sup>③</sup>现在中国在德国共有827家企业，比2010年增长了13%。

2012年双方签订了《工银租赁公司与空中客车公司A320系列飞机采购协议》，中方决定购入的50架A320系列飞机中有20架为从未购买过的装配新型发动机的A320neo飞机，将天津总装线的生产合同延长了10年。

在欧中光伏产业贸易争端上，默克尔表示：“我建议欧盟委员会和中国通过谈判来解决这一问题，而不要进行反倾销诉讼。”<sup>④</sup>即便在9月6日欧盟委员会依然宣布，对从中国进口的光伏板、光伏电池以及其他光伏组件发起反倾销调查时，默克尔仍未改初衷。德国一些光伏企业也纷纷呼吁，不要对中国的光伏产品实施“双反”，因为它们不少都是为德国的光伏业从事前期加工的，对其实施“双反”势必影响德国光伏业的生存和发展。多年以来，欧盟对中国不断进行反倾销诉讼，德国一向紧随。此次德国竟然一反传统，顶着欧盟的压力，维护德中贸易，迎合中国的吁求。这种政策上的向背得到了两国舆论的广泛赞誉，也引起了国际舆论的广泛关注。

② 宋涛：《中德政府磋商谱写两国关系新篇章》，载《人民日报》，2012年8月29日。

③ 《德国快讯》，2012年第6期。

④ 法莱蒂，塞巴斯蒂安：《为讨好北京，默克尔抛弃欧洲的光伏企业》，载《参考消息》，2012年9月2日。

双方还同意在双边贸易结算中增加使用人民币和欧元，促进两国金融机构开展人民币业务及在德国发行人民币金融产品。中方欢迎德国金融机构投资中国的银行间债券市场。中国也同意扩大对德国的稀土出口，加强同德国在稀土上的开采开发、利用和高科技运用等合作。

#### 四、退出核电及其后果

2011年3月11日日本发生福岛核泄漏事件。5月30日，默克尔总理发表讲话，宣布将于2022年前关闭所有核电厂。这对德国经济，特别对其能源经济带来了重大的影响：

核电企业坚决反对。如莱茵集团总裁格罗斯曼就立刻致信默克尔，批评政府的能源政策，担心核电公司无法继续供应合同中分配给他们的发电量。

煤炭工业得以起死回生。很多人认识到不能放弃煤炭资源，尤其是不能放弃成本低廉的褐煤资源。德国莱茵集团发电站专家鲁尔夫·施勒塞尔认为，尽管德国也从其他国家进口天然气，利用太阳能发电，但只有传统的煤矿才是德国真正的自有资源，在可再生能源能够保障供给之前，它将是德国最安全的基础能源保障。在这种认识的作用下，德国煤炭的发电比例开始提升。2012年电能产量为6170亿千瓦时，其中褐煤产电比率从2011年的24.6%上升到25.6%，无烟煤产电比率也从2011年的18.5%上升到19.1%，因而也成为33个城市空气质量不达标的一个重要原因，遭到欧盟的警告。<sup>⑤</sup>

扩大可再生能源的开发。日本福岛核

泄漏事故后，德国的可再生能源股就暴涨了90%。联邦政府也公布了第6次新能源研究项目，决定在2011—2014年期间，投入35亿欧元用于推进新能源研发，以应对德国弃核、建立全新的能源供应系统的决策；政府将给近海风能发电园提供50亿欧元的资助，并想把海上风能发出的电价从13欧分/瓦小时提高到15欧分/瓦小时，而陆地的风能电价则降低1.5%。2011年5月2日德国在波罗的海建造的首座近海风力发电场——“波罗的海1号”正式投入运营，该发电场装有21座风力发电机组，能够为5万户家庭提供电力。<sup>⑥</sup>

造成能源价格及总体物价的上涨。2012年8月汽油和柴油的涨幅在9.4%，供暖用油的价格甚至上涨了13.5%，从而推高了整体物价水平。2012年8月物价较2011年同期上涨2.1%，这是通货膨胀率首次冲上2%。<sup>⑦</sup>

据估计，德国为退出核能预计需要颁布或修改八项法律法规，耗资2300亿欧元。于是默克尔政府就决定征收核燃料税，但遭到核电企业的竭力反对。

#### 五、减少养老保险费、提高退休年龄

联邦政府原则上已同意减轻养老金交纳人的负担，2013年将拨出60亿欧元补贴养老金保险。原定的总收入19.6%的缴费额可下降到18.9%。<sup>⑧</sup>

几年前由联盟党和社民党大联盟政府通过的提高退休者年龄的法案，自2012年1月1日起执行。按新生效的法律，德国的法定退休年龄将由过去的65周岁逐步过渡到67周岁。<sup>⑨</sup>

所谓逐步过渡系指将延长的2年分为

⑤ 郑红，管克江，刘歌：《德国33个城市遭欧盟警告》，载《人民日报》，2013年3月2日。

⑥ 《德国快讯》，2011年第9、11期。

⑦ 《世界报》，2012年9月12日。

⑧ 《德国快讯》，2012年第20期。

⑨ 魏爱苗：《德国逐步提高退休者年龄》，载中国经济网，2012年01月20日。最后访问时间为2012-8-20。

24个月。前12个月，用12年的过渡期，即每年在上一年的基础上增加1个月。这样在2024年即可过渡到66周岁时退休。后12个月分6年过渡完，即每年在上一年的基础上多工作2个月方可退休。这样到2031年时即可执行67岁退休的制度。

## 六、降低失业率和专业人才定居的门槛

经过多年努力，德国的失业率逐步下降，2012年降至6.8%。但专业人才日益短缺，于是德国正在逐步降低移民的门槛。《法兰克福汇报》2012年3月28日报道称：高素质的外国专业人才将更易获得在德国的居留权。联盟党和自民党议会党团达成一致：如工作年薪超过4.48万欧元（而不是此前的6.6万欧元），将可获得居留权——“蓝卡”。对于专业人才严重紧缺的职业，年薪门槛可降低至3.49万欧元。持有蓝卡3年，即可获得定居许可。如果能证明德语水平合格，持有蓝卡2年后，即可获得定居许可。

## 七、其他

在过去几十年中，世界贸易每年都以平均5%的速度增长，但现在远远达不到这一平均值。根据世贸组织的数据，2012年勉强增长了2%，2013年预计增长3.3%，阻碍增长的主要原因还是欧洲的债务危机。

在整个欧元区，经济衰退导致的失业率始终居高不下。欧洲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从2013年1月到2月，新增33,000名失业者，17个欧元区失业总数将近1900万，比2012年2月增长了将近180万。平均年失业率一直保持在12%，奥地利的失业率最低，仅为4.8%，希腊失业率最高，为26.4%。青年失业率从22.3%升到23.9%，比去年同期下降了0.1个百分点。

德国经济研究所（DIW）认为德国又回到了景气增长的道路上，2012年的经济疲软状态已经过去。德国经济研究所的景气晴雨表显示，2013年1月到3月的国内生产总值相比上个季度增长了0.5%。消费者的消费欲望并未减少，根据纽伦堡消费研究所（GfK）的消费氛围研究，消费者认为4月的经济发展会更加景气，因此也乐意消费。到目前为止，欧债危机和欧元区的经济衰退都未影响到人们对经济景气的情绪。景气预期达到了0.6%，这是自2012年6月以来，德国人对景气发展的信心首次超过了常年平均值。

根据联邦劳动部的统计数据，2013年3月的失业人数为309.8万，比2月份的失业人数有所减少，但比去年同期增加了7万人。从整个德国范围来看，失业率下降了0.1个百分点，回到7.3%。德国的劳动力市场从整体上看没有受到过去几个月经济大环境的冲击，正继续稳定发展。

德国的通货膨胀在不断好转，2012年12月通货膨胀率为2.1%，到2013年1月就降至1.7%。和上年圣诞节时期相比，消费者价格降低了0.5%，但整体上2012年的消费者价格比上年平均上涨了2%。

根据汉斯-伯克勒基金会经济与社会科学研究所（WSI）的计算，2012年德国人的工资上涨超过了物价上涨，全年平均增长2.7%。而价格在同期只上涨0.2%。并且从2013年7月1日起，东部地区的养老金将增长3.29%，而西部地区养老金只增长0.25%。此后东部地区的养老金将不再只有西部养老金的88.8%，而是上涨到91.5%。东部地区养老金强势增长的原因在于，2012年东部地区的工资收入大幅增长，达4.32%，远远超过了西部地区的1.5%。

德国化工巨头BASF在2012年的营业额再创新高，由于对油和气以及农业化学药品的强劲需求，BASF的销售利润比上年增加了

90 亿欧元，涨幅为 4.5%。

由于网络购物的快速增长，德国邮政受益颇丰，特别是在圣诞节期间，大量客户在网络上寄送网购商品。2012 年德国邮政的利润比上年增长了 43%，但目前仍然负债。

2012 年德国联邦铁路公司的利润创下新纪录，销售额增长了 3.7%，达到 393 亿欧元。2013 年 3 月下旬，德国铁路和交通工会接受了最新的劳资协议，13 万雇员分两档阶段涨工资，从 2013 年 5 月 1 日开始增长 3%，到 2014 年 4 月 1 日开始再增长 3%。此外，还有一次性支付 500 欧元、改善养老条件等内容。德国铁路将在今年和明年增加投入 5 亿欧元用于车站和铁路的现代化建设。这些资金原本是用于新建和扩建铁路的，现在用于维护车站及铁路，令其更加坚固方便，毕竟“火车站是城市的招牌和名片”。

自从德国最大的连锁超市 Schlecker 退出市场后，另外两家连锁超市 Rossmann 和 DM 占据了市场，处于领先地位。Rossmann 在整个行业内增长速度最快，2012 年的销售额增长了 16.1%，在今年的前三个月，Rossmann 的销售增长加速，达到 16.4%。目前，Rossmann 在德国内外的年销售额接近 60 亿欧元，在德国一共有员工 2.6 万人。在 Schlecker 宣布破产时，Rossmann 接手了 Schlecker 1/5 的门店，增强了自身竞争实力。不过，DM 在行业内仍旧排名第一。DM 的员工数量达到 2.9 万人，在德国的销售额就达到 51 亿欧元，市场占有率接近 20%。

德国著名的百货公司 Karstadt 从 2012 年 10 月到 2013 年 2 月开始新的营业年度起，销售额比上年同期降低了约 10%，销售额和原来的销售计划相比缩水了 12%，并且 Karstadt 还在进行裁员，目前已经削减了 1850 个工作岗位，预计到 2014 年共要削减 2000 个工作岗位。

大众汽车集团总部近日发布的 2012 年度

财报中，一组盈利数据同样表明，去年大众汽车在华业绩出现大幅提升。该公司年报数据显示，2012 年大众汽车集团在华销量为 2,812,051 辆，同比提升 24.5%，占全球总销量从 27.3% 扩大为 30.3%。中国是大众汽车集团的重要市场，预计全球建立的 10 家工厂有 7 家都将在中国建成。但 2012 年大众汽车在中国也出现了质量问题——DSG 变速箱故障事件，基于中国媒体及消费者的压力，3 月 16 日大众汽车集团（中国）、一汽-大众和上海大众联合发表声明称，实施主动召回以解决 DSG 问题。大众汽车集团一共召回 384,000 多辆汽车，涉及帕萨特、途锐、新宝来等诸多系列，是大众汽车集团在中国最大的一次产品召回行动。

对德国企业来说，中国早已不仅是一个生产区位那么简单了。大中型企业相继在中国建立了自己的研发中心，比低劳动力成本更重要的是创新。例如，在北京的奥迪研发中心工作着 300 名研发人员，研究消费者的需求和偏好，以便让产品更好地适应市场。

3 月中旬，德国政府通过了一份减支预算案，根据这份 2014 年预算案，新债发行将降至 64 亿欧元，较先前计划的 131 亿欧元大幅度减少，此外，联邦支出将削减 51 亿欧元，政府收入将提高 56 亿欧元。该计划意味着德国 2015 年将达到预算平衡，比宪法要求的“债务刹车”提前一年，2015 年德国将不用发行新债。朔伊布勒指出，德国的预算计划对欧洲来说是一个强烈的信号，可以向欧元区其他国家证明，可持续的预算和增长并不互相排斥。

2003 年 3 月 14 日时任德国总理施罗德提出了德国在二战后最具争议性的改革计划“2010 议程”，对该项计划如何评价，引发各方专家争论。在其他国家，此项改革计划被视作是典范，而在德国，很多批评家认为，该项改革措施带来了社会阶层的疏离。作为

一项改革计划，“2010 议程”的确有其副作用，但决不可忽视的是改革带来的成效。该项改革计划提出前，德国的经济和社会制度都处于很糟糕的状态，经济增长停滞，失业人口超过 400 万，人口老龄化不断加剧，国家的养老金和医疗保险负担沉重。提出改革的目的是为了让失业者更愿意去工作，即使是去做一些报酬并不丰厚的工作，另外，也让雇主更愿意、更敢于雇佣新的员工。2005 年默克尔总理上台后曾表示，“2010 议程”为德国的社会福利制度适应新的时代打开了一扇大门。这次改革成效最明显地体现在国际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中德国的经济状况上，德国经济受到冲击并不如其他国家那么严重，失业率屡创历史新低，竞争力不降反增，这都受益于起步较早的改革。社民党主席施泰因迈尔认为，改革推动了国家的进步。当然改革会有一些未考虑到的地方，比如教育，过去几十年的教育问题对未来提出了挑战，当失业问题不再紧迫时，人口素质的提高便成为关注的重点，如果还有一个 10 年计划，教育应当成为重点目标，这与此次政府的投

资重点不谋而合。

在过去一年中，老年雇员的数量增长到新的最高点。2012 年 9 月，60—65 岁之间的就业者约为 148.4 万，比 2011 年增长了 12.3%。从长远看会增长得更快，在未来 5 年内，老年就业者的数量将增长 81.7%。由于老年人失业后比年轻人更难找到工作，因此劳动部长呼吁所有雇主主要保住年长的雇员。

绿党和社民党拟在大选胜利后改革短时低薪工作体制，抑制“迷你工作”。据称，“迷你工作”的标准从收入 450 欧元降到 100 欧元，100 欧元以上的收入都应当缴税。引入“迷你工作”目的是将其作为进入劳动力市场的过渡桥梁，但这一预期没有达到，因此应当通过改革产生更多常规工作岗位。社民党劳动力市场方面的发言人也表示了对 100 欧元起征点的赞同。联邦劳动部也认为有采取行动的必要性，“迷你工作”和高额的社会救济不应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对大学生和中小學生而言，“迷你工作”是个不错的选择，而实际上超过 30% 的从事“迷你工作”的人都希望延长工作时间，因此应当给兼职工作更多机会。

**作者简介：**殷桐生，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于芳，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系讲师，博士研究生。

# 媒体新闻： 德国媒体对中国新领导层的评价

周海霞

在中国共产党十八大召开前夕，德媒涉华报道中就已一再出现关于中国未来领导层的相关报道；十八大召开期间以及之后一段时间，德媒中更是集中出现大量关于新当选的中国领导层的报道。德媒在其对中国新领导层的观察和评价中表现出对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期待，关于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和李克强个人的评价以积极正面为主。本文对多家德国平面媒体自2012年9月以来的涉华报道加以梳理，从中摘取并总结部分信息，以呈现德媒关于中国新领导层的评价。

首先，对于中国新一届领导层就职，德媒尤其关心的问题在于新政府是否具有改革的意志，其实在上一届政府换届时亦是如此。在政府换届之前与换届伊始，德媒对中国新

一届政府领导人表现出一定的期待，比如《明星》表示中国新任国家主席习近平具有成为伟大的改革者的潜质。该刊称，习近平有一天可能会成为像邓小平一样的人物，能够使中国发生同样的可持续性变化。<sup>①</sup>

在经济方面，德国媒体则一致认为新一届中国政府必将进行改革。<sup>②</sup>德媒得出此结论的出发点是认为中国经济面临重要的转折点。<sup>③</sup>报道称，中国现行体制和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已逼近边缘极限，<sup>④</sup>不再适应发展需要，甚至岌岌可危，<sup>⑤</sup>而在国际经济中中国也不能再继续保持其世界工厂的身份。<sup>⑥</sup>基于中国经济必然发生改革的出发点，德媒在相关报道中也表现出相应的期待。有报道称，新一届中国政府一定会倾尽全力推动中国经济的新一轮发展，为自己赢得更多信任。<sup>⑦</sup>鉴于中国当

① Vougioukas, Janis/Fu, Kiki.: „Der Thronfolger“, Stern, 8. November 2012.

② Erling, Johnny: „Peking stößt weitere Reformen an“, Die Welt, 18. Dezember 2012.

③ Stocker, Frank.: „Chinas Wirtschaft vor der Zäsur“, Die Welt, 5. März 2013.

④ Lee, Felix.: „Gewaltiges Arbeitspensum“, taz, 16. November 2012; Vgl. Follath, Erich/Wagner, Wieland.: „Ein Mörderischer Machtkampf“, Der Spiegel, 15. Oktober 2012.

⑤ Eckert, Daniel/Zschäpitz, Holger.: „Inselstreit erfasst die asiatischen Börsen“, Die Welt, 19. September 2012.

⑥ Erling, Johnny.: „Peking stößt weitere Reformen an“, Die Welt, 18. Dezember 2012.

⑦ Eder, Emmeran.: „Viel Neues in Schlangenjahren“, Handelsblatt, 21. Februar 2013.

今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越发重要，德媒比如《明镜周刊》认为，中国新政府领导下的经济改革不仅将会对中国经济产生重大影响，而且国际社会也将受益其中，当然也包括德国经济。<sup>⑧</sup>更有报道表示，习近平在西方被视为自由市场经济的追随者，因此有专家认为习近平领导下的新一届中国政府执政对于世界经济而言是一个好消息。<sup>⑨</sup>

在关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德媒纷纷表示，新一届中国政府面临巨大挑战，<sup>⑩</sup>有一系列问题急需解决，其中包括贫富差距、环境污染、老龄化以及国际安全问题等等，<sup>⑪</sup>相似的观点在上一次中国政府换届时也同样出现在德媒涉华报道中。德媒在报道中国新一届政府工作动向和具体举措时，这些问题也经常提及，比如德媒报道称：中国政府将带领中国从一个农业和工业国转变成为一个高科技国家和服务产业主导的国家；中国新一届政府关注环境问题；<sup>⑫</sup>中国放弃规模效益型经济增长作为未来目标，而代之以可持续发展；<sup>⑬</sup>新政府承诺将采取措施促进健康、教

育和社会福利平衡事业的发展。<sup>⑭</sup>

在国际问题上，德媒对中国新一届政府的评价依然延续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涉华报道的趋势，即认为中国政府自信和强势<sup>⑮</sup>。中国国家主席提出的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被解读为中国意欲强势崛起的证据之一，<sup>⑯</sup>甚至有德媒如《焦点》杂志将其解读为“抬头的民族主义”。<sup>⑰</sup>同时，与近年来中国经济发展被西方指责具有攻击性相应，德媒在其关于中国新一届政府的报道中也称，西方担心中国新任政府继续保持攻击性路线。<sup>⑱</sup>与这种所谓“攻击性”预测相关，报道密切关注中国的军备开支增长情况，德媒称中国扩张军备，将跻身军事大国之列。<sup>⑲</sup>

德国对新一届中国政府的观察和评价，与其关于中国高层领导人个人的观察和评价是密不可分的，其中最受关注的当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总理李克强，相比之下又以前者受关注程度更高。

德媒对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关注主要表现为如下方面：

⑧ Follath, Erich/Wagner, Wieland: „Ein mörderischer Machtkampf“, Der Spiegel, 15. Oktober 2012.

⑨ Werning, Heiko: „Die Kleine Wortkunde“, taz, 15. November 2012; Vgl. Dometeit, Gudrun: „Der rote Kaiser, der China retten soll“, Focus, 29. Oktober 2012.

⑩ Wagner, Wieland: „Die Wahrheit auf dem Index“, Der Spiegel, 23. Juli 2012.

⑪ Lee, Felix: „Gewaltiges Arbeitspensum“, taz, 16. November 2012; Vgl. Erling, Johnny: „China und die Toten aus dem Container“, Die Welt, 23. November 2012.

⑫ Zand, Bernhard: „Das Kohlenmonster“, Der Spiegel, 04. März 2013.

⑬ Lee, Felix: „Abschied vom Megawachstum“, taz, 06. März 2013.

⑭ Lee, Felix: „Städtebauer wird chinesischer Premier“, taz, 16. März 2013.

⑮ Lee, Felix: „Die Führung verlangt absoluten Siegeswillen“, taz, 18. März 2013.

⑯ Erling, Johnny: „Pekings Führung setzt auf Träume“, Die Welt, 18. März 2013; Vgl. Erling, Johnny: „Chinas Angst vor der Französischen Revolution“, Die Welt, 6. März 2013.

⑰ Dometeit, Gudrun: „Der rote Kaiser, der China retten soll“, Focus, 29. Oktober 2012.

⑱ Redaktion: „Diese Woche: Wer, Wo, Was“, Focus, 4. März 2013.

⑲ Lee, Felix: „Abschied vom Megawachstum“, taz, 06. März 2013; Vgl. Follath, Erich/Wagner, Wieland: „Die Weisen und die Welteroberer“, Der Spiegel, 29. Oktober 2012; Vgl. Lee, Felix: „Die Führung verlangt absoluten Siegeswillen“, taz, 18. März 2013.

首先，德媒对习近平的家庭背景极为关注，一方面是其作为中国开国元勋习仲勋之子的身份；另一方面是其作为公众人物彭丽媛丈夫的身份，比如《焦点》杂志和《日报》都调侃称，如果问起“习近平是谁？”，起初在中国得到的回答主要是：“彭丽媛的丈夫”。<sup>20</sup>报道说，这位主席夫人良好的公众形象将会使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中国共产党从中受益。<sup>21</sup>习近平的成长经历和职业履历也相应受到关注，比如其上山下乡的那段经历。

总体而言，德媒对于习近平的评价是积极正面的：具有国际开放心态、喜欢看好莱坞影片；<sup>22</sup>是一位具有战略头脑、平和的政治家<sup>23</sup>、在职业中谨慎小心<sup>24</sup>、实干家<sup>25</sup>、市场经济的拥护者<sup>26</sup>、诚实的强硬派，在公共场合并非不苟言笑，而是具有亲和力<sup>27</sup>、具有反腐决心<sup>28</sup>。

《明星》杂志如此评价习近平：“他是一位有潜质成为伟大改革者的领导人……如果将习近平的生平片段和细节组合起来，呈现出来的人物形象将会是令人震惊的：这位中国的改革政治家诚实、有责任心，但同时他

依然是一位忠实的共产党人。有些迹象表明，习近平有朝一日可能会成为那个让他的国家发生持续性改变的伟人，就像邓小平一样。”<sup>29</sup>

德媒对于中国总理李克强的评价同样以正面积为主。与德媒报道习近平时关注其家庭背景不同，对于李克强，德媒更关注其通过个人奋斗而获得的成就。报道称，中国总理李克强是中国为数较少的没有高层家庭背景，而进入最高领导层的领导人之一，<sup>30</sup>《日报》在报道李克强时使用了“农民的儿子跻身党内精英阶层”<sup>31</sup>的标题。德媒尤其关注李克强的教育背景和学术能力，报道称之为中国受教育程度最高的国家领导人，<sup>32</sup>热衷于报道其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取得的学术成就，李克强所师从的博士生导师厉以宁的学术业绩同样受到关注。

德媒对于作为政治家和中國新任总理的李克强的预期也非常正面，报道表示，经济学家李克强不同于技术专业出身的工程师们，他不会以解决技术问题的方式作为主要手段来解决中国面临的问题。<sup>33</sup>关于李克强的政府工作方向，德媒报道较多的是他关于推广

<sup>20</sup> Hansen, Sven: „Xi Jinpings bessere Hälfte“, taz, 10. November 2012; Vgl. Dometeit, Gudrun: „Der rote Kaiser, der China retten soll“, Focus, 29. Oktober 2012.

<sup>21</sup> Hansen, Sven: „Xi Jinpings bessere Hälfte“, taz, 10. November 2012.

<sup>22</sup> Vougioukas, Janis/Fu, Kiki: „Der Thronfolger“, Stern, 8. November 2012.

<sup>23</sup> Follath, Erich/Wagner, Wieland: „Die Weisen und die Welteroberer“, Der Spiegel, 29. Oktober 2012.

<sup>24</sup> Follath, Erich/Wagner, Wieland: „Ein mörderischer Machtkampf“, Der Spiegel, 15. Oktober 2012.

<sup>25</sup> Erling, Johnny: „Der Sanierer“, Die Welt, 16. März 2013.

<sup>26</sup> Werning, Heiko: „Die Kleine Wortkunde“, taz, 15. November 2012; Vgl. Dometeit, Gudrun: „Der rote Kaiser, der China retten soll“, Focus, 29. Oktober 2012.

<sup>27</sup> Vougioukas, Janis/Fu, Kiki: „Der Thronfolger“, Stern, 8. November 2012.

<sup>28</sup> Dometeit, Gudrun: „Der rote Kaiser, der China retten soll“, Focus, 29. Oktober 2012; Vgl. Vougioukas, Janis/Fu, Kiki: „Der Thronfolger“, Stern, 8. November 2012.

<sup>29</sup> Vougioukas, Janis/Fu, Kiki: „Der Thronfolger“, Stern, 8. November 2012.

<sup>30</sup> Lee, Felix: „Städtebauer wird chinesischer Premier“, taz, 16. März 2013.

<sup>31</sup> Lee, Felix: „Bauernsohn in Elitepartei“, taz, 25. Oktober 2012.

<sup>32</sup> Erling, Johnny: „Chinas Prinzen auf dem Thron“, Die Welt, 15. März 2013.

<sup>33</sup> Lee, Felix: „Bauernsohn in Elitepartei“, taz, 25. Oktober 2012.

城市化的主张，比如系统性的城市化与农业科技革新相结合；在城市化过程中减少行政国家参与等。<sup>④</sup>在这个意义上，有报道称“城市建设者成为中国总理”<sup>⑤</sup>，这里的“城市建设者”指的就是李克强。

综合来看，德国媒体对于新一届中国政府领导层的评价是较为正面的。这种正面评价不仅源于其对于中国领导人个人的积极评价，同时也与德媒寄希望于新一届政府领导下，

中国将会发生改革息息相关。根据德媒的观点，无论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中国都应当发生变革，在经济上德媒表示已明确看到改革迹象，并表示中国经济改革的影响将远远波及中国以外的其他国家；在政治上，虽然德媒预测新一届中国政府将会坚持既有路线，但似乎还有所期待。上述分析显示，德媒关于新一届中国政府的评价随着时间的发展也在发生变化。笔者预测，这种趋势今后仍将持续。

作者简介：周海霞，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系讲师，博士。

---

<sup>④</sup> Erling, Johnny: „Der Mann, der weniger Staat in China will“, Die Welt, 21. März 2013; Vgl. Erling, Johnny: „Riskante Urbanisierung“, Die Welt, 12. März 2013.

<sup>⑤</sup> Lee, Felix: „Städtebauer wird chinesischer Premier“, taz, 16. März 2013.

# 政治、社会与文教新闻

于 芳

## 一、国内政治形势

在 2013 年 1 月 1 日新年献词中，默克尔总理号召德国公民鼓起勇气、共同努力、团结起来，经济形势在来年将会变得更为棘手。已经采取的措施会逐渐显出成效，所有人都要有耐心，危机不会轻易消失。默克尔提到，研发是保证工作岗位的重要办法，政府应当在教育和研发领域上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加大投入。

3 月 9 日，自民党人菲利普·罗斯勒以 85.7% 的支持率再次当选为自民党主席，任期两年。在塞浦路斯危机暂告一段落的时刻，联邦总理默克尔及其政府的支持率为 68%，占有优势地位，默克尔仍旧是德国最受欢迎的政治家。根据 4 月民意调查，75%（比 1 月上升了 5 个百分点）的德国人认为欧元危机和债务危机最糟糕的时刻尚未到来，65%（比 3 月上升了 6 个百分点）的德国人认为默克尔在欧元危机中采取了正确而果断的行动。

黑森州司法机构发现，新纳粹分子试图在监狱里建立起联邦范围的联系网络，在黑森州联系上其他州的狱友，将监狱变成右翼极端分子的寄身之地，并向极右翼的罪犯及其家人提供资金帮助。允许服刑人员接触

“国家社会主义地下组织（NSU）”的政策面临着考验。但据专家称，他们早已知晓新纳粹分子的网络，包括服刑人员如何交流，利用什么样的途径，并提到和恐怖组织 NSU 的联系人是谁。

自 2001 年“9·11 事件”发生之后，德国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加强国内安全，并通过了一系列法案，这些法律至今仍旧有效，政府拟采取行动应对恐怖组织对国内安全造成的威胁。

## 二、社会、文化和教育

2013 年 2 月，750 吨马肉被作为牛肉出售和加工。2 月底，因牛肉中可能混有马肉，5 万吨肉被召回。销售商无法证明这些肉食品的来源，未能达到自 2000 年疯牛病以来欧洲范围内的普遍标准。目前受到影响的德国企业多达 124 家，从荷兰购进肉食品又销往德国各地。德国各州食品监管部门已采取行动追踪已售商品，并阻止剩余商品的流通。

2013 年 3 月 5—9 日举办了德国汉诺威工业博览会（CeBIT），此次博览会参会人数比往年减少了 12%，但据博览会主席称，此次博览会比以往的表现更好，质量有所提

升，主题依然延续之前四大板块进行展示，即数字商务（CeBIT pro）、数字政务（CeBIT gov）、数字实验室（CeBIT lab）和数字生活（CeBIT life）。博览会不仅是对话的场所，更是促成合作的论坛。默克尔总理在博览会开幕式中称，该论坛将创造发展、工作机会和欧洲的未来。

从两年前开始，接受哈茨 IV 救助者的孩子可享受免费的班级旅行、免费参加体育社团或免费上补习课。但很多社会机构对这项教育福利颇有微词，很少利用，这从国家报销的资金数额上即可看出。两年已过去，情况并未发生很大变化，做得最好的地区是汉堡和不莱梅，专家称各个学区应充分利用资源，对学生投入更多关注。

欧盟委员会一项研究显示，德国是欧洲最有创新能力的国家之一，仅次于瑞典。此处所指的创新能力意味着德国拥有高度发达的大学体系，且工业和科研实现了良性结合。

据联邦统计局数据，德国大学新生数量相比上年减少了 4.9%，减少人数最多的领域为工程学，减少了 8.8%，其中男生人数减少了 12%，女生人数则增加了 2.7%，有更多女生希望成为工程师。据劳动市场和职业研究人员的调查结果显示，自 2005 年以来，大学毕业生的就业机会在不断改善，2011 年，大学毕业生的失业率为 2.2%，几乎接近完全就业的水平。而在 2006 年，大学毕业生的失业率为 3.6%，1997 年更高，为 4.5%。高等专科学校的毕业生也拥有类似的机会，2006 年，他们的失业率为 3.3%，到 2011 年降低到 2.5%。但对于没有受到良好教育的青年人而言，就业机会就不那么乐观了。

社民党领导人施泰因布吕克的夫人在波恩任教，发现每到体育课如游泳课时，会有穆斯林女学生请病假不参加。因此，施泰因布吕克认为出于宗教原因男孩和女孩应分开上体育课，这样就顾及到了穆斯林的宗教信

仰。但这一建议受到了来自党内的批评，认为“德国 150 年前有过男校和女校，社会的发展不应倒退”。分开上体育课不但无法促进穆斯林学生融入社会，反而会阻碍他们的融入。联邦总理默克尔对此也持批评态度，她认为这是完全错误的融合政策，分开上课只会导致越走越远，而不是实现社会融合。此外，自民党和绿党都对这一建议持反对意见，认为此举将会侵犯男女平等的基本权利。

继 2011 年 6 月欧洲议员科赫·梅林被取消博士学位以来，2012 年 2 月德国国防部长古滕贝格爆出博士论文涉嫌剽窃，2013 年 2 月德国教育部长安纳特·莎万也爆出博士论文涉嫌剽窃的丑闻。为了避免此类事情发生，现任教育部长约翰娜·万卡决定，为博士论文设立审核标准，内容包括鉴定人的选择、鉴定流程的时间及时效。

联合国儿童救助组织对欧洲 29 个国家的 176,000 个儿童和青少年（年龄在 11 到 15 岁之间）进行问卷调查，其中德国被访者约 5000 人。结果显示，荷兰儿童和青少年认为自己拥有最好的生活条件，排在最末的是罗马尼亚。综合考虑教育、卫生、安全、行为和风险、居住和环境、物质条件等内容，德国此次在 29 国中排名第六位，比 2010 年的调查上升了两位，这意味着德国儿童和青少年的外在生活条件有所改善，不过，他们的幸福感却并没有同时提高，有 1/7 的受访者认为目前的生活状况尚可，但有些人对生活条件的看法颇为负面。很多德国的儿童和青少年感到并不幸福，外部生活条件和内在幸福感之间的差距是所有受访国家中最大的。教育专家称，片面关注物质和形式上的成功，会让很多青少年被排除在社会之外，失去希望和未来。社会应当充分利用资源，倾听未成年人的心声，让他们有更多机会参与到社会建设中，更加积极地面对人生。

### 三、环境保护

德国政府拟将再生能源发电所占比例从目前的 25% 提高至 2020 年的 35%。为鼓励人们多用再生能源发电，政府提高了非可再生能源发电的电力税。社民党和绿党执政的各州要求电力税降低 25%，默克尔总理拒绝降低电力税。

德国政要出行一般乘坐德国的国产车，但这些车通常超过了欧盟规定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被环保监测部门亮起红灯，领导人绿色出行的意义受到关注。在这一点上，汉堡州政府做得很不错，根据为期 7 年的公务车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所有州政府委员乘坐的公务车，排放量都低于每公里 130 克二氧化碳的排放标准。

德国政府计划最多确定五处地方用于存放核废料。各方代表同意，到 2015 年以前，由专门的调查委员会建议各种可能的标准来寻找核废料存放地点。寻找核废料的存放地点预计需要花费 20 亿欧元，这些费用应由核公司来承担，这些核能企业已投资 16 亿欧元来调研（Gorleben）一地，但就该地是否合适并无任何明确的报告和说法。确定存放地点的最终期限是 2031 年，因此 Gorleben 不失为一个可能的选择。

绿色和平组织指责联邦政府没有重视煤电厂造成的污染问题，为了施加压力，绿色和平组织给出了一项调查报告，要求德国放弃使用煤来发电。该组织认为，联邦政府决定退出核能发电的同时忽略了烧煤带来的污染，目前德国 45% 的电都来自煤电厂。

作者简介：于芳，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系讲师，博士研究生。



# 热词诠释



# LTRO 与 SMP

关海霞

## 一、LTRO（长期再融资计划）

LTRO 的全称为 Long-Term Refinancing Operation，中文翻译为“长期再融资计划”。LTRO 是欧洲央行的传统金融工具，目的主要是增加银行间的流动性，维持欧洲银行业的金融稳定。

2008 年金融危机之后，由于各国在危机中采取了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导致各国债务激增。债务问题席卷全球，受影响最大的就是欧洲。希腊成了欧债危机中第一块倒下的多米诺骨牌，随后，欧元区多个国家陷入主权债务危机。在市场对于债务国经济复苏及偿债能力极度担忧的情况下，大量投资资金撤出欧洲大陆，债务国政府及银行的融资成本同时飙升，这导致欧洲银行业陷入了融资难→惜贷→流动性差→融资难的恶性循环境地。企业及家庭难以贷款，银行间同业拆借几乎停止，大量欧洲银行只能依靠从本国央行和欧洲央行借贷来维持流动性。

欧洲央行在欧债危机期间于 2011 年 12 月 9 日欧盟峰会后提出了两个三年期的 LTRO。2011 年 12 月 21 日结算的是第一期 LTRO，取代了 2011 年 10 月 6 日宣布的 12 个月期 LTRO。它的运行机制是：欧洲央行公

布此项操作后次日进行公开招标，由欧洲央行的对手方——欧洲银行以符合要求的抵押品进行抵押贷款，最低借款 100 万欧元，利息为 1%，1 年后在提前告知本国央行后可以提前全部或部分还本。欧洲央行为了让更多的欧洲银行能参与本次借贷，除了将贷款利率从 2% 降至 1% 以外，还降低抵押物标准。除了可以抵押欧元区国家主权债务，也可以抵押对中小企业的贷款。

第一期拍卖的 LTRO 总量涉及 523 家欧洲银行，贷款总额高达 4890 亿欧元，被称为欧洲版 QE(量化宽松伙伴政策)。本次 LTRO 的贷款时间是欧洲央行有史以来最长的一次，为期 3 年。

2012 年 2 月 29 日，欧洲央行宣布推出第二轮三年期长期再融资操作，总规模为 5295.3 亿欧元。欧洲央行此次再次使用这项传统的金融工具，目的就是希望欧洲银行在获得 1% 低息的长期贷款后，可以去购买高息的债务国国债，比如西班牙、意大利的国债（近期利率分别在 5%、6% 左右），通过套利利息差一来解决欧洲银行的流动性问题，二来可提高市场对于主权债务国国债的认购率，从而降低欧洲央行直接购买债务国国债的现金压力。

根据欧洲央行公布的数据显示，3月25日这一周欧元区银行将参与偿还总计69亿欧元的LTRO贷款。5家银行参与3月20日的第一轮LTRO的还款，数额为3.85亿欧元；15家将参与第二轮LTRO还款，数量为64.32亿欧元。

目前看来，LTRO操作还是有它自身优势的：首先，缓解了更多的银行流动性问题。欧洲523家银行参加了第一期LTRO，提出了贷款申请，远远多于以前参与主要再融资操作（Main Refinancing Operations, MRO）的银行数量——130至200家。其次，新增了大量信贷，开辟了新的融资渠道。第三，大幅延长信贷资金的期限，减轻了银行的融资压力，也促使银行放贷给家庭和企业。第四，融资成本低，带来了套利交易的空间。

从目前实施情况来看，LTRO计划最大的问题在于银行以低成本融资后，不一定购买欧洲边缘国家债券。因为前期银行一直在抛售这些高风险的国债，现在虽然现金增加，但重新买回这些国债来套利的动机较小。有数据显示，在欧洲银行投标LTRO后，有将近一半的资金又重新被存回了欧洲银行。总体来看，LTRO计划有助于欧洲银行缓解流动性压力，减少破产风险，但对主权债务危机的提振作用有限。

## 二、SMP（证券市场计划）

证券市场计划是指中央银行为达到某些目的，通过证券市场、货币市场等公开市场所采取的有计划的调节货币供应量、利率走势的操作行为。

在欧债危机的背景下，债券市场失灵，重债国流动性短缺。为进一步解决欧洲尤其是欧元区重债国的债务问题，缓解债务危机边缘国的债务压力，修复债券在货币政策传导中的功能，欧洲央行从二级市场购买欧元区成员国政府和公共部门发行的可交易债券，从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购买欧元区私人公司发行的可交易债券，并通过微调操作对冲购买债券投放的流动性。

2010年5月，欧洲央行开始在证券市场计划（Securities Market Programm, SMP）框架内购买重债问题国的债券。至2011年底，欧洲央行总共购买了2100亿欧元，其中1570亿欧元为重债国债券，约为欧洲银行资产的10%。

2012年，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提出重新激活该计划，立刻遭到一片反对声。目前看来，欧洲央行不太可能启动该计划。一是这个计划一经提出，就遭到了德国的强烈反对。在德国看来，欧洲央行购买重债国国债的行为会造成潜在的成员国债务共同化，隐藏着严重的稳定性危机。二来，欧盟条约的第123条条款明确禁止欧洲央行为成员国政府提供货币融资的行为：禁止欧洲央行或成员国央行向欧盟其他机构、各成员国政府或其他团体、公共事业投资或提供任何信贷安排、弥补财政赤字或将公共债务货币化的行为；禁止欧洲央行和成员国央行从上述机构购买债券。因此，欧洲央行不太可能独自朝着这个方面行动，即欧洲央行直接购买政府债券，作为市场的投资者，直接插手主权债务市场。

比较好的替代选项可能是欧洲央行宣布允许欧元区国家央行购买民间部门资产，包括未担保银行债、企业债，从而实现“信贷宽松”。

作者简介：关海霞，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系讲师，博士研究生。

# OMT 和 SSM

徐四季

## 一、OMT（夺标货币交易）

夺标货币交易（Outright Monetary Transactions, OMT）属于央行的公开市场业务，具体是指欧洲央行在二级市场上直接买卖欧元区成员国发行的国债。

2012年8月2日，欧洲央行理事会宣布，将在二级市场启动 OMT，以保证货币政策的有效传导和货币政策的单一性。在欧债危机的背景下，陷入财政危机的国家信用等级不断下降，国债利率迅速上升；欧元区各成员国国债之间的利率差日渐加大，欧元区国债市场出现了严重扭曲，这影响到了欧元区统一货币政策的传导过程。OMT 的直接目的首先在于降低意大利和西班牙国债的利率水平，减小两国银行的再融资成本，进而缓解债务危机。

2012年9月6日，欧洲央行理事会进一步公布了 OMT 的技术细节：

- **限制性条件：**OMT 的一个必要前提是相关国家必须严格遵守欧洲金融稳定基金（EFSM）和欧洲稳定机制（ESM）相关计划的条件。相关计划可以是宏观经济调整计划，也可以是预防性计划。在拟定针对相关国家的限制性条件和监控

相关计划时，应谋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参与。在此前提下，欧洲央行理事会将从货币政策的角度考虑启动 OMT。一旦目的已达到或条件没有被遵守，欧洲央行理事会会有权中止 OMT。在彻底评估后，欧洲央行理事会会有权决定 OMT 的启动、延续和终止

- **适用范围：**今后在 EFSF 和 ESM 宏观经济调整计划或预防性计划启动时，欧洲央行将会考虑启动 OMT。目前正处于宏观经济调整计划之下的欧元区成员国，一旦它们能重新进入债券市场，欧洲央行也可能考虑对该国启动 OMT。OMT 的交易对象主要是 1—3 年期的国债。OMT 没有事先设定的定量限制
- **债权人地位：**在法律地位上，OMT 的债权人（即欧洲央行）不享有优先权，其待遇与私人债权人或其他债权人一样
- **流动性冲销：**通过 OMT 产生的流动性将被完全冲销，以防止这些流动性引发通胀。
- **透明性：**OMT 持有债券的总量及其市值将每周公布。OMT 持有债券的平均到期期限和国别细目将每月公布一次
- **证券市场计划：**鉴于启动 OMT 的决定，欧洲央行将停止证券市场计划（Securities

Markets Programme, SMP)。通过 SMP 注入的流动性将继续像以前那样被逐步吸收, SMP 资产组合中现有的证券将持有至到期日

欧洲央行将 OMT 视为一种货币政策工具, 而不是《欧洲联盟运作条约》(Vertrag über die Arbeitsweise der Europäischen Union, AEUV) 第 123 条明确禁止的为成员国政府提供的货币融资行为。事实上, 货币政策和国家货币融资的界限是很难准确界定的。

目前看来, 这一政策还是比较成功的, 在欧洲央行真正介入债权市场之前就稳定了市场情绪, 增加了投资者的信心。政策一出, 西班牙、意大利和葡萄牙的国债收益率迅速降低, 而避险的德国国债收益率则明显走高。

## 二、SSM (单一监管机制)

2013 年 3 月 19 日, 欧元区 17 个成员国和欧洲议会就建立欧元区银行单一监管机制 (Single Supervisory Mechanism, SSM) 达成一致: 欧元区的大型银行将不再由各国设立监管机构, 而是由欧洲央行直接、统一监管。其细则如下:

- 核心监管机构为欧洲央行。欧洲央行将设立一个专门的监管理事会负责银行监管工作
- 监管对象为欧元区的大型银行, 具体是指资产总值超过 300 亿欧元或所在国国内生

产总值 20% 的银行。其他银行原则上仍然由各国监管机构监管, 但在必要的情况下, 欧洲央行亦有权对其进行直接监管

预计 SSM 将于 2014 年 3 月 (即立法生效 12 个月后) 最终建成。SSM 建成后, 欧洲稳定机制 (ESM) 可以为迫切需要救助的银行直接注资。

欧元区成员国必须加入 SSM, 非欧元区的其他欧盟国家只要愿意也可以加入 SSM。

建立 SSM 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从短期来看, SSM 的建立为 ESM 直接救助危机银行创造了前提条件, 从而可以打破当前欧债危机中银行危机和主权信用危机之间的恶性循环关系, 使欧元区能尽快解决银行系统问题并最终走出欧债危机。从长远来看, SSM 的建立有利于强化欧洲宏观审慎监管, 降低系统性金融风险; 它体现了欧洲一体化的内在要求, 是走向银行联盟的重要一步, 也为进一步实现财政联盟和政治联盟奠定了基础。

SSM 将金融监管权力集中到欧洲央行, 这虽然可以提高监管质量和监管的一致性, 但在事实上扩大了欧洲央行的职权范围, 有可能威胁到其独立性。对此, 欧盟声明称, 欧洲央行的货币职责将与监管任务“严格分离”, 从而“消除货币政策目标与审慎监管的潜在利益冲突”。但具体如何确保欧洲央行的货币政策不受政治因素的干扰依然是现实中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

作者简介: 徐四季, 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系讲师, 博士。

# 政治舞台



# 德国联邦议院大选介绍

袁 洁

根据德国联邦总统约阿希姆·高克 2013 年 2 月 8 日签发的总统令，第 17 届德意志联邦议院选举将于 2013 年 9 月 22 日（周日）正式展开。

德国联邦大选每四年举行一次。基本法第 38 条规定，联邦议员通过普遍、直接、自由、平等和秘密的方式选举产生。所有年满 18 岁的德国公民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德国选民约有 6200 万人，其中女性占多数，逾 3200 万人。在 2009 年的议会选举中，有 350 万人是新选民。德国的参选率传统上都很高，70 年代参选率达 90%，德国统一以来保持在 80% 上下。在 2009 年 9 月 27 日第 17 届德国联邦议院选举中，70.8% 有选举权的选民参加了投票。

## 一、联邦议院选举 ( Bundestagswahl )

联邦议院是民选的人民代表机构，由 598 名议员组成，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任期四年，其主要任务是立法和监督政府。

在德国主要有两种选举方式，人们可以前往所在选区的投票站进行投票，也可通过邮寄选票的方式参与选举，但都必须通过填写选票 ( Stimmzettel ) 来完成。

德国选举实行两票制，每个选民可投两票。

第一票 ( Erststimme ) 投给所在选区 ( Wahlkreise ) 的直接候选人 ( Direktkandidat )。在选票的左侧列出本选区直接候选人的名单，获得最多选票的候选人可直接进入联邦议院。直接候选人可以是某个政党的代表，当然也并非一定如此，但一般来讲，只有那些隶属于某个政党的选区代表才有望当选。如果选举人通过第一票成功选出一名无党派人士直接进入议会，那么这些选举人的第二票将不予统计。德国全国共被划分为 299 个选区，每个选区可通过第一票选举产生一名议员，占联邦议院 598 个席位的一半，即 299 个。通过第一票选举进入议院的议员被称为直选议员 ( Direktmandate )。

第二票 ( Zweitstimme ) 投给某个政党，或者说，选举各政党的州候选人。第二票位于选票的右侧，列出了被批准参加此次联邦大选的各个政党。根据第二票的投票结果，联邦议院 598 个议席将按照相应比例划分给各个党派，各党派将按照提前确定的各联邦州候选人名单 ( Landesliste ) 选出议员进入联邦议院。如果某党在某联邦州通过第一票获得 8 个直接议员席位，通过第二票获得 13 个联邦议员席位，则首先要保证 8 个直接议员

的席位，再从第二票获得的 13 个联邦议员席位中选取 5 名进入联邦议院，使总席位达到 13。相反，如果某党在某联邦州获得的直接议员席位多于按第二票比例所分配的席位，那么该党可以增派议员进入联邦议院。例如，基民盟在黑森州通过第一票赢得 8 个直接议员席位，而根据规定，基民盟在黑森州只能获得 6 个席位，这两个缺失的席位被称为“超额议席”（Überhangmandate），联邦议员的总人数也相应增加两个。因此，联邦议员总数一般会高于法律规定的 598 名。比如，2009 年联邦议院选举产生 622 名议员，包括 24 个“超额议席”。

有些候选人，他们在谋求直接候选人资格的同时，也在各州候选人名单中处于比较靠前的位置，这样就可以保证其在第一票失利的情况下也可以通过第二票进入议院。实践中，各党派的首席候选人会采取这种办法保证当选。

此外，为了避免因众多小党的存在而使得达成多数意见复杂化，一个限制性条款，即所谓的“百分之五条款”（Fünf-Prozent-Klausel）把这些小党阻挡在联邦议院大门之外。根据“百分之五条款”，只有那些在第二票中获得总票数百分之五以上选票或者至少三个直接议席的政党才能进入联邦议院。如果某个政党只获得一个或两个直接议席，那么这一位或两位代表只能以独立身份进入联邦议院担任议员。

第一票和第二票是相互独立的，例如，选民可将第一票投给基民盟的候选人 A，并将第二票投给社民党。联邦选举法还规定，如果任意一票作废，另外一票不会受到影响。决定联邦议院中议席数量的基础是有效的第二票。

## 二、联邦总理选举（Bundeskanzlerwahl）

联邦总理由联邦总统提名并由议会选举产生，他向联邦总统提出各部部长的任免建议，并按联邦总统批准的工作条例领导联邦政府。联邦总理对联邦议院负责，在国家战争状态下拥有对武装力量的指挥和命令权。

一般来讲，联邦总理由在联邦议院大选中获得最多选票的政党提名的候选人担任，一般是该党党主席。在联邦总理选举之前，必须先确定执政联盟，执政联盟需对许多细节进行磋商，包括各部在政党之间的分配，保留哪些部、新设哪些部、未来几年的实施规划等等，并将谈判结果写入联合执政协议（Koalitionsvertrag）。只有经过上述步骤之后，才能进行总理选举工作。联邦总理由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

## 三、联邦总理选举的三个阶段<sup>①</sup>

第一阶段：根据联邦总统提名，新选举产生的联邦议院选举产生新的联邦总理。总理候选人必须获得绝对多数票（die absolute Mehrheit），即所有选票（包括弃权票）的一半以上才能当选。如果不能达到绝对多数，则开启第二阶段。在联邦德国的历史上至今还没有出现过这一情况。

第二阶段：联邦议院有两周的时间选出新的总理。在该阶段，可以有一名或多名总理候选人。候选人也必须获得绝对多数票才能当选总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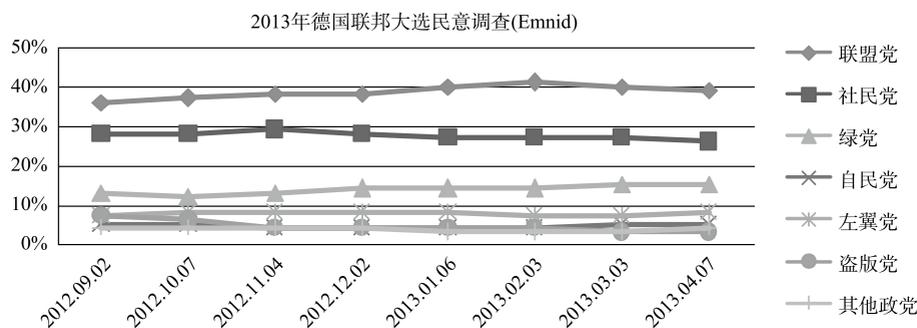
第三阶段：如果第二阶段也没能成功选出联邦总理，联邦议院必须在两周内确定新的总理候选人并进行表决。获得最多选票

<sup>①</sup> 《德国概况》，德国联邦议院官方网站和维基百科。

的候选人当选。这里又分两种情况：如果候选人获得绝对多数票，那么联邦总统必须在7天内任命新总理；如果候选人获得的是相对多数票（die relative Mehrheit，即获得最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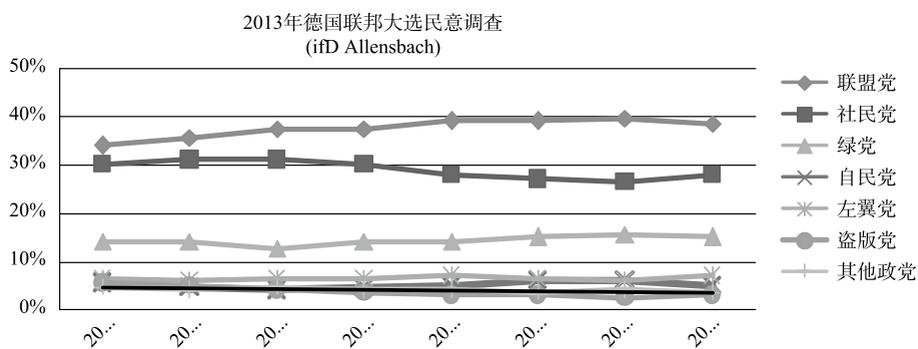
选票，但没有过半），那么联邦总统须根据当前的政治状况决定任命新总理或者解散议会。

近期德国联邦大选民意调查的各党支持率图示。



Emnid 是德国最大的、历史最悠久的民意调查机构之一，成立于1945年11月1日，总部位于德国北威州的比勒费尔德市。该机构每周就德国联邦大选对约2000位受访者

进行民意调查，并于周日公布民调结果。该折线图选取2012年9月以来每月第一个周日的民调结果，所用数据均来源于 <http://www.wahlrecht.de/umfragen/emnid.htm>。



ifD Allensbach 是德国最知名的民意调查机构之一，成立于1947年，总部位于巴登-符腾堡州的阿伦斯巴赫。该机构拥有约100名员工，主要采用面对面采访方式，也进行电话、书信和在线采访。ifD Allensbach 每月

就德国联邦大选对约1600名受访者进行民意调查并发布调查结果。该折线图选取2012年9月以来的数据制作而成，所用数据均来源于 <http://www.wahlrecht.de/umfragen/allensbach.htm>。

作者简介：袁洁，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系硕士研究生。

## 德国重要政党简介

德国的政党很多，这里主要对其中7个影响较大的作一简单的介绍。Forsa 研究所2013年4月10日的民意调查显示，联盟党的支持率为41%，社民党23%，绿党14%，自民党6%，左翼党9%，盗版党3%，其他党4%。

### 一、联盟党

谢 昕

德国联盟党由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基民盟）与其仅活跃于巴伐利亚州的姊妹党基督教社会联盟（基社盟）组成。基民盟1945年6月成立，基社盟1945年10月成立。1949—1966年联盟党单独执政，1966—1969年与社民党联合执政，1982至1998年与自民党联合执政，2005—2009年与社民党联合执政，2009年至今与自民党联合执政。

基民盟党员以企业主、农场主、职员和知识分子为主，代表的是中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它传统上是一个基督教、男性的政党。基社盟是德国巴伐利亚的一个基督教保守主义政党。在联邦议院，它和基民盟共同组成一个议会党团。该党奉行基督教社会主义和保守主义，主要得到企业家和劳工、庄园主和农民、独立经营的小业主的支持，特别受到男性选民的支持（女性选民更青睐中间偏左的社民党）。基民盟的首任主席是康德拉·阿登纳。联盟党是西方国家传统意义上的保守政党，经济上倾向于维护企业主的利益，主

张通过鼓励企业主不断扩大投资来推动经济发展。

2012年6月底数据显示，基民盟党员为482,951人，略少于社民党。目前基民盟执政的州共有7个：黑森州、萨尔州、萨克森州、萨安州、图林根州、柏林州及梅前州。

2012年4月数据显示，基社盟有150,585名党员，女性党员比例为19.3%，是德国第三大党。基社盟一直在巴州执政，在其他各州无基层组织。

民调显示，联盟党目前的支持率达到40%以上，遥遥领先于其他各党，宣布将于6月24日公布竞选纲领。

### 二、社民党

熊 雁

德国社会民主党 (SPD) 是德国现存的最老的政党，由1863年创立的全德工人联合会 (ADAV) 以及1869年创立的德国社会民主工党 (SDAP) 于1875年合并而成，1890年更名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在140多年的时间里，它经历了巨大的变化。1976年党员数量为100多万，90年代之后不断下滑，到2003年下滑加速，仅2003—2004年社民党就流失了近50万名党员，2011年只剩下489,638万人。

社民党在德国13个州中参与执政，其中9个州中作为大党执政，它们是：柏林、勃兰登堡、不莱梅、汉堡、梅前、下萨克森、北

威、莱普和石荷州。其他作为小党参与执政的有4个州：在萨安、萨尔和图林根州社民党与基民盟组成大联盟政府，在巴符州与绿党联合执政。

2013年3月11日社民党通过了竞选纲领（草案），共十一章：一、更好更公正地治理德国，创建德国新的社会平衡；二、约束金融资本主义，加强经济和中产阶级，创造好的工作；三、一个现代社会的教育，平等和共同生活；四、一个公平的税收政策；五、社会安全和预防；六、睦邻；七、环保和消费者保护；八、民主生活；九、一个不一样的更好的欧洲；十、关于全球化的主张：所有国家的公平取代少数国家的富裕；十一、更好地治理德国。

社民党联邦总理候选人皮尔·施泰因布吕克，曾任大联盟政府时期的财政部长，目前正受到各类丑闻的困扰。2013年社民党推出了竞选纲领草案，也未能提高他的个人支持率。3月份的一项调查报告显示德国民众认为北威州州长克拉夫特是比施泰因布吕克更好的社民党候选人。

### 三、绿党

田佳峰

德国绿党产生于20世纪60、70年代的各种新社会运动，如生态运动、和平运动、学生运动、反传统文化运动、女权运动、公民倡议运动和反核能运动等。60年代初美国插手越南战争，1973年石油危机爆发，使发达国家进入滞胀时期，深受经济危机、能源危机、生态危机及安全危机的影响，绿党便吸收各种社会新思潮由此而诞生。

绿党的价值观及政治原则有四项：生态、社会责任、基层民主和非暴力。其中生态是第一性的原则，其基本含义是维持生态平衡，

把自然界看作由无数互相联系、不断发展的生命网络系统构成的生态系统，人类社会就包含在这个系统中，构成一个分系统。只有人类社会和谐发展，即社会结构有利于人的发展，该分系统才能运转良好，整个生态系统才会平衡。

社会责任起源于社会不公。该原则就是要改善人与人的关系，任何人不能因为种族、性别、年龄、地域、性取向、贫富、国籍等原因而受到歧视。其中男女平等是绿党标志性的特点，也是其政策制定中单独考虑的一点，绿党在成立时就规定女性在党内职务的比例最低为50%，这成为德国其他政党的表率。

基层民主就是按照直接民主的原则建立党组织，途径是权力分散化。绿党认为传统政党在政治上由于等级化和官僚化已使上层决策者与基层党员和群众脱离联系，导致决策者丧失社会责任感，无法代表群众的利益。

非暴力原则又叫甘地主义。早在1983年的竞选纲领中绿党就已提出：“我们的首要原则是人道的目的不能通过非人道的途径来达到。”生态革命的目的不能用暴力实现，甘地的名言就是他们的信条：“无所谓和平之路，和平本身就是路。”

由于绿党发源于学生运动、女权运动、生态运动等新社会运动，青年学生、女性、都市白领阶层中不少人都是绿党的忠实选民。

绿党的崛起对德国产生了深刻影响。首先是政党政治方面，绿党将群众抗议运动引向议会政治，扩大了议会的群众基础，缓解了社会矛盾；其次是政治格局方面，打破了之前3个政党（基民盟/基社盟、社民党、自民党）三足鼎立的“两个半政党”格局，形成两大党占主导的多元政治格局；再次是绿党崛起对各传统政党的政策也产生影响，使之发生“绿化”，如引入女性比例、环保、限制核能等绿党主张。绿党作为“反对党的党”推进了国家改革。

当前绿党在德国 16 个州议会已取得显著的成绩。在巴符州和不莱梅州绿党所占比例超过 20%，在巴伐利亚州、萨尔州及勃兰登堡州、梅前州、萨克森州、萨安州、石荷州、图林根州占比例不到 10%，在其他州情况介于两者之间。在 9 个州议会绿党已成为第三大党。

## 四、自由民主党

沈淋容

德国自由民主党（FDP，简称自民党）成立于 1948 年，是德国历史上执政时间较长的政党，先后在 1949—1956、1961—1966、1969—1998 及 2009 年至今与基民盟 / 基社盟或社民党组成执政联盟。该党目前在黑森州与社民党、在萨克森州与基民盟、在巴伐利亚州与基社盟组成执政联盟，如今在联邦议院占有 93 个议席。

1990 年自民党人数曾一度达到 18 万，之后党员人数一直在减少，现在党员人数只有 58,675 人，已被绿党超过，且其数量呈继续萎缩的趋势。

在 2005 年及 2009 年的联邦议院选举中，自民党在现任德国外交部长韦斯特韦勒的带领下获得了 9.8% 及 14.6% 的选票。2011 年 3 月自民党在莱普州及萨安州议会选举中相继失利并被踢出两州议会。此后，韦斯特韦勒辞去党主席一职，由现任德国经济与技术部部长的菲利普·罗斯勒接任，而离任的该部部长赖纳·布吕德勒（Rainer Brüderle）则担任该党议会党团主席一职，他也是自民党今年的总理候选人。

在德国联邦议院中，自民党是最为旗帜鲜明地主张经济自由主义的政党，有时候也被政治对手斥之为新自由主义的代理人。自民党认为全球化是大势所趋，对于德国是机

会多于威胁。德国应该顺应时代潮流，加快进行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改革，以便在全球化的时代保持竞争力。自民党改革纲领的核心目标是改善投资环境，从而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简化各种官僚机构和规章制度，改革劳资关系的传统。通过削减各种财政补助来平衡预算，减少赤字。在税务制度上，敦促对世界第一庞杂的德国税法进行大刀阔斧的简化，将个人的所得税简化成三个等级的税率，分别为（15%、25%、35%）。不但坚决反对提高增值税，而且建议通过全面减税来刺激经济增长。该党认为，目前由国家财政支持的社会福利名目繁多，主张将它们合并成单一的国民补助金，同时推广各种靠资本运作的私营福利实体，比如商业养老保险，补充甚至逐步取代目前的国家社会福利体系。在欧盟问题上自民党将自己定位为一个推进欧洲一体化的政党，目标是实现一个在政治上一体化，而且有着共同对内对外安全防务政策的欧洲。统一的欧盟应该在政治上能够高效率作出决断，并能切实贯彻执行。自民党原则上支持土耳其加入欧盟，认为对当前进行的人盟谈判不应该预先设定任何结果。考虑到未来土耳其可能无法最终实现加入欧盟的基本条件，或者欧盟本身没有能力继续接纳一个大国作为新成员，谈判的议程中应该包括其他备用方案。一定要明确的是，欧盟自身的健康成长是要优先考虑的问题。

## 五、左翼党

李晓璇

左翼党（Die Linke）是德国议会中比较年轻的一支力量，也是德国政坛一支“顽固的年轻力量”。

2007 年 6 月 16 日，由原左翼党 - 民主社会主义党（Demokratische Linke-PDS）和劳动

与社会公平选举抉择党（Wahlalternative Arbeit und Soziale Gerechtigkeit, WASG）合并而成左翼党。截止2012年12月31日，该党共有党员63,761人，现任党主席为格辛娜·洛驰（Gesine Löttsch）和克劳斯·恩斯特（Klaus Ernst），总部位于柏林，在联邦议院622席中占据76席，欧洲议会99席中占据8席。左翼党传统势力范围主要集中在柏林、勃兰登堡、萨克森、图灵根等东部各州。

在德国这样一个拥有特殊历史并且长期分裂的欧洲国家，左翼力量在两德统一之后的发展壮大实属不易，而德国左翼党的发展历史也恰恰体现了这样一种不易的曲折过程。

东西德统一之际，原民德执政党统一社会党（SED）更名为统一社会-民主社会主义党，1990年2月4日更名为民主社会主义党（民社党，PDS），2005年7月17日更名为左翼党-民主社会主义党（Demokratische Linke-PDS）。1990年统一后的首次德国大选中，民社党仅获得2.4%的选票，主要是来自原民主德国的几个州，但由于当时德国东西选区是分开统计的，所以民社党依然获得17个议席。1994年，该党获得30个议席，1998年得票数首次超过法定5%的界限，获得5.1%的支持率，具备了组成议会党团的条件。但在2000年，民社党党内发生分歧，造成2002年大选中选票跌出5%，最终获得4%的选票。2005年，民社党开始考虑与刚刚成立的劳动与社会公平选举抉择党合并。

劳动与社会公平选举抉择党的主要成员是原社民党（SPD）中因不满施罗德1998年上台后推行第三条道路的中间路线而退出社民党的成员，包括前社民党主席1999年任联邦财政部长的奥斯卡·拉方丹（Oskar Lafontaine）。

2005—2007年，两党就合并问题进行了漫长的谈判。2007年6月16日，两党在柏林正式合并。96.9%的左翼党-民主社会主义党

党员以及83.9%的劳动与社会公平选举抉择党党员赞成合并。

两党合并弥补了民社党最大的不足，使得左翼党作为一个整体进军老州的地方议会。2008年，左翼党在地方选举中进入了不莱梅、黑森、下萨克森以及汉堡州议会。

在2009年的德国大选中，左翼党取得了重大胜利，获得76议席。

但经过发展的高潮之后，近年来左翼党党员人数不断下降。2007年成立之初，左翼党拥有党员71,711人，2009年达到78,046人，之后不断下降，2012年年底，已降至63,761人。

## 六、盗版党

古丽格娜·艾尔肯

德国盗版党（Piraten-Partei，也译海盗党）于2006年9月10日在柏林成立。它参照了瑞典盗版党的模式，也是盗版党国际的成员。2011年9月19日，该党以将近9%的得票率首次进入柏林州议会，2012年又进入北威、萨尔和石荷州议会。

经过短短几年的发展，盗版党已在全国16个联邦州设立了州级党组织，在部分联邦州还建立了县市级基层组织，并成立了党的青年组织“盗版党青年团”，在全国约30所高校设立了盗版党高校小组。目前，该党人数已达33,334人，并仍在以较快的速度持续上升。党员主要是受过良好教育并对网络感兴趣、热衷网络下载的年轻人。与传统政客不同，他们穿着T恤和牛仔裤，手拿最时尚的电子通讯设备，亲自上阵设计竞选海报，充分利用互联网，热衷于网络问政，通过网络，特别是社交网站Facebook和Twitter等收集民意，提出政见。他们主张信息自由，个人可以自由从互联网上进行下载，要求改革版权制度。此外，他们还要求网络信息和政

府行政的透明化，加强公民权利。他们的这些政治主张无疑是让无数不满主流政治的年轻的和冷漠的选民们有了一个全新的选择。

盗版党现任主席是伯恩特·施洛牟 (Bernd Schlömer)。

## 七、选择党

唐卓娅

德国的选择党 (Alternative für Deutschland) 是 2013 年 4 月 14 日在柏林成立的一个最新政党。该党希望在默克尔所谓“别无选择”的欧元拯救政策以外拿出另一个选择。其前身是一个名为“2013 大选的选择” (Wahlalternative 2013) 协会，该协会并不以政党身份活动，而是支持与其政见相同的政党进入联邦议院，希望借此发挥影响力。2012 年秋该协会成立，当时它选择的政治伙伴是“自由选民党” (die Freien Wähler)，该党的最高领导人是阿登纳的孙子斯特凡·韦尔哈恩 (Stephan Wehrhahn)。2013 年初两者合作参与了下萨克森州的州议会选举，“自由选民党”惨败，主要原因是双方在欧元政策和欧洲政策上存在重大分歧，反对欧元是“2013 大选的选择”的主题，而“自由选民党”似乎将重点放在了地区事务上。“2013 大选的选择”反对欧盟进一步深化，希望保留更多的国家主权，而“自由选民党”却强调欧洲统一的历史必然性。由于分歧无法弥合，“2013 大选的选择”的主要领导人在 2013 年 2 月决定成立一个独立的新政党，命名为“德国的选择党”。

选择党的创始人也就是当初“2013 大选的选择”的主要领导人，是汉堡大学的宏观经济学教授贝恩德·卢克 (Bernd Lucke)，《法兰克福汇报》前任编辑康拉德·亚当 (Konrad Adam) 以及前任黑森州国务秘书亚历山大·高兰德 (Alexander Gauland)。卢克和高兰德都有着极深的基民盟背景，卢克作为前基民盟成员已达 33 年之久，因反对联盟党的欧元救助计划而退出基民盟另立新党。选择党的大多数支持者是推崇自由主义的保守派国民经济学教授，如斯蒂芬·洪堡 (Stefan Homburg) 和查尔斯·布兰卡特 (Charles Blankart)，而最有名的支持者当属德国联邦工业联合会前任主席汉斯-奥拉夫·汉高 (Hans-Olaf Henkel)，他们因共同反对政府的希腊救助计划而联合在一起。在 2013 年 4 月 14 日该党成立大会上卢克说：“我们要做真正的欧洲人，就必须取消欧元”，强调该党不左不右，“我们不需要意识形态的指路明灯，我们只需要我们正常的人类理解力”。目前选择党共有 7000 多名党员，规模最大的基层组织在北威州。选择党计划参加 9 月的联邦议院大选，目前关于其支持率说法不一。柏林自由大学教授奥斯卡·尼德迈尔说，只要德国的选择党获得 2% 的选票，默克尔领导的执政联盟就可能失去多数党地位，并把自民党挤出联邦议院。

选择党的竞选纲领由货币政策、欧洲政策以及民主政策构成，核心是要求经济发展孱弱的南欧国家退出欧元区。他们反对欧元，提出德国应当“有序退出欧元区”。因此也被人称为“反欧元党”，但却全力支持欧洲的和平联合。

作者简介：谢昕、熊雁、田佳峰、沈淋容、李晓璇、古丽格娜·艾尔肯、唐卓娅均系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系硕士研究生。

# 从各党竞选纲领看德国大选

李 微

**【摘要】**在目前德国即将进行新一届大选的背景下，笔者从德国五大主要政党及选择党的竞选纲领入手，对各党在财政税收、金融危机应对、劳动力市场、社会、能源、家庭和欧洲等重大政策领域提出的主张和构想进行比较，并分析各党派的政策着重点和倾向性，从而透析德国大选热点和前景。

**【关键词】**德国大选 党派 竞选纲领

新一届德国大选即将在2013年9月22日举行，目前各党派正如火如荼地开展前期选举工作，虽然目前还并不明确哪些党派会最终参与竞选，但议会内四大党团：社会民主党（SPD）、自由民主党（FDP）、绿党（Bündnis 90/Die Grünen）和左翼党（Die Linke）都已经发布了其竞选纲领。联盟党（CDU/CSU）虽然还未发表正式的竞选纲领，但早在今年一月份，他们便在联盟党大会上以“共同行动，为了一个强大的德国”为题，出台了一份声明（即威廉港声明），其中他们明确阐述了他们将如何构建未来的德国政府和政策<sup>①</sup>。此外，联盟党在一个网站上以“我心所向”为主题，提供了八个政策领域，并在每个政策领域中都说明了其在过去

执政的八年间已经完成任务，在未来想要继续完成的目标，并邀请选民在4月30日之前在该页面上给出选民自己的意见<sup>②</sup>。除去这五大党团之外，盗版党也宣布了其竞选纲领，新建立的德国的选择党（Alternative für Deutschland, afd）则于4月14日在该党成立大会上作出决议，参与2013年德国大选，并发布了一份四页纸的竞选纲领。北外德语系谢昕、熊雁、田佳峰、沈淋容、李晓璇、古丽格娜·艾尔肯、唐卓娅等七位硕士研究生分别将上述七个政党的竞选纲领或声明译成了中文。本篇论文正是在上述前期工作的基础上对已发布的政党竞选纲领以及竞选声明加以比较，并分析各党派的政策着重点和倾向性，从而分析德国大选热点和前景，在目

① 联盟党竞选声明内容见 [www.cdu.de](http://www.cdu.de)，下同。

② 联盟党竞选互动网页内容见 [www.regierungsprogramm.cdu.de](http://www.regierungsprogramm.cdu.de)，下同。

前德国政坛即将发生变动的背景下，这无疑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 一、经济政策和财政金融政策

在欧洲债务危机的大背景下，各党都将竞选纲领的重点放在了经济金融政策上。在联盟党的“我心所向”主题网站上，最重要的两个政策领域便是劳动力政策以及如何加强未来德国的技术领先优势和全球竞争力的政策。在其竞选声明中，如何创造公平的金融环境，推行稳定的货币政策，加强技术革新，增强德国企业竞争力，发展可持续型经济，以建设更为强大的德国，则几乎是其全部内容。而在社民党 116 页的竞选纲领中，财政经济政策一章占了 28 页，税收政策占 6 页<sup>③</sup>。绿党是将经济和财政政策放在其整个竞选纲领的第二章和第三章<sup>④</sup>，自民党和左翼党则放在其竞选纲领的首要位置<sup>⑤</sup>。选择党由于其成立出发点便是反对欧元，因此其竞选纲领的重点便是货币政策和欧洲政策<sup>⑥</sup>。

虽然各党的竞选纲领都体现出了对经济和金融财政政策的重视，但其侧重点有着非常显著的不同。作为现任执政党，同时也是中右政党的联盟党强调德国经济应在今后的四年中实现稳定且可持续的增长。中左政党的社民党则将重点放在实现一个更为公平的经济氛围，约束金融资本，促进中产阶级的扩大和提升。绿党着重推动可持续发展，指出应引入新的指标来衡量富足和生活质量，强调新能源的运用和生态工业的进步。自民党认为应主要加强市场的框架条件，减少干预，加强企业创新精神和自主能力，推行紧

缩财政，减税减负，实现市场的自主增长。左翼党的竞选纲领则以“100% 的社会”为题，强调重新创建和谐和团结的社会，打击投机行为和不公平倾销，实现财富的共同增长。而在选择党仅仅四页的竞选纲领中，涉及经济部分的政策主要是解散欧元区、降低欧元债务危机。

### 1. 财政和金融政策

在财政和金融政策上，各个党派都不约而同地认为应削减国家债务，但方式和侧重点并不相同。在威廉港声明中，联盟党承诺，从 2015 年开始，联邦财政将不会再有新的债务，2016 年开始将逐步削减原有债务。但与此同时，他们依然决定将在教育和研究方面加大资金投入。联盟党目前的内阁伙伴自民党同样认为紧缩的财政政策势在必行，因为“通过通货膨胀的方式整顿财政”是绝对不可行的。但他们坚决反对增加税收以提高政府的收入，认为应加强央行的独立性，反对通过欧洲央行直接对危机国家注资，进一步稳定币值，加强对金融行业的监管。

社民党同样强调要约束金融市场，认为是金融市场上“不负责任的投机行为”才导致了欧盟范围内国家债务的急剧上涨。社民党因此希望开始征收金融交易税，对银行实施更为严格的自有资本管理规则，并强调划分投资银行和商业银行的明确分界。此外社民党还认为应对食品投机行为和原材料投机行为实施严格的禁令。绿党则认为应引入公民财产税，增加国家收入，从而降低债务，同时整顿金融市场，对银行引入债务刹车机制。左翼党强调通过国家调控实现财产的重

③ 社民党竞选纲领内容见 [www.spd.de](http://www.spd.de)，下同。

④ 绿党竞选纲领内容见 [www.gruene.de](http://www.gruene.de)，下同。

⑤ 自民党和左翼党纲领内容分别见 [www.fdp.de](http://www.fdp.de) 以及 [www.die-linke.de](http://www.die-linke.de)，下同。

⑥ 择党竞选纲领内容见 [www.alternativefuer.de](http://www.alternativefuer.de)，下同。

新分配，增加财产税等各类税收，以推进社会平衡，减轻债务压力。

## 2. 税收政策

税收领域中，各党派分歧很大。自民党坚决反对增加任何形式的税收，认为应实施所谓的“税收刹车机制”。无论是对个人，还是企业，都不应增加其税收。他们坚决反对增加遗产税，反对重新开征财产税。同时自民党还认为应改革现有税收体制，简化税收程序，实现灵活税率。在企业税方面，他们强调改善税收的框架条件，对非资合企业实行较低税率的自有资产征税办法，对于增值税他们主张把目前的“簿记征税法”（物品一经售出，登记在簿后立即缴税）转变为“实质所得征税法”（物品售出，并已经收到买方所支付的款项之后再行纳税），以保证中小企业的流动性，大大简化对营业税额的计算。

联盟党则将削减税负的重点目标人群放在中产阶级。他们认为，应在下一个执政周期“使税率与通胀率相结合，如果工资的上调直接导致价格上涨的话，则不应针对增长的工资征收更高的税款”。这项措施的主要受益者是中低收入者。联盟党同样反对增加遗产税以及重新征收财产税，认为这会损害德国经济的竞争力，从而威胁劳动岗位。

与联盟党和自民党相比，更加“左倾”的三个政党：社民党、左翼党和绿党则主张实施更为激进的税收政策。社民党明确指出，他们将会提高征税额度，并将多征收的税款用于削减国家债务，加大对教育和基础设施的建设。他们将“按照适当的标准”重新引入财产税机制，并对年收入在10万欧元以上的个人征收49%的个人所得税（目前为42%—45%），此外，对资本收入也将加大增税力度。社民党还主张取消在过去四年中，由联盟党和自民党所确立起来的针对“某些

利益集团，如酒店所有者或是丰厚遗产的继承人”所给予的税收政策上的优惠。

在增加税收上，左翼党比社民党走得更远。他们极力主张由国家通过税收来调节财产分配，因为“富人和企业应为国家财政的平衡作出贡献”。因此，对于拥有百万以上财产（包括不动产）的个人，他们将对超出部分征收5%的财产税。针对个人所得税他们主张提高起征额度，但对年收入在6.5万欧元以上的个人应征收53%的税款，对年收入在100万欧元以上的个人，则应征收75%的税款。对于遗产税的起征额度他们则认为应降低到15万欧元，对60岁以上的老人或是儿童继承者该额度可翻倍至30万。与社民党一致，他们同样认为应该引入金融交易税。

绿党也赞成应通过税收缩小贫富差距，对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他们认为应调高到8700欧元（目前是8130欧元），但对年收入在6万欧元以上的个人，税率应提高到45%，8万以上则应提高到49%。财产税方面，绿党将对财产总额在100万欧元以上的个人征收财产税，以增加国家财政收入。但绿党在税收政策上也具有自己独特的侧重点：他们将严格规范生态税收，改革航空交通税以及汽油和燃料的征税制度。

选择党在税收方面仅仅强调要简化税收法律和制度，以使德国公民更切实地了解他们所缴纳的所有税款。

## 二、能源政策

在能源改革、新能源引进以及对传统不可再生能源的摒弃上，德国无疑走在了世界的前列。目前，德国正在“能源转型”的大框架下逐步取缔核能发电站。从各个党派的竞选纲领来看，各党无一例外都主张继续推行能源改革，促进可持续发展。但其具体做法和重视程度并不一致。

在环保政策和能源政策方面最为高调的是绿党，在本次的竞选纲领中也继续为能源改革摇旗呐喊。首先，他们希望颁布气候保护法，将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减排标准（与1990年排放量相比，到2020年降低40%，到2050年降低95%）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此外，他们将改变采矿法，以“阻止新的褐煤开采”。按照绿党的时间表，到2030年，对煤的使用将退出德国的历史舞台。绿党力主加大“能源转型”的力度，并希望在下一个十年中，达到德国的电力50%来自可再生能源的目标。为了实现“可接受的电力价格”，他们将逐步降低企业在用电和使用可再生能源时候所产生的费用。

联盟党也明确支持“能源转型”，并认为德国因此能获取更为安全、清洁和可支付的能源。联盟党同时将能源转型与社会经济相结合，试图为德国打造一个在世界上也首屈一指的“环保型和能源高效型国民经济”。他们的目标是到2050年德国的传统能源消耗将降低至目前的一半，电力的获取将有80%来自于可再生能源，而二氧化碳的排放量比起1990年将降低至少80%。联盟党的重要结论在于，生态经济是未来的发展方向，应将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结合起来，创造未来的全新生产和就业模式。

社民党则希望建立一个独立的能源部，以负责能源转型的任务。他们同时强调应保障能源转型的可支付性，降低电税，以避免增加企业和个人的负担。因此他们主张彻底改革“可再生能源法”，使能源转型建立在经济的、可支付的基础上。因此认为，“提高能源使用效率，节约能源消耗，是实现能源转型的关键”。

同样主张对“可再生能源法”进行改革的还有自民党。但与社民党的改革设想和目的不同，他们认为构建整个能源市场，使之市场化，并拟定一项阶段性计划。按

照此计划，所有原本享受固定新能源补贴的设备和技術都应迅速地、有计划地且强制性地转变为直接市场化运营机制；他们支持促进欧盟可再生能源统一市场的建立，并将欧盟的能源效率方针纳入德国法律，使之遵循“以激励代替强迫”的原则。

在使用可再生能源进行发电上，左翼党所制定的目标为到2020年提高至整体发电量的50%。此外与1990年相比，2020年，德国二氧化碳排放量应降低至一半，2050年降低90%。与其整个竞选纲领的标题“100%社会性”相一致，左翼党在能源政策上同样强调社会性原则，主张取缔在“生态税、电网收入、二氧化碳排放交易以及可再生能源法上所存在的一切不平等现象”，他们认为这些不平等现象主要是由于政府对某些企业所给予的不恰当优惠政策所导致的。此外，左翼党还希望立刻关闭所有核能发电站，在2040年取缔用煤做能源。

选择党在能源政策上的主要措施集中在为公民减负。他们认为不应由公民承担能源转型的成本，应降低电价以及为能源转型而支付的税额。

### 三、社会福利政策和劳动力市场政策

德国各党之间，尤其传统的左翼政党和右翼政党之间，在社会福利政策和劳动力市场政策方面一直存在着较大的分歧。尤其是在社保、劳资关系、工作模式、最低工资、退休年龄和退休金方面，各个党派拿出了截然不同的方案。

在劳动力市场政策上，传统左翼政党社民党，左翼党和绿党都主张提高实质工作酬劳，对就业率应更重质量而不应只重就业人口数量。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三个党派都认为应该引进覆盖全行业的法定最低工资。其中，社民党和绿党认为每小时最低工资应在

8.5 欧元，而左翼党则认为应保证 10 欧元的最低时薪，到下一个执政周期结束的时候，该数字应上升到 12 欧元。在这个问题上，自民党和联盟党与上述三党持完全相反、同时彼此之间也存在一定差异的观点。自民党坚决反对引入覆盖全行业的，具有法律强制效力的最低工资，认为这将损害德国企业的竞争力，从而丧失工作岗位。而联盟党出于充分就业的目标考虑，虽然也反对普遍的最低工资，但提出了较为灵活的解决模式，即在劳资双方没有确定合同工资的情况下，引入一个具有法律效力的工资底限。但这个工资底限应由劳资双方的共同委员会确定，以使工资的决定权继续掌握在工会和雇主协会的手中。此外，已经签署的劳资合同，即使其中确定的薪酬低于工资底限，也应保持其合法性。

不仅仅是最低工资，在劳动派遣和短时工作层面，几个党派所持的意见也完全不同。社民党和绿党主张同工同酬，认为劳动派遣人员应享受与正式员工同等的薪酬和待遇，左翼党则更为激进，主张最终取消劳动派遣制度，在此目的实现之前，应至少实现同工同酬，减少劳动派遣工作的时间长度，并引入较为灵活的津贴模式。左翼党同时认为应将短时工作转变为具有社会保险义务的完全劳动关系。自民党和联盟党则认为短时工作和劳动派遣型工作增大了德国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尤其使教育程度较低的德国人能够更加容易获得工作，因此应继续保持。但联盟党同样赞成对劳动派遣工人实行同工同酬的原则。

退休年龄和退休金问题同样是大选期间被热议的一个问题，对此各个党派也都拿出了自己的方案。自民党反对一个固定的退休年龄，认为“60 岁以上的德国人应有权利自由选择其退休年龄”，而退休金的数额应严格与其缴纳的养老保险相挂钩。与此同时，自

民党希望消除工作录用时对老年人的壁垒，鼓励 60 岁以上的退休人员重返工作岗位，以获得除退休金之外的附加收入。这个主张与联盟党的“混合型退休收入”的概念是一致的。但联盟党在退休政策上将采取更为人性化的措施，如对 1992 年前有生育的妇女多给予一个百分点的退休金。此外，为了消除老年贫困现象，对于按照法律规定缴纳满 40 年退休保险的人引入保证生活必需的最低退休金（850 欧元）。社民党同样支持最低的“共同退休金”，以保证低收入退休人群能够在退休之后获得每月至少 850 欧元的收入，但其条件比联盟党更加宽松，只需满足在 40 年的缴纳年限中缴满 30 年即可符合标准。此外社民党还提出了使用税收手段以保证“共同退休金”的发放。绿党所谓“保障退休金”的核心概念与社民党的完全一致，条件进一步放宽，“要求服务社会满 30 年的标准中，应不仅仅只包括完全工作的时间，也包括短时工作，10 年以下的在家照顾孩子的时间以及失业的时间”。左翼党的“共同最低退休金”的标准则定在了每月 1050 欧元。最后，社民党和左翼党还强调应提高新州的退休金标准，使之与老州相一致。

#### 四、欧洲政策

在目前欧债危机的大背景下，各党派的欧洲政策同样是选民热议的一个焦点。据民调显示，德国人民普遍对德国援助危机国家的行为存在抵触情绪，但从政治长远利益来看，德国政治家们都或多或少地承认，放弃欧元区的行为是绝对不可取的。从目前出台的竞选纲领来看，除了以解散欧元区为目标成立的选择党之外，其他几大党派的大方向均是强调要与欧盟国家、欧元区国家以及与危机国家站在一起，团结一致地解决目前的欧债危机问题。但其方式和投入程度不尽相同。

刚刚成立不久的选择党推出的竞选纲领仅仅四页，但各个层面都是围绕解散欧元区这个核心展开的。他们认为，欧元区的其他国家损害了欧元的现状和前景，德国应及早退出欧元区，重建自己的货币，或者在小范围内重新确立一个更加稳定的联合货币体系。此外，他们坚决反对由德国的纳税人为欧元区国家的债务买单，银行应对自己的债务负责，通货膨胀的压力不应被转嫁到储户身上。

但除了选择党之外，其他各党派都明确指出，一个团结的欧洲才是欧债危机的最终出路。目前还在执政的联盟党就明确指出：“继续建立一个强大的欧洲，维护欧元的坚挺，确定更为明确的规则，建立与欧洲公民更亲近的联系。”在全球化的浪潮中，面对新兴国家如中国、印度和巴西的崛起，只有统一的欧洲才能迎接挑战，迎来机遇。但为了实现欧洲的共同强大，联盟党要求通过“财政契约”实现欧洲范围内的债务控制机制，他们反对一个债务同盟，以免德国纳税人的金钱毫无限制地流向危机国家的腰包，同时呼吁所有欧元区国家提高国际竞争力，降低债务。最后，他们强调应加强欧盟公民在欧盟治理层面上的参与度，降低“民主赤字”，强化欧洲议会的作用。

自民党的欧洲政策在实质上与联盟党相当接近。一方面，自民党人呼吁欧洲危机国家承担起更多的责任，推进经济结构改革以维护欧元整体币值稳定；另一方面，他们同样认为一个“公民的欧洲”才是欧盟最终的发展方向，因此致力于将欧洲议会发展成一个在立法方面具有平等提案权的全民议会。对于接纳新的欧盟成员国（如土耳其），他们强调入盟的条件不能打任何折扣。

与上述两党不同，社民党在欧洲政策上明显更加激进，更强调一致行动，一致参与。他们要求建立一个共同的“欧洲投资建设基金”和“欧洲偿债基金”，通过这种有

约束力的减债和改革计划使所有国家行动起来，履行自己的义务，以克服欧洲内部长期和过度的经济不平衡，保证所有欧盟国家的行动能力。

左翼党更是将矛头直指现任政府，认为联盟党和自民党一直宣称的“危机国家应更多承担起责任，努力削减债务”的说法完全偏离了问题的实质核心：国家对银行的救助和注资才是各国债务居高不下的根本原因。而德国银行更是在这个过程中获益良多。因此，他们主张，在为银行注资以使其重掌金融行动能力的时候，其资金应来源于对百万富翁开征的财产税。此外，应打击逃税现象，这就要求银行对可疑的储户行使更强的资本流动监控。他们同样反对各国银行以低利率从央行借资，却以高利率贷给各国的行为。总体而言，左翼党在欧洲政策上也强调社会公平，认为是金融市场的垄断形式导致了欧债的发生，并许诺将转变这种状况。

绿党在竞选纲领中较少涉及欧债危机的解决模式，更多强调要建立一个“民主、团结和人性的欧洲”。为此，他们呼吁召开欧洲大会，缔结欧洲纳税公约以共同打击逃税现象，并在欧盟所有成员国推行一致的难民政策。

## 五、家庭政策

在家庭政策方面，各党侧重有着明显的不同。联盟党要求为12到36月龄间的孩子建立托儿所，并以法律形式加以确定。为了推进州一级和市县一级的幼儿园建设，联盟党承诺提供高达8.5亿欧元的补助，此外，联盟党引进幼儿看护补贴，以使家庭有更多选择。自民党同样认为，托儿所和幼儿园的建设责任更多的应在州一级层面上以及应继续发放幼儿看护补贴。社民党则持与上述两党完全相反的意见，认为应取消该项补贴，而将省下来的资金全部投入

到扩建日托所等公共托儿机构中去。持几乎同样意见的还有左翼党和绿党，他们认为应逐步取消该项补贴，使之社会化。比如建立一个社会性的共同父母专项基金，使用这笔资金进一步扩建儿童日托机构，要求日托时间应更加灵活。

在保障家庭成员就业方面，联盟党认为应简化家庭成员从短时工作和兼职工作向全职工作转变的程序。此外，联盟党还将承认祖父母照顾孙辈的工作时间，以开拓一个全新的幼儿看护可能性。自民党则认为应加强父亲在家庭生活中的参与权利，在发放父母津贴的时候更注重灵活性。社民党呼吁改革父母津贴，认为应更多地向低收入家庭倾斜。在夫妻共同课税一条上，联盟党和自民党持支持态度，社民党、绿党和左翼党则认为应分割课税。

在对家庭概念的认知上，联盟党宣布他们尊重除婚姻之外的其他伴侣形式，但并不保障这些形式具有与婚姻一样的法律效力。但自民党和绿党却呼吁应平等对待婚姻和其他已注册伴侣关系，尤其在个人所得税和收养权上使之拥有同样的权利。更进一步支持同性伙伴关系的则是社民党和左翼党，他们要求同性婚姻合法化，以保证其在税收和收养方面与传统婚姻具有一样的权利。

## 六、简要结论

从以上竞选纲领的分析比较来看，德国各政党虽然在大方向上保持一定的一致性，例如都明确要削减国家债务，在全欧统一的前提下解决欧债危机（选择党除外），支持继续开展能源转型，以实现德国的可持续发展

等，但从对现有问题的根源分析以及解决方式和侧重点上来看，各党还是有着相当大的差异，尤其是在传统左翼政党和传统右翼政党之间。

大体上而言，德国政府目前的执政党：联盟党和自民党更强调按照现有的模式稳步发展德国经济，解决欧债危机。在过去的四年中，德国的经济状况获得了广泛的认可，这加强了执政党的底气，从竞选纲领上看，联盟党所承诺的政治举措与前四年的路径并无实质上的区别，“改革”一词在其竞选声明和竞选网页上很少出现。与此同时，同样作为现任执政党，自民党与联盟党之间却存在一定分歧。作为自由主义的代表，自民党人一再强调权力的下放，减少中央干预，通过完全的市场实现社会财富的增加，解决欧洲债务危机。他们反对增加税收，反对统一的退休年龄、最低退休金和最低工资，认为欧元区危机国家应更多承担义务，主张能源转型的开支由市场自行承担和消化，强调过多的“公平”和“援助”会损害市场的完全自由和效率。

社民党、左翼党和绿党的竞选纲领与上述两党更为不同。三党都更加强调社会的公平，强调对社会资源的重新分配。因此三党都赞成引入最低工资和最低退休金，主张提高起征点，对富人征收更高的遗产税、所得税，加征财产税，加强国家干预，以获得更大的行动力，削减贫富差距，增加国家收入，拉动经济增长。这其中，左翼党走得更远、更“左倾”、更激进。绿党更强调环保、新能源和可持续发展。作为中左翼政党的社民党则在坚持社会公平的前提下措施相对温和，且具有更大灵活性。

作者简介：李微，北京科技大学讲师。

## 2013 年德国大选前景评析

刘立群 于冬冰

**【摘要】**2013年9月22日将举行每4年一次的德国联邦议会选举即“大选”，选举出第18届联邦议会并组成新一届联邦政府。2009年上台的第17届黑黄联合政府（联盟党+自民党）能否延续，特别是默克尔总理能否成功连任令人瞩目。影响德国大选结果的因素较多且相当复杂，目前主要有：1. 欧债危机的状况；2. 德国经济状况，尤其是失业状况；3. 各党自身状况及其支持率，包括各党领袖，尤其是总理候选人的支持率。如不出大的意外，则黑黄两党很可能笑到最后。不过即便黑黄联盟继续执政，除要继续解决欧债危机等一系列棘手问题之外，黑黄两党在联邦参议院依然处于少数并受到处于多数的红绿三党的掣肘，因而无法完全施展其政策主张。

**【关键词】**德国联邦议会 选举 支持率

2013年9月22日将举行每4年一次的德国联邦议会选举即“大选”，选举出第18届联邦议会并组成新一届联邦政府。在目前德国议会五党体制（两大党+三小党）情况下，由于不可能有任何一个大党能单独获得半数以上议席，通常是由得票超过或接近半数议席的两个政党作为多数党派组成新一届联邦政府，即一个大党（联盟党或社民党）+一个小党（目前联邦议会中的三个小党是自民党、绿党和左翼党）。2009年上台的第17届黑黄联合政府（联盟党+自民党）能否延续，特别是默克尔总理能否成功连任令人瞩目。影响德国大选结果的因素较多且相当复杂，目前主要有：1. 欧债危机的状况；2. 德国经济状

况，尤其是失业状况；3. 各党自身状况及其支持率，包括各党领袖，尤其是总理候选人的支持率，等等。

纵观德国政府本届任期情况，可以用“坚挺、稳健”来予以总结。国际金融危机旧疾未除，又添欧洲债务危机新伤。尽管如此，德国在默克尔总理的带领下继续改革社保福利制度、加强科研投入、加大出口力度，取得了经济增长、社会稳定的局面。当前德国的失业率处于历史最低水平、财政收入位于历史高位，穷人数量大幅减少。本文试图从德国2013年大选日程、各党派现状、大选议题以及组阁方式等角度分析大选的情况。

## 一、德国第十八届议会选举时间表

经与联邦政府协商，德国总统高克于2013年2月8日宣布9月22日（星期日）为第18届联邦议会的选举日。德国联邦统计局局长于2月21日公布，目前德国选民人数共6180万（略少于2009年大选时的6220万），其中女性选民3180万，男性选民3000万，

年龄18—40岁的选民占29.3%，年龄40—60岁的选民占37.0%，年龄60岁以上的选民占33.7%，40岁以上的选民高达70%。这种年龄分布显然不利于像盗版党这样主要被年轻人所青睐的政党，而较有利于像左翼党这样党员年龄偏大的政党。

与选举有关的具体时间表如下<sup>①</sup>：

日程（选举前/选举后）	事项
周一，2013年6月17日 （大选前97天）	截至18:00以政党为单位向联邦选举委员会主席表明参选的最后期限。这里的政党指的是自上一次议会选举后由非本政党提名的五位及五位以上的本党议员连续在联邦议会或州议会所代表的政党
周五，2013年7月5日 （大选前79天）	确认及公布以下内容的最后期限： 1. 自上次选举后，由本政党提名的五位以及五位以上的本党议员在联邦议会或者州议会连续代表的政党 2. 经联邦选举委员会承认为政党的宣布参选的社团组织
周二，2013年7月9日 （大选前75天）	政党或社团组织因联邦选举委员会的规定妨碍其竞选提名而向联邦宪法法院上诉的最后期限
周一，2013年7月15日 （大选前69天）	截至18:00提交以下内容的最后期限： 1. 向各选区选举委员会主席提交选区竞选提名 2. 向州选举委员会主席提交各州候选人名单
周四，2013年7月25日 （大选前59天）	联邦宪法法院对上述申诉裁决的最后期限
周五，2013年7月26日 （大选前58天）	1. 以下事项截止日期： a. 撤回或更改某一提名 b. 完善竞选提名，避免影响提名有效性 c. 选区竞选委员会确认选区竞选提名 d. 州选举委员会确认州候选人名单 2. 开始分发选举证
周一，2013年7月29日 （大选前55天）	提出以下申诉的最后期限： 1. 向州选举委员会提出反对撤回或允许某一选区提名候选人 2. 向联邦选举委员会提出反对撤回或允许某一州提名候选人
周四，2013年8月1日 （大选前52天）	关于申诉裁决的最后期限： 1. 州选举委员会就反对撤回或允许某一选区提名候选人做出裁决 2. 联邦选举委员会就反对撤回或允许某一州提名候选人做出裁决
周一，2013年8月5日 （大选前48天）	以下内容对外公告的截止日期： 1. 选区选举委员会主席批准的选区提名 2. 州选举委员会主席批准的州选举提名
周日，2013年8月18日 （大选前35天）	有选举权的人开始在居民户籍管理处进行选民目录登记

（待续）

<sup>①</sup> [http://www.bundeswahlleiter.de/de/bundestagswahlen/BTW\\_BUND\\_13/terminkalender\\_btw13/](http://www.bundeswahlleiter.de/de/bundestagswahlen/BTW_BUND_13/terminkalender_btw13/).

(续上表)

日程 (选举前 / 选举后)	事项
周日, 2013年9月1日 (大选前21天)	1. 通知选民在选民目录登记的最后期限 2. 必须通过申请才能进行选民目录登记的选民提交申请的最后期限
周一, 9月2日, 到周五, 2013年9月6日 (大选前 20—16天)	审核选民目录; 对选民目录中错误或不完整提出申诉
周四, 2013年9月12日 (大选前10天)	对选民目录中出现错误的申诉结果送达的最后期限
周六, 2013年9月14日 (大选前8天)	向选区选举委员会主席提出反对乡镇管理机构就选民目录的正确性决议申诉的截止日期, 这一申诉可在乡镇管理机构提出
周一, 2013年9月16日 (大选前6天)	乡镇管理机构公布选举活动起止时间、选区、选举地点、选票和选举程序的最后时间
周三, 2013年9月18日 (大选前4天)	选区选举委员会主席就反对乡镇管理机构关于选举目录申诉决议的决定截止日期
周五, 2013年9月20日 (大选前2天)	截至 18:00 申领选举证最后期限
周日, 2013年9月22日 (大选当日)	1. 按规定在 8:00—18:00 之间分发选票 2. 截至 15:00 特殊情况下提交选举证的最后期限 (根据联邦选举条例第 2 项第 25 条, 经证实的突发疾病情况下) 3. 18:00 是接受信函选票的最后时间节点 4. 18:00 后联邦选举委员会主席查验、确认并公布目前选举结果
从周一, 2013年9月23日 (大选后1天)	1. a. 选区选举委员会在公开会议上查验、确认最终结果以及在本选区当选者 b. 选区选举委员会主席通知在本选区当选者 2. 州选举委员会在公开会议上查验、确认本州内第二票结果 3. a. 联邦选举委员会在公开会议上确认候选人名单选举的最终结果以及当选的各州候选人名单 b. 州选举委员会主席通知当选的州候选人 4. 公告 a. 选区选举委员会主席公布选区内最终选举结果以及当选的候选人名单 b. 州选举委员会主席公布州内最终选举结果以及当选候选人名单 c. 联邦选举委员会主席公布全国范围内的选举结果, 各党派所获席位数, 按照联邦州以及当选候选人名单进行公布
到周二, 2013年10月22日 (大选后30天)	德国联邦议会通过制宪会议开幕形式来确认选举结果, 当选候选人获得联邦议会议席
周五, 2013年11月22日 (大选后两个月)	选民、州选举委员会主席、联邦选举委员会主席以及联邦议会主席可向德国联邦议会就选举有效性提出申诉的最后期限

根据上述时间表, 联邦德国将于 2013 年 9 月 22 日举行第十八届联邦议会选举。根据 数次民调结果显示, 受 5% 条款<sup>②</sup> 限制, 此次能够进入议会选举的政党依然为由基督教

② 5%条款: 只有在政党选票 (即第二票) 中获得至少 5% 选票, 或至少获得 3 个直选议席的政党才能正式进入议会。如果某个政党获得了 2 个直选议席, 则该党可获得 2 个议会议席, 但该党代表只能以独立人士身份出任议员。

民主联盟（以下简称基民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以下简称基社盟）为共同参选组成的联盟党、社会民主党（简称社民党）、自由民主党（简称自民党）、绿党以及左翼党，同上一届议会完全相同；曾在地方选举中名噪一时的盗版党以及刚诞生不久、以反欧元著称的“选择党”进入联邦议会的可能性极小。

2009年大选的投票率仅为71.2%，比2005年大选时的77.7%骤降6.5个百分点并创下历史新低。如何提升选民的投票热情、保证投票率稳步回升是德国政界各政党面临的共同难题。

## 二、各党目前状况

对于这五个政党在9月大选后将以何种方式组阁，目前还是一个未知数。首先，就执政党——联盟党来说，目前获得约42%的支持率<sup>③</sup>，不足《基本法》规定的半数席位标准，无法完成单一政党组阁任务。但作为所有进入联邦议会的政党中支持率最高的政党，联盟党继续执政的可能性很大。且联盟党总理候选人默克尔连任两届总理，带领德国顺利度过金融危机和欧洲债务危机，党内党外支持率相当高（党内98%，民调60%<sup>④</sup>），因而联盟党非常有望在下届大选后继续执政。在大选前联盟党需努力的方向集中于两点：一是继续稳健的执政风格，确保支持率稳定在35%以上；二是谨慎选择其联合执政伙伴。

当前，在各党派已相继公布竞选纲领的情况下，联盟党宣布将于6月24日公布竞选纲领。在此之前的6月17日大选序幕即已拉开。基民盟选择在最后期限公布竞选纲领，其目的主要有以下两点：

1. 出于对竞选纲领内容全面性、科学性的考虑。联盟党作为主要执政党，占据内阁中诸多重要部门，因而对于下届政府执政走向、政策延续问题了解更深。联盟党既要确保其执政理念的连续性，又要研究其他政党竞选纲领，做出反驳并调整自己的政策。因此联盟党推出竞选纲领的步调显得缓慢慎重。

2. 避免树大招风，影响支持率。联盟党目前支持率为42%，按照以往经验，在大选活动拉开序幕之后会有些许下降。所以联盟党要在接下来几个月中尽可能不出错或少出错，以保证支持率。所以，晚些推出竞选纲领推迟了来自其他政党攻击的声音，可减少负面影响持续的时间。

另一现执政党自民党则在即将到来的选举中前景堪忧。在本届任期内，自民党经历了从起初14.7%的超高支持率到跌破5%的过山车式大起大落以及被迫换帅风波等。这固然与自民党领导人的能力有关，却也关乎自民党的执政理念。前副总理韦斯特维勒曾在自民党内获得接近100%的支持率，但在执政后却选择了颇为生疏的外长职位，放弃得心应手的党魁位置。自民党属中右翼政党，虽然执政后经济政策、减税措施有所转变，但其为企业家、为中产阶级和富人服务的基本属性和原则没有改变。自民党的支持率一度降为4%<sup>⑤</sup>，要想继续参政议政，自民党的当务之急是跨过5%的门槛。

作为最大的反对党，社民党在2009年联邦议会选举中惨遭滑铁卢，只得到23.1%的建党以来最低支持率，失去了执政党地位。其原因并非社民党执政过程中出现失误，而是由于社民党成了大联合政府这一违背权力

<sup>③</sup> ZDFtext, S.167, 2013.03.22, <http://module.zdf.de/teletext/master.html>.

<sup>④</sup> Ebenda.

<sup>⑤</sup> Ebenda.

制衡的特殊产物下的牺牲品。为保证政策的出台落实，联盟党与社民党必须统一意见，放弃不同观点。这就导致人们倾向于将功劳归于占多数席位的联盟党，而认为社民党无所作为。因而在下届议会选举中，社民党总理候选人施泰因布吕克明确表示：与2009年的选举不同，这次社民党不会再被默克尔麻痹，我们将与联盟党严格区分开来，有一个清晰的选举方向；除非可以在大联盟政府中出任总理，否则社民党要拒绝参政。但从目前社民党选情一路下滑角度看，这一愿望几乎不可能实现。

从德国现在的民调结果中看，社民党只获得约28%的选票。加上总理候选人施泰因布吕克（民调支持率29%<sup>⑥</sup>）在2月26日将意大利五星运动党领导人格里洛和前总理贝卢斯科尼形容为“一个是专业小丑，另外一个，是雄性激素过度的小丑”。这一番言论导致了极为严重的外交事故，也影响了社民党在选民心中的形象，对其今后的外交手段有所质疑。在目前德国十大领导人排名中，施泰因布吕克位列第八，得分远低于同党的施泰因迈尔和加布里尔；即使是社民党的支持者中，也只有54%的人认同继续由施泰因布吕克代表社民党参选<sup>⑦</sup>。可以说，目前的社民党选情黯淡。

绿党经过30年的发展，以其先进的、前瞻性的执政理念赢得越来越多的支持。此次更是将绿色变革的理念全面覆盖到其竞选纲领的每一个部分，推动能源变革、建立绿色教育、从生态方面改革金融等等。目前，绿

党的支持率稳定在14%<sup>⑧</sup>。在两大全民党无法单独获得半数议席的情况下，绿党的稳定和较高支持率无疑使其成为两大党炙手可热的拉拢对象。由于绿党近些年的执政理念颇有向中右偏转的倾向，因而红绿联盟也许不是唯一选择。

作为五党中唯一没有执政过的政党，左翼党渴望在下届议会选举中可以上台执政。然而左翼党还面临如下三个问题：一是左翼党在议会中的角色扮演。由于左翼党党员主要是对德国统一后的生活感到失望的新联邦州人以及老联邦州中反对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的阶层，因而左翼党是议会中唯一在重大社会问题上持反对观点的政党，比如反对救助他国银行、反对签订“财政契约”等等<sup>⑨</sup>，这也就意味着，如果同左翼党组成执政联盟，可能在政策推行过程中受到诸多阻拦；二是由于政策的相似性，左翼党经常被社民党用来攻击对手政策的疏漏，甚至直接为社民党所用；三是随着盗版党的兴起，分流了一部分原左翼党的支持者，导致左翼党支持率徘徊在6%—7%<sup>⑩</sup>之间。

### 三、组阁的多种可能

#### 1. 联盟党与社民党

前文提到，除非由社民党总理候选人出任总理，否则社民党拒绝大联盟。但照目前的支持率看，社民党落后联盟党很多，绝无超过联盟党得票率的可能；联盟党也不可能让总理大权旁落。因而时隔四年后再次出现

⑥ ZDFtext, S.167, 2013.03.22, <http://module.zdf.de/teletext/master.html>.

⑦ Politbarometer, ZDF, 2013.03.15, <http://heute.de>.

⑧ ZDFtext, S.165, 2013.03.22, <http://module.zdf.de/teletext/master.html>.

⑨ DIE LINKE wird gebraucht - Zur Bundestagswahl 2013, 2012.9 <http://www.die-linke.de/partei/zusammenschlusse/kommunistischeplattformderparteidielinke/mitteilungenderkommunistischenplattform/detail/archiv/2012/september/zurueck/archiv-2/artikel/die-linke-wird-gebraucht-zur-bundestagswahl-2013/>.

⑩ ZDFtext, S.165, 2013.03.22, <http://module.zdf.de/teletext/master.html>.

大联合政府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 2. 联盟党与自民党

二战后联盟党与自民党的共同执政经历总体上还是愉快的。但由于自民党支持率的极度低迷，这一组合的最大问题就在于无法获得联邦议会过半数的席位，且自民党能否进入联邦议会还是未知数。

## 3. 社民党与绿党

同同一种组阁方式相似，若绿党与社民党联合，其支持率可能略低于联盟党与自民党的联合。社民党和绿党都已明确表示只考虑这种组合。

## 4. 社民党、左翼党与绿党

这种红-红-绿方式的组阁虽能够满足超过议会半数席位的要求，但左翼党不愿与社民党同在一个执政联盟中。社民党也一再声明，不同左翼党组成执政联盟，因为二者因左翼党中的部分人退出社民党而结仇，也因在社会、内政问题上部分政策相似，左翼党担心会被社民党的光芒所掩盖；而在外交政策、欧洲政策和安全政策上都有明显的区别，同时在经济和金融政策上也有差距。

## 5. 社民党、绿党与自民党

从联邦议院与联邦参议院的功能执行上看，这种组阁方式是可行的，不过三党之间许多政策理念差异较大，很难相互妥协和弥合。

# 四、竞选议题

竞选迄今所涉及的主要议题有：

## 1. 应对欧债危机的举措以及欧元区的前景

债务危机中的大选一定会涉及未来领导人的经济、金融政策以及欧洲政策。各政党将会就是否履行“财政契约”、执行紧缩政策，如何减少国家债务进行辩论。社民党总理候选人施泰因布吕克把欧洲团结视为其竞选运动的核心。

## 2. 税收问题

在税收政策上，自民党反对提高税收，认为增加税收就是加重个人和企业的负担。尤其是在本任期财政平衡得到了良好维护，更无须额外依靠增税来增加财政收入。因而个人所得税的税率应逐步改革以应对逐渐提高的税收，减轻中产阶级的负担，简化税收体系。而绿党则为了履行财政契约要求，减少国家债务，主张引入公民财产税。联盟党认为，公民必须要从通货膨胀引起的增加税收（也就是所谓的隐蔽性增税）中解放出来。这种隐蔽性的增税会导致公民表面工资提高的同时纳税额也随之提高，而公民收入的实际价值并没有增加。

## 3. 关于能源利用与发展

德国作为绿色能源发展和利用的先驱，在绿色清洁能源的应用和推广上作出了不懈努力。但实际上由于过度强调清洁能源，德国在研发发电装置、运输能源上面投入了巨大的人力和物力，导致能源价格居高不下，民怨不断。能否高效、经济地发展清洁能源，将是各政党无法避开的话题。绿党提出，要保护能源安全；企业必须依照《能源安全法》缴纳相应税款；大力推动能源市场百分之百使用可再生能源。可以说，在能源资源利用领域，绿党的作为拔得头筹，有望在竞选中赢得更多选民。2009年大选时是否退出核电

是一重要议题，由于2011年3月14日日本福岛核电站严重事故导致德国反核声浪大增，并迫使黑黄联合政府于5月底确认到2022年完全退出核电，因而不再成为此次大选的议题。这尤其被视为绿党的胜利，是绿党支持率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

#### 4. 关于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

在德国“2010议程”实施十周年之际，德国的社保体系也面临改革的必要性，是否要执行统一的最低工资标准，是否要提高养老保险金额，使其高过社会救助金都是民众关心的问题。

联盟党反对法律规定最低工资，认为最低收入应由公平的工资及国家补贴组成；联盟党还准备为1992年前生育的母亲提供更高层次的退休养老保障；绿党则提出引入适用于所有人的全民保险；普遍引入最低工资制度；目前社民党在竞选纲领中使用了近150次“更加公正”(gerechter)的表述，可见社民党在社保即社会公平领域着墨颇多，誓要挽回因“2010议程”导致的社民党民心大失的局面。

关于同性婚姻：绿党赞成，联盟党反对，这是阻碍黑绿可能联手的突出障碍之一（在目前各州政府中无一例黑绿联合执政）。此外，竞选中还可能就德国是否继续海外驻军、如何处理与西亚北非关系、怎样防止极右势力死灰复燃、创新民主形式等问题展开辩论。

以上情况一方面说明了德国目前经济社会稳定，民众对政府并无大不满；另一方面可以肯定的是，各政党之间政见分歧趋于缩小，特别是对外政策将基本延续。无论哪个组合上台执政，其政策和本届政府相比都不会发生太大改变。尽管默克尔政府的欧债危机政策主要在南欧国家遭到猛烈抨击，但在德国国内则获得较为广泛的支持，这体现在目前其执政联盟的支持率接近70%。

## 五、大选前景展望

德国政坛刚刚经历了修改选举法之争。具体情况是：早在2008年7月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就宣布联邦议院选举法部分违宪，要求在3年内制订新的规定。2011年联合执政的联盟党和自民党未与反对党达成协议便推行选举法改革，导致社民党、绿党及3千多民众上诉到联邦宪法法院。德国联邦宪法法院2012年7月25日再度宣布目前的联邦议院选举法违反德国基本法。此问题主要涉及比例代表制计算方法及超额议席的安排，因比例选举选票的计算必然出现小数即非整数，而被选举的议员必然是个人（整数），迄今的计算方法会导致在联邦范围内得票较多的政党所得到的议席反而少于得票较少的政党，即出现“逆向权重”。宪法法院原则上不禁止超额议席，但认为不能过多，目前最高限额在15席左右为宜，而在2009年大选后超额议席达到24个并全部属于联盟党。2012年10月联盟党、自民党、社民党和绿党就议席计算方法达成协议，2013年2月21日联邦议院、3月1日联邦参议院先后通过此修正案，并将应用于2013年9月大选结果的计算。

截至2013年4月底，在德国16个州中，联盟党只在8个州政府中联合执政，社民党则在12个州政府中联合执政，绿党进入5个州政府，自民党进入3个，左翼党进入1个。这样，在由州政府代表组成的联邦参议院中，联盟党和自民党的议席数少于社民党、绿党及左翼党而占少数，大约70%的联邦法律需要联邦议院和参议院共同批准才能通过，所以即便黑黄在联邦议院占多数，在很多情况下都无法绕过联邦参议院，因而一些法律依然很难通过，给德国未来政坛及各方面发展带来诸多变数。16个州议会选举结果与联邦议会选举结果的关联度很低，不过客观上看似乎多少存在某种反向效应，即五个政党在

联邦议会和联邦参议院中分别取得某种平衡，作为更侧重公平还是更侧重效率两种倾向之间平衡的反映。

一般来说，距离选举的日期愈近，民调的结果愈为准确，对大选结果的预测也较为准确，本文截稿时间为2013年4月底，距离9月22日大选还有4个多月。此外，民调结果与实际投票结果也会相差较大，有些中间选民直到最后才会决定是否参加投票以及投哪个党的票，所以大选结果仍有较多不确定性。联盟党总理候选人默克尔的人气显然远远高于社民党总理候选人施泰因布吕克，这对社民党的选情显然十分不利。在2009年大选中，自民党得票较高（14.6%）弥补了联盟党得票较低（33.8%），得以促成黑黄联合执政。此次大选看来相反，是联盟党得票较高、

自民党得票较低而促成黑黄继续执政，在这种情况下，自民党出任的部长也必然少于第17届政府中的五名。

迄今综合各方面情况来看，9月22日大选后可能性较大的组阁方式有：1. 黑黄联合；2. 红绿联合；3. 黑红联合。黑红联合肯定远超半数，但只有在前两种组合完全无望时才能予以考虑。前两种组合的可能从目前看相差不大，黑黄得票可望达46%以上，红绿可能在40%—45%之间，关键就看最后时刻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如果不出大的意外，则黑黄两党很可能笑到最后。不过即便黑黄联盟继续执政，除了要继续解决欧债危机等一系列棘手问题之外，依然受到在联邦参议院黑黄两党处于少数而红绿三党处于多数的掣肘，无法完全施展其政策主张。

作者简介：刘立群，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于冬冰，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系硕士研究生。



# 外交观察



# 德国<sup>①</sup>外交的三大节点

潘琪昌

【摘要】联邦德国从立国至今在外交上有三大节点。第一个节点是“定位”，向西方一边倒；第二个节点是“突破”，推行“新东方政策”；第三个节点是“转折”，就是德国统一。联邦德国的外交政策核心有两点：国家统一和欧洲一体化。德国统一后，它在外交政策上便转向另一大目标，即欧洲建设，倾力于欧盟的发展，在加强经获联盟的同时竭力使其走向政治联盟。今天，德国外交的走向明显受到德国的地理位置因素、历史因素、有限实力因素和国际环境因素的制约。无论是对欧盟、对美国、对俄罗斯还是对华都可以看到这一考量。

【关键词】节点 定位 一边倒

联邦德国从立国至今在外交上有三大节点。

## 一、第一个节点是“定位”

1949年出任联邦德国第一届政府总理的阿登纳牢牢地将国家定位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坚定不移地推行向西方一边倒的政策。

1945年纳粹德国覆亡，德国被分为东、西两部分。在后来建立起联邦德国的西德，当时有两大政党在政治舞台上竞争：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基督教民主联盟。社民党在当时的西占区是最大的政党，历史悠久且主政过德国政府。西部占领区在1947年作过一次民意调查，问谁是战后最令人钦佩的政治家，

结果是社民党主席舒马赫，而基督教民主联盟的主席阿登纳几乎不为人所知。然而，在1949年的大选中，西德的老百姓却选择了阿登纳，基督教民主联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结成的联盟党在议会选举中得票31%，社民党得票29.2%，以2%的微差落败。败选的社民党骄傲地拒绝有可能对联邦德国政策走向施加影响的参与执政，从而使阿登纳得以完全放手推行自己的政策。

阿登纳在决定联邦德国的航向时坚定地选择了向西方一边倒，这与当时社民党主张建立一个中立化的德国，在美苏两大敌对阵营之间走中间道路的政策取向显然不同。联邦德国在外交上一边倒向西方固然有其处在

① 此处德国是指1949年建立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或曰联邦德国。

美、英、法三国控制下不得已而为之的决策，却也是阿登纳出于与西方共同的价值观而作出的真心诚意的抉择，这一抉择最终导致联邦德国在1990年完成了德国统一的大业。德国统一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但就外交政策而言，则是阿登纳当初选定的向西方一边倒的决策为“以西统东”奠定了基础。

但这一政策从1950年代末起由于美国和苏联之间出现的缓和逐渐走入僵局，德国常感到被美国当筹码背着自己与苏联搞交易而无法自解的痛苦。阿登纳虽曾想对自己的外交政策作些调整——主要体现在1960年拟定的所谓“格劳勃克计划”<sup>②</sup>，但一个人要改变自己总是很难，且阿登纳时年已84岁，没有时间和精力来大刀阔斧进行改革了，在此期间，德国国内一批有识之士纷起要求对外交政策进行改革，以勃兰特为代表的政治家们于是走上外交前台，开始了对阿登纳向西方一边倒外交政策的变革。

## 二、第二个节点是“突破”

这一突破以“新东方政策”为标志。新东方政策实际在阿登纳政策时期的1960年已经开始酝酿。1963年，勃兰特的谋士埃贡·巴尔在一次讲话中提出对另一个德国即民主德国实施“以接近求变化”的策略，这一策略成为西德新东方政策的核心，突破了之前联邦德国一味靠向西方的政策。

这一策略后来也成为社民党执政伙伴的德国自由民主党对新东方政策的形成和推行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早在1962年德国自由民主党就制定过一份文件，指出德国统一是个遥远的目标，必须经过许多站才能到达，

作为近期目标两个德国应该首先接近起来，这与社民党的外交政策思想不谋而合。1969年勃兰特政府的“新东方政策”正是在这种要求对现行外交政策作出改变的呼声日渐高涨的社会大环境下实现的。

“新东方政策”是对阿登纳外交政策的一场革命性的突破。如果说阿登纳的政策为德国的统一奠定了基础，那么，“新东方政策”就是在此基础上添砖加瓦建造起了统一德国的大厦。对德国统一大业来说，两者缺一不可。“新东方政策”的突破体现为联邦德国打开了以苏联为首，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社会主义国家阵营缓和关系的大门。它的“以接近求变化”的核心策略最终使民主德国“变化”了过来，被收纳进了联邦德国。

## 三、第三个节点是“转折”

所谓“转折”即是德国的重新统一。德国统一是德国历史的一个转折点，也是德国外交政策的一个转折点。

联邦德国从阿登纳起，除了刚开始要争得主权地位以外（这一点在它1955年加入北约时已经实现），它的两大外交目标就是德国统一和欧洲建设。德国统一使德国外交政策完成和达到了其一大任务或曰一大目标。德国统一后，它在外交政策上便可以一心一意转向它的另一大目标，即欧洲建设，倾力于欧盟的发展了。

德国统一后外交政策的重点明显转移到了欧洲或曰欧盟，这成为统一后德国外交政策的根本变化。如果说统一前联邦德国的政策总体上是“东西方政策并举”，那么，如今德国对外政策的中心和重中之重已经是其欧洲政策，即强化和深化欧盟的一体化建设。

<sup>②</sup> “格劳勃克计划”因阿登纳的国务秘书格劳勃克起草而得名，主要内容是在两个德国举行公民投票来决定德国是否统一。这与阿登纳政府一直坚持的不承认民主德国的政策大相径庭，被认为是阿登纳外交思想的重大调整，但此计划最终被束之高阁，没有出台。

与德国统一几乎同步进行的冷战结束和苏联解体，使德国没有了面对苏联所受到的安全威胁，同时也就没有了对美国安全保护的全面依赖，这使德国可以彻底放手将其对外政策的重点转移到欧盟发展上来。今天对德国来说，最重要的是经营好欧盟，欧盟对于德国既有重要的政治意义，也有重要的经济意义，必须借助于欧盟，德国才能在世界上有更大的政治分量和经济分量。

德国外交政策在历经上述三大节点时都毫无例外地在国内引发了激烈争论，其中伴随着各种批评和指责。2011年德国在打击利比亚问题上有史以来第一次没有与美国和欧洲盟国站在一起，破天荒地同俄罗斯和中国一样投了弃权票后，国内批评之声又一次蜂起。引发众多诘问和责难集中在三个方面：1. 德国是否应该坚持外交政策的连续性<sup>③</sup>；2. 德国对自身角色的定位是德国政府通常声称的“文明力量”（Zivilmacht），抑或应是“建构大国”（Gestaltungsmacht）<sup>④</sup>；3. 德国外交政策是否失去了可信度，已经迷失了方向<sup>⑤</sup>。人们在密切关注着德国外交的走向。

#### 四、德国外交的走向

德国的重新统一使德国的实力和政治地位得到大大提升，两个德国的合并，顿使德国成为拥有7910万人口（在欧洲仅次于俄罗斯）、35万7千平方公里领土的中欧泱泱大国。今天的德国正在凭借雄厚的经济实力及提高了的政

治地位，将自己打成一个欧洲中央大国。但正如任何国家的外交政策都不是随意的政策一样，在经历了上述三大节点的德国外交在今天也必然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这些因素主要是：

##### 1. 德国的地理位置因素

1871年用“铁血”手段统一了德国的俾斯麦有一句名言曰：“外交政策的唯一常数是地理位置。”任何国家的地理位置都与生俱来，它构成国际关系中所谓的地缘政治因素，对本国的对外政策的构想和实施起着关键的作用。俾斯麦当年采用“小德意志方案”统一德国，首先是出于对德国地理位置的考虑。今天重新统一的德国地处欧洲中部，与9个国家接壤，是欧洲拥有毗邻国最多的国家，它既可以因睦邻四周成为沟通东西南北的友好桥梁和枢纽，也可因与周围国家交恶而陷入四面楚歌的困境。问题在于，德国背有沉重的历史包袱。

##### 2. 德国的历史因素

鉴于德国发动过两次世界大战的劣迹，欧洲各国，特别是德国四周的邻国，对德国可能东山再起，重新作乱的恐惧和担忧并未放下，德国的重新统一使它们的这种担心变得更加具有现实性。在德国势将统一和统一之后，关于“欧洲的德国还是德国的欧洲”的议论风起一时，便是欧洲人这种心理的生动反映，至今仍有希腊的报纸刊登带有纳粹标志的德国总理的漫画。

③ 德国外交政策协会研究所所长埃勃哈德·桑德施奈德在关于德国外交政策的大讨论中对德国政府经常宣称外交政策保持连续性提出反对：“坚持德国外交政策连续性会导致德国陷入自设的政治陷阱，因为这种连续性的思维使人看不到要对变化的现实做出必须的反应。”引自“Aus Politik und Zeitgeschichte”，2012年第10期，第3页。

④ 埃勃哈德·桑德施奈德在上注的同一篇文章中写道：“德国是一个——不论其是否愿意——建构大国，这样的国家，与正在崛起的门槛国家一样，要承担起全球性的责任。”

⑤ 德国前总理科尔对默克尔政府的政策提出严厉指责称：“多年来德国已经没有了可信度——无论在国内还是在海外。”引自《国际政治》（《Internationale Politik》），2011年第5期，第10页。

德国的这段历史也在时刻警醒德国人，要牢记历史教训，不能重蹈覆辙，所幸的是，联邦德国历届领导人都对此均有深刻的反省和清醒的认识。这种清醒的认识反映在外交上，即摒弃军国主义和对外武装扩张和侵略的政策，同时推行特别是与欧洲国家和平合作的政策，集中表现为对欧洲一体化进程的积极推动。

### 3. 有限实力的因素

从实力条件来看，两德统一无疑使德国的力量大增，但就其国土规模和综合实力而言，只能是一个中等强国，还达不到能像美、俄那样的世界大国在国际舞台上行动的地步。特别是在综合国力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指标即国防力量方面，德国缺少一个世界大国必备的军事实力。正如德国时任驻华大使薄德磊2002年在中国德国研究会举办的年会上作报告时所说：“我们十分清楚，德国既不能单独行动，也不能拥有一种涵盖全球的政策，它也不具备这种能力。”

### 4. 国际环境因素

主要有四个方面：1) 美国实力的相对削弱，它在国际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在下降；2) 俄罗斯，特别在普京强势回归总统职位后，显示出重新崛起的巨大潜力和良好前景；3) 多极化进程中，被德国称为新兴力量中心（neue Kraftzentren）或建构国家（Gestaltungsmacht），如中国、印度、巴西、南非等一批国家在国际经济和政治舞台上发挥愈来愈重要的作用；4) 恐怖主义势力依然活跃，现实和潜在的地区性冲突对国际安全构成严重挑战。

在上述这些因素的影响之下，可以预见，

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德国外交政策将表现出如下走向。

首先，德国将一如统一以来推行的以强化和深化欧盟建设为核心的外交政策，欧洲政策成为它外交政策的基石。德国只有借助欧盟的力量才能真正实现自己的利益，德国已经将自己的命运完全与欧盟绑在了一起。正如韦斯特韦勒外长2013年2月8日在新加坡关于“欧洲和亚洲”的讲话中一再强调欧洲一体化对德国的重要意义：“欧洲的内涵要大于其成员国的总和，大于27个成员国国家利益的相加，这是一个具有共同价值观的共同体，生死与共地同明天的多极化世界联结在一起”。“对德国来说，欧洲一体化规划不是一种政策选择，欧盟无论从我们的安全或发展前景来说都是基石和战略机构”。“欧洲一体化是我们对今天这个世界的全球化的回答。我们知道，如果我们想为我们的国家有一个光辉灿烂的未来，我们就需要一个强大的、更加团结的欧洲”。<sup>⑥</sup>

今天看来，德国的前途确实在于统一的欧洲，德国知名国际政治专家汉斯·毛尔在2012年3月德国出版的《政治和当代史》期刊撰文所写的那样：“德国肩负着欧盟未来发展的重任。要使欧盟成为一个拥有全球性影响的强大实体，它就需要有一个与这种实体相当的名至实归的共同安全和外交政策。而为了使欧盟在纷乱的全球化进程中能真正发出自己的声音并为建立有效的国际新秩序作出自己的贡献，欧洲必须首先自己要巩固起来。在这里，显示出德国的两个基本的利益考量，即：德国的安全和未来是与欧洲的未来连在一起的，在当前危机情况下巩固欧洲的一体化因而与德国的生存利益攸关。”<sup>⑦</sup>

近年来欧盟深深陷入金融和债务危机，一些人开始对欧盟和欧元的发展前景进行思考。

<sup>⑥</sup> “Reden von Bundesaussenminister Guido Westerwelle”，德国外交部网页，2013年4月20日下载。

<sup>⑦</sup> 汉斯·毛尔：《危机期间的外交政策决策过程》，载“Aus Politik und Zeitgeschichte”2012年第10期，第3页。

2012年6月7日，默克尔借接受德国电视一台记者采访之机明确提出强化欧洲政治联盟之想，她呼吁欧洲各国“一步一步地”将“权力让渡给欧盟”。默克尔说出她对欧盟建设的构想：要与志同道合的国家一起，以目前已经在“申根协定”和“欧元区”运作的“双速”方式，来共同推动欧盟建设，打造一个强化的政治联盟。<sup>⑧</sup>默克尔的这一公开呼吁，引起世人的瞩目，也表明了德国继续推进欧盟建设的坚定决心。

毫无疑问，德国必须与欧盟其他成员国，特别是法国这样的起主导作用的国家共同推进欧盟建设。德国十分清楚，没有任何一个欧盟成员国能独立支撑起欧盟这座大厦的建设，对德国来说，必须与其他国家共同来推进欧盟建设的进一步强化和深化，它无可争议地是一个主导国，但不是唯一的主导国。另外，德国也深信，自己的安全利益融入欧盟及与美国之间的跨大西洋联盟中。在世界局势依然不太平的今天，欧洲的安全和稳定仍需美国的存在，大西洋伙伴关系对欧洲的和平和安全仍具有突出作用。2007年默克尔访美，代表欧盟正式向美提议建立“跨大西洋经济伙伴关系”，坚持欧盟建立共同安全与防务不应成为抗衡美国的力量。德国维系同美国的盟友关系，不仅是出于对数十年联盟关系的传承，也不仅仅是从安全角度来考虑，也是两国共同的体制和共同的价值观将它们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德国现在大力呼吁建立一个跨大西洋内部市场，除了经济利益外，也是着眼于维护对美关系。

德国也不会忽视与俄罗斯的关系。作为曾经的宿敌和如今失去超级大国霸气的俄罗斯，依然是欧洲举足轻重的大国，俄罗斯是

世界上国土最辽阔的国家，它仍然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核大国。特别是普京强势回归后，俄罗斯频频在军事上秀肌肉。面对这个昔日超级大国可能重新崛起的现实，德国无论作为伙伴或对手都不能无视俄罗斯的影响力。1992年12月，科尔访问俄罗斯时，德国最有影响的报纸之一《法兰克福汇报》撰文道出了德国对俄罗斯的心态：“俄罗斯太重要了，而且在目前的情况下，它还是非常捉摸不透的。”<sup>⑨</sup>这个评论在20年后的今天看来还是恰当的。韦斯特韦勒在阐述外交政策原则时就对俄罗斯的政策说道：“俄罗斯是我们的战略伙伴，这并不意味着对俄罗斯在社会和治理方面存在的缺陷视而不见或者加以淡化，将俄罗斯视为伙伴是解决问题的最佳思路。德国对俄政策在过去一年中并没有新发明，但我们将其纳入了新的框架中。”<sup>⑩</sup>

德国外长韦斯特韦勒在2013年2月举行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发言时宣称：“我们要与俄罗斯一起来加强我们的安全……我们要同俄罗斯一起在一个共同的经济区内，而不是通过建立竞争的经济区来增进我们的福利，我们要把俄罗斯当作伙伴，特别在有着意见分歧的时候坚持这一目标尤为重要。”一个月后，3月15日，韦斯特韦勒又在一次讲话中明确声明：“我们需要在欧洲有更多的安全与稳定，我们深信，这一点唯有与俄罗斯合作而不是对抗才能获得。”<sup>⑪</sup>

对于德国的对华政策，40年前，德国迎合世界发展的潮流，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今天德国是中国在欧盟的最核心的合作伙伴，与其他欧盟国家相比，德国和中国无论在政治或经济方面皆居于最高水平。出于对经济

⑧ 《环球时报》2012年6月9日，news.xinhuanet.com/world/2012-06/09/c-123258486.htm，2013年4月20日下载。

⑨ 《法兰克福汇报》（Frankfurter Allgemeine），1992年12月17日。

⑩ 德国外交部长韦斯特韦勒2010年10月21日在德国外交政策协会的讲话，转引自网站<http://www.china.diplo.de/Vertretung/china/zh/02-pol/aussenpol/grundlinien/rede-dgap-111021-s.html>。

⑪ 德国外交部网页:AuswaertdesAmt-Startseite, Reden von Bundesausenminister Guido Westerwelle。

利益的着眼和对中国市场的需要以及对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顾虑，德国将维护中国的友好关系；但另一方面，出于价值观的相异，德国又与中国保持距离。默克尔推出价值观外交并非偶然，德国今天的价值观实际上从联邦德国成立起业已确定，只是在默克尔上任时因应当时的国内外形势突出地提出来而已。它虽然并非专对中国，但一触及关乎德国基本价值观的问题，就不可避免与中国发生争执乃至冲突。总体说来，德国将与中国保持一种实用主义的平和关系。

总体上说，在对华政策上，德国将与中国保持一种实用主义的友好关系。德国是中国在欧洲最大、世界上第六大贸易伙伴，中国则是德国在亚洲的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出于对经济利益的着眼和对中国市场的需要，同时出于对中国在国际舞台上举足轻重地位的看重以及对维护国家和平安安全的共同认识，德国将维护中国的友好关系。

2010年，德国与中国商定建立政府磋商机制，这是两国间级别最高、规模最大的政府间对话。2012年8月，默克尔总理赴北京与中国政府进行了第二次政府间磋商，双方在联合声明中认同两国将加强面向未来的合作，默克尔在随后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特别强调了这一机制对两国在政治、文化和经济领域日益深化的关系中具有特殊意义。而出于价值观的相异，德国又与中国保持距离。

默克尔推出价值观外交并非偶然，但今天已有愈来愈多的人相信，其价值观外交不

会对中德关系造成严重损害，正如德国《时代周刊》在今年就德国外交政策发表的一篇文章所指出的那样：“当价值观和利益发生冲突时，对一项实用的外交政策来说，必须在一时性地将利益置于前位，这才是有意义的。”<sup>⑫</sup>

其次，值得提一笔的是，德国将自己的外交政策标称为和平政策，并将此作为其外交和安全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德国联邦议院在2013年2月27日发布了2012年关于军备控制和裁军的年度报告，韦斯特韦勒就此发表声明称：“裁军、军备控制和核不扩散是德国外交和安全政策的一个重点，早在基本法的序言中就已指出，欧洲联合和维护世界和平是我们外交政策的两大核心支柱。”<sup>⑬</sup>德国在全力经营欧洲一体化建设的时候，需要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它今天坚持裁军、军备控制和维护和平的政策，也体现了德国对历史的深刻反省，与当前蠢蠢欲动、挑起领土争端、妄图否定侵略罪责、强化军事机器、试图修改二战后制定的和平宪法并将其自卫队升格为正式国防军的日本，形成鲜明对比。

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德国的外交政策无疑也在不断地作出相应变化，但总体而言，德国今天的外交政策依然是以价值观为取向、以利益为主导的，欧洲、跨大西洋伙伴关系以及推进全球化是其核心，这个基本点没有变化，维持了它的连续性，那些认为德国外交政策失去了方向，不应再强调连续性的言论应属言过其实。

作者简介：潘琪昌，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所研究员。

<sup>⑫</sup> 德国《时代周刊》“Die Zeit”，2013年2月28日。

<sup>⑬</sup> 韦斯特韦勒2013年3月15日在联邦议院关于年度裁军报告的辩论会上的发言。引自德国外交部网页：AuswaertdesAmt-Startseite, Reden von Bundesausussenminister Guido Westerwelle。

# 德国青睐非洲

李文红

【摘要】冷战结束后，在大国竞争中，非洲的地缘政治地位在经济全球化中越来越被“边缘化”。世纪之交，世界大国对非洲的关注度越来越高。非洲大陆在德国外交政策中的重要性也不断加强。德国是一个自然资源比较贫乏的国家，许多工业原料来自非洲。在非洲问题上，由于历史原因，德国一直把非洲国家作为合作的重点之一。非洲是联合国内一支重要的力量，政治上德国希望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能够得到非洲国家的支持很关键。德国强调在联合国，尤其是在欧盟框架内以平等伙伴关系推行非洲外交战略，主张用对话解决冲突和争端，强调“他助促自助”的原则等等。

【关键词】边缘化 非洲政策 发展援助

## 一、德国重视非洲的原因

冷战结束后，在大国竞争中，非洲的地缘政治地位在经济全球化中越来越被“边缘化”，非洲几乎成为全球化进程中的“被人遗忘的角落”。全世界48个最不发达国家中有33个在非洲，一半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非洲的外债总额高达3500亿美元，难民达到800多万，居世界各地之首。<sup>①</sup>

### 1. 经济因素

非洲大陆在德国外交政策中所占有的地

位与日俱增，起到的作用也不断加强和提升。非洲面积约3020万平方公里，约占全世界陆地面积的20%，拥有10亿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15%。非洲自然资源丰富，南部非洲铬的蕴藏量占世界的80%，并且是世界上最重要的钻石、黄金和铂的生产地。德国是一个自然资源比较贫乏的国家，许多工业原料来自非洲。德国对锰消费的65.5%、金消费的43%和铬的40.7%均来自南部非洲。<sup>②</sup>

### 2. 政治需要

世纪之交，世界大国纷纷角逐非洲，对

① 殷桐生：《德国外交通论》，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0年，第306页。

② 潘琪昌：《走出夹缝》，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9月，第298页。

非洲的关注度也越来越高。全非洲有 54 个国家是联合国成员国，占联合国会员国的 27.9%，是联合国内一支重要力量。德国希冀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就必须得到这些国家的支持。从 2001 年 4 月起，德国陆续出台了一些对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的外交战略文件，阐述本世纪德国对非洲的外交政策。文件把撒哈拉以南非洲分为五个地区，介绍每个地区的现状及德国对它们的政策。早在 1978 年 1 月 3 日，德国时任总理施密特在答复社会民主党和自由民主党议会党团一项提案时说，联邦德国在加入西方阵营并安排好了同东方国家的关系之后，应该不失时机地承担起它在联合国所负的责任，推行一种“面向南方的政策”，一种“第三世界政策”。<sup>③</sup>1978 年 1 月，施密特政府向索马里提供 2500 万马克贷款，支持索马里反对当时被苏联支持的埃塞俄比亚。

德国援助非洲已有 50 多年的历史。20 世纪 70 年代，非洲民族解放独立运动风起云涌，蓬勃发展。施密特执政后，积极利用联合国成员国身份参与解决非洲问题。德国在非洲国家之间冲突中担当调解人角色。1977 年，德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国，与美、英、法及加拿大四个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国组成所谓“接触小组”，在纳米比亚与南非之间进行调停。1977、1978 年德国同美、英、法和意大利组成“欧加登委员会”，斡旋索马里与埃塞俄比亚之间的冲突。1978 年 6 月底，施密特访问尼日利亚和赞比亚，这是德国总理首次进入非洲。1980 年施密特总理在联邦议会发表声明说：“第三世界国家的独立和不结盟国家的独立作用是世界和平与稳定的重要因素。”同年 9 月 24 日，根舍外长在联合国

大会上发言说：“没有第三世界的发展，就没有持久的可靠的和平。”<sup>④</sup>

### 3. 历史渊源

在非洲问题上，由于历史原因，德国一直把非洲国家作为合作的重点之一。19 世纪后半叶，欧洲列强对非洲进行了野蛮的殖民主义掠夺，而德意志各诸侯还在为本民族的统一而相互争斗。1884 年在柏林召开刚果会议，以图解决欧洲列强对非洲殖民地的相互争夺。柏林会议为年轻的德意志帝国对外搞殖民掠夺扫清了障碍。1883—1884 年西南非洲（纳米比亚）、多哥和喀麦隆成为德国的保护国，1885 年把东非的坦噶尼喀划为德国的殖民地。经过两次世界大战，德国丧失了海外所有殖民地，这反倒成了战后德国发展与第三世界，包括与非洲国家关系的有利条件。

## 二、德国的非洲政策

进入 21 世纪以来，德国对非洲援助政策又有了新的发展和调整，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强调在联合国，尤其是在欧盟框架内推进对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外交战略。德国的非洲战略文件目标指出，“要同我们的欧盟伙伴一起并且在联合国框架内采取共同步骤”，“我们同非洲的合作日益由欧盟同非洲及其各地区的关系与对话来决定。因此，在德国对非洲政策的过程中，欧盟及其与非洲的关系变得更加重要。在欧盟框架内的一致行动通常会增强对非洲政策的有效性，这种协调不仅符合欧洲的利益，也符合我们对非洲政策的利益。”<sup>⑤</sup>

③ 潘琪昌：《走出夹缝》，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296页。

④ 冯中林：《德国指南》，北京：时事出版社，1996年，第157页。

⑤ 殷桐生：《德国外交通论》，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0年，第307页。

第二，主张用对话解决冲突和争端，以平等伙伴关系推行其非洲政策。

第三，强调“他助促自助”的原则。以往西方认为，发达国家对非洲的援助是赠予和非洲国家接受的关系。德国表示，与非洲的政治对话必须考虑非洲自身发展的责任，考虑非洲的责任由非洲承担的原则，“在所有合作领域，要以更严格的目光对待每件事，以了解所采取的措施能否提高受援国的创新与自力更生能力，而不是鼓励依赖文化或使之长存。”<sup>⑥</sup>这种援助必须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德国方面强调，援助非洲应该侧重于促进当地私有经济的发展潜力，以及改善教育和卫生领域的公共设施。为了减少非洲国家对能源出口的依赖，应该支持非洲实现经济产业多元化以及提高当地产值，特别是应加强职业培训，加强当地科技和创新能力，建设更为现代化、更加环保的能源系统，改善公共机构，减少难民生活的压力。最近德国政府向埃塞俄比亚派遣了一个技术援助小组，其任务是在埃塞俄比亚多洛阿多难民营改善和修理供水、供电以及医疗卫生系统设施。用德国媒体的话说，“是把援助的钱用在刀刃上”。<sup>⑦</sup>2005年7月6日在苏格兰首府爱丁堡举办此活动。活动的组织者、爱尔兰歌星鲍勃·格尔多夫提出口号“让贫困成为历史”，希望通过举办免费演唱会敦促8个发达国家（简称G8，正值G8峰会）免除贫困非洲国家的债务，把向他们提供的援助款加倍，并且创造更公平的贸易环境。德国名模克劳迪娅·西弗等名人也到场或参加演出。美国女星苏珊·萨兰登说：“如果他们漠不关心，他们一定要向公众表明这种态度”；西弗对她

的德国同胞说：“我自己有两个孩子，以全体非洲母亲的名义，我求政治家们现在做些什么。”南非前总统纳尔逊·曼德拉也通过电视图像在演唱会上发表了讲话说，我要对所有的领导人说：“不要寻求别的道路。不要犹豫。注意这个世界渴望行动，而非语言。勇敢地行动吧……我很难过地说在这个新世纪里世界上最穷的国家还有数以百万计的人们身陷囹圄，铁链缠身。他们被关在贫困的监狱里，现在到了把他们放出来的时候了。”<sup>⑧</sup>由英国推动的这个计划将帮助免除38个国家共计550亿美元债务。首先获得债务免除的18个贫困国家大多数位于非洲，他们所欠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非洲发展银行的全部400亿美元将立即获得免除。布朗表示，英国在未来10年内，将拿出7亿到10亿美元左右的资金补贴世行、非洲开发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损失；美国将承担13—17亿美元；德国将出资10亿美元左右。<sup>⑨</sup>

从2003年10月开始，德国领导人不断访问非洲。其中经济是一个重要原因，比如德国对能源的需求。目前非洲出产的原油占世界原油总量的12%，这一份额今后还会增加。另外，非洲大陆还拥有5000万吨天然气，占世界总量的1/3。

### 三、德国对非洲的发展援助

非洲是一个政治上不很稳定的地区，政府和反政府力量之间的矛盾时而发生，民族矛盾导致流血事件也常而有之，各种疾病比如艾滋病更是严重损害非洲人民的健康。过去，西方发达国家对非洲的援助也投入不少，

⑥ 殷桐生：《德国外交通论》，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0年，第307页。

⑦ 《光明日报》，2011年8月8日。

⑧ 《新京报》，2005年7月8日。

⑨ www.hibor.com.cn 2013.4.16.

但收效不显著。对此，德国也在不断总结对非洲开展援助的经验和教训，积累了不少好的经验和方法。

德国提倡对非洲援助的国际合作，也强调对非洲的文化援助。在西方发达国家中，德国对第三世界的援助虽然比较实在，援助数额也较大，但仍未越过联合国规定的占其本国 GDP 0.7% 的目标，也只占德国 GDP 的 0.4% 左右。德国的发展援助分为财政援助和技术援助：财政援助如贷款、赠款；技术援助如提供职业技术培训、直接向受援助国派遣技术援助人员。德国如此重视非洲是直接关系到德国自身的安全和经济利益的。德国政府在非洲的积极活动，政治立场鲜明，政治意图明确。但是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在国际关系中也是一样。德国过去是极力排除苏联在非洲的影响，现在是更多地从非洲攫取更多的经济利益。

德国之所以调整援助非洲的政策，除有地缘政治和经济因素的考量以外，也受到非洲自身变化以及新兴发展中国家实力增长的影响。近年来，中国和非洲双边经贸、投资关系发展迅速，中国在非洲的经贸、投资活动提升了当地居民的生活水平，推动了当地的经济增长。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非洲今年经济增速将会达到 5.7%。非洲还有不断成长的消费群体，有丰富的农业和矿产资源，2012 年全球发现的 5 大气体中有 4 个在非洲海岸，非洲的发展潜力被普遍看好。<sup>⑩</sup>

进入 21 世纪，大国都把目光投向这个过去不在他们眼里的非洲，对非洲的关注度不断提升。从安全角度上看，非洲稳定与否也关系着德国的安全。2004 年 1 月，施罗德总理访问非洲四国，在埃塞俄比亚非盟总部

发表演说，“如果在一区域里存在着不安全和冲突，便没有人能够生活在安全中”，“国际和洲际边境并不能抵挡武力冲突、国家解体、贫穷、瘟疫和难民潮所带来的冲击”。一位德国政府官员在总理出访前夕表示，帮助非洲大陆摆脱贫穷和战乱，进而维护欧洲安全方面，德国负有“特殊的责任”。德国汉堡非洲事务研究所所长梅勒尔认为：“如果非洲出现了无政府状态的地区，就像目前某些地区已经出现的那样，这些地区就可能成为国际恐怖分子的大后方。这将或早或迟成为我们的问题。人们无论如何不能忽视这一点，否则将遭到报应。所以我们至少要将非洲的重要性提高到应有的位置。”此外，“我们也希望写在我们宪法里的价值观也能被非洲国家所接受，非洲国家实现民主和人权等也是我们的利益所在。”<sup>⑪</sup> 德国在非洲的经济更是自不待言。2012 年德国对非洲贸易额为 210 亿欧元，占德国对外贸易总额的 2%，其中对南非出口占 40%。<sup>⑫</sup> 德国欧盟统计报告显示，2009 年上半年，欧盟 27 个成员国与非洲的进出口贸易达 1390.51 亿美元。其中欧盟从非洲进口 699.41 亿美元，占欧盟进口总额的 9%，进口单项贸易额最大的是石油，金额达 406.36 亿美元；欧盟向非洲出口 691.1 亿美元，占欧盟出口总额的 10%，出口单项贸易额最大的是机电产品。<sup>⑬</sup> 德国外长韦斯特韦勒同意在与非洲接触的过程中奉行经济先行的政策。他认为，如果德国不想失去现在富裕的生活状况，它就必须在这个世界上及时地与新兴力量结交友谊。因为“世界已经不再是二战后的局面，而正在孕育产生新的全球结构，其中包括新的中心力量。我们不仅仅要经营现有的伙伴关系，也要在这个世界上寻求建立新

<sup>⑩</sup> 《环球时报》，2013年4月11日。

<sup>⑪</sup> 同上。

<sup>⑫</sup> 商务部，2013年3月28日。

<sup>⑬</sup> 《西亚非洲》，2009年第9期。

的伙伴关系。而在此我们绝对应该采用经济合作的手段。因为我们通过自己的历史也已经体会到，贸易往来能够促进社会变革，使其朝着更自由的方向发展。”<sup>⑭</sup>

据悉，德国与非洲在可再生能源上的贸易额每年为 3.96 亿美元，有分析人士指出，这一数字有很大的上升空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董事斯坦勒表示：“在未来 3 到 4 年里，我们将在肯尼亚见证一场能源革命。从太阳能到最大的风力发电厂，这说明转向低碳经济、发展高效环保能源不是发达国家的专利，发展中国家同样享有这种权利。”2011 年 7 月 14 日，德国总理默克尔结束了对肯尼亚、安哥拉和尼日利亚非洲三国之行。在出访前，默克尔在每周电视讲话中表示：“此行旨在促进能源合作。我们将在肯尼亚寻求可再生能源合作；我们希望与安哥拉建立能源和原材料的合作伙伴关系，同时，我们希望进一步加大与尼日利亚的贸易往来。”对于此次出访，德国政府官网上评论为“默克尔此行旨在说明，德国与非洲的关系非比寻常。”据当地外媒报道，这是默克尔上任以来第三次出访非洲，也是 30 年来第一位访问尼日利亚、第一次对安哥拉进行正式访问的德国总理。有分析指出，此次出访的大背景是，德国在 6 月宣布了对非洲的新政策，未来德国将通过加大双边贸易来实现对等价值，进而实现对非洲的援助。换言之，德国的非洲新政将由昔日的单边援助为主转为双边贸易，特别是在油气和矿产领域的合作。一位资深能源专家向新欧洲网表示：“安哥拉和尼日利亚都是油气出口大国，默克尔此行目的明确，相比之下，肯

尼亚可能有点特别，但是德国正计划对肯尼亚输出新技术，其中包括可再生能源技术。在为本国寻求油气供应的同时，德国也希望能推动本国可再生能源技术出口到非洲地区。”

#### 各国政府、私人及国际组织对非洲旱情援助表

时间：2011-08-18

中国	4.4 亿元人民币
美国	1.05 亿美元
英国	5200 万英镑
德国	3000 万欧元并将承担欧盟 1.6 亿欧元中的 20%
法国	3000 万欧元
澳大利亚	2100 万美元
芬兰	500 万欧元
欧盟	1.6 亿欧元
科威特埃米尔国王	1000 万美元
世界银行	5 亿美元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3 亿美元

最近，发展援助部长尼贝尔对东部非洲进行了访问，此行的目的是了解当地的饥荒灾情，商谈援助方式。德国外长韦斯特韦勒在亚的斯亚贝巴召开的援助国会议上宣布，德国将采取进一步措施，协助战胜非洲东部的饥荒。截至目前，德国已经为非洲之角的饥民提供了 3300 多万欧元的援助。除此之外，德国还分摊了欧盟援助的 20% 资金。德国政府的非洲新战略，旨在增强对非洲的影响和经济上获得双赢。<sup>⑮</sup>

作者简介：李文红，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系副教授，博士。

<sup>⑭</sup> 《环球观察论坛》，2011年7月14日。

<sup>⑮</sup> www.tsrb.com.cn 2011-08-18。

# 德国与欧洲导弹防御系统

于冬冰

【摘要】欧洲导弹防御系统作为美国全球导弹防御系统的重要环节，担负着保卫美国及其欧洲盟友国土安全，维系美欧军事同盟的重要作用，因而从诞生伊始就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作为欧洲导弹防御系统的参与建立者和相关利益者，德国国内各界对此系统的看法不尽相同。国际上各大国从各自安全利益角度考虑对反导也褒贬不一。本文通过介绍反导系统工作原理和进展情况，分析德国所持立场、预判德国与相关国家关系的处理方式及在欧洲导弹防御系统中充当的角色和起到的作用，揭示反导系统的本质。

【关键词】欧洲导弹防御系统 德国 美国 俄罗斯

## 一、欧洲导弹防御系统简介

欧洲导弹防御系统声称是针对“流氓国家”而设。按照美国设想，假设导弹威胁来自伊朗。在德黑兰发射导弹 60 秒后，即导弹还在助推上升阶段，部署在空间的早期预警卫星即捕捉到火箭发射的异常热辐射。根据卫星到发射点的角度可以大致推算出导弹发射的位置。导弹升空后放出弹头。部署在捷克的欧洲中段雷达实时跟踪并解析弹头信息，将实验数据传送给位于波兰的火控计算机，由其计算拦截弹道直至升空拦截；如果拦截失败，位于英国约克郡的雷达会继续跟踪目标，并通知加州和阿拉斯加的拦截阵地准备

第二次拦截。<sup>①</sup>

根据奥巴马的新方案，美国在欧洲部署导弹防御系统将分四个阶段完成：第一阶段，即 2011 年前，美国将在欧洲完成部署海基神盾武器系统、SM-3 (IA) 型拦截装置以及 AN/TPY-2 型雷达监视系统等感应装置，以应对现有的伊朗导弹威胁，确立反导系统总指挥部；第二阶段，美国将在 2015 年前完成部署陆基和海基 SM-3 (IB) 型拦截装置以及更先进的感应装置，扩大应对短程、中程导弹威胁的防卫范围；第三阶段，美国将在 2018 年前完成部署 SM-3 (IIA) 型拦截装置，加强应对中程及中远程导弹威胁的能力；第四阶段，美国将在 2022 年前完

---

① 作者和时间不详，[www.kommunisten.eu/attachments/571\\_isw\\_gr12\\_seite4.pdf](http://www.kommunisten.eu/attachments/571_isw_gr12_seite4.pdf)。

成部署 SM-3 (IIB) 型拦截装置，以应对中程、中远程导弹威胁及洲际弹道导弹对美国本土的威胁<sup>②</sup>。

据英国 BBC 网站 2013 年 3 月 16 日报道，美国国防部长查克·哈格尔宣布，为应对来自朝鲜的导弹威胁，美国计划加强在西海岸的导弹防御系统，取消欧洲导弹防御系统第四阶段的部署计划。自 2022 年开始，再在东欧部署拦截器。

## 二、美国热衷建立反导系统原因

两次世界大战让美国崛起，成为超级大国，无论是经济、政治、还是军事实力，其他国家都望尘莫及。近一个世纪以来，美国俨然成为世界秩序的维护者和管理者，插手他国事务，充当国际警察。这导致了在安全方面美国确实受到威胁。尤其是在 2001 年“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后，北约成立国际反恐联盟，开始了以美国为首的打击恐怖主义的征程。同时美国也成为恐怖分子袭击的重点，因而美国出于安全因素考量建立反导系统确有必要。另外，建立导弹防御系统，也是满足美国军工集团利益的需要。由战争发家的军工集团为维持其自身利润，必然会影响国防开支方面的政策。再者，建立反导系统也是保持美军事技术绝对优势的必然选择。通过在海外建立新的武器装备系统，可以将军事发明、军事理论应用于实践，保证美国在军事科研领域的绝对前沿地位。

## 三、德国在反导系统中所持立场

### 1. 矛盾心态

在是否参与导弹防御系统的问题上，德国一直左右为难。2010 年 10 月北约里斯本峰会前，德国支持美国在东欧部署反导系统，但不参与部署过程。

按照当时的计划，即使德国参与，也只能保护境内北约驻地，即所谓的点防御，不能保护德国平民。高层领导更是公开表示“更倾向于在北约内寻求解决方案并与俄公开讨论”<sup>③</sup>。德国政府重新设定它的地缘政治坐标——坐落在欧洲中部的西欧国家。这决定了德国政治、经济、军事上向西欧靠拢，同时要注意维护其与东欧国家的关系，保证领土周边安全稳定，因此支持美国作出的防务措施。

同时，德国考虑到在波兰、捷克部署雷达与反导导弹，其防御目标值得商榷。是第三国家还是两国一直防范的近邻俄罗斯？如果德国参与反导，会不会触动俄罗斯的敏感神经？与波兰、捷克相比，德国更注重不要得罪俄罗斯。德俄的战略伙伴关系不应因此受到牵连，政治经济往来不应遭到破坏。在地缘因素与进出口贸易作用下，德国形成了一种经过精心考量、能顺应莫斯科方面敏感心理的外交政策：既不参与美国反导系统，也不与俄罗斯公开叫板。

再者，建立共同反导系统不应以牺牲欧洲国家的基本防务需求为代价。建立这一反导系统会给欧洲国家本已捉襟见肘的军费预

② 短程弹道导弹（SRBM），射程小于1000公里；中程弹道导弹（MRBM），射程大于1000公里，小于3000公里；中远程弹道导弹（IRBM），射程大于3000公里，小于5500公里；洲际弹道导弹（ICBM），射程大于5500公里。

③ 章念生，张光政，刘华新，温宪：《现实利益纠结 反导构想难解欧洲安全困局》，<http://news.163.com/10/0427/08/658V42OF000146BC.html>。

算造成巨大压力，投资反导系统可能会导致各国购买直升机等军用运输工具的基本防务需求受到影响。<sup>④</sup>多番权衡后，德国放弃参与反导系统的建设。

里斯本峰会后，美国对反导系统发展方向进行了调整，将北约伙伴拉入了反导系统建设的队伍中。更广的覆盖面、更大的保护伞让众多北约盟国欣然接受，包括德国。

德国接受反导系统建立的原因，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第一，柏林方面认为，加入欧洲反导系统后，只要其目标不是俄罗斯，就不会损害自己的国家利益，并能在该系统的统一框架内执行各自的局部任务。不需要大幅改动军事设施、技术保障和火力装备，也不用改变各国军队的指挥流程和指挥软件系统。这使该系统具有了开放性，可接收更多的欧洲参与者，新成员也不用为改进本国原有系统浪费金钱。在欧洲反导系统的保护下，可以更加坚定地推进导弹及核武器不扩散措施和反恐行动<sup>⑤</sup>。

第二，北约承诺将邀请俄罗斯共建导弹防御系统，将俄罗斯拉入伙，可以避免来自东面近邻最大的威胁，对于这样的结果，德国乐见其成。

第三，出于安全上的考虑。随着世界范围内弹道导弹和相应弹头数量的不断增加，风险也随之提高。不管这些武器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被使用，技术的发展使人们可以预见到，终有一天会出现能抵达德国领土的远程运载工具。根据德国政府调查，伊朗一

直在进行远程导弹的研究。5—10年内，伊朗将有能力发射射程达3000公里的中程弹道导弹。德国慕尼黑距离德黑兰也不过2760公里。联邦国防部国务秘书吕迪格·沃尔夫认为，自从德国被盟友和友好国家包围以来，“这是德国领土面临的最后威胁之一”<sup>⑥</sup>。

第四，同意加入欧洲导弹防御系统也是德国示好美国的重要手段之一，此前德国因伊拉克战争派兵问题与美国关系变冷。默克尔上台后一直运用灵活的外交手法改善同美国的关系，同意建立欧洲导弹防御系统，德国向美国展现了愿意合作、积极配合的态度。这既保护了自己又改善了与美国关系，何乐而不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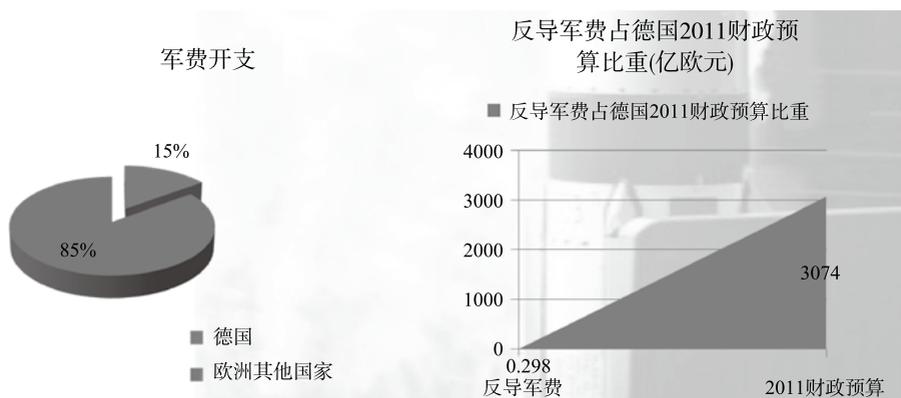
但欧洲正在欧债危机的泥潭中挣扎，从里斯本峰会到芝加哥峰会，欧债危机一再恶化给北约各国军费开支蒙上阴影。仅2009年和2010年，北约欧洲成员国的国防支出就减少了约450亿美元，<sup>⑦</sup>北约首脑担心这将会削弱北约的防务实力和安全保障能力。各成员国对北约防务投入不平衡的加剧，更使这一世界最大军事联盟面临分裂风险加大的尴尬境地。所幸按照美国计划，欧洲导弹防御系统建设大部分使用美国技术与装备，欧洲各国只需承担维护费用与驻军费用，力所能及地提供相匹配的反导装置。据北约预算显示，北约欧洲成员国共需承担军费约为两亿欧元。联邦政府给出的预算中提到，德国只需负担此系统欧洲部分两亿欧元的14.9%，即2980万欧元。这一数字占德国2011年财政预算3074亿欧元的不到万分之一。（见下图）

④ 章念生，张光政，刘华新，温宪：《现实利益纠结 反导构想难解欧洲安全困局》，<http://news.163.com/10/0427/08/658V42OF000146BC.html>。

⑤ 凯旋：《俄罗斯要牵头建立欧洲统一反导防御系统》，2006年，<http://mil.news.sina.com.cn/p/2006-12-02/0959416537.html>。

⑥ Pau 35, Juni 2012.

⑦ 《欧债危机使北约防务陷尴尬 或造成军事联盟内部分裂》，2012年05月21日，[http://news.xinhuanet.com/mil/2012-05/21/c\\_123167421.htm](http://news.xinhuanet.com/mil/2012-05/21/c_123167421.htm)。



这样的数目虽不至于堵住所有反对者的嘴，但也不至于引起国内各界的强烈不满。2012年2月初，德国拉姆斯坦（Ramstein）空军基地成为欧洲导弹防御系统的指挥中心所在地<sup>⑧</sup>，德国积极投入反导系统建设中。

## 2. 各党派意见

作为曾经的执政党、如今最大的在野党社民党，明确表示出对建立这一系统的担忧。社民党发言人指出，北约在商榷构建导弹防御系统问题上给出的理由是预防来自“流氓国家”的潜在威胁，特别是来自中东国家的威胁。德国本身与伊朗、朝鲜等国并无直接利益冲突，如此大张旗鼓地将某些国家列入防御、对抗范围，是一种引火上身的行为。且德国近邻俄罗斯一直高调反对欧洲导弹防御系统的构建并采取反制措施，如若一意孤行、擦枪走火，对德国自身的安全会造成比“流氓国家”更大的威胁。社民党在

外交问题上的重点与联盟党的一边倒不完全相同，社民党更注重战略平衡，注重维护区域和平稳定。

左翼党一直反对德国参与建立欧洲导弹防御系统。党内一位国防专家指出：这一防御系统对维持欧洲安全局面毫无意义，只会造成欧洲的不稳定。在今年2月3—5日第48届慕尼黑安全政策会议召开时，德国国防部长德迈齐埃（Thomas de Maizière）宣布，将德国境内的爱国者导弹应用到防御系统中。对此左翼党议员表示这只是一种象征性行为，因为爱国者导弹只能应对射程在1000公里的短程弹道导弹。前文提过，德黑兰距离慕尼黑将近3000公里，这意味着爱国者导弹根本无法拦截中程或远程导弹。若将爱国者导弹部署在防御系统之内，那么欧洲导弹防御系统的有效性非常值得怀疑。

绿党在这一问题上态度比较暧昧。北约里斯本峰会前，绿党坚决反对美国导弹防御系统的构建。峰会之后，绿党向联邦政府提

<sup>⑧</sup> 拉姆斯坦成为反导指挥中心原因：1.在作战理念上，北约认为弹道导弹防御属于领空综合防御的一部分，理应归入空军指挥体系；2.在里斯本峰会上，北约决定改革原有指挥体系，其中将只设立一个空军指挥司令部。2011年6月北约国防部长决定将唯一的空军司令部放在拉姆斯坦，同时撤销了在土耳其伊兹密尔的空军司令部。在这种情况下，拉姆斯坦成为北约设立反导指挥中心的唯一选择。

出小质问 (kleine Anfrage)<sup>⑨</sup>，就参与欧洲导弹防御系统所需经费、如何部署、德国义务以及与周边大国关系进行质问。在得到答复后，绿党表示，如果参与这一防御系统能够有效遏制军备扩散，那么绿党同意德国加入。

### 3. 民众观点

德国联邦议会各政党的意见不尽相同，德国社会各界对此也是议论纷纷。德国汉堡的研究国际安全学术论坛在全德就是否加入一个导弹防御系统进行问卷调查，结果2/3的受访者表示没有必要。理由主要有以下四点：

一是德国与伊朗并无利益冲突。如果对伊朗公开表示敌意，有可能激怒伊朗，成为伊朗计划外的攻击目标。

二是这一在建的欧洲导弹防御系统实质上为美国制造。美国不过是想将整个欧洲拖下水分担风险而已，德国没必要冒险。

三是担心会因此影响同俄罗斯的关系。从苏联开始，俄罗斯自始至终都竭力反对在其家门口设置反导系统，认为会对其自身安全环境造成威胁。德国是否应该考虑俄罗斯感受，也避免自身受到威胁。

四是对这一系统的有效性提出质疑。根据论坛结果专家表示，从技术层面上看，花大价钱打造的导弹防御系统的确漏洞不少。一些普通、甚至是低技术的手段都会使尖端的导弹防御系统造成误判，比如，金属箔条、探空火箭和低功率干扰机有可能会使欧洲当前和未来部署的反导雷达无法准确正常工作。

## 四、德国与相关国家关系处理

从目前来看，建立欧洲导弹防御系统已成既定事实。既然大趋势不可逆转，德国又该如何扮演好自身角色，处理好与相关国家的关系呢？

### 1. 融入北约，示好美国

前文中提到，德国同意参与建立反导系统，就是与美国合作，向美国示好的表现。德国外交政策的重中之重就是将自己融入欧盟、融入北约，在国际政治事务上以一个声音说话，谋求政治大国的地位。那么德国必须履行作为北约成员国的义务，根据《北约宪章》第五条规定，对一国的攻击“应被视为对缔约国全体之攻击”。北约将其引申为“对一国的潜在攻击应被视为对缔约国全体之潜在攻击”，欧洲导弹防御系统就这样“合理”地应运而生。如此牵强附会，不得不说，尽管德国的政治地位有所提高，军事上为美国马首是瞻的立场仍未改变。

### 2. 避免冲突，拉拢俄罗斯

俄罗斯曾向北约提出两个条件。一是要以法律条文形式确保欧洲导弹防御系统不针对俄罗斯而设；二是要求北约与俄罗斯共享反导实验的各种数据。两个理由均被美国拒绝。作为应对措施，俄罗斯在其西部边境设立多处雷达基地与导弹，用行动抗议北约不顾俄安全利益，削弱俄核威慑力量，挑衅双方关系的行为。

笔者认为俄罗斯有理由反对反导系统。伊朗研发核武器主要是针对老冤家以色列，

⑨ 议会质问：邦议会议员向联邦政府提出的质问。议会质问分为大质问 (große Anfrage)，即狭义的议会质问 (parlamentarische Anfrage) 和小质问 (kleine Anfrage)。大质问和小质问都必须采用书面的形式提出，并且要有一定数量的议员签名。对小质问，联邦政府可以通过书面的形式答复；联邦政府对大质问的答复可以成为联邦议会召开会议的议题。除了大、小质问以外，任何联邦议员都有权向联邦政府提出要求口头或书面给予答复的质问。

针对支持以色列的美国，而非欧洲国家。所以这一防御系统是拿伊朗当作借口，美国真正想防御的其实是俄罗斯。且看反导系统计划在捷克布置雷达，在波兰部署 10 颗反导导弹，声称 10 颗足以摧毁来自伊朗的导弹威胁。但显而易见的是，如果将 10 颗反导导弹的阵地布置妥当，那么在需要的情况下多布置十几颗甚至几十颗都是十分容易的。而且不管计划的项目是否针对俄罗斯，在第 3 阶段和第 4 阶段本身就会产生针对俄罗斯战略武器系统的抵御能力。再者，北约声称导弹防御是针对来自“流氓国家”的威胁，具体指出的最大威胁来自伊朗和朝鲜。两国的导弹发展水平均不为外界所知。然而试想，朝鲜与欧洲国家的直线距离在 8000 公里以上，只有洲际导弹才有微小可能达到精确射击的要求。况且朝鲜与欧洲国家可谓“无冤无仇”，说朝鲜会不顾后果以导弹攻击万里之外的欧洲，恐怕再流氓的国家也不会出此下策。因此说欧洲导弹防御系统针对朝鲜而设，实在是自欺欺人。如果不针对朝鲜，那么伊朗便是最大的潜在威胁。从地理位置上判断，伊朗首都与南欧距离均在 3000 公里之内，中程导弹即可到达南欧甚至中欧国家，包括德国。

问题是，伊朗与欧洲国家并无深仇大恨，伊朗总统内贾德甚至还为纳粹屠犹开脱。所以欧洲，具体到德国利用反导系统来对付伊朗实为多此一举。

俄罗斯与美国以及北约在广泛合作道路上面临的问题和障碍，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冷战时期遗留下来的猜疑，因为信任与合作需要双方的互动。北约反导系统已经箭在弦上，不得不发。面对俄罗斯的反对、美国的不让步，德国这个地理位置上的“夹心饼干”就要做好双方的工作。消除猜疑的最佳途径

是加强以信息交换与整合能力为形式的合作。积极斡旋，为北约与俄罗斯会谈提供机会。德国柏林科学和政治基金会认为，北约与俄罗斯的合作应小步骤循序渐进，遵循务实方案。合作还应配合上能够建立信任的措施并制定明确目标。从这个意义上讲，双方应该先共同进行信息的分析利用，而不是联合硬件。北约—俄罗斯和美国—俄罗斯层面上的导弹威胁信息评估汇总已经为积极合作树立了榜样。之后的步骤可以包括建立用于收集和分配信息与数据的合作中心，继续共同指挥，这也是涉及三方的欧洲—大西洋安全倡议所建议的内容。<sup>⑩</sup>

### 3. 合理处理与伊朗关系

欧洲导弹防御系统声称为了防御来自伊朗的潜在导弹威胁。对伊朗的清晰指控会让本没有利益冲突的伊朗与欧洲关系跌入低谷，德国在这个问题上也是进退维谷。一方面为了追求其政治大国的地位，必须与美国、与国际原子能机构联手制裁伊朗；另一方面，充当国际警察的后果就是很容易惹祸上身，引起伊朗反弹，成为伊朗的攻击目标。故而笔者认为，既然德国已经在国际社会做出制裁伊朗的表态，那就继续坚定地站在欧盟、站在北约阵营，寻求北约的保护伞。同时寻求通过法律渠道解决伊朗核问题，避免更大冲突的发生。

从实质上看，欧洲导弹防御系统与之前的美国导弹防御系统东欧部分一脉相承，假想敌都是俄罗斯。欧洲防御系统的建立，美国与其欧洲盟国成了拴在一条绳上的蚂蚱，一荣俱荣，一损俱损。通过这个系统，美国不但表面对抗伊朗，实则制约俄罗斯；同时也利用了欧洲，控制了欧洲。冷战缔结起来的欧美伙伴关系并非与世长存，欧盟憧憬将其“欧盟模

<sup>⑩</sup> Paul, Michael: Rakettenabwehr—Probleme und Chancen für die Nato-Russland-Beziehungen, SWP-Aktuell 2012/A 35, Juni 2012.

式”推向全世界，万事通过一定的机构、规则进行，梦想以道义的力量改变这个世界。这一点是欧美根本分歧所在。在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四分五裂、北约陷于“生存危机综合征”的时候，美国用一个反导系统，将欧洲从“中立化”倾向上拉回来，与自己站在一条船上，分担了自身承担的安全风险，修补北约这个军事政治存在的窟窿，不可不谓棋高一着。

德国的角色很纠结。一方面明知美国插手欧盟，拉欧盟下水还得摆出合作姿态；另一方面，德国出于历史、经济、资源因素考量不想也不能与俄罗斯翻脸，这涉及德国核心利益。尤其是当前，欧债危机使欧洲陷入麻烦之中，作为欧盟领头羊，德国被债务国弄得焦头烂额。在这种情况下，还要分身做和事佬，解决北约与俄罗斯之间的龃龉，德国的日子也不好过。所以德国在欧洲反导问题上表现得比较模糊，虽然支持并参与反导系统建设，但是强调俄罗斯立场的重要性，欢迎俄加入。因而可以推测，在反导问题上，德国的方针很可能是一面做，一面看，见机行事，恰当应对。

## 五、中国的关切

中国一直认为建立全球导弹防御系统，包括在世界一些地区部署该系统或开展相关合作，不利于维护战略平衡与稳定，不利于国际军控和防扩散努力，不利于国家间互信和地区稳定。按照中方观点，导弹防御系统会打破现有的战略平衡，导致紧张局势交替升级和导弹技术扩散，不利于国际社会所作的防止大规模杀伤武器扩散的努力。发展导弹防御系统会将军备竞赛扩展到宇宙空间，这对保障世界和平与安全不是一个正确的选择。

作者简介：于冬冰，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系硕士研究生。

## 六、前景预测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构建欧洲导弹防御系统已经成为无可争辩的事实。德国目前所能进行的工作就是积极参与，努力配合，调和矛盾。作为北约成员国，德国遵循平均分担风险和负担的结盟原则；作为俄罗斯的伙伴，柏林可以协助打消莫斯科对导弹防御系统隐蔽意图的忧虑——即不论现在还是未来，反导系统的建立都并非针对俄罗斯核武装力量，并支持采取其他有助于建立信任的措施。

当然，欧洲导弹防御系统能否顺利地进行下去还是未知数，决定权并不在德国政府手中。

笔者认为，欧洲导弹防御系统存在成功的可能。若北约，特别是美方松口，与俄罗斯在导弹防御系统上合作，利用未来几年时间实现合作上的实质性进步，共享反导雷达数据、互相交换预警信息，就不会引发军备竞赛。相反，导弹防御系统还有助于巩固军控与核不扩散系统，达到双赢目的。

然而，目前的国际形势纷繁复杂。面对朝鲜不顾国际社会反对，数次进行核试验与导弹发射试验的行为，美国更需要的是加强自身而非欧洲的防御能力。从2013年3月16日美防长的表态中可以看出，美国会将战略防御的重心更多放在本土，特别是西海岸。欧洲导弹防御系统因此受到冷遇。而且针对俄政府目前激烈的反制措施，若双方对话无法取得实质进展，北约独自继续反导系统，将反导导弹和预警雷达部署到俄罗斯家门口，俄罗斯必会作出反制措施，保护自己的安全。事实上俄罗斯并不惧怕反导系统，他已经拥有突破美国反导系统的技术手段。令人担心的是，此举将破坏当前的均衡，引发新的军备竞赛。因此在欧洲反导系统建设中将会出现种种意外突发情况，计划的搁浅，甚至撤销的可能也不能完全排除。

## 联邦总统高克关于欧洲的演说（摘要）

王海涛

2013年2月22日，德国总统约阿希姆·高克在总统府以“欧洲：加强约束——重获信任”为题发表了演说，展望欧洲理念的前景，引起广泛的关注，现摘要报道如下：

报告中他首先提到了欧盟所面临的问题，例如欧债危机解决方案的艰难谈判；成员国公民对要为危机埋单的担忧；对布鲁塞尔技术官僚和清规戒律的愤怒，对决策缺乏透明度的抱怨，对混乱的机构组织的不信任以及对欧洲理事会日益增长的重要性和德法两驾马车领导地位的不满等。

接着他回顾了欧盟发展的历史。成立欧共体/欧盟的构想是“通过‘共同体关系’保障欧洲的和平并承诺合理的利益。不仅是出于理性的考虑，这样也符合其国家利益”。“西德从中获益匪浅，借此重新回到了国际社会。法国和其他伙伴国家通过控制德国的煤钢生产满足他们安全保障的需要。”

欧盟的成立和发展的基础是欧洲认同意识和共同的价值观。“我们只需要离开欧洲，不管走向哪里，就能感觉到文化统一的现实（欧洲认同感）；从古希腊文化，到罗马帝国以及罗马法，直到占主导地位的基督教犹太教信仰的传统。”“欧洲认同感的来源：本质上永恒的价值规范以信仰和纲领的方式将我

们相连。我们以欧洲之名汇集在纪念碑周围，它铭刻的不是击败他人的荣耀，而是为了和平和自由、民主和法制、平等、人权和团结。这些价值都是承诺，但也通过条约和法律的形式明确了下来，是人们对于共和制共同理解的出发点，也是保证所有参与社会和政治生活的公民受到公平待遇的基础”。“欧洲价值观的约束力将彼此连接”，“它不受国界限制，超越了所有国家、种族、文化和宗教的差异而具有普世意义”。“所幸没人怀疑共同的价值观，但需要深入探讨目前的欧盟机构框架。有人认为联邦制联盟是唯一的希望；有人则认为要改进现有的机构，例如引入第二议会或扩大欧洲议会的权利；有人认为如果能充分利用拥有更多政治意愿的可能性，维持现状就够了；而对欧元持怀疑态度的人宁愿降低一体化水平。”

“欧洲价值为欧洲共和开辟了道路”。“这种认同感是多元的。欧洲认同感并没有消除区域或国家认同感，而是与之并存。”

在谈到德国在欧盟的地位时，高克极力为德国欧盟政策辩护，指出：“德国在欧盟扮演的角色可能引起一些国家的怀疑和不信任。德国从欧元中获益匪浅，让德国变得更强大，在重新统一后成为西欧最强大的经济体，让

很多人害怕。有些看法很快就被曲解，好像德国现在推行的是传统的强权政治，甚至是罪恶路线。不仅民粹主义政党认为德国要像当初那样把欧洲变成德国的，从而压迫其他民族，默克尔竟然也是这一德国的代表。”

“然而德国的政治家不想对谁发号施令，德国的社会变得成熟和理性。在德国，没有一个民粹主义、民族主义的政党获得民众的支持，进入德国议会。德国没有将深化的欧洲看成德国的欧洲，而看成是欧洲的德国！”

“我们不会恐吓、强迫他人接受我们的理念，只是想分享经验。差不多十年前，德国在全世界和德国公民眼里是‘欧洲病夫’。德国应对经济危机所采取的措施尽管随之产生很多内部矛盾，但效果显著。当然现在有不同的经济理念，条条大路通罗马。如果现在德国的政治家偶尔会对其他人的情况无动于衷或者他们的理性显得有点冷酷无情或居高临下，也肯定是特殊情况而非常态，主要还是想从必要的争论中找到正确的出路。如果在批评意见中表现出不屑，甚至是蔑视，不仅仅是严重的侮辱，在政治上也肯定会适得其反，会让自我批评性的谈论变得更加困难或者受到阻碍，现在的危机国家中，至少已有少数人已经看出了苗头。德国人应该明白，即使认为自己的观点正确，也不需要激怒或贬低对方。”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欧盟成立的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保障和平，而1989年后的首要任务是保障自由。“欧洲国家曾是世界强权并且在世界舞台扮演过重要的角色。在当今的全球化世界，面对新兴大国的挑战，最好让统一的欧洲成为全球力量：政治上共同决策，在全球范围内主张自由、人权和团结的价值观。经济上保持竞争力，保证物质安全以及社会内部和平。”

“但是欧洲还没有准备好担当这样的角色”，在欧盟的发展过程中，凸显出发展速度

与缺乏政治架构的矛盾。为了解决欧盟的这些问题，他列出了以下几点：

“欧盟需要进一步的内部统一，因为没有共同的财政和经济政策就无法保证欧元的生存；另外需要继续统一外交、安全和防务政策，行动一致，有效应对新的威胁，还需要在生态、社会政策（特别是移民）以及人口方面达成共识。”这些都需要依靠一体化的深化来解决。

“深化欧洲一体化需要拿出更大的勇气！欧洲需要的不是怀疑论者，而是旗手；不是犹豫不决者，而是果断行动者；不是被动者，而是建构者。”

“深化的欧洲就是深化的公民社会。2013年就是欧洲公民年，这是个好的开始。‘重建欧洲宣言’中讲得已经很具体了，宣言的名字起得非常好，会让支持欧洲的人团结起来。‘不要问欧洲能带给你什么，要问自己能为欧洲做什么！’这句名言给我们前进的动力。作为一名欧洲公民，我的梦想是：

第一，不要冷漠！布鲁塞尔可能距离很远，但至那里讨论的问题与所有人息息相关。我们不能再漠不关心，因为欧盟的标准会真实影响到幼儿园教室和我们的餐桌；因为在外交、安全、环境和发展政策上实行的标准，都冠以我们之名。我们不能再漠视欧盟对政治避难者的态度。

第二，不要懒散！欧盟很真实，也很复杂，也必须复杂。它能让公民表达自己的利益，了解信息；我们能让超过43%的选民参加欧洲选举，却不能让布鲁塞尔变成替罪羊，尤其是在那些由于民族国家的利益或国家失灵造成畸形发展的地方。

第三，认识到你们的创造力！如果老是把责任推给别人，永远无法让欧洲变得更好。我们有很多选择，如果想开始或阻止做某件事，就可以使用欧洲公民倡议活动；如果想建立或构建某个项目，可以提出拨款申

请；如果想做好事并让邻国了解你，可以参加志愿活动。每个人都能为‘是的，我就要欧洲！’这句话找到理由。”

高克从宏观角度对欧盟的过往今朝进行

了分析，同时对未来给予了展望，但是他也意识到，这个过程是非常漫长和艰苦的，最终欧盟走向何方仍然不甚明朗，他也无法给出明确的答案，只能从精神上振奋欧洲。

作者简介：王海涛，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系硕士研究生。



# 经济视野



# 欧债危机背景下的中国对欧、对德投资战略<sup>①</sup>

殷桐生

**【摘要】**当前欧债危机仍然没有看到尽头，对中国的影响则日益显现，既有挑战也有机遇。中国也正采取各类措施，希望能够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其中加强对欧投资则显现了其突出的地位。本文正是从机遇与挑战入手，阐述加快对外投资是有效举措、中国对欧投资概况、当前中国对欧投资的主要问题、中国对欧投资的战略选择以及中国企业对德投资的关键问题等方面对欧债危机背景下的中国对欧投资的战略进行分析，希望能对相关的机构、单位、企业和读者有所裨益。

**【关键词】**欧债危机 直接投资 战略选择

纵观世界投资行为的发展史可以看出，它是同投资理论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开始时几乎属于发达国家的专利。20世纪60年代，海默提出的垄断优势理论，70年代巴克莱和卡森提出的内部化理论、小岛清提出的边际产业扩张论，80年代邓宁提出的国际生产折中理论，这些理论大大推动了发达国家的对外投资活动。

一些发展中国家依仗经济的腾飞，也把对外投资提上了日程，它们不仅到其他发展中国家进行“平行投资”，而且到发达国家进行“上行投资”。于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便出现了众多关于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的理论，如1983年刘易斯·威尔斯提出的小规模技术理论以及拉奥提出的技术地方化理

论，不断推动着发展中国家的对外投资。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对外投资活动也日益展开。

## 一、欧债危机给中国提供的挑战与机遇

当前欧债危机总体来看已经缓解，但并没有看到尽头，不确定因素还不少，对中国的影响则日益显现。中国也正采取各类措施加以应对，其中加强对欧投资则显现了其突出的地位。

欧债危机以及欧盟和相关国家应对欧债危机的政策对我国来说既是机遇又是挑战。不援助欧洲原则上也不会陷入挑战，但也不可能赢

① 本论文受“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编号：2013XG003）。

得大的机遇。相反，如果我们能审时度势，就会像应对全球化一样能够抓住机遇赢得挑战。

### 1. 挑战

- 贸易：从中国进口减少
- 大宗商品价格：上涨
- 投资：削弱中国的投资信心
- 货币：中国挂靠的货币篮子中欧元比重在增加，大概是 20% 左右，欧元贬值，已经造成我国外汇储备缩水和蒸发
- 中欧利差倒挂，将导致热钱为套利而流入我国，造成输入型通货膨胀，会加剧中国的通胀形势。央行在 2010 年和 2011 年连续 13 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其中仅 2011 年就密集地 6 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sup>②</sup>但 2011 年全年通货膨胀率仍为 5.5%<sup>③</sup>

### 2. 机遇

- 欧洲金融秩序，甚至是国际金融秩序重构，给中国提供了重大的机遇：有利于缓解人民币增值压力，提高我国外汇储备的真实收益率，可以进一步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争取以人民币计价我国部分对外债权，使人民币国际化
- 我国目前拥有 3.2 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但使用并不理想。应该说，目前动用恰逢其时
- 可以改善进口结构，消费升级
- 中国企业可以走出去和引进来，加大投资和引资活动
- 可以买企业、买技术、买品牌、买渠道

## 二、加快对欧投资是抓住欧债危机这一机遇应对挑战的有效举措

当前中国对外经济的突出问题是三压力

和两过剩。三压力是指：出口压力、外汇储备风险压力和通胀压力；两过剩则是指：产能过剩和流动性过剩。直接投资便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有效举措，它可以

- 替代出口，规避贸易保护主义，形成原产地多元化，替代中国的出口
- 获取先进技术，输出边际产业，优化出口产品技术结构
- 将“死钱活用”，或实施“债转股”，即将债券转换成资产，既可避免国债价格下跌产生较大的缩水，又可谋取更大的利益
- 利用人民币的增值形势，因为本币贬值有利于出口，增值则有利于对外投资
- 缓解流动性过剩，缓解外汇储备风险和通胀压力
- 发挥民营企业的对外投资积极性
- 缓解我国部分能源和原材料的匮乏
- 充分利用外资
- 扩大劳务出口
- 使中国对欧援助从“输血”过渡到“造血”

对欧洲受资国来说则可以：

- 扩大市场
- 提供资金
- 降低成本
- 增加就业
- 增加税收

从而推动经济的发展，缓解债务危机，成为“雪中送炭”的“善举”和“壮举”。

## 三、中国对欧投资概况

英国经济学家邓宁的著名投资理论是把一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与该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数额连在一起，认为在人均国内生产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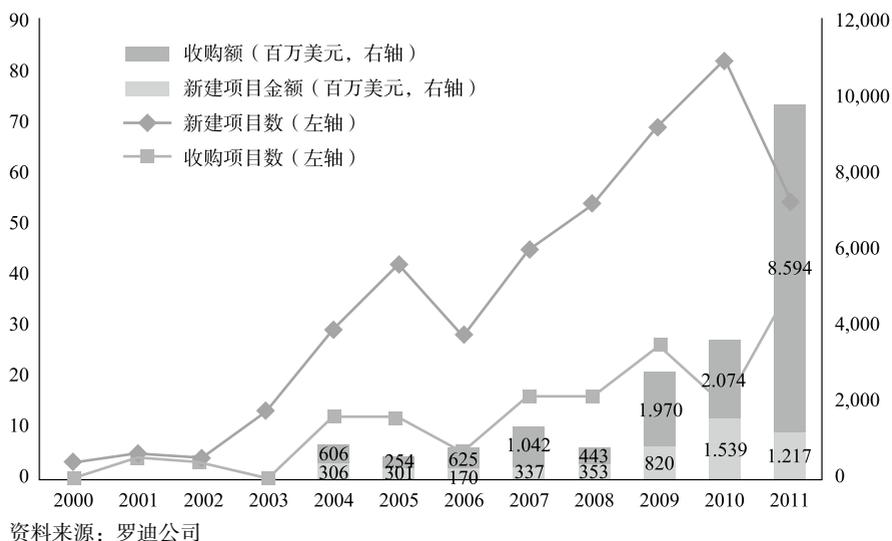
② 百度网站：[zhidao.baidu.com/question/3515360](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3515360)，2013年2月10日。

③ 搜搜问问网站：[wenwen.soso.com/z/q3552069...htm](http://wenwen.soso.com/z/q3552069...htm) 2013年1月18日。

值 400 美元以下的第一阶段和 400—2500 美元之间的第二阶段，对外投资的数量较少；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 2500—4000 美元的第三阶段时，对外直接投资开始加速发展；如果人均超过 4000 美元，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速度将快于利用外资的增长速度。<sup>④</sup>当前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处于第四阶段，也就是说处于对外投资的快速发展期。

据商务部统计，2010 年底中国非金融类对外投资存量为 3000 亿美元，设立境外企业 1.6 万家，分布在全球 177 个国家和地区，对外投资规模居发展中国家之首，出现了“三个一”的大好形势：即资产总额超过 1 万亿

美元，为东道国创造了 100 多万个就业岗位，纳税超过 100 多亿美元。在总投资额中，约有 70% 在亚洲，其次是非洲和拉美，对欧洲投资很少。2004 年以来，中国对欧投资逐步上升。据罗迪集团统计，2000—2011 年共有 573 次投资交易，投资总额 210 亿美元。2004—2008 年年均并购和新建项目投资数增长至 50 个，年均投资额达 8 亿美元，明显高于 2004 年以前的年均 10 个和 1 亿美元以下。2009—2010 年投资交易数增至 100 个，年投资额突破 30 亿美元。2011 年有 54 个新建和 37 个并购项目，总投资额约为 100 亿美元，超过前两年年均投资额的三倍。<sup>⑤</sup>



2011 年欧债危机继续发酵，欧洲各国更渴望中国的资本，于是中国对欧投资便有了大幅度的攀升，上半年已经增加了 99.2%。根据德国联邦银行的统计，“2004 年至 2010 年，中国在德国的直接投资每年都以两位数的速度递增，2008 年的增长率甚至达到了 39.6%”。德国联邦外贸与投资署提供的数

据显示，2011 年中国在德国的直接投资余额为 12.8 亿美元，约合 10.2 亿欧元，投资项目达到 158 个，项目投资首次超过美国，成为德国外资第一大来源国，这还不包括企业兼并或收购。<sup>⑥</sup>截止 2012 年 11 月底，中国对西班牙累计投资 4.1 亿美元，其中仅 2011 年就达 2421 万美元，目前在西班牙的中资企业共

④ 商德文，何冬阳：《当代国际投资理论评述》，载《东方论坛》1995 年第 1 期。

⑤ 《中国对欧投资特点分析》，从 2012 年 9 月 13 日【美国】rhgroup.net 编译：中国贸促会电子信息行。

⑥ 魏爱苗：《德国期待扩大对华经贸合作》，载《经济日报》，2012 年 9 月 1 日。

34家。<sup>⑦</sup>在荷兰中资企业总数已超过300家，累计投资总额约30亿美元，仅2011和2012年，中国对荷兰新增投资项目分别达到30个和31个。<sup>⑧</sup>

如果按年增长30%测算，中国对外直接投资2015年就将达到3000多亿美元，很可能成为世界第一，到2018年，将实现7000多亿美元。美国罗迪厄姆咨询及集团最近发布的报告更是预测，2010—2020年中国的对外投资将达到1—2万亿美元，其中的1/4将流向欧洲。<sup>⑨</sup>可以肯定，中国对欧直指投资将会有更大的提升。

#### 四、当前中国对欧投资的主要问题

- 对欧洲的投资环境知之不多，语言和文化障碍突出，部分企业盲目投资
- 中国企业“走出去”的主力军仍然是国有企业，但已呈现多元化的趋势，一些非国有企业，如华为公司、吉利汽车、三一重工等也开始“走出去”。总的来看，还是中小企业居多，投资规模偏小
- 遭遇欧盟制度和政策上的不公对待
- 宏观规划和管理不够完善
- 研发水平偏低
- 忽视了人才的选派和培养
- 不易选好正确的合作伙伴

#### 五、中国对欧投资的战略选择

发达国家一般奉行三大投资战略：供应导向型投资、销售导向型投资和工资导向型投资，其中以销售导向型投资为主。

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对欧投资属对发达

国家投资，而这些发达国家又深陷债务危机。面对这样的背景，中国必须要有新的对欧投资战略。笔者认为应突出：

##### 1. 实物投资

从事实物投资可以减少风险，因为不管出现什么危机，实物投资的价值仍在，一般不会出现严重的贬值和缩水，相反可以享有危机消失后实物保值和增值所带来的利好，当然也要看准行情。方法：一是收购外国企业；二是购买战略资源。受当前欧债危机影响，上述产品在欧洲市场的价格有所回落，中国可以适时大量地购进，以弥补国内战略资源的不足；三是购买黄金、白银贵金属。

##### 2. 加大海外并购

海外并购是对外投资的一种重要方式。可以加大对一些有发展前景、技术先进的欧洲企业（如大型制造业、高科技企业、石油、矿山、运输、金融保险机构等）进行部分或全额股权收购，构筑欧洲生产经营基地。2008年，中国企业海外并购金额达302亿美元，占当年对外直接投资的54%；2009年，海外并购金额为175亿美元，占当年对外投资的31%。这说明海外并购已成为中国对外投资的重要甚至是主要形式。从海外并购的实际发展情况来看，海外资产和股权等类型的并购比较成功，品牌和技术并购虽有一些成功的范例，却并不突出。

以TCL为例，它通过收购德国施耐德电子公司，连同“施耐德”和“DUAL”两个世界知名品牌及其产品分销渠道，成为欧洲高端彩电主要生产商。它在扩大销售额的同时，

<sup>⑦</sup> 丁大伟：《交货期决定竞争力》，载《人民日报》第23版，2013年3月15日。

<sup>⑧</sup> 张杰：《服务和维护现场跟进》，载《人民日报》第23版，2013年3月15日。

<sup>⑨</sup> 张亮：《演绎更精彩的合作故事》，载《人民日报》第23版，2013年3月15日。

也节约了销售的时间成本，并规避了各种风险。TCL集团还通过购并法国“汤姆逊”公司彩电及DVD业务，使彩电年销售量居全球之首。它还利用“汤姆逊”和“RCA”品牌及销售网络，在欧洲各主要市场都建立了制造中心。

在海外并购中不仅大企业收购大企业的案例引人瞩目，大企业收购中小企业的做法同样引人关注。如海尔收购了意大利坎波多罗小镇的一家冰箱制造企业，吉利收购了英国锰铜控股公司，山西运城制版集团收购了西班牙瓜达拉哈拉省雷斯工业园的一家同类企业，联想收购Medion37%的股份，中国海航集团（HNA）收购西班牙NH酒店20%的股份，蓝星公司收购挪威硅生产商埃肯公司等等。

### 3. 投资建厂

直接在欧盟对象国中建厂，实施“绿地投资”仍应是中国对欧投资的一个重要的形式。例如以海尔为代表的一批中国企业通过在欧洲投资建厂，不仅开辟、巩固和扩大了欧洲市场，而且还绕过关税壁垒，规避了欧盟的反倾销调查、配额限制以及形形色色的非关税贸易壁垒，把“内产外销”变为“外产外销”，大大增加了出口。同时，也使企业的形象和品牌深深扎入欧洲芸芸众生的心中，提高了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与往年不同，最近欧盟对中国彩电恢复重税的决定并没有重创中国的彩电业。它们通过提升产品结构和在欧盟建厂，绕过欧盟贸易壁垒，成为中国企业成功应对贸易保护主义的范例。目前厦华在德国、法国，海信在意大利、法国均拥有工厂；TCL还在波兰设立了工厂；长虹在捷克建立了生产基地；创维、海尔也在匈牙利、比利时等国建立了多家彩电生产基地及合资公司；广西柳工集团在荷兰成立了子公司等，以避开各类壁垒，抢占海外市场；现

在的爱国者等国内知名企业，也正是通过投资欧洲的方式才顺利打入了欧洲市场，占到了一席之地。

### 4. 技术层面的战略决策

要在技术层面进行对外投资战略决策，首先要解决两个指导思想问题：其一，发展外援式技术进步。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提高技术创新能力有两条途径：一是内源式技术进步，这种技术进步来自于国内；二是外源式技术进步，这是通过国际技术转让来实现技术进步。由于内源式技术进步耗资耗时巨大，因此，越来越多的国家希望通过国际技术转移，缩短研发时间和投入。这样，可以跨越式缩小与先进国家之间的技术差距，获得技术的超常规发展。其二，必须根据具体产品的周期来决定投资的战略。根据经济学中的产品周期理论，一种产品的相对优势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的，我们必须据此制定相应的战略。

#### 1) 引入阶段

如果本国的某项产品处于引入阶段，那么决定其相对优势的主要是专门技术，此时生产商和需求者之间的沟通特别关键，因此要加大实施技术和管理追赶型的对外投资。

欧盟大多为发达国家，在很多技术层面都高出我国。因此我们必须加大投资，特别是购并外国具有先进技术的企业。如TCL通过购并法国汤姆逊公司，获得了其在传统彩电领域的3万多项专利。通过并购和参股我们也可以获得欧盟的先进管理经验。

#### 2) 成熟阶段

成熟阶段也是出口阶段，是向类似需求结构国家出口该产品的阶段，产品的技术水平高低便成了相对优势的关键。今天我国在航天、原子能、生物工程、激光技术和超导材料等方面已接近或达到世界先进水平，进入了成熟阶段。这些新技术产品在欧洲市场有

很大的需求，也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 3) 标准化阶段

在我国，纺织业、机械制造业等产品的技术要求已趋标准化，特别是一些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劳动密集型技术则比较适应欧盟的某些东道国。此时，市场竞争的关键在于商品价格的高低。因此此类技术可以转移到一些资源丰富、劳动力低廉、交通便利的欧盟新成员国或非欧盟成员国。

### 4) 停滞和替代阶段的边际产业扩张

当前我国不少行业的产品已经进入停滞，甚至替代阶段，出现生产能力相对过剩，如彩电、空调、洗衣机、电子产品等。这些边际产业可以绕过壁垒直接进入发达国家，也可以向欧盟新成员国以及非欧盟国家投资。中国一些传统加工企业也可以通过大力开拓国外投资业务来消化和吸收国内过剩的加工能力，通过国际投资来带动设备、技术和劳务出口，转移一部分加工能力和适用技术。

### 5) 专有技术阶段

根据垄断优势理论和小规模技术理论，一项产品如果在欧洲已成为所有各国都不可或缺或短缺的专有技术时，就成了专利垄断产品，也就成了最有竞争力、最能获利的产品。这里主要指我国具有传统特色的技术，包括中国园林、国画、中医中药、手工艺品和传统食品等。

## 5. 抓住低碳经济和可再生能源的直接投资

当前世界经济面临两个重大的挑战，即环保和能源，与其相对应的则是低碳经济和可再生能源经济的发展，在中国则称之为节能减排。在这两方面，欧盟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许多发达国家拥有众多中小型高科技公司，但缺少市场开发途径和资金。中国企业应该通过并购或合资、合作经营等方式与

其开展合作，通过合作开发跟踪技术前沿，有效地掌控和利用各种战略资源。

## 六、中国企业对德投资的关键问题

### 1. 研究法律框架，进行法律咨询

德国《商法》规定，一个外国公司应由其有限责任公司或无限责任公司在德国进行经营活动。有限责任公司一般分责任有限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建议中国企业都采用责任有限公司，因它灵活性较大，对公司财产负责任，可建立一人公司，对资本要求也较低，最低 25,000 欧元（约合 20 多万元人民币）。可以用现金形式投入，也可用实物的方式投入。

### 2. 要有高水平的德语翻译

最好是本公司的中国雇员。

### 3. 登记、证件、执照、开户、税收和保险

在德国很容易获得公司营业许可执照，而且全国通用。公司名称须经当地商会认可。为了争取为中国雇员免缴或少缴社会保险金，请尽可能加上中国省、市名称。应尽量由国内的母公司做股东。

在商业登记部登记前可用新建公司名义在银行开户，在商业登记部登记时需提供下列证件：（可交纳 2500 欧元请公证机构代拟文）

最低资本已交付的证明，经过公证的公司章程，证明总经理签名属实的证件，股东名册及各股之金额等。

公司要交以下的税款：地方的工商税、企业营业税、附加税以及对红利征收的源泉税。微型企业（9 人以下）税款可以控制在 2500 欧元（约合两万多人民币）内。如果公司要在德国雇人干活，必须给他缴纳保险，公司和个人一人承担一半。

#### 4. 公司章程

必须制定公司章程，内容包括：公司名称，法定地点，营业目的，股份总额，各股东所占股份，股东表决权；董事长、总经理、董事、经理、董事会、监事会、股东大会的权利与义务；各类会议程序，会计年度，年度报告，增加股金的程序以及股份转让与抵押等。

#### 5. 居住及工作许可

公司的所有中国雇员必须获得移民局的居住许可和劳工局的工作许可。公司负责人同样要申请居住许可，还需开业许可，但无需单独申请工作许可。

欧债危机中的中国直接投资是一个全新的课题，是一篇大文章。本文从五个方面对此进行了分析，希望能对相关的机构、单位、企业和读者有所裨益。

作者简介：殷桐生，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 奥地利经济体制特色

邓志全

**【摘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直到1955年10月，奥地利才摆脱四国占领，开始重建家园，比其他欧洲国家足足晚了10年。而不到20年的光景，奥地利于1974年便赶上并超过了西欧国家的平均发展水平。奥地利成功地走上了具有奥地利特色的发展道路。本文从奥地利经济体制、社会福利、社会财富分配、社会伙伴关系定位以及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平等、参与及促进社会和谐的合作等社会治理特色，来介绍奥地利的经济体制。

**【关键词】**奥地利 经济体制 社会治理特色

二战后，直到1955年10月，奥地利才摆脱四国占领，开始重建家园，比其他欧洲国家足足晚了10年。而不到20年的光景，奥地利于1974年便赶上并超过了西欧国家的平均水平。据资料统计，2012年奥地利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高达48,479欧元，列世界第13位。如今，奥地利的经济和科技水平在欧盟发达国家内处于中上地位。战后的半个多世纪，奥地利的通货膨胀率、失业率和犯罪率在西方发达国家一直较低，是贫富差距不大的福利国家，几乎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罢工、抗议游行甚或武力冲突事件。奥地利成功地走上了具有奥地利特色的发展道路。这条道路的特色不妨从以下三个方面看：

## 一、经济体制与众不同

奥地利有关部门提供的资料显示，其公

有经济成分在国民经济中占45%，主要包括在国民经济中起着十分重要的宏观调控作用的国有企业（钢铁冶金和重型机械制造）、石油、煤气、电力、化工、航空、银行、城市供暖、社会住房、公共交通、邮电通讯、铁路、城市垃圾清理和加工等行业。它们在投资、创造就业、促进经济流通和保证国家经济生活的正常运转方面举足轻重，对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又具有宏观的维稳作用。

## 二、社会福利实实在在

奥地利社会保险包括退休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和事故保险等四类，含义有三：保障每个公民的生老病死都有所依托；四类保险是法定的，不取决于个人意愿；都由国家出面主办，不得以盈利为目的，亏损由国家从预算中调拨资金补贴。其基本目标是保

障每个公民的基本生存权利，特别是照顾那些收入较低、家庭人口多、负担过重的社会阶层，使低收入者生老病死和享受教育的基本人身权利得到保障。举例说明：

- 一对夫妇加三个孩子的五口之家，只要父亲就业，即使他因工资不高而只交纳很少的社会保险金，其妻子和三个孩子也能享受法定的免费医疗
- 国家实行9年制免费义务教育，适龄儿童不仅免交学费，还可享受国家补贴的教科书和月票
- 每个孩子自出生开始直至26岁都享受国家补贴，近年的金额为每人每月156.3欧元，而随着年龄的增长还会略有增加。对于多子女的家庭，从第二个孩子起，儿童补助金则累进式增加

此外，奥地利联邦和地方政府（以州一级政府为主）还设置社会住房基金来开发社会住房，租金较低，专供收入不高的人群居住。若住房者仍无能力支付全额租金，还可再申请租金补助。对购买私人住宅或自建住宅的家庭提供低息或无息贷款进行补贴以及对残疾人和老年人，还采取不同的抚恤和帮助措施等。

### 三、社会财富的分配特色——重点照顾低收入阶层利益

奥地利制定社会财富分配法规的基本指导思想是：尽力缩小贫富差距，实现最大限度的分配平等。主要通过使用累进式个人所得税制度来缩小贫富差距。如：

若个人年收入低于3640欧元，免交个人所得税；年收入超过这个限额，则要按规定交纳个人所得税。奥地利的个人所得税率分为0%、21%、31%、41%、50%共五级，收入越高，缴税越多。这一税制同样适用于企业家、商人和艺术界人士。

政府收取的税金用于维持国家政治体制和福利制度的正常运转，如补贴退休和医疗保险的赤字，实施义务教育和发展社会保障住房，从而实现了高税收高福利的良性循环。

## 四、确立“社会伙伴关系”，促进社会和谐

简言之，“社会伙伴关系”是将社会各类关系定位为平等的伙伴而非对手。它影响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稳定社会、促进经济发展等方面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举其大者如：由劳、资双方成立社会团体（如：职工协会和联邦商会）作为“社会伙伴”，联合协商解决经济上的敏感问题以及参与国家立法和决策活动。

### 1. 工资谈判——照顾劳方利益

每年3月，奥地利“职工协会”代表劳方，“联邦商会”代表资方各派出由精通经济的专家组成的谈判代表就工资增长幅度进行谈判。首先由劳方代表书面提出雇员当年工资应增幅度、理由和根据；资方代表在审核劳方的要求和根据后，提出自己认为合适的幅度及依据。如此反复谈判数轮，直至双方达成协议。协议确定的工资增长幅度具有法律效力。奥地利全国经济界职工（不含公务员和政治家）的工资均依此作相应的增长，增长的幅度可高于谈判确定的幅度，但却不得低于该幅度。

### 2. 物价谈判——协调劳、资双方利益

奥地利于1956年首创由劳、资双方共同组建“物价管理委员会”来协调物价。而今，随着经济形势日趋稳定，多种商品的价格逐步放开。然而，凡涉及公民基本生活的必需品，如汽油、燃油、煤气、电力、粮食、面

包、牛奶、食盐和部分服务行业的收费标准等仍需通过劳、资双方谈判进行调整。雇主代表根据原材料价格、劳动力价格及能源价格上涨幅度导致产品的成本上升，提出调整价格的幅度。劳方代表为保护劳方利益，在进行认真深入的审核之后，要求资方降低增长幅度并提出自己的根据。如此反复，直至双方达成协议。这样就避免了百姓生活必需品被市场化而引起的价格波动和社会心理动荡。

### 3. 参与国家立法和执政

- 任何法律草案，事先须征求职工协会和商会的意见，并且在双方提出文字鉴定之后，法律草案才能提交议会表决，否则议会不予表决。如涉及某行业的利益，还须征求该“行业协会”的意见，如涉及医生利益，须征求“医生协会”意见
  - 国家各部委须设立“咨询委员会”，由部长直接领导。职工协会和商会向咨询委员会派出自己的代表。此外，还吸收相关行业的专家和代表。咨询委员会每月举行一次例会，由部长亲自主持，讨论和协商有关重大事件和问题。国家部委通过这一法定途径广泛征求和听取社会各方面的意见，以减少和避免决策失误。咨询委员会不向其成员提供报酬
  - 联邦总理府也设咨询委员会，称为“专家委员会”，由职工协会、商会、农民协会及其他重要行业的协会代表组成，每月举行一次例会，由联邦总理亲自主持或由总理临时委派的全权代表主持会议。其目的也在于广泛征求和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接受有关利益代表机构的监督
  - 职工协会和商会的领导人常常兼任国会议员或执政党的领导人，密切关注政治和经济形势的发展，随时向国家有关部委提出书面建议和意见，为国家部委制定有关行政命令时提供借鉴和参考
- 我国古代哲人老子曰：“……难易相成，长短相形，……”世上万行都存在于相对之中，完美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上述特色在保障奥地利人民生活的同时，也暴露出不少弊端和副作用，主要表现在：
- 奥地利社会保险和福利开支占国民收入的28%，雇工费用占49.3%，致使劳动成本增长过快，商品价格过高，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力减弱
  - 公共开支的负担有增无减，国家预算赤字已超过了经济学家确定的警戒线（预算赤字占国内产值的2.5%为警戒线），国家背上了沉重的预算开支负担
  - 导致就业者懒惰、不求进取和其他舞弊现象的发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努力工作者的积极性
  - 人口日趋老龄化，国家每年用于退休保险和医疗保险的补贴数额巨大，存在大量的赤字

如何趋利避害？相信智慧的奥地利人民和执政者会通过社会伙伴关系，寻找到优化途径，为奥地利的特色道路谱出新篇章。

作者简介：邓志全，我国原驻奥地利参赞，教授。

# 瑞士金融监管的变革、发展与前景

任丁秋

**【摘要】**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瑞士金融监管体制发生了重大变革，由分业监管走向统一监管。新生的瑞士金融市场监管局面临诸多矛盾和难题，严峻挑战中蕴含着发展机遇。本文正试图探讨瑞士金融监管体制的沿革，分析瑞士金融监管的发展战略，展望瑞士金融监管的未来前景，提出对我国金融监管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瑞士 金融监管 战略目标

21世纪初，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对各国金融监管提出严峻挑战。瑞士早于1998年开始酝酿金融监管体制的改革，经过一系列筹备工作，于2007年正式启动，在金融危机的促动下，最终于2009年完成了金融监管体制的重大变革，从分业监管走向统一监管。危机中诞生的瑞士金融市场监管局面临诸多矛盾和难题，制定了金融监管的战略目标和实施政策，并取得显著成效，为维护瑞士金融中心的稳定和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 一、瑞士金融监管的重大变革

### 1. 瑞士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背景

在由美国次贷引起的金融危机爆发之前，瑞士金融采取分业监管模式，设有独立的三家监管机构，即瑞士联邦银行委员会、联邦私人保险局和反洗钱管理局。瑞士金融市场主要采取自律管理形式，国家和政府基本上

不进行干预。

长期以来，这种分业监管模式支持了瑞士金融业的长足发展。然而，伴随经济全球化的滋长和蔓延，金融业综合经营的日益深化，金融创新产品的不断涌现，金融风险也在快速积累和传递，分业监管模式已难以适应瑞士国内外金融业的新形势和复杂局面，在金融危机中更加暴露出弱点，其最大问题是：金融监管的交叉和真空同时并存，没有一个得到法律授权的联邦机构来负责金融市场监管，无法有效防范系统性风险。例如瑞士联邦银行委员会隶属联邦财政部，没有独立法律身份，不能完全掌控所拥有的资源。

早在1998年，瑞士的一些专家和立法者就已经开始酝酿对金融监管模式进行改革。2007年6月22日，瑞士联邦金融市场监管法出台，对瑞士金融监管体系实行重大改革，将瑞士联邦银行委员会、联邦私人保险局和

反洗钱管理局三家机构合并，组建新的瑞士金融市场监管局。该法获得瑞士联邦议会批准，于2009年1月1日正式生效，瑞士金融市场监管局也于即日正式成立。在发展统一金融监管模式的过程中，瑞士听取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意见和建议，同时借鉴了德国等其他欧洲国家的方式和做法，更从此次金融危机中汲取了经验和教训，最终决定设置独立性较强的现代管理结构和框架。

## 2. 瑞士金融监管的组织结构

1) 管理部门。瑞士金融市场监管局设董事会、执行董事会和执行委员会。董事会是战略管理机构，2012年由9名成员组成，设董事长一名，副董事长一名。董事会决策重大事务，发布法令和通令，负责财务预算。董事会实行集体领导，采取投票方式由多数通过决定。董事会起初设人事任免和薪酬委员会、审计委员会和战略委员会，后根据形势发展，改设审计和风险委员会、提名和任命委员会、并购委员会。各委员会的成员由董事会成员组成。

执行董事会是瑞士金融市场监管局的运营管理机构，由7名成员组成，负责规范经营，准备业务文件和材料供董事会决策参考，负责执行和实施董事会的决定。执行董事会设首席执行官一名，其他六名成员分管银行部门、保险部门、市场部门、执行部门、运营部门、咨询和战略服务部门。

执行委员会是执行董事会的高级机构，主要负责决策实施方面的工作，决定执行的细则和程序，以及关于被监管机构和个人的刑事诉讼。执行委员会设主席一名，包括主席在内的固定成员有三名。

2) 业务部门。2009年瑞士金融市场监管局成立之初，下设银行部、保险部、市场部、战略与中心服务部四个部门，分别负责银行

业、保险业、证券市场的监管业务和战略策划及公共服务。自2011年至今，业务机构扩展为六个部门，其功能不断充实。

(1) 银行部。分设7个职能处和工作组：针对瑞士两家大银行，分别设立了瑞士银行集团工作组和瑞士信贷集团工作组；三是对财富管理银行、证券交易商的监管处；四是对零售、商业和贸易银行的监管处；五是风险管理处；六是偿付能力和资本工作组；七是审批处。

(2) 保险部。分管8个业务领域，设有6个职能处和2个工作组：一是人寿保险监管处；二是非寿险监管处；三是健康保险监管处；四是再保险监管工作组；五是风险数量管理处；六是风险质量管理处；七是保险集团监管处；八是保险监管法工作组。

(3) 市场部。分管六个业务领域，设3个职能处，即集合投资计划和分销处、资产管理处、反洗钱和市场分析处；还有3个工作组，即资产管理和集合投资计划监管组、市场交易监管组、会计、审计公司和评级机构工作组。

(4) 执行部。分设4个部门，即调查处、诉讼处、破产工作组、经营服务工作组。

(5) 战略服务部。设有6个工作组，即国际政策组、国际合作组、法规组、法律顾问组、合法合规组、会计组。

(6) 运营部。下设2个职能处，即设备管理和采办处、信息和通讯技术处；还有5个工作组，分别负责财务、人力资源、企业建筑、企业风险管理和内控系统、内部经营发展项目和投资组合。

3) 员工队伍。瑞士金融市场监管局认为，一个专业素质高、具有奉献精神、充满信心的员工队伍，是金融监管部门最重要的人力资源。瑞士金融市场监管局成立的2009年，员工人数为359名，2010年405名，2011年427名。2012年末，全局的员工人数

增加为 477 名。员工平均年龄 41 岁，30—49 岁之间的员工占 68%，非瑞士籍的员工占 76%。

### 3. 瑞士金融监管的目标和任务

瑞士联邦金融市场监管法第 5 条规定“金融市场监管的目标是保护债权人、投资者和投保人；保证金融市场的正常功能，从而维护瑞士金融中心的声誉和竞争力”<sup>①</sup>；第 6 条规定瑞士金融市场监管局的任务“一是依法行使监管，二是执行与监管有关的国际任务”<sup>②</sup>。

瑞士金融市场监管局自 2009 年成立以来，每年发布授权宣言，阐述其工作目标和权责任务。第一个授权宣言相对简单，包含金融监管机构的宗旨、法律地位、主要的职责权限。之后的授权宣言在内容上不断充实，更加全面。2012 年授权宣言包括如下要点<sup>③</sup>：

1) 瑞士金融市场监管局是依据公法设立的机构，拥有自己的法律身份和地位。作为独立的监管机构，瑞士金融市场监管局保护债权人、投资人和投保人的利益，确保金融市场的特有功能，这是瑞士金融市场监管局使命的核心内容。

2) 瑞士金融市场监管局的目标：一是保护金融市场的顾客，防备金融机构破产，以及证券市场中的不公平交易和不公正待遇；二是保护金融市场的功能，以保持金融体系的稳定和市场信心。对于顾客和金融市场的保护也能够间接地提升瑞士金融中心的竞争力和声誉。

3) 瑞士金融市场监管局负责监管银行、保险公司、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商、集合投资计划、分销商和保险中介，颁发市场准入许可证，保证被监管机构合法经营，并

持续符合市场准入的要求。负责反洗钱工作，提供行政支援，对违反法规的行为给予制裁或处罚，必要时进行机构重组和破产诉讼程序。

4) 瑞士金融市场监管局负责监管股权披露，安排必要的诉讼程序，发布指令，如有犯罪嫌疑，向联邦财政部提出犯罪控诉。负责监管公开并购或收购，作为专门投诉机构，接受对瑞士并购委员会决定的申诉或上诉。参与立法程序，依据权限发布自己的条例法令，公布关于金融市场法的解释和适用的通函，并负责自律标准的确认。

与 2009 年授权宣言相比，2012 年授权宣言在内容上更为充实，关于职责和任务的表述较为全面，最重要的是明确提出了金融监管的目标，并区分了金融监管目标的两个层次。

### 4. 瑞士金融监管的方式和手段

瑞士金融市场监管局履行其监管职责，采取风险指向的方式，通过审批、监管、实施和法规的手段<sup>④</sup>，重点突出金融监管业务的专业化、持续性和预见性。

1) 准入审批。瑞士金融市场监管局将市场准入审批作为监管的质量标准。对金融机构的市场准入审批与审慎监管相联系，是金融监管的重要预防性手段，以防止不符合准入条件的金融机构获得营业批准。市场准入审批包含不同形式的授权，必须划清审批要求的严格程度。金融监管相应地也从最严密的审慎监管，到简单的注册登记无须持续监督，分为不同的等级和层次，明确金融监管的执行力度。

2) 审慎监管。瑞士金融市场监管局实

① 《瑞士金融市场监管法（2009）》，第 2 页。

② 同上。

③ 瑞士金融市场监管局：年度报告（2012），首页。

④ 瑞士金融市场监管局：战略目标 2013-2016，第 6 页。

施持续的、风险有所指向的审慎监管，保证金融机构具有充分的偿付能力，完备的风险控制以及正常的业务经营。瑞士金融市场监管局在审慎监管中确立监管重点，根据金融机构所产生风险对于债权人、投资人和投保人及金融系统的影响程度，将被监管机构分为六大类。第一类风险级别最高，包括所谓“太大而不能倒”、“过度关联而不能倒”的大银行等金融机构。第二类至第五类机构的风险依次递减。归入第六类的机构风险程度最低，因而不必接受严格的审慎监管。

3) 有效实施。瑞士金融市场监管局适当地实施金融监管法，可以使用在相关法律中规定的强制性手段，整治和惩罚违反监管法律法规的行为。在运作实施程序的过程中，着眼于总体监管目标，遵守行政法的平等、均衡和诚信等核心原则，提高透明度和实行信息公开，对市场中的内部交易、市场操纵和不公正收购等不法行为进行干预，以免金融客户遭受不公正交易和不平等待遇。

4) 统一法规。金融市场法规是金融行业有效发挥其功能作用的前提和基础条件。瑞士金融市场监管局基于监管目标和原则，实行全国统一的金融监管，对原有法律法规进行合理流程化，并利用专业优势，对金融立法产生影响。同时密切关注国际金融法和国际金融监管的发展趋势和动向，积极参与金融业国际标准的制订，旨在提高瑞士金融中心的声誉和金融市场的竞争力。

## 5. 瑞士金融监管的核心价值观

瑞士金融市场监管局成立之年，将其核心价值观概括为以下七个要点：即独立、技能、国际联络、内部透明、外部透明、诚信和效率。此后经过不断修正和提炼，2012年，瑞士金融市场监管局确立其核心价值观包括

以下三个内容<sup>⑤</sup>：

1) 系统性的监管活动。瑞士金融市场监管局作为监管机构，保护金融市场顾客利益和金融部门的顺畅运行，通过准入、监督、实施和法规的手段进行工作，采用基于风险的监管方式，保证监管的持续性和预测性，同时促进与国内外监管机构、政府、专业协会等组织的对话交流与合作。

2) 独立决策。瑞士金融市场监管局是一个在组织机构和财务上独立的机构，独立自主地发挥其功能作用，维护公共利益。金融监管机构的工作环境，是以各种利益群体的相关利益区分为特征的，必须保持高度自主自治，在法定的职权范围内行使权力，独立地决定监管战略和策略。

3) 负责任的员工队伍。瑞士金融市场监管局的员工是负责任、诚实和有能力的，业务熟练，工作富有成效，能够应对压力和挑战，根据环境的变化及时采取适当的具体措施。

核心价值观的确立非常重要，它高度体现了瑞士金融监管的基本理念、指导思想和行为标准。瑞士金融市场监管局通过贯彻和宣传其核心价值观，期望在国内外树立起瑞士金融监管的良好声誉和独特形象。

## 二、瑞士金融监管的发展战略

临危受命的瑞士金融市场监管局，主要面临来自国内外一系列的挑战和难题：第一，银行“大而不能倒”问题，在瑞士尤为突出；第二，政府和中央银行对问题银行的救助和处理，引发关于自由和公平竞争原则的争论和质疑；第三，瑞士跨境私人业务的法律风险突出，银行保密法在危机中遭遇前所未有的责难和攻击；第四，对资本充足率和流动

<sup>⑤</sup> 瑞士金融市场监管局：年度报告（2012年），第106页。

性的规定需要做出新的调整和修订；第五，金融业高管的薪酬和奖金问题，激起社会公众的指责和不满等。这些亟待研究和解决的主要问题，既反映了危机时期各国金融监管遇到的普遍性矛盾，又代表了瑞士金融监管的特殊性问题。

面对国内外纷繁复杂的金融局势和矛盾问题，瑞士金融市场监管局从战略角度出发，着力进行金融监管的顶层设计。2009年9月30日，经过联邦议会批准，瑞士金融市场监管局发布了2010—2012年战略目标。该战略目标包括以下七个方面：一是减少系统性和复杂性；二是改善顾客保护；三是流程化和合理优化法规；四是增加监管实效和监管效率；五是执行持续市场监管和有效实施；六是定位于国际稳定和市场一体化；七是加强瑞士金融市场监管局的权威。该战略目标的核心是维护和保证瑞士金融中心的声誉和竞争力。

2009年12月，瑞士金融市场监管局董事会通过了由执行董事会提交的金融市场监管“实施政策”<sup>⑥</sup>，并于2010年1月26日对外公布。该“实施政策”从法律和程序的角度确立了13条原则，包括执行监管法、保证市场完善、公正透明的诉讼程序、与司法部门和自律组织的合作等，以保证金融监管战略目标的具体实施。之后，瑞士金融市场监管局又将2009—2012年作为金融统一监管的第一个战略发展阶段，将2010—2012战略目标涵盖4年的整个战略期。

根据金融监管2009—2012年战略目标，瑞士金融市场监管局采取了一系列实施步骤，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2012年末，瑞士金融市场监管局对其战略目标的实施及其效果给出总体评价<sup>⑦</sup>。

## 1. 减少系统性风险

瑞士金融市场监管局从防范系统性风险的角度出发，加强了识别和抑制系统性风险的工作，对“系统重要性”做出定义和解释，将瑞士银行公司和瑞士信贷集团列于榜首，专门针对“太大而不能倒”、“过度关联而不能倒”的问题，制订了“一揽子”防范措施。自2009年初，瑞士金融市场监管局开始对两家大银行进行压力测试。2010年6月，对两家大银行执行新的流动性要求。2012年12月第三版《巴塞尔协议》发布后，又对所有银行实行了规范化的流动性要求，并支持银行制订新的关于抵押债权的资本充足性要求，使大银行拥有更多高质量的资本，增强其较快识别和应对系统风险的能力。

## 2. 改善客户保护

瑞士金融市场监管局对机构市场准入的审批采取高标准，从风险源头上把好关口。2010年指出现行法律对于顾客的保护不够充分，2012年提出具体措施改善金融产品的设计和分销，要求增强金融服务及成本的透明度。2011年，在保险行业全面推行“瑞士偿付能力测试”，以此作为有效保护顾客的主要工具。在对金融机构进行兼并和清算过程中，尽力保护顾客的权益。在各业务领域实行有效的监管方法，健全金融中介机构，从而增强客户保护。

## 3. 合理优化法规

瑞士金融市场监管局坚持统一监管的目标，加快了法规建设步伐，促使法规流程化和合理优化。在金融监管中，尽量执行协调

<sup>⑥</sup> 瑞士金融市场监管局：《金融市场监管实施政策》，2010年1月。

<sup>⑦</sup> 瑞士金融市场监管局：年度报告（2012年），第12—15页。

统一的法律法规，例如对银行和保险公司推行一致的破产法规，以同等保护债权人、投资人和投保人的利益。在银行监管方面，执行第三版《巴塞尔协议》的标准，发布金融市场监管局通函“资本充足性和资本规划——银行”，增强大、小银行的抗风险能力。对审计公司要求必须向金融市场监管局送交风险分析报告，使用前瞻性方法对机构的风险状况做出独立评估。通过监管式审计的改革，使审计公司成为金融监管当局的得力助手和监管体系的重要支柱。

#### 4. 提高监管效率

瑞士金融市场监管局审查和改善了所有业务领域的监管手段，并引进新的监管方法，先在个别部门试行，再逐步向其他部门推广。监管业务活动以防范风险为导向，对于高风险类别的金融机构进行密切、经常和直接的监管，对于市场准入的审批和监管加以改良和跨业界协调，推行新的监管工具，如团队监管、评级信函等方式，同时优化监管机构内部程序，采用新的 IT 工具，以提高和改善监管效率。

#### 5. 组织有效实施

瑞士金融市场监管局重新设计了金融监管的实施程序及其组织框架，采取标准化方式进行专业管理和干预，使调查和执行程序的运作快捷、透明，监管活动更加统一、有效。2011年3月，瑞士金融监管局的执行部从市场部独立出来，负责有关机构、产品和市场监管的调查和执行诉讼程序，是金融市场监管局的制裁手段，还负责监管证券交易法中的报告和披露义务的执行情况以及并购和收购。对《证券交易法》进行了修订，制订了关于违反股权披露报告义务的处理办法，调整了制裁范围，增强了监管效力。

#### 6. 促进国际金融稳定

瑞士金融市场监管局重视和推进与国际金融监管机构建立稳固的工作关系和业务联系。监管战略实施期间，瑞士签署了一系列重要的关于监管活动的协议，包括在全球重组和发展战略方面的协议。瑞士积极参与金融领域国际标准的协商和制订，发挥了重要作用，如对银行的资本要求标准。瑞士的保险业监管取得显著进步，最终得到符合“欧盟偿付能力 II 指令”要求的认可。在频繁引发国际争议的跨境业务领域，瑞士金融市场监管局公布了关于跨境金融业务风险的建议意见书，辅以多次的现场视察，加强了监管的力度。瑞士于2012年6月主办了第14届国际统一金融监管研讨会，来自德国、奥地利等国的代表出席了会议，这样的活动无疑有利于增强瑞士在金融监管领域的国际声誉。

#### 7. 强化金融监管机构

瑞士金融市场监管局作为一个独立的权威机构，在履行其职责的同时加强自身建设。首先是成功合并了前任三家金融监管机构，调整和重组管理机构，细化了运营结构和工作流程，使之符合监管战略目标，同时转变了机构的职业模式，从专家或行家的职业模式发展为管理职业模式。金融监管统一之后，原来各监管机构之间的业务合作关系，转变成为机构内部各部门之间的紧密合作关系。

瑞士金融监管战略目标的制订和实施，对外有效缓解了危机背景下金融领域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提振了金融市场和金融消费者信心，维护了瑞士金融中心的声誉；对内确立了统一监管的组织结构和业务工作模式，完成了从分业到统一监管的体制和机制的转型，开启了瑞士金融监管历史的新纪元。

### 三、瑞士金融监管的前景规划

2012年10月17日,瑞士金融市场监管局出台了2013—2016年金融监管的战略目标,展示了瑞士金融监管的前景规划蓝图。该战略目标于2012年11月21日得到瑞士联邦议会的批准,这标志着瑞士统一金融监管后,行将跨入第二个战略发展阶段。

新的金融监管战略目标的核心,是对金融机构及其业务经营方式的审慎监管、金融监管的国内和国际合作以及法规和金融市场监管局作为一个权威机构的自身建设,意即未来瑞士金融监管的重点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1. **审慎监管。**通过审慎监管来增强金融稳定和抗风险能力。即通过国际认可的审慎标准和持续合规,来加强瑞士金融中心的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如果市场发生不利情况,便以有序和快捷的方式解决,使金融市场客户遭受最小的损失。

2. **业务运作。**在业务运作中推进统一性、透明度和客户保护。为提高瑞士金融中心的声誉,推进公正的业务运作,协调金融市场各方参与者,金融市场监管局坚持实施市场准入审批程序,在监管的各个层次上形成透明度,以促进顾客保护,维护瑞士金融中心和金融监管的国际声誉。

3. **国内外合作。**积极参与国内外交流与合作,强调合作的有效性。在国际活动中,金融市场监管局集中并利用其资源,将重点放在核心业务和事务上。在国内合作方面,保证各机构之间的信息交流畅通、有效,清楚界定各自的决策范围。

4. **法律规章。**金融市场监管局依照监管目标,在其职责范围内,行使必要的权力,从事专业活动。从金融监管的角度,分析现有法规和法律的发展趋势,利用其专业

知识和技能,支持提议重要法规,对法律法规建设及早给予关注。

5. **机构权威。**金融市场监管局作为监管的权威机构,进行有效监管和开放对话。金融市场监管局使用有效的程序,通过富有竞争性和协调能力的员工队伍,来履行其功能。在业务工作中,监管机构与利益相关者进行开放式的主题对话,并且保持信息公开,向公众报告和披露监管活动的信息。

新时期的监管战略目标与第一战略期的监管目标有着明显的区别。第一战略期间,面对金融危机的严峻形势和国内外复杂的矛盾问题,瑞士金融监管当局需要当机立断,强力推行统一监管,多管齐下,采取组合配套措施,以稳定金融体系和金融市场,因而监管目标具有全方位、多层次、动作大、力度强等特点。随着金融形势的发展变化,第二战略期的监管目标作出相应调整,减少了子目标数目,体现了金融监管的规范化、常规化建设,战略目标的整体框架清晰,且显得较为平和。

### 四、瑞士金融监管的借鉴意义

我国现阶段采取金融分业监管的模式,未来可能将会逐步过渡和实行统一的金融市场监管。瑞士金融监管体制的改革与监管实践的发展、关于金融监管战略目标及其实现程度评估的经验,对我国的金融监管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 1. 防范系统性风险

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凸显了识别和防范系统风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防范系统性风险,对于我国的金融业同样重要,其中对于银行业尤为重要。我国银行业在国民经济中处于核心地位,一旦出现问题会给整个经济和社会带来巨大冲击。国际货币基金和世界银行都曾

提示要警惕中国银行业出现系统性风险<sup>⑧</sup>。同时，我国的系统性风险可能是由于若干单个风险汇集而成，会对金融体系和国民经济造成严重影响。因此必须提高警惕，未雨绸缪，识别和界定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对其实行严格监管，形成防范系统性风险的预警和监管机制。

## 2. 加强金融客户保护

保护金融客户是金融监管机构所能发挥的核心作用，应列为金融监管战略的重要目标。在我国的金融市场交易中，存在不少侵犯金融消费者权益的现象，主要表现为侵犯金融消费者的知情权、隐私权和公平交易权。目前，中国人民银行建立了内部的金融消费保护局，中国银监会、保监会和证监会也分别设立了银行业消费者保护局、保险消费者权益保护局、投资者保护局。要将金融消费者保护纳入我国的法律、司法和监管体系，形成统一规划协调、具体分工负责的保护框架。金融监管部门要根据各自专业领域的产品及服务特点，制订维护金融消费者权益和保护客户私密的规章制度、实施细则和办结流程以及争议和纠纷处理程序，形成比较完备的维权工作机制。

## 3. 完善监管法律法规

金融监管法律法规的主要内容包括市场准入监管、有关市场运作的监管、有关市场退出的监管。市场准入监管，是开设金融机构的严格审批过程。金融机构的市场准入必须满足资本充足标准、合格的管理人员、符合规定的经营范围以及组织结构、管理规章等条件。对市场运作监管是金融监管的重点环节，包括业务

经营监管、业务范围监管和风险监管。要推行风险指向的监管方式，将监管对象按其风险级别加以分类，实行不同力度的监管。对市场退出的监管要进一步规范有关制度和业务程序。要完善原有金融监管的法律法规，根据新的形势和情况变化，对监管法律法规加以增补和修订，或提出新的立法提案和建议。

## 4. 提高金融监管效率

目前我国采取分业监管模式，银监会、保监会和证监会各自对口负责银行业、保险业和证券业的监管。由于金融业务的交叉和混合发展，使得金融监管的重叠和盲区同时并存，监管资源的缺乏和浪费同时存在，直接影响监管效率。要发挥政府职能，建立三大监管部门之间、监管部门与中央银行等宏观调控部门之间的协调机制，加强信息沟通与业务合作，提高金融监管的有效性和整体效率。

## 5. 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

美国“次贷”危机和欧洲债务危机接连爆发，引起各国对金融监管体制的反思和改革。面对系统性金融风险，原有针对金融机构的微观监管功能严重失效，宏观审慎监管成为金融监管的新的研究思路和现实工具，引起国际上的广泛讨论和实际应用，由此丰富了金融监管的理论和实践。我国要发展与国际金融监管机构和外国金融监管当局的工作关系和业务联系，就要开展金融监管方面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加强对话与沟通，积极参与国际金融监管法律法规的制订和修订，争取某些业务领域的话语权和主动权。

作者简介：任丁秋，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

<sup>⑧</sup> 国际货币基金：《中国金融体系稳定评估报告》，世界银行：《中国金融体系评估报告》，2011年。

# 利益相关者

## ——中德跨文化经济交往伦理的重要原则

姚 燕

【摘要】“利益相关者”是近20余年来崭新的经济伦理与企业伦理原则，已逐渐被国内外经济学界、经济伦理学界较多人接受与研究。它亦可成为跨文化经济交往伦理的一条重要原则，跨文化的利益相关者自有特定内涵，此原则也规范不同国家经济实体的多种经济交往活动，包括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经营理念和伦理管理。对此，学界研究尚甚少。本文试图将利益相关者原则拓展至跨文化经济交往领域，并着重以德国在华跨国公司为阐发对象，来阐明它也是中德跨文化经济交往伦理的一条重要原则。

【关键词】利益相关者 跨国企业准则 跨文化交流 伦理机制

### 一、“利益相关者”原则的由来、扩展和中、德两国的共识

近代以来，西方传统的企业管理理论以股东（Stockholder）至上的赢利最大化为唯一目的。“利益相关者”原则的提出，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伦理与企业伦理管理的一大转折。其中心思想是：企业存在的目的并非仅为股东服务，也应为许多关系到企业经济的利益群体服务，因而要履行企业的社会责任。

利益相关者的定义首次出现在1963年斯坦福研究所的一份备忘录中。<sup>①</sup>美国经济学家弗里曼（R. Edward Freeman）在20世

纪80年代给利益相关者下的定义较有代表性：“任何一个影响公司目标的完成或受其影响的团体或个人”<sup>②</sup>。该定义不仅将影响企业目标的个人和群体视为利益相关者，也正式将社区、政府、环境保护主义者等实体纳入利益相关者的范畴。90年代中期，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企业竞争的日趋激烈，公司的经营活动越来越受到公司外部因素的影响，许多学者都从更加广义的经济与社会角度来认识利益相关者。90年代以来，弗里曼、布莱尔（Margaret M. Blair）、唐纳森（Thomas Donaldson）、米切尔（Ronald K. Mitchell）、克拉克森（Max Clarkson）等学者的研究，形成了较

① 此定义为：“利益相关者是这样一些团体，没有其支持，组织就不可能生存。”

② 弗里曼，R.爱德华：《战略管理——利益相关者方法》，王彦华，梁豪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第2页。

为系统的理论框架。利益相关者包括了与企业存在经济利益关系的所有个体和群体,包括国家与政府、投资人、企业员工、供应商、顾客与消费者、社会公众、环境保护组织、消费者权益保护组织、所在社区、市场中介组织、新闻媒体、后代人等。公司并非实物资产和股东的简单集合,而是一个由利益相关者构成的共同体,企业应综合平衡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要求,追求利益相关者的整体利益。利益相关者管理实质上是以社会伦理与道德规范为依据的伦理管理,对利益相关者负起道德责任,使经济获得持续发展。而企业只为股东利润最大化为唯一追求,会导致不道德经营,急功近利,自行衰落。

如今,利益相关者已成为一条国际公认的企业伦理原则,不少跨国企业也将它列为本企业的道德准则。1994年国际经济组织“考克斯圆桌会议”正式采纳它,形成《考克斯商业经营原则》,并具体规定公司在经济全球化中的种种责任,特别强调了和“经济发展困难的国家和地区”的合作,“促进可持续发展”,“尊重地方文化的完整性”。<sup>③</sup>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2004年发布的《OECD公司治理原则》的修订版和2000年发布的《OECD跨国企业准则》及其2011年修订版也采纳、阐发了此原则,覆盖了该文件的各章节,如“企业应全面考虑其开展业务之国家已制定的政策,并考虑其他利益相关方面的意见”<sup>④</sup>在各种国际性组织、国际性活动中,利益相关者的概念也被广为使用,如2009年11月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强调要加强利益相关者(或译利益攸关方)之间的合作。

利益相关者理念和理论的推广,来自于

全球化发展趋势,它切合跨文化经济交往的需要,通过伦理原则谐调,可以拓展成国际性经济交往伦理的原则,并且更具有利益主体的多元性、交往方式的多样性和文化内涵的丰富性。本、异文化中的成员都是跨文化经济交往活动的利益相关者,应当从交往活动中受益。他们既包括企业在异文化环境中从事经济活动时面对的股东、投资者、雇员、顾客、供应商、政府、社区、媒体、相关机构、公众等利益相关者,也包括企业所在母文化中的利益相关者。企业则连接了本、异文化中的利益相关者,要对他们履行双重的责任,使双方互利共赢,而不应在异文化中使自身经济活动引起零和博弈。跨文化的利益相关者理念体现为促进母国和东道国共同的可持续发展,贯穿在企业内部和外部利益相关者之间的跨文化交往、实现企业责任和对话伦理之中。

“利益相关者”原则作为经济伦理与企业伦理管理的基本准则,已成为中、德经济与企业界、有关学界的共识。

在中国,“利益相关者”是企业伦理管理的重要原则,包含了“以德治企”的丰富内容。如:将企业的合法收入及时合理分配,形成良好的企业信誉;尊重员工,创造人道化的工作环境;将消费者满意视作企业销售产品的最高目标,决不欺瞒消费者;依法经营、照章纳税,并尊重生产地、销售地社区居民的文化环境与生活习惯;保持与相关媒体的良好合作关系;积极从事慈善事业,回报社会,树立健康的公众形象;保护环境,开展生态文明建设,以利可持续发展,等等。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于2006年5月23日在“2006年中国经济高峰会”上指出:公

<sup>③</sup> 《考克斯商业经营原则》即《考克斯圆桌商业原则》,参见乔治·恩德勒(主编):《国际经济伦理》,锐博慧网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45—150页。

<sup>④</sup> OECD: OECD Guidelines for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Paris 2011. S. 19, 原文为“Enterprises should take fully into account established policies in the countries in which they operate, and consider the views of other stakeholders.”

司治理原则中不可缺少的一项就是利益相关者的权利、作用和保护。<sup>⑤</sup>可见“利益相关者”原则也是中国企业改革的一项准则。

德国本来就注重要求企业治理在国家的宏观调控和“经济秩序”的框架中运行，遵循社会福利市场经济的“经济秩序伦理”，体现人道主义平衡原则和社会福利政策；德国企业实行员工参与制和共同决策制，如大型企业监事会50%的成员必须来自雇员的代表。20世纪90年代以来，德国的经济伦理、企业伦理理论也重视利益相关者原则。如彼得·乌尔利希（Peter Ulrich）的整合性经济伦理学，其中观层面的企业伦理学说中就吸取了利益相关者理论。他使用包括投资人、员工、供货商、企业所在地、有关政府部门和社会公众在内的利益相关者概念，主张所有利益相关者展开对话，在对话中论证和考察各自提出要求的正当性，以确立企业经营决策的正当性和企业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sup>⑥</sup>他在所参与主编的《面向公众利益——对企业政策和公司交往的伦理挑战》一书的“导言”中指出：传统的自由企业制度不再适合作为企业在伦理上负责、经济上健全运作的指导原则；普遍公众应是企业的终极伦理目标所在，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不应只是某些特殊群体的利益，应扩展为普遍公众的利益。<sup>⑦</sup>

利益相关者原则在中德跨文化经济交往实践活动中也多有体现。在近些年世界金融危机与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严峻形势中，中德经贸关系保持稳定发展的良好态势，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互相兼顾了作为利益相关者

的对方，达到互利共赢。中德跨文化经济交往的一种主要载体是德国在华跨国公司，对它们而言，利益相关者原则是跨文化的。跨文化的利益相关者原则，是多重跨文化经济交往的伦理原则。德国跨国公司本是德国社会福利市场经济的单元，自身承载、体现着其社会福利市场经济的伦理文化，而代表中国利益的中国政府及其致力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德国跨国公司最大的利益相关者。所以，它依据利益相关者原则治理，首先要同当今中国发展市场经济的目标协调、耦合，涉及两种不同的市场经济之伦理文化的合理交往与融会。同时，德国在华跨国公司在具体治理中要同企业外部的各部门、社会群体、个体发生跨文化交往，在企业内部则有来自中、德及其他文化的员工的跨文化交往，要综合平衡地兼顾企业内外部各方面利益群体与个体，调融他们的伦理文化价值，求得协同效益。所以，利益相关者原则也是德国在华跨国公司在具体治理中当较好奉行的跨文化经济交往伦理原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与中国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保持协调一致；和德国跨国公司外部和内部利益相关者的跨文化交往；对话是德国在华跨国公司开展企业内外部跨文化交往、化解摩擦与冲突、达成共识的有效途径。

## 二、德国在华跨国公司和中国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保持协调一致

《OECD 跨国企业准则》一直强调可持续

<sup>⑤</sup> 周小川：《公司治理改革是股份制改革的核心》，载新浪网2006年05月23日，[http://finance.sina.com.cn/money/bank/bank\\_yhfg/20060523/12032589688.shtml](http://finance.sina.com.cn/money/bank/bank_yhfg/20060523/12032589688.shtml)。

<sup>⑥</sup> 姚燕：《从分离到整合——彼得·乌尔利希的整合性经济伦理学述评》，载《哲学动态》，2006年第5期，第53—59页。

<sup>⑦</sup> Ulrich, Peter: Business in the Nineties: Facing Public Interest, in: Ulrich, Peter/Sarasin, Chares: Facing Public Interest: The Ethical Challenge to Business Policy and Corporate Communications, Dordrecht/Boston/London 1995, P.1-5.

发展。如最近的2011版指出，跨国企业应“促进社会、经济与环境的进步，以期获得可持续发展”<sup>⑧</sup>，“承认利益相关者的通过法律或通过双边协定而产生的权利，并鼓励在创造财富、工作岗位和财务稳定企业的可持续性方面同利益相关者积极合作。”<sup>⑨</sup>

在当今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跨国公司应是东道国的平等合作伙伴，有机融入东道国经济与社会文化发展的框架，促进东道国健康的市场经济和可持续发展，这样才能使自身与母国的利益得到真正可靠、持久的保障。在可持续发展方面，如德国大众汽车公司、西门子公司从中国改革开放之初便制定了在中国发展的战略，同中国的工业化协调一致，并且引入环保生产，在帮助中国的汽车工业、电子工业、通讯、铁路等行业发展的同时，公司本身也得到了切实利益和很大发展。在全球金融危机、经济低迷之时，中国汽车市场逆势上扬，德国大众汽车公司在全球市场中一枝独秀。另一个范例是德国国际合作机构通过和中国在可持续的经济发展、环保、经济改革、能源等方面的合作，帮助中国逐步改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及经济发展的框架条件，既有利于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也使德国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投资环境得到改善，取得互利共赢的效果。<sup>⑩</sup>

然而，由于德国跨国公司和其他跨国公司一样，在华投资与发展的目标服从其

全球战略，也以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为动力，因此与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长远目标也有一定差距，存在一些有待双方通过沟通、对话论证解决的问题。这方面的问题主要有两个：一是德国跨国公司与我国经济发展的地区导向有明显偏离。我国中西部地区十分需要引进外国资金、技术与管理，以促进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德国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绝大部分集中在现时投资环境好的东部，在中西部的项目甚少。5300个德资企业中的一半集中在上海附近。<sup>⑪</sup>二是冲击技术溢出的负面效应。德国跨国公司拥有世界先进技术，中国对他们开放的目的之一是要“以市场换技术”，获得他们的先进技术。中国加入WTO后，修改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放宽了不少限制，德国跨国公司则加入在华从合资转为独资和并购企业的热潮，采用加强控制技术的风险管理模式，以避免和中方合作直接转让技术，大为减少技术溢出效应。上述两个问题和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不协调，但也关涉德国跨国公司的利益，有待中德双方在跨文化经济交往中，寻求共识，妥善改进。如2008年开始，中国政府大量投资的西部地区所重点发展的领域恰好是德国具有的优势的领域，如可再生能源和铁路技术。德国跨国公司可利用这一机遇，既促进中国西部的开发，也可使自身获益。

⑧ OECD: OECD Guidelines for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Paris 2011, P.19, 原文为“Contribute to economic, environmental and social progress with a view to achiev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⑨ OECD: OECD Guidelines for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Paris 2011, P22, 原文为“Enterprise should recognise the rights of stakeholders established by law or through mutual agreements and encourage active co-operation with stakeholders in creating wealth, jobs, and the sustainability of financially sound enterprises”。

⑩ 见GIZ: GIZ in China, <http://www.giz.de/de/weltweit/377.html>, 最后访问时间为2013-4-20。

⑪ Geinitz, Christian: Deutsche Firmen in Asien Aufbau West in China, in: Frankfurter Allgemeine, 2010年7月8日, <http://www.faz.net/aktuell/wirtschaft/unternehmen/deutsche-firmen-in-asien-aufbau-west-in-china-11011665.html>, 最后访问时间为2012-1-16。

### 三、德国在华跨国公司同外部、内部利益相关者的跨文化交往

德国在华跨国公司的外部和内部环境都不同于在母国的情况，都要面对多种更有伦理文化差异的利益相关者群体与个体：在企业外部有众多不同的利益相关者群体与个体，如当地政府有关部门、社区和一般公众（包括媒体）、竞争企业（包括中国本土企业）、供应商、作为消费者的顾客乃至尚不可见的后代等；在企业内部则有中国员工。他们都生活于中国的现实与传统文化之中，并受中国的社会、政治因素影响，有其共同和特殊的伦理价值观。德国跨国公司不是只要奉行本国法规就能取胜，而是要开展更开阔的跨文化交往，将公司的发展目标、经营理念和企业管理与社会责任同外部利益相关者沟通，平衡一些可能冲突的利益，求得利益与价值上的“交叠共识”（求同存异的共识），这样才能使自身在华得到生存与发展。

总的来说，德国跨国公司在中国较注重与外部利益相关者的跨文化交往，如2006年，巴斯夫在中国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首倡并发起了“1+3”企业社会责任项目，即以一家大企业带动三家合作企业，向供应链上

的三类伙伴（供应商、客户及物流服务供应商）传授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论和方法，制定具体的解决方案，并通过合作企业向利益相关方传播的辐射效应来促进供应链的共生共赢。巴斯夫的这个战略中体现了它的企业社会责任理念和利益相关者的理念。该公司在战略中纳入“确保可持续发展”和“带动供应链企业社会责任”的理念，并提出了“金蜜蜂”理念，强调企业在获得利润的同时，应对社会作出贡献，引导可持续发展。同时，它也意味着企业在创造价值的同时，要给予利益相关的企业回馈，从而实现利益圈的共同成长。<sup>⑫</sup>但个别公司也有缺乏和与之竞争的中国企业进行跨文化沟通从而发生纠纷的事件，较突出的是历时多年的博世—西门子公司在德国蓄意强抢注册海信商标，引起中国海信集团公司较大诉讼纠纷的事件。它历经多年，最终通过协商和解，但足可引以为训：市场竞争不是只求经济利益而毋庸考虑伦理秩序的纯商业行为，市场竞争如果不考虑利益相关者，必定变成恶性竞争，丢失长远利益；德国在华跨国公司必须顾及与之公平竞争的中国本土企业、媒体和公众，和这些利益相关者进行和平协商的跨文化对话，才能合理解决纠纷，达到互利共赢。<sup>⑬</sup>

⑫ 巴斯夫公司网页：[http://www.greater-china.basf.com/apex/GChina/GChina/zh\\_CN/content/BASF-China/1.4\\_Sustainability/1.4.7\\_1plus3/1plus\\_act](http://www.greater-china.basf.com/apex/GChina/GChina/zh_CN/content/BASF-China/1.4_Sustainability/1.4.7_1plus3/1plus_act)，及《巴斯夫：“1+3”企业社会责任项目》，载全球品牌网，<http://www.globrand.com/2011/521896.shtml>，2011年7月8日，最后访问时间为2012-1-16。

⑬ 关于此事件以下经过可参见“海信正式对外披露商标遭抢注的真相”。载慧聪网2005年2月24日，<http://info.homea.hc360.com/2005/02/241620248288.shtml>，最后访问时间为2006年12月，并参见徐会玲：“海信西门子之争急刹车 中国公司侥幸胜出”，载《经济观察报》2005年3月21日。转引自<http://finance.sina.com.cn/chanjing/b/20050312/09571424944.shtml>，最后访问时间为2013年4月。段军艳：《内幕：海信怎样说服西门子低价拿回商标》，载《经济观察报》2005年3月23日，转引自<http://www.techweb.com.cn/business/2005-03-23/2433.shtml>，最后访问时间为2006年12月。

简介此事件之始末：1993年以来，海信集团公司一直是中国电子百强的上榜企业。1998年以来，排名进入前十位，其电视机、空调机、电脑、手机等产品，一直是国家名牌产品，集团公司及其所属子公司的英文商号和产品的商标都是“HiSense”。1999年以前，“HiSense”商标已在40个国家和地区注册，在国际经营中欧洲、美国、澳洲、中东、南非、东盟等区域和国家已成为海信的重要战略市场。德国

就德国在华跨国公司内部利益相关者而言，中、德双方员工以各自的技术、管理和各种劳动作为人力资源投入企业，也是企业实际运作的实体所在，并为企业承担了风险。他们双方是来自不同国家的利益相关者，有着文化差异，包括伦理价值观念的差异。根据利益相关者原则，在企业内部的跨文化交往中尊重他们的权益，使中德员工文化上互为沟通，融会于企业的核心价值观，这对企业成败至为重要。在注重作为利益相关者的员工的利益上，西门子是一个较成功的范例。此公司一贯认为员工是公司的最大财富，注重选择与培养既有进取心、责任感、团队精神，又具有坚实的专业背景、熟练业务技能的人才，为员工的发展制定了一整套确实可行的措施；实施“员工综合发展计划”，为每一位员工制定了短期和长期发展规划，并通过技术和管理培训、工作轮换、国际交流、项目参与以及晋级、加薪等不同步骤加以实施。在该计划的实施过程中，公司人事部、

各部门经理和员工本人之间保持不断交流，以增加透明度，使员工清楚自己在公司的发展轨迹，同时公司和员工还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随时调整各自的努力目标。<sup>⑭</sup>成立于1997年10月的西门子管理学院就是为员工提供管理和职业培训的主要机构之一，该学院可以根据员工的不同需求，提供各种与专业及个人发展相关的培训，每年有超过6000人参加该学院举办的各种培训研讨会。<sup>⑮</sup>

#### 四、对话是利益相关者原则内在要求的伦理机制

对话是利益相关者原则内在要求的伦理机制，是德国在华跨国公司开展企业内外部跨文化交往、化解摩擦与冲突、达成共识的有效途径。《OECD跨国企业准则》就强调了“以良好经营行为的构成为主题的社会对话”。<sup>⑯</sup>中国的对外经济交往伦理奉行“和谐”原则，也主张通过对话而非激化矛盾的对抗来消弭

博世-西门子家用电器集团（下称BSH）是西门子的合资子公司，1994年进入中国后在无锡、南京、安徽设立分公司，总投资额高达6亿多美元，以两位数的年均增长速度发展，成为在华成功的跨国企业。“BOSCH”（博世）和“SIEMENS”（西门子）为该公司的主要商标。1999年1月5日，海信集团的“HiSense”、“海信”商标被中国国家工商总局商标局正式认定为驰名商标，6天后BSH在德国抢先注册了“HiSense”商标。2000年11月海信在德国提交商标注册时发现该商标已于1999年被BSH抢先注册，使海信集团在欧盟地区的商标注册一路受阻。2002年底开始，海信集团与BSH就此商标抢注和转让问题正式进行磋商。BSH竟要转让价格4000万欧元，来赚取高额经济利益。就在和谈过程中，BSH向德国科隆法院提起诉讼，使双方失去了和谈的基础。2005年2月24日通过中华商标协会发起声势浩大的“中国商标海外维权研讨会”，商务部、工商局、商标局等部门代表悉数到会。会上专家认为：抢注竞争对手商标，树起“市场篱笆”，正在成为一些国外企业设置贸易壁垒的一种重要手段；也违反了知识产权法的基本精神与原则，不应是以诚信为理念的企业所为。会后，媒体报道铺天盖地，舆论氛围使得BSH在中国面临空前的信任危机，而中国市场对于BSH是至关重要的。在中国商务部、中华商标协会与中国家用电器协会调解和欧盟驻华机构的介入下，BSH向海信声明表示愿意放弃之前的谈判立场，双方总裁重开和解谈判，终于在同年3月发表和解声明，BSH同意将其根据当地法律在德国及欧盟等所有地区注册的“HiSense”商标一并转给海信集团，转让价格低于4000万欧元，同时撤销针对海信的商标诉讼；声明表示“双方也愿意在此和解基础上，今后在相关业务领域积极寻求合作机会，加强友好合作，促进事业发展。”

⑭ 王志乐（主编）：《2004跨国公司在华报告》，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年，第242页。

⑮ 王志乐（主编）：《2002—2003跨国公司在华报告》，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3年，第224页。

⑯ 王志乐（主编）：《软竞争力——跨国公司的公司责任理念》，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年，第303页。

经贸方面的摩擦与冲突,处理好竞争与合作的关系,做到良性互动,互利共赢。当代德国主流经济伦理学家乌尔利希认为:合乎伦理的交往和作为话语交往的对话(Diskurs)是通达伦理与经济内在统一的途径,经济行为的所有相关者应当在这种交往中进行对话、交流观点和行动理由,在所有人平等的基础上进行理性论证,达成共识,从而在相关者之间调解利益冲突。对话伦理学的范式是他说的交往伦理的基本原则。<sup>①</sup>德国企业伦理学家的代表施泰因曼(Horst Steinmann)在吸取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的话语伦理学思想上也和乌尔利希一致,他主张:“企业伦理学着眼于经济行为合法性关系的目标”和“对话伦理的基本定向结合起来”,“是一种对话过程的方法论”,对话伦理学即和平伦理学,它“可以从程序上引导规范的发展”,形成“实质性规范”,体现在“行为守则”中,“用来规范某些孕育着冲突的行为领域”,其目标是“发展具有达成共识能力的企业战略”。它要求“论证各方在对话中达成合理理解”,那是一种“出自内心赞同才能展示其作用力”的“交往伦理”;它要求提供对话空间,通过企业文化促进对话,使企业成员成为具有伦理反思能力和对话能力的成员,领导则要善于从事对话的论证,树立实现合理交往的领导风格,以求最佳管理成效。<sup>②</sup>

德国在华跨国公司中已有公司开始发挥上述对话伦理机制,开展和企业内、外部利益相关者多种形式对话,在这种跨文化交往

中互相交流,获得信息,听取建议与意见,协商解决问题,以实现企业的和谐发展。世界化工巨头巴斯夫集团公司因化学工业污染危险大,特别重视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是世界上第一家在公司内部成立“可持续发展理事会”(Sustainability Council)的企业。公司本着“公开坦诚和信任”的原则处理和利益相关者的关系,专门设立问题管理部门,负责找出每个利益团体最关心的问题,专家组也定期调查公司和利益相关者的关系。更还设立由公司代表与当地居民代表组成的社区顾问组(Community Advisory Panel),负责和社区沟通,定期召开会议,讨论污染物排放、工厂安全、如出现问题的应急措施等等主题。巴斯夫已有60多个社区顾问组在开展与利益相关者的对话,取得好成效。<sup>③</sup>同时,巴斯夫生产基地(Verbund)也和当地政府、社区、医院、学校、消防队以及邻近工厂对话、沟通、合作,制定紧急响应计划并就该计划进行讨论,提倡邻近企业之间的互助。位于上海化学工业区的巴斯夫生产基地(如SBPC、SLIC和BACH)联合化工区其他公司,组织周边奉贤和金山两区的地方政府和社区群众及化工区政府召开社区交流会,共同就所关心的环保、安全和促进地方经济、增加就业问题交换意见。会后,这些公司开展化工区及周边社区空气质量监测行动,特别在居民区增设了监测点。<sup>④</sup>

以医药保健、作物科学和材料科技为主要业务的拜耳公司注重发挥媒体在和公众对

① 姚燕:《从分离到整合——彼得·乌尔利希的整合性经济伦理学述评》,载《哲学动态》,2006年第5期,第53—59页。

② 施泰因曼,霍尔斯特/勒尔,阿尔伯特:《企业伦理学基础》,李兆雄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第59、65、66、83页。

③ 蒋冬冬,王倩:《巴斯夫:常青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之道》,引王志乐(主编):《软竞争力——跨国公司的公司责任理念》,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年,第87—100页。

④ 巴斯夫公司网页:[http://www.greater-china.basf.com/apex/GChina/GChina/zh\\_CN/content/BASF-China/1.4\\_Sustainability/1.4.7\\_1plus3/1plus\\_act](http://www.greater-china.basf.com/apex/GChina/GChina/zh_CN/content/BASF-China/1.4_Sustainability/1.4.7_1plus3/1plus_act),最后访问时间为2012-1-16。

话中的作用,开设“拜耳-健康生活”中文广播节目,就医药保健及生活质量主题和公众交流与对话,每周一次在北京、上海及其他主要城市播出;2004年公司还和清华大学启动“拜耳-清华公共健康与艾滋病媒体研究室计划”,研究室吸收媒体从业成员及有关专家,致力于报道、讨论有关艾滋病、其他慢性病和健康问题,从而建立全国性的交流与对话平台。<sup>①</sup>

在跨国企业内部偕同员工开展充分有效的对话式交流沟通,西门子公司将其称为“CPD”(Comprehensive Personnel Development)流程,是全年持续不断的交流过程,由CPD圆桌会议和CPD员工对话两部分组成。CPD圆桌会议每年举行一次,参与者为中高级经理和人力资源顾问,以谈心式对话预测公司团队和重点员工的潜能,回顾一年业绩,制定具体的管理本土化和全球化有效融合的措施。CPD员工对话则随时进行,由经理和员工直接进行,事先有问卷调查等准备,年终

填写的“CPD员工对话表格”汇总成为圆桌会议的重要参考。员工对话内容开阔,如员工职能及责任范围,业绩回顾与预测,员工对自身职业发展的看法,员工的意见、要求包括企业能为员工发展提供的条件,双方共同商定员工职业发展的措施等。这种制度化的对话伦理机制,保证了西门子公司稳健管理和员工业务发展的利益。<sup>②</sup>

综上所述,利益相关者理论虽然还有待完善、发展,但它强调在经济活动中不单纯追逐经济利益,而要顾及与经济活动有关、受其影响的各方利益,在对话中找到一条各方接受的“中道”,这是符合伦理治理的企业经营之道。这既适用于同一国家和文化中的经济活动,也适用于跨文化的经济交往和其他交往活动。特别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各国利益密切相关,其间的“交互性”关系必须被纳入一切考量之中,利益相关者理念正是强调了这种交互性关系,是贯通跨文化经济交往的一条基本伦理原则。

作者简介:姚燕,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系副教授,博士。

<sup>①</sup> 王倩:《拜耳可持续发展的三大支柱》,第111页,引王志乐(主编):《软竞争力——跨国公司的公司责任理念》,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年,第101—103页。

<sup>②</sup> 王志乐(主编):《2002/2003跨国公司在中国投资报告》,引《西门子在中国的投资》,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3年,第224—225页。

# 剖析德国在欧债危机中能独善其身的原因

关海霞

**【摘要】**欧洲债务危机的风暴愈刮愈烈，其所带来的影响也越来越广。欧盟峰会在2011年10月的首脑会议上，就扩大救助机制“欧洲金融稳定基金”（EFSF）达成了一致，将救助规模扩大到1万亿欧元。作为欧盟经济领头羊的德国积极参加了救助计划。虽然整个欧洲都笼罩在债务危机的阴影之下，但是德国的经济连续几年都实现了增长，2011年预计增长3%。劳动力市场也表现抢眼，失业人数进一步下降。为什么德国到目前为止，还未被卷入债务危机？究其原因，最根本的是德国政府十年来对经济进行的持续改革。同时，德国政府在上一轮金融危机中实施的对德国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及时而恰当的救助措施，也提高了德国经济的抗风险能力。

**【关键词】**欧债危机 德国 经济改革 整固财政

## 一、前言

2008年，一场自美国爆发的次贷危机导致全球各国经历了金融风暴的洗礼，全球金融市场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不少商业银行、投资银行纷纷破产或重组。但是这场猛烈的金融风暴不仅波及金融市场，而且也影响到了各国的实体经济。2009年，全球各国经济不同程度地陷入了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最大衰退。因此2009年也就成为了经济危机之年。为了应对经济危机，阻止本国经济陷入衰退，各国都不同程度采取了宽松的财政政策和积极的货币政策，政府大举借债，拉动投资，刺激消费，因此，这一场金融海啸可以说是让全球各国“负债累累”，政府财政赤字急速攀升，公共债务也屡创新高。到

2009年底，全球不少国家相继爆发主权债务危机，债务风暴呈巨浪来袭之势，而这其中最严重的就是来自希腊主权债务危机开始的欧洲债务危机。

如今，在欧元区，从希腊开始的债务问题正逐步扩散，越来越多的欧元区国家卷入其中，已经发展成为对欧元区和欧元这个货币的信任危机。它不仅波及了整个欧元区的稳定，也给正处于缓慢复苏的欧洲经济蒙上了一层阴影。2011年10月26日，欧洲理事会就拯救方案形成了一揽子决议：EFSF通过杠杆扩充至1万亿欧元；银行业重组，将银行的核心资本率提高到9%；希腊债务减记50%；意大利财政改革。这些决议在原则上来说，并没有问题，路子是对的，但是政策上的东西，短时间内很难让人体会出其意

义，所以也只能在短期内起到平复金融市场的作用。

现今，在整个欧元区，随着希腊爆发的债务危机波及面越来越大，市场对银行业的信任也正逐渐丧失，银行间交易市场越来越枯萎。曾经被资本市场认为最安全的主权债务，如今沦落为被投资者纷纷抛弃的对象。随着债务危机的加深，欧元区各国的政府也频现更替现象，反过来这又加大了市场的怀疑，人们对政治家们所采取的措施和行为也越来越不信任，大家怀疑政府是否能完成巩固财政的任务，减少赤字和债务，完成既定的目标。这一切无疑对欧债危机雪上加霜。

在欧洲许多国家，巩固公共财政也陷入了两难的境地：一方面现在巩固公共财政需要采取必要的紧缩财政政策，而另一方面这又会进一步加剧经济的衰退。如今的货币联盟陷入了一个由债务危机和银行业危机交织的恶性循环中。正如德国复兴信贷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Norbert Irsch 所说，“欧洲的危机乃是政治危机、主权债务危机、银行危机、竞争力危机的复合体。”

虽然整个欧洲经济不景气，复苏缓慢，但是作为欧盟经济领头羊的德国，经济形势确实大好，从而也拉动了整个欧盟和欧元区经济的缓慢增长。因此，本文将通过分析德国经济的表现，研究德国经济表现抢眼的原因，并展望未来的发展。

## 二、债务危机中的德国经济

自债务危机爆发以来，作为欧盟经济火车头的德国，其经济一直有着不俗的表现，在债务危机救助中，也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这一点尤其表现在 2011 年。

### 1. 2011、2012 年德国经济的总体表现（括号内为 2011 年的数据）<sup>①</sup>

-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0.8%（3%）
- 出口增长 3.9%（7.8%），进口增长 2.5%（7.1%）
- 就业达 41,569 人（41,090）人，失业率 6.8%（7.1%）
- 消费价格上涨 2.0%（2.3%）
- 财政略有余额，01%（-1.1%），但国债下降微乎其微，仍高达 80% 以上（81.7%）

### 2. 债务危机中的德国银行业

欧债危机期间，整个欧洲的银行业遭遇巨大的信任危机。这对于金融业来说，信任的丧失是其面临的最大的挑战。尽管如此，根据德国中央银行发布的报告，德国金融体系在过去几年里，表现良好。银行的自有资本投资进一步提高和改善，资本化明显提高，盈亏情况稳定。2008 年初到 2011 年夏，13 家从事跨国金融业务的德国银行根据目前的《巴塞尔 II 协议》，将其核心资本额从 8.1% 提高到 13.1%；根据资产负债总额和核心资本的比率计算，负债额度显著下降；风险资产也有所回落。这样一来，对自有资本的需求减少了近 30%。于是，德国银行业通过提高自身抗风险能力，对危机显得更有抵抗力了，对于再融资过程中出现问题的免疫力也得到了改善。

但是，随着欧债危机影响面的逐渐扩大，由它直接和间接的影响产生的压力将进一步挤压金融机构的收益空间。根据欧盟峰会达成的协议，希腊的债务被大幅度减记，这将会给德国银行业带来不小的压力。一旦意大利债务危机升级，势必对欧洲经济尤其是金融业产生难以估量的负面影响，作为欧

<sup>①</sup> “Jahreswirtschaftsbericht 2012/2013”。

盟经济领头羊的德国，其银行业也难免不受影响。

目前，德国银行业面临的主要困难是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欧债危机的困扰。德国必须对其拥有的希腊等债务国国债做资产减记处理。二是世界经济的大环境不好，复苏前景不是很明朗。这对于外向型经济的德国来说，经济前景并不乐观。三是欧洲央行坚持的低利率政策以及较高的全球流动性。低利率政策就意味着存在中期通货膨胀的风险。德国央行认为，本国银行业的经营成绩不容乐观。<sup>②</sup>四是德国银行在金融危机中的旧疾还没有完全解决，即银行拥有企业的不动产和债券。

德国央行指出，来自希腊、爱尔兰和葡萄牙的风险总体上可控制，而从欧盟第三大和第四大经济体意大利和西班牙未收回的款项数额更大。德国银行业和保险业拥有近420亿欧元的国债，230亿欧元的西班牙国债，此外它们还拥有两国银行的大量欠款。

### 三、德国经济至今没有深度卷入欧债危机的原因

#### 1. 德国持续的社会经济改革

2008年，源于美国次贷危机的世界经济危机暴露了英美“盎格鲁-撒克逊”经济模式自由竞争体系的缺陷。始于2009年的欧洲债务危机，又让人看到了高福利体制的不足。

而德国在这期间却表现出社会稳定、出口强劲、财力充足等显著优势，这不得不归功于德国持续的社会经济改革。

十几年前的德国，是一个重病缠身的经济大国。美国学者认为，这是由于德国长久奉行高福利制度造成的，把它称之为“德国病”。其具体表现为“五高两低一结构”：高失业、高福利、高劳动成本、高国债、高税收和低投资率、低增长和结构问题。这些导致德国企业成本居高不下，大批制造业企业迁出德国，外来投资疲软，收支失衡也给政府带来巨大压力。<sup>③</sup>1998年，施罗德总理上台，他制定的《2010年议程》改革计划几乎涵盖了社会各个方面，主要措施包括：<sup>④</sup>通过降低税率增加个人和企业的收入，以刺激消费和投资；改革失业保险和救济制度，逐年削减失业者的救济金并加强再就业培训；推迟、甚至暂时冻结退休养老金的增加等等。除此之外，施罗德时期，德国政府还加大了教育和科研投资，以进一步提高劳动生产率。2005年后的大联合政府，总理默克尔推出了“整固、改革、投资”三和弦，突出了财政整治，此后，债务和赤字就不断下降。同时默克尔还坚持了《2010年议程》的改革思路，在削减企业负担等方面不断推出新政，提高劳动生产率。比如在劳动力市场，不管是施罗德，还是默克尔，都致力于改革高福利、降低失业率、提高劳动效率，同时保障工人与雇主间的公平，都将推动就业作为政策的核心目标，而促进经济

② 胡小兵：《德国银行业采取措施应对欧债危机挑战》，载<http://finance.people.com.cn/bank/GB/16253969.html>，2011，最后访问时间为2011-12-5。

③ 今时今日，这些问题仍存在于许多“老欧洲”国家。南欧国家的以上问题还在日益严重：希腊债务问题缠身，葡萄牙薪资制度僵化，西班牙失业现象严重，意大利缺乏熟练工人，法国也处于对产业外移的恐惧阶段。这些国家现在也正是欧债危机发展最严重的地区。

④ 郇公第：《欧债危机中德国何以独善其身》，载[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0-04/28/c\\_1260994.htm](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0-04/28/c_1260994.htm)，2010，最后访问时间为2011-12-4。

增长也只是增加就业的手段之一。在劳动市场和福利制度方面，施罗德进行了强力改革，着重降低失业保障，同时为愿意工作的人提供培训和支持等。默克尔政府在保持这些的同时，继续推行“小微工作”和“短工”等新的工作形式和福利形式。即便在经济危机和债务危机中，德国的就业率也是欧盟的佼佼者。

“十年树木”，德国两届政府十年改革的成效，在当前经济危机和债务危机的背景下逐步显现。如今，虽然经历了全球金融危机，又面临欧洲债务危机的困扰，与其他欧元区经济体不同的是德国经济在经历了短暂的低迷后，一直保持着复苏的势头。十多年前的“病人”现已成为当前欧洲经济的发动机和稳定器。

因此，十多年来德国政府及时并持续运行的社会经济改革是这次德国没有深度卷入债务危机、经济得以迅速恢复的根本原因。这也说明，南欧各国要想从根本上摆脱债务危机，仅靠外部的救助是不够的，最重要的是要及时进行有效的经济改革。德国经济过去十多年走过的路可为这些国家提供很好的借鉴。

## 2. 拯救金融危机措施得当

德国至今没有深度卷入债务危机，还要归功于上一轮金融危机时期，德国政府迅速而果敢出台了有效的金融救市和经济刺激方案，社会各界积极参与救助，给德国经济的恢复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内部环境。

在金融危机爆发后，德国政府先救虚拟经济，并一改往日“行动迟缓”的形象，迅速果断地对本国的银行业进行救助，以避免金融市场流动性的枯竭以及银行间业务的往来中断，稳定德国金融市场。德国政府推出了一套规模达到近 5000 亿欧元金融救市计划，以稳定陷入危机的金融市场。除德国政

府外，州政府也积极参与银行的救助。因为，德国州政府既是公共管理机构，也是众多德国州立银行股权的持有者，他们也不希望看到相关的州立银行破产。从银行本身来看，当时面临危机的银行积极面对，保持乐观态度；若干大银行积极开展或酝酿并购重组。从行业层面上，行业协会在救助中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德国储蓄银行及票据清算协会（DSGV）既是行业协会，其地方分会也是其中部分州银行的股东。同时该会还是储蓄银行存款保障体系的载体，负责管理储蓄银行扶持基金、州级扶持基金、保障性储备。在危机应对中，DSGV 发挥了重要的管理和协调作用。

这一切，在稳定金融市场的同时，也保障了资本市场的流动性，抑制了资本市场的恐慌。虽然各银行的股价有所下跌，但是在德国金融市场上并没有出现大规模银行挤兑情况，保证了经济的正常运转。

在逐步稳定金融市场的同时，德国政府也对实体经济进行救助。德国是一个以实体经济发展为主的国家，而且经济发展具有明显的外向性，也就是说，德国对外经济发展的依赖程度较高。因此，上一轮金融危机对德国实体经济的冲击比较大，其主要支柱产业，比如汽车制造业、钢铁业和机械制造业的经营业绩大规模下滑，几乎处于停滞状态。为了防止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造成更严重的威胁，德国政府连续出台了两个经济刺激计划，以促进增长，保障就业，维护稳定。但两套经济刺激计划方案的数额加起来，也只不过 820 亿欧元。这相对于美国的 7890 亿美元和中国的 4 万亿元的经济刺激计划，真的可以算是“小手笔”了。可是，从现在债务危机的角度来看，我们不得不佩服德国人的聪明。现在不仅欧洲经历着债务危机的痛苦，其实整个世界经济都在面临债务危机的困扰。其根本原因，就是在前一轮的金融危机中，

采取了过于宽松的财政政策，导致流动性增加得太多，国家债务也剧增。可以说，这场债务危机是上一轮金融危机的延续，是其附属品。

德国的 820 亿欧元的经济刺激规模，虽然不大，但是有效刺激了国内经济的发展，私人消费和投资都逐步增长，失业率也是稳中有降。这为德国经济的回暖提供了动力。从 2009 年下半年开始，德国经济开始逐步回升，慢慢复苏。同时，820 亿欧元的规模，可以说是新增流动性不大。与此同时，在经济逐步复苏时，德国政府并没有像其他国家那样，进一步扩大经济刺激计划，反而开始实施退出战略，逐步实行紧缩的财政政策，巩固财政，平衡收支，逐步减少赤字和债务。因此，在欧元区许多国家都陷入债务危机的时候，德国的债务虽然也超过了《稳定和增长公约》所规定的 60%，达到了 80% 以上，但经过了两年恢复，德国的财政运行良好，让资本投机者无机可乘，其债务还是在德国可以控制的范围之内的。

### 3. 德国银行业相对保守，虚拟经济在金融危机中受冲击不大

德国银行业相对保守，虚拟经济不是德国经济发展的原动力，这也使得德国的金融领域，尤其是银行业在欧债危机中能保持相对的稳定。

与美、英等国比较起来，德国算不上是一个金融业很发达的国家。在德国，实体经济的发展程度要远远超过其虚拟经济。从业务上看，德国的银行体系主要可以分为两大类：综合性银行和专业性银行。综合性银行又可以进一步划分为商业银行、储蓄银行和信用合作银行三大类。德国的商业银行又分为综合银行、专业银行和其他银行性金融机构。综合银行，顾名思义，就是可以经营多种业务，从个人储蓄，借贷，到经营有价证

券、客户理财以及保险业务等，是一种全能型银行；而专业银行就只能从事其营业许可证所规定的特定金融业务，比如存款、贷款或证券等。其他银行性金融机构主要包括投资公司、住房储蓄银行、担保银行。

从管理上看，德国银行体系又被称为“三支柱架构”：德国银行的主体部分由私人银行、公立银行（州立银行和储蓄银行）和信用合作银行组成。

从业务属性看，德国在银行管理上实行混业经营，理论上所有银行都可以成为全能银行，同时经营商业信贷、投资。事实上大部分德国银行现在也是这么做的。只是就储蓄银行而言，其核心主体业务都是传统商业信贷。

目前，德国有 2277 家信贷机构，数量在欧盟当中位居前列，但网点分布的密度则处于中游。从规模上看，私人银行和州立银行中的某些，比如德意志银行（Deutsche Bank）已经成为银行巨头，拥有国际业务；在德国银行体系中，主体是储蓄银行和信用合作银行。这些银行主要由大量中小银行构成，占到了德国银行体系的 70% 以上。这些储蓄银行通常只经营传统的存信贷业务，并不深度涉足其他金融业务范围。在外人看来，德国的银行体系是相对保守的。而恰恰是这种相对保守的体系，使得德国银行体系在上一轮的金融危机中与美国、冰岛和英国等国相比，受到的冲击不大。而受到冲击的德国商业银行，包括私人银行，比如德国工业信贷银行、德累斯顿银行等和一些州立银行，比如萨克森州立银行，其亏损主要来自投行业务和资产减记，也有少部分来自坏账准备增加。整个受损失规模大概在 3000 亿欧元左右。但是，在危机期间，整个德国商业存贷业务仍正常进行，部分银行还有增长。在危机发生后，各银行都力图克服困难，避免破产。德国政府也积极及时地展开救助，实施了近

5000 亿欧元的金融救市计划。

此外，德国存款保险体系健全，保险额高，并拥有严格的信贷监管机制。

由于德国银行业在前一轮金融危机中并没有受到严重的损害，通过各方救助，元气恢复得比较快。同时，通过这几年的发展，德国各银行也提高了抗风险的能力，因此，债务危机来临的时候，德国的金融市场相当稳定。

#### 4. 德国外贸和内需两旺

德国经济发展良好，也加强了德国抵御债务危机影响的能力。债务危机对德国实体经济几乎没有产生重大影响，出口、内需两旺。私人消费提高，企业对机械和设备领域的投资活跃。由于欧元区一些国家出现资金支付难问题，因此，德国对投资者更加具有吸引力。

#### 5. 新债务法规的实施

为了尽快降低国家年度预算赤字和公共总债务，2009 年 6 月，联邦参议院通过了德国联邦和各州政府制定的《新债务法规》，并将其写入联邦基本法。根据新债务法规，政府应大力削减国债和赤字。要求联邦政府从 2016 年开始每年新增国债不得超过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 0.35%；联邦各州更是从 2020 年开始就不得举借新的债务。德国政府这样做的目的是让人看到德国政府决心整肃财政纪律的明确信号，增强拓宽市场的信心。

这一法规，也给德国进一步实施紧缩的财政政策、稳固财政、抵御债务危机提供了法律保障。

## 四、结束语

从目前形势来看，德国经济发展平稳，至今还没有受到欧债危机的重大影响。但是，其经济发展前景却不容乐观。

首先，整个世界经济发展继续低迷，这势必会影响德国的出口，而对外经济的稳定发展，一度是德国经济增长的支柱。由于受债务危机影响的国家都被迫实行紧缩的财政政策，而这些国家都是德国出口的主要地区，因此 2012 年，德国的出口增长便降到了 3.9%，于是只能靠国内需求来带动，国内生产总值只增长了 0.8%。

因此，为了避免深度卷入债务危机，德国应积极参加危机援助计划。救助这些卷入危机中的国家，也是在救自己。欧盟经济高度一体化，欧元区各国的经济相互依存度高，同时，欧元区的国家也是德国出口的主要地区。一旦欧洲经贸联盟解体，德国乃至欧洲都将付出沉重的代价。此外，据柏林世界经济研究所国际宏观经济研究室主任安斯加尔·贝尔克估计，如果希腊成功推动经济增长，加之政府未来五年内通过国有资产私有化获得 500 亿欧元资金，希腊到 2015 年就能偿还全部贷款和利息。如果爱尔兰和葡萄牙也同样能够清偿全部贷款和债务的话，那么德国将从救助贷款中额外获得利息收益 55 亿欧元。<sup>⑤</sup>

其次，德国政府要进一步巩固财政，缩减赤字，降低债务，提高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同时也为欧元区其他财政纪律松散、处于危机边缘的国家提供示范作用。因为，救助并不能治本，要想充分摆脱债务危机，欧元区各国必须厉行节约，降低财政赤字和公

<sup>⑤</sup> 胡小兵：《欧洲债务危机愈演愈烈，德国如何施救不伤己》，载 <http://www.chinanews.com/cj/> 2011/08-14/3256360.shtml, 2011, 最后访问时间为 2011-12-06。

共债务负担。如果大环境好转，再加上自身经济的发展，那么德国被拖入深度债务危机的可能性也会降低。

第三，加强研发投入和创新，开发新的经济增长点，在全球化中，提高经济的竞争力。德国经济乃至欧洲经济增长缓慢，主要是经济的创新发展不足。在联邦政府 2015 年的财政计划中，重点除了减少新债务外，就是加大对未来领域的投资，如能源、教育和研究，以达到经济增长。

总之，欧洲债务危机的中长期风险仍然存在，能不能继续抗衡债务危机，一方面取决于德国本身经济的发展和是否能保持一个

稳固的公共财政，降低公共债务和赤字；另一方面也取决于整个欧洲甚至世界经济大环境。欧元区国家，不管是已经受到债务危机冲击的国家，还是尚未受到深度冲击的国家，今后大多会采取紧缩的财政政策，这可能会影响到欧元区和与欧元区有着密切贸易关系的国家和地区经济的复苏和发展。德国不是一个孤岛，其经济的发展离不开世界经济的大环境，经济增长与国际环境变化密切相关。

为了应对债务危机，德国经济面临着许多已知和未知的挑战，德国政府在制定经济政策方面还任重而道远。

作者简介：关海霞，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系讲师，博士研究生。

# 经济全球化对德国社会福利国家的影响

徐四季

【摘要】经济全球化对德国社会福利国家的影响是深远的，它打破了其传统的资本-劳动-国家间相对稳定的三角关系。社会福利国家原本是调节国内资本和劳动利益冲突的有效工具。但经济全球化意味着资本能够轻易摆脱特定国家的监控，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自主选择劳动力，具有越来越强势的地位；相反，劳动相对于资本的交易权利正在不断弱化，国家对宏观经济的调控能力和提供社会保障的政治功能也受到了极大的限制。以联邦德国为例，资本外流造成了日益严重的就业问题，国民收入的分配日益向资本收入倾斜，而社会福利国家亟待适应新的形势。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 社会福利国家 资本-劳动-国家的三角关系

冷战结束之后，随着新技术革命的兴起和市场经济的全球扩张，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不断加快和深入，如今已成为世界各国必须要面对的一个现实。“由于全球资本为追逐利润而四处流动，政府保障公民的生活能力大大降低了。跨国公司能够在全世界范围转移投资和资源，致使各国政府产生了一点不安全感，也使它们管理宏观经济政策的能力陷入了困境。现代福利国家尤其如此，因为它要依靠国家来解决各种社会经济问题。就其本质而言，原有的福利国家是一种调节国内资本与劳动利益冲突的有效工具。由于全球化的种种力量使天平倾向了资本，那种为民主福利国家提供强大支持的社会政治联盟也

就变得越来越难以为继了。”<sup>①</sup>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德国的社会福利国家制度也亟待适应新的形势。本文将从资本-劳动-国家的三角关系出发，重点分析经济全球化对德国社会福利国家的严峻考验。

## 一、对经济全球化的认识

在分析经济全球化对德国社会福利国家的挑战之前，首先有必要澄清对经济全球化的几点认识。

第一，尽管“经济全球化”这一概念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才为学术界所普遍接受的，但经济全球化并不是一个全新的过程，

<sup>①</sup> 舒尔茨，布里吉特·H：《全球化、统一和德国福利国家》，载《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2001年，第1期，第43—54页。

其萌芽至少可以追溯到资本主义发展早期。<sup>②</sup>

如果将经济全球理解解为经济资源（如资本、商品和劳动力）的国际化，那么这一过程是伴随着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开辟和国际劳动分工的发展而逐步产生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曾清晰地描述了这一现象：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

实际上，资本和商品流动的国际化贯穿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整个发展过程。这一点是由资本的扩张本性决定的：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驱动下，资产阶级总是在可能的最大范围内寻求最佳的投资场所和商品销售市场。当然，这种早期的萌芽状态同当今的经济全球化趋势不可同日而语。

第二，当今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受到了两大因素的推动：一是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的新技术革命；二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各国政府推行的新自由主义政策。<sup>③</sup>

德国学者于尔根·弗里德里希斯在《全球化——概念与基本设想》一文中指出：“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技术进步推动的。借助现代信息技术——从卫星信息传送到国际互连网络和内部网络——人们今天可以向任何地方传送信息。在各公司企业之间和一个公司企业内部都可以进行这样一种交往联系，它使人们可以进行控制监督，使得物质传送——例如文件——

成为不必要，还可以对于股市行情迅速进行反应，使转移服务变得十分简单，而且还能消除时差。”<sup>④</sup>应该说，新技术革命使世界不仅在地理意义上，而且在经济意义上大为缩小了。

此外，经济全球化也并不是科学与经济进步带来的一种自然而然的发展进程。“这种全球一体化是伴随一种经济政治的神圣学说的崛起同时发生的。……它就是新自由主义。……从这种经济学说的主要代表，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米尔顿·弗里德曼的思想出发，获得多数派地位的西方经济自由派政府在80年代就把这种教条提升为自己政策的准则。放松控制取代国家监控，贸易与资本流通自由化，国有企业的私有化，这些都是迷信市场的各国政府及其控制的国际组织，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武器库中的战略武器。借助这些武器，他们进行了捍卫资本自由的斗争。”<sup>⑤</sup>正是这种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在客观上推动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

第三，对“经济全球化”这个概念，学者们所下的定义各有不同，但对其一般特征，争议不大。经济全球化是指资本、技术、劳务、商品等各种经济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和统一配置，包括生产、技术、金融、贸易全球化等，使得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之间形成一种更加直接和紧密的内在联系。<sup>⑥</sup>具体来讲，经济全球化体现在全球化的国际贸易、全球化的金融交易和跨国公司的全球化经营战略这三个方面。

② 高彭怀：《历史比较中的社会福利国家模式》，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4年，第129页。

③ 张世鹏：《二十世纪末西欧资本主义研究》，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3年，第122—123页。

④ 同上，第123页。

⑤ 马丁，汉斯·彼得/舒曼，哈拉尔特：《全球化陷阱——对民主和福利的进攻》，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第7—8页。

⑥ 冯英华，戴启秀：《经济全球化对欧洲福利国家的挑战——以德国为例》，载《国际观察》，2005年，第3期，第66—72页。

## 二、经济全球化对德国社会福利国家的影响

经济全球化对德国社会福利国家的影响是深远的，它打破了其传统的资本-劳动-国家间相对稳定的三角关系。“就资本而言，在经济全球化资本自由流动的条件下，如果国内政策威胁到资本利益，它可以马上转移。由于德国国内企业获利欠佳，同时也为了巩固和加强德国大公司在国外的市场竞争地位，德国资本大量外流。而流失资本等于流失繁荣、流失福利、流失就业。在劳动方面，与战后的‘黄金’年代（20世纪50—60年代）相比，经济全球化、快速的技术更新、后福特主义和广泛实行自由市场政策所带来的最终结果就是弱化了劳动的交易权利，使雇员承担起失业的风险和工作条件变化的压力，增加了生活的不安定感，工资增长普遍减缓。在政府方面，为了留住本国资本，吸引外国资本，各国竞相进行‘减税竞争’，德国也不可能置身局外。这意味着极大地限制了政府利用财税政策调节收入分配、提供社会保障的能力，也使社会福利制度面临不可抗拒的巨大改革压力。”<sup>⑦</sup>

### 1. 资本的强势和国家的弱势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资本能够在一定的制度框架内实现其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资本的强势地位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资本市场的国际化使每一个经济主体都能轻易地使其资本摆脱特定国家的监控，并利用可能的区位优势（如低税负）；跨国公司可以在全球范围内自由选择投资地点，最大限度地降低成本、扩大赢利。其次，资

本持有人的地位明显提高，“股东价值”，即股东的赢利前景，成为投资决策的首要标准；资本筹集和运作机构（如投资基金）的重要性日益提高。第三，“非实物”的货币资本本身获得了新的力量：全世界98%的金融交易受投机利益驱动，与商品交易和实体投资无关；国际外汇投机的规模已经大到了足以操纵所有国家货币的程度，这意味着国际金融专家对有关国家的经济实力及其政府执行经济政策纪律的评价，会对汇率变化产生影响。<sup>⑧</sup>

相反，面对经济全球化，国家对宏观经济的调控能力正在减弱。以联邦德国为例，目前其货币政策已经让渡给欧洲中央银行，而且即便是欧央行也不能完全自主地根据市场状况控制欧元的利率和汇率水平，因为一旦它擅自降低利率，资本立刻就会从欧元区流向那些可能提供高收益的国家和地区。与此同时，财政政策的自由度也明显减小，除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对国家债务、财政赤字和通货膨胀的限制之外，全球性的“税务竞争”使国家损失了大量的财政收入。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各国政府竞相降低企业税税率来吸引投资；联邦德国也不例外，德国企业税税率从1995年的59%降至2009年的29.44%，近30个百分点的降幅明显高于同期世界和欧盟企业税税率下调的平均幅度（参见表1、图1）。尽管如此，当前德国的企业税税率依然高于世界和欧盟的平均水平，即25.51%和23.22%，由此可见德国在全球“税务竞争”中面临的巨大压力。财政能力的降低使国家在实施社会福利政策中处于极其被动的地位。

<sup>⑦</sup> 裘元伦：《德国社会的收入分配及其对社会福利政策的影响》，载《求是》，2005年，第12期，第58—60页。

<sup>⑧</sup> 考夫曼，弗兰茨-克萨韦尔：《社会福利国家面临的挑战》，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107—109页。

表 1：1995—2009 年国际企业税税率比较（单位：%）

	世界	经合组织	亚太地区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	美国	欧盟	德国
1995	-	37.70	-	34.00	40.00	37.90	59.00
1996	-	37.70	-	34.00	40.00	38.00	59.00
1997	-	36.00	32.60	29.80	40.00	35.50	57.50
1998	-	35.70	32.40	30.10	40.00	35.10	56.60
1999	32.69	35.00	31.67	28.82	40.00	34.12	52.30
2000	32.36	33.90	31.44	30.09	40.00	32.83	51.60
2001	31.49	32.80	31.29	29.82	40.00	31.05	38.36
2002	30.72	31.39	31.52	29.91	40.00	30.00	38.36
2003	29.53	30.90	30.34	30.05	40.00	28.81	39.58
2004	28.75	29.75	30.37	29.82	40.00	27.47	38.29
2005	28.01	28.80	29.09	28.64	40.00	25.34	38.31
2006	27.47	28.16	29.09	27.64	40.00	25.01	38.34
2007	27.12	27.69	29.18	27.45	40.00	24.22	38.36
2008	25.84	26.56	28.43	26.91	40.00	23.22	29.51
2009	25.51	26.30	27.49	26.91	40.00	23.22	29.44

数据来源：KPMG: *Corporate and Indirect Tax Rate Survey 2007 and 200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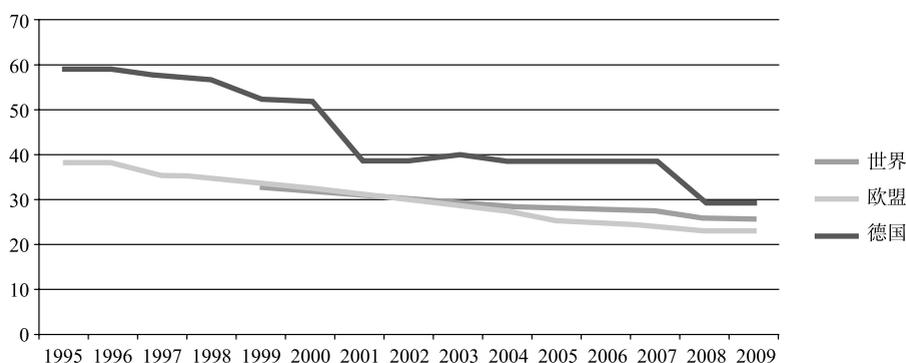


图 1：1995—1999 年德国、欧盟和世界企业税税率比较（单位：%）

数据来源：KPMG: *Corporate and Indirect Tax Rate Survey 2007 and 2009*。

## 2. 资本的强势和劳动的弱势

经济全球化意味着资本可以在世界范围内自由选择不同国籍、不同技能和不同薪资要求的劳动力。而且，全球化时代是一个把经济增长建立在广泛推行知识密集型生产与服务、实行自动化并大量削减劳动岗位基础

之上的新经济时代。因此，在资本和劳动的新时代角逐当中，资本明显处于强势，而劳动则处于弱势。这样的力量对比突出表现在劳动力供给匹配和劳资谈判当中；对于社会福利国家而言，这意味着日益严重的就业问题和收入分配问题。

1) 日益严重的就业问题

按照德国社会学家乌尔利希·贝克的观点, 新经济时代全球资本的新劳动生产率法则是: “数量越来越少的、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可以在全球范围内流动的人们却可以创造出越来越多的效益和服务。经济增长不再保证失业率的减少, 而是相反, 要以劳动岗位的减少为前提——这就是高失业率的生长。”<sup>⑨</sup> 对于联邦德国这样的发达工业国家, 日益严重的失业问题至少有一部分是由于资本外流引起的——大型企业将生产、甚至是研发基地转移到拥有大量廉价劳动力的发展中国家, 德国本土的劳动岗位不断遭到削减, 其中低技能劳动者和传统工业行业首当其冲。

德国联邦统计局的一项调查表明, 2001—2006年间, 由于经济活动的外移, 100人以上的企业在德国本土削减了共计约 188,600 个劳动岗位; 同期, 这些企业在德国本土创造了约 105,500 个新的劳动岗位, 相当于岗位削减数的 56% (参见表 2)。总体看来, 经济全

球化, 特别是跨国公司的全球化经营战略对德国本土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是负面的。但是, 受到冲击的主要是低技能劳动岗位和传统工业行业。第一, 从岗位削减数来看, 高技能劳动岗位 (63,283 个) 仅相当于低技能劳动岗位 (125,351) 的一半左右; 第二, 从新增岗位的情况看, 新增的 59,310 个高技能劳动岗位能替代 94% 的被削减的同类岗位, 而新增的 46,183 个低技能劳动岗位仅能替代 37% 的被削减的同类岗位; 第三, 相对于服务领域 (51,359 个和 69%), 工业领域劳动岗位的削减数 (136,748 个) 要多得多, 而新增岗位对被削减岗位的替代率 (50%) 要低得多; 第四, 对于服务领域的高技能劳动岗位, 新增的岗位 (21,208 个) 要多于被削减的岗位 (20,770 个), 特别是在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中, 新增岗位对被削减岗位的替代率甚至达到了 121%, 也就是说, 经济全球化对德国这些局部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是正面的 (参见表 2)。

表 2 : 2001—2006 年德国企业经济活动外移对本土劳动岗位的影响

	高技能劳动岗位		
	削减岗位数	新增岗位数	新增岗位对被削减岗位的替代率 (单位: %)
非金融工商经济	63,283	59,310	94
工业	42,075	36,999	88
其中: 高技术产业	30,545	28,673	94
服务业	20,770	21,208	102
其中: 知识密集型服务业	7,327	8,831	121

	低技能劳动岗位		
	削减岗位数	新增岗位数	新增岗位对被削减岗位的替代率 (单位: %)
非金融工商经济	125,351	46,183	37
工业	94,673	32,042	34
其中: 高技术产业	60,954	17,864	29
服务业	30,589	14,094	46
其中: 知识密集型服务业	16,347	9,135	56

数据来源: Statistische Bundesamt: *Verflechtung deutscher Unternehmen mit dem Ausland 2009*。

⑨ 戴启秀: 《德国模式解读——建构对社会和生态负责任的经济秩序》, 上海: 同济大学出版社, 2008年, 第140页。

## 2) 日益严重的收入分配问题

由于世界金融市场的迅猛发展和全球投资渠道的不断拓展,相对于劳动,资本在收入分配中的强势地位越来越明显。一方面,为了改善就业状况,工会在劳资谈判中不得不保持克制的态度——原则上,工资的上涨必须要慢于企业主赢利的增加,因为一旦资本的收益率低于全球最低标准,这些能带来劳动岗位的投资就会流向他方;另一方面,国际竞争的加剧也确实强化了企业主反对加薪的意愿。

劳资之间的力量对比首先表现在国民收

入的初次分配上。在初次分配中,国民收入被分成两大部分:一是雇佣劳动收入;二是企业经营和资产收入。德国统一以后,国民收入从1991年的11,925.7亿欧元增加到2010年的19,035.3亿欧元,增幅为59.6%;同期,雇佣劳动收入增加了48.5%,明显慢于国民收入的增加;企业经营和资产收入增加了86.9%,大大快于国民收入的增加(参见表3)。从劳动和资本收入的年增长率变化上我们可以发现引人注目的趋势:企业经营和资产收入的增长要比雇佣劳动收入的增长强劲得多(参见图2)。

表3: 1991—2010年联邦德国国民收入、雇佣劳动收入与企业经营和财产收入

年份	国民收入(单位:亿欧元)	雇佣劳动收入(单位:亿欧元)	雇佣劳动收入年增长率(单位:%)	企业经营和资产收入(单位:亿欧元)	企业经营和资产收入年增长率(单位:%)
1991	11,925.7	8,470.1	-	3,455.6	-
1992	12,697.8	9,171.7	8.3	3,526.1	2.0
1993	12,876.6	9,387.7	2.4	3,488.9	-1.1
1994	13,410.0	9,618.6	2.5	3,791.4	8.7
1995	13,972.2	9,970.2	3.7	4,002.0	5.6
1996	14,177.3	10,066.2	1.0	4,111.1	2.7
1997	14,386.2	10,106.9	0.4	4,279.3	4.1
1998	14,660.9	10,322.5	2.1	4,338.4	1.4
1999	14,872.6	10,595.1	2.6	4,277.5	-1.4
2000	15,244.3	11,000.6	3.8	4,243.7	-0.8
2001	15,608.5	11,206.1	1.9	4,402.4	3.7
2002	15,761.2	11,283.2	0.7	4,478.0	1.7
2003	15,996.1	11,320.8	0.3	4,675.3	4.4
2004	16,723.0	11,371.3	0.4	5,351.7	14.5
2005	16,946.8	11,298.6	-0.6	5,648.2	5.5
2006	17,791.0	11,495.1	1.7	6,295.9	11.5
2007	18,378.1	11,809.5	2.7	6,568.6	4.3
2008	18,710.2	12,232.8	3.6	6,477.4	-1.4
2009	17,918.3	12,258.6	0.2	5,659.7	-12.6
2010	19,035.3	12,578.2	2.6	6,457.1	14.1

数据来源: Statistisches Bundesamt: Bruttonationaleinkommen, verfügbares Einkommen und Volkseinkommen, 20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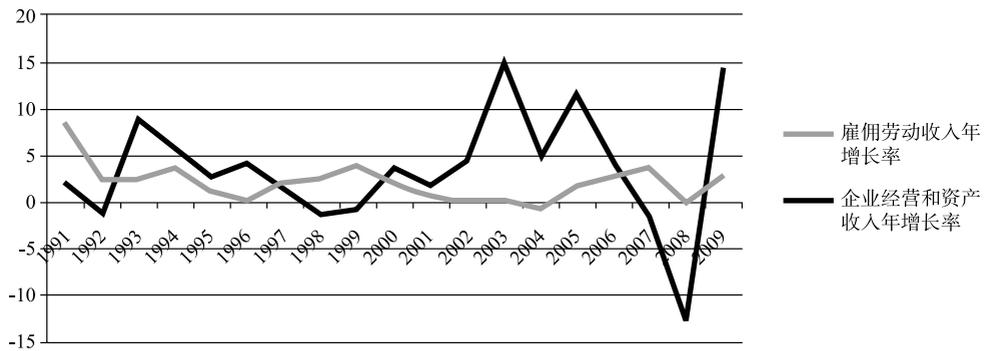


图 3：1991—2010 年雇佣劳动收入与企业经营和资产收入的年增长率（单位：%）

数据来源：Statistisches Bundesamt: Bruttonationaleinkommen, verfügbares Einkommen und Volkseinkommen, 2011。

劳资力量平衡的改变也明显地表现在再分配后私人居民可支配收入的组成结构上：1995 年以来，净工资收入所占的比例几乎是持续地从 45% 左右下降到现在的 40% 左

右；与此同时，净利润收入所占的比例从 30% 左右上升到 35% 左右；而社会福利收入的比例则保持不变（参见图 3）。这一点很值得注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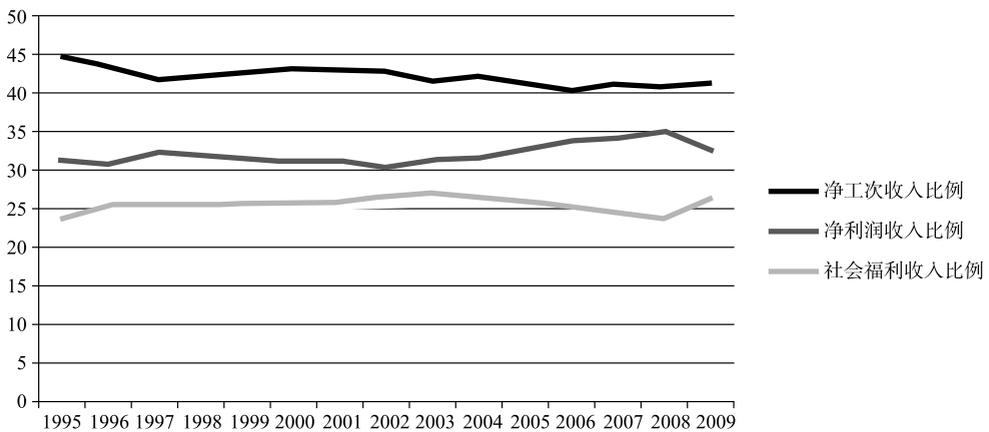


图 4：1995—2009 年联邦德国再分配后私人居民可支配收入的组成结构（单位：%）

数据来源：Schäfer, Claus: Zukunftsgefährdung statt Krisenlehren—WSI-Verteilungsbericht 2010, 638, in: WSI-Mitteilung 12/2010, 636–645。

作者简介：徐四季，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系讲师，博士。

# 德国城镇化道路与启示

黄萌萌

**【摘要】**十八大报告强调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是对科学发展的重要解读。德国城镇化虽然在欧洲起步较晚，但是后来居上，用40年时间在20世纪初已经基本完成了城镇化进程。德国城镇化发展均衡、城乡统筹、分布合理并且以中小城市为主。每个城市圈都有自己的核心竞争优势，中小企业为德国的小城镇和乡村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促进当地经济发展。近年来，德国十分重视绿色、可持续的城市发展，为此从联邦层面制定了一系列纲领和措施。节能减排，发展低碳的城市交通以及促进新能源等高新技术开发成为德国城市发展的首要目标。欧盟与德国也想借此机遇在全球化背景下保持特有的自身优势。

**【关键词】**城镇化 中小城市 可持续城市发展

## 引言

中国共产党十八大报告中指出，在当代中国，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本质要求就是坚持科学发展。其中，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的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是十八大报告中对科学发展的解读，也是对我们城镇化发展以及促进城

乡一体化的基本要求。<sup>①</sup>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城镇化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就，1995年城镇化率为29.04%，到2007年城镇化率已经达到了44.94%，预计到2020年我国的城镇化率将达到59.17%。<sup>②</sup>但是，目前我国的城镇化发展还面临着如资源短缺、规划不合理、中小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薄弱、大城市由于人口、交通运输过度集中而带来的各种城市病、经济和产业结构不合理、新老工业产生的环境问题、增长方式粗放、就业任务艰巨、城乡发展不平衡、“三

① 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载《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2012年11月第一版，第19页。

② 简新华，何志扬，黄锬：《中国城镇化与特色城镇化道路》，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35—267页。

农”问题严重等诸多问题。2008、2009年的经济危机也为我国的沿海制造业出口造成了严重的负担。<sup>③</sup>

全球化使得各国宏观经济联系日益紧密，经济全球化带动了信息技术与经济的快速发展，这同时赋予城镇化新的内涵。新型城镇化是建立在增强城市化动力、改善城镇空间结构以及优化城市生态环境基础之上的。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城市国际化、资源的全球配置以及发达国家的城市化经验对中国城镇化产生了积极而深刻的影响。欧洲发达国家的城镇化基本上在20世纪中期已经实现，在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城市重建阶段后，其城市化向更高水平发展并且在20世纪60至70年代经历了进入了逆城市阶段。在80年代由于城市建设的发展、公共交通的完善以及城市环境治理水平的提高，人口再度向城市集中，同时实现了高度城市化以及城市的现代化。作为欧盟龙头国家的德国是世界上城镇化发展比较快、城镇率比较高的国家之一。在其城镇化进程中的曲折与教训对我国城镇化来说是前车之鉴，但其先进的管理经验与城镇化理念对我国同样有借鉴意义。

## 一、城镇化定义

德文文献里对城市化（Verstädterung）做出如下定义：城市化是指在一个空间内城市数量、面积以及居住人口的扩张，增多或者扩大……城市化的概念是用来形容城市居

住区的增长过程以及所达到的状态，这经常用城市化率来表达。<sup>④</sup>中文文献对城市化做出了更为具体的定义：“城市化或城镇化（Urbanization）是指第二、三产业在城镇聚集，农村人口不断向非农业和城镇转移，使城镇数量增加、规模扩大，城镇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向农村扩散、城镇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向农村普及的经济、社会发展过程。”<sup>⑤</sup>由于中国城镇的规模和很多外国的小城市人口相当，城镇化过程中人口不仅向城市聚集，也向城镇聚集，因此中国学者通常把Urbanization译为城镇化，外国学者则称之为“城市化”。

## 二、德国的城镇化进程

德国城镇化进程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1800年至1850年城市化初始阶段，1850年至1870年不可逆转的城市化突破阶段以及1870年后由工业化带动的城市化高度发展阶段。<sup>⑥</sup>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60年间，德国的城镇化率继续从70%提高到90%（见图1），伴随出现逆城市化现象，大量兴建卫星城，城市居民搬至郊区居住。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德国推进可持续的城市发展战略，成为国际上可持续发展的领军国家。德国由于国家的分裂和邦国林立，城镇化与工业化相较于英国、美国起步晚，但是却后来居上，德国从1871年到1910年用了不到40年的时间完成了工业化和城镇化。德国城镇化历史

③ 万博，张兴国：《德国小城镇建设经验与启示》，载《小城镇建设》，2010年第11期，第89—95页。

④ Leser, Hartmut (Herausgeber): „Diereke Wörterbuch: Allgemeine Geographie“, DTV Deutscher Taschenbuch Verlag, 1997.

⑤ 简新华，何志扬，黄锜：《中国城镇化与特色城镇化道路》，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页。

⑥ Achenbach, Heindrik: „Geschichte der Urbanisierung in Deutschland-zentrale Aspekte“, S. 1, <http://hendrik-achenbach.jimdo.com/geschicht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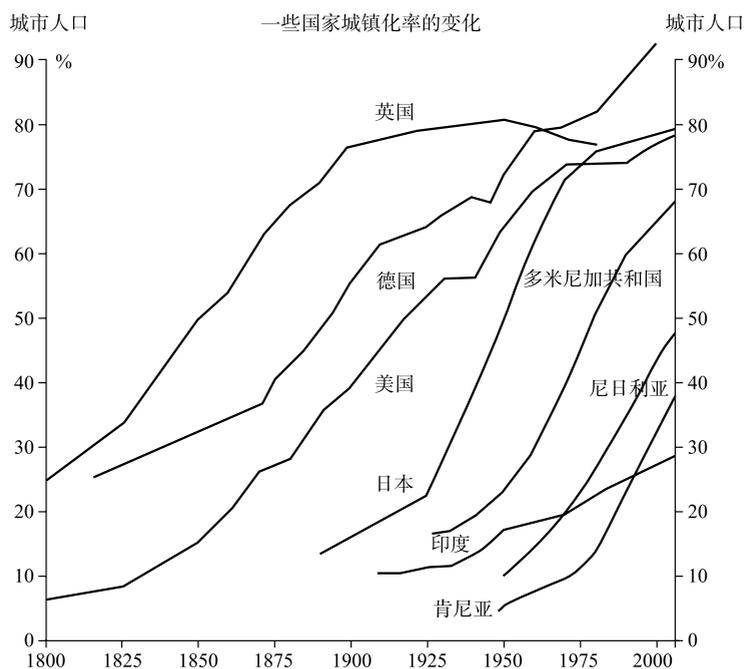


图 1

资料来源: Berlin-Institut für Bevölkerung und Entwicklung: Entwicklung von Urbanisierung. Oktober 2007

阶段的划分不仅包含着诸如城市数目增长和新城市形成的量化过程,还包含城镇生活方式的塑造以及最终渗透至乡村的质变过程。

1850年至1870年间是德国城镇化的突破阶段,在此期间产生两种类型的城市,第一种是政治和经济中心的开放型市民城市(die offenen Bürgerstädte),也被称为“中心城市(zentrale Orte)”。其特点是文化与行政机构集中在内城,工人则集中在住宅区。每一个“中心城市”相距至少150公里并且形成相互竞争性。第二种城市则是工业需求导向型城市和工业密集区。在以工厂为中心的周围绿地上建立工人居住点,在该类城市中人口结构单一,市民阶层无法发挥其在“中心城市”中的显著作用。同时还有其他小城市则保留了其作为集散中心以及粮食生产中转站

的职能,并且通过铁路交通运输与大城市相连接。<sup>⑦</sup>

随着德意志第二帝国的建立,德国的人口大幅增长,10万人以上的城市数目激增。在此期间由于早期的工业化提供大量的就业岗位而促进了城市人口的增长与城市的发展,其中大量年轻务工人员从农村涌入城市。这在改变了社会结构的同时也使得城市劳动力供应上升,农村劳动力人口下降。自1885年后出现城市行政区不断向外扩张的趋势。不仅企业厂主希望在城市周边乡镇部署基础设施建设从而获得盈利,因而大力支持这一进程,而且城市规划者也承诺提供长期的资金优惠支持。面对日益膨胀的城市人口,城市管理当局将城市划分为工厂区、住宅区、商业区。在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德国各

<sup>⑦</sup> Achenbach, Heindrik: „Geschichte der Urbanisierung in Deutschland-zentrale Aspekte“, S. 2, <http://hendrik-achenbach.jimdo.com/geschichte/>.

大城市也产生了很多的问题，比如由于贫富差距加大而产生社会分化，城市周边聚集贫民窟以及城市犯罪率的上升等现象。在德国城镇化进程中市民阶层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形成了所谓相对于国家职能的“补充功能”（Komplementärfunktion）。城镇机构并非是国家机构的延伸，而是拥有大量的自治权，代表着地方层面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市长代表市民推动和执行社会改革目标并且在市议会上更趋向于代表社会底层的政治意愿。<sup>⑧</sup>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德国在 50 年代创造了“经济奇迹”，并且着手城市重建实现了高度城市化，在此过程中德国开始由集中型城市向分散型城市化发展。主要特征是中小城市获得了较快的发展，城市人口在中小城市的分布比重逐渐提高。联邦德国居住在中小城市的居民占人口总数的 70%。人口在 10 万以上的大城市在德国只有 80 个，中小城市数目达到 3159，约占全国城市和乡镇总数的

68.4%。大城市与中小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所提供的就业岗位差距逐步减小，约 350 万个企业和工厂坐落于中小城市和乡镇，为当地的劳动人口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岗位，中小城市的失业率平均低于大城市劳动人口失业率约 2 个百分点（见图 2）。此外，中小城市同样拥有良好的公共服务设施，约 4 万所学校和 5 万所幼儿园以及 2200 所医院分布于中小城市，使得中小城市居民拥有充足的教育资源和医疗卫生设施，从而避免了人口大量涌入大城市分享有限的教育、卫生资源。<sup>⑨</sup>大中小城市居民购买力和收入并无很大差异。随着现代交通运输网的全面建设和信息技术的发展，大城市的区位优势已经明显减弱。在此情形下，中小城市和乡镇由于较为低廉的房价和租金以及不断完善的交通状况和基础设施条件，吸引了大量企业和劳动力。城市的行为方式和结构也逐渐渗透到小城镇与乡村居住地，从而进一步促进了城乡均衡发展。

选取的城市和乡镇类型对比指数

	大城市	中城市	较大的小城市	较小的小城市	乡镇	联邦
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的城市、乡镇数目	80	609	877	1673	1381	4620
2010 年 15—65 岁劳动人口失业率	7.4	6.2	4.9	4.8	4.3	6.0
2005 年—2010 年职工发展率（工作地点）	6.3	5.2	5.4	5.1	5.0	5.7
2000 年—2010 年住宅区和交通面积变化率	5.0	8.0	9.2	9.4	10.6	8.6
2010 年居民每平方米房租报价（欧元）	6.8	5.8	5.6	5.1	5.1	5.9
2009 年居民购买力（欧元）	20,665	20,040	19,754	18,864	18,535	19,873

图 2

资料来源：Das Bundesinstitut für Bau-, Stadt- und Raumforschung (BBSR): Laufende Stadtbeobachtung—Raumabgrenzungen: Stadt- und Gemeindetypen in Deutschland, [http://www.bbsr.bund.de/cln\\_032/mn\\_340582/BBSR/DE/Raumbeobachtung/Raumabgrenzungen/StadtGemeindetyp/StadtGemeindetyp2010.html?\\_\\_nnn=true](http://www.bbsr.bund.de/cln_032/mn_340582/BBSR/DE/Raumbeobachtung/Raumabgrenzungen/StadtGemeindetyp/StadtGemeindetyp2010.html?__nnn=true).<sup>⑩</sup>

- ⑧ Achenbach, Heindrik: „Geschichte der Urbanisierung in Deutschland-zentrale Aspekte“, S. 2, <http://hendrik-achenbach.jimdo.com/geschichte/>.
- ⑨ Portz, Norbert: „Stadtentwicklung in Mittel- und Kleinstädten: Chancen und Herausforderungen“, Bundesverband für Wohnen und Stadtentwicklung e.V., VHW FWS 3/Mai—Juni 2011, [http://www.vhw.de/fileadmin/user\\_upload/Forum\\_Wohneigentum/PDF\\_Dokumente/2011/FWS\\_3\\_2011/FWS3\\_11\\_Portz.pdf](http://www.vhw.de/fileadmin/user_upload/Forum_Wohneigentum/PDF_Dokumente/2011/FWS_3_2011/FWS3_11_Portz.pdf).
- ⑩ 根据德国联邦建筑与区域规划局（BBSR）大中小城市划分依据：大城市人口 10 万以上；中城市人口 2 万至 10 万；较大的小城市人口 1 万至 2 万人；较小的小城市人口 5000 至 1 万人；乡镇人口少于 5000 人。

### 三、德国的城镇化特点

#### 1. 注重立法与规划

德国城镇化建设十分注重发挥规划的协调作用，城镇化不仅仅强调功能完整、布局合理，而且对交通、通讯、排污等公共设施建设坚持长远性原则，避免重复建设。德国城镇化的另一个特点是“三结合”原则，即城市规划和相关规定是由县市政府、专家和市民共同参与制定，建立了市民广泛参与的住宅建设制度。在获得广泛的社会认同的基础上，规划一经议会批准通过后各方就依法严格执行，被赋予法律地位。

此外，国家、区域和地方自治之间具有高度协调机制，各级机构在规划审批前共同协商，协调国土规划、市政规划与区域规划之间的矛盾。<sup>①</sup>德国的城镇化并没有简单地追求数量上城市规模的扩大，而是提倡法律先行、注重规划、集约发展，进而明确功能、加强各方联系、维护城市中自然和文化的多样性，促进宜居、可持续的城市发展。

#### 2. 建立城市圈，重视中小城市发展

德国拥有 8200 万人口，是欧洲人口最稠密的国家之一。目前，德国的城镇化率已经达到 90%。整体来看，德国的城镇化发展均衡、城乡统筹、布局合理，以中小城市为

主，德国人口的 2/3 分布于中小城市，并且能够吸收当地约 50%—60% 的就业人口。<sup>②</sup>在德国没有可以任意支配其他城市并占主导地位的大都市，即使拥有百万人口的柏林和慕尼黑也只是形成了单一中心的城市集群空间。德国城市遍布于各联邦州之内并且组成了结构上多中心的功能互补的城市集群。德国拥有 11 个大都市圈，聚集着 70% 的人口，位于大城市辐射区的中小城市尤其受益于大城市的发展，由于通勤设施便捷，居民数量日益增长。不仅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岗位，而且成为供给中心、拥有丰富的文教和旅游资源，平均每三个中型城市就拥有一所高校。<sup>③</sup>拥有 1100 万人口的传统鲁尔工业区就是德国最大的城市集群，包括科隆、杜塞尔多夫、埃森、杜伊斯堡、多特蒙德五个人口在 50 万以上的城市，便捷的铁路和公路交通将各个城市和乡镇有机地连接起来。此外，还有法兰克福区、莱茵-美茵区、斯图加特区、慕尼黑区、大汉堡区、柏林-勃兰登堡等。<sup>④</sup>德国的城市能够比较均匀地分布在全国，这与 1870 年德国统一之前各个邦国拥有各自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也密不可分。<sup>⑤</sup>

#### 3. 强调独特的竞争和创新优势

在德国社会福利市场经济的框架下，带动企业创新与提高企业绩效和积极性的有序

① 赵力勃，许龙发等：《德国小城镇基础设施考察报告》，载《建设科技》，2009年第16期，第74—76页。

② 叶齐茂：《如何引导中国城镇化健康发展——对德国城市环境规划师Jürgen Paulussen的采访》，载《国外城市规划》，2005年第1期，第70—73页。

③ Das Bundesinstitut für Bau-, Stadt- und Raumforschung (BBSR): „Klein- und Mittelstädte—Leben zwischen Dorf und Großstadt“, Bonn, 2012, [http://www.bbsr.bund.de/cln\\_032/nn\\_340582/BBSR/DE/Aktuell/Newsletter/11\\_2012/beitraege/klein\\_mittelstaedte.html?\\_nnn=true](http://www.bbsr.bund.de/cln_032/nn_340582/BBSR/DE/Aktuell/Newsletter/11_2012/beitraege/klein_mittelstaedte.html?_nnn=true).

④ Sciexx-das Wissenmagazin: „Verstädterung in Deutschland- Entwicklung und aktueller Stand“, 26.11.2001, <http://www.scinexx.de/dossier-detail-24-9.html>.

⑤ 柴野：《国外城镇化建设：“德国模式”值得借鉴》，载新华网，2013年1月28日，[http://news.xinhuanet.com/yzyd/tech/20130128/c\\_114529632.htm](http://news.xinhuanet.com/yzyd/tech/20130128/c_114529632.htm).

竞争得到了制度和法律上的保障，政府的职能是制定总体政策法规并且保证正常的市场秩序，努力为企业在公平环境中的竞争提供平台。<sup>①⑥</sup>德国每个城市圈都有自己特殊的竞争优势以及专业化、集约化和出口导向型产业。行业协会与工会参与制订经济政策，而且在执行经济和社会政治措施方面拥有较大的自主权，填补了国家调控的空白并且协助行业竞争有序进行。<sup>①⑦</sup>如曾经以钢铁等重工业为主的大型传统工业区鲁尔区；以慕尼黑为首的航天、微电子等新兴工业区；以海洋工业为主的不来梅-汉堡工业区，这些城市工业区之间以及区内企业之间形成互补产业链，从而避免恶性竞争，与之相关的各种生产也被带动，因此奠定了整个城市的就业、经济和繁荣的基础。此外，具有竞争力的信息与新能源企业大量分布于中小城市和乡镇，在注重产品研发与技术创新的同时，由于产品的多样性和专业性，在全球竞争中取得了产业内与产业外贸易的竞争优势。在德国，相对于大型企业的规模优势中小企业更具有创新优势，中小企业的数量与竞争力保证了竞争机制的良好运作。<sup>①⑧</sup>

#### 4. 建设良好的基础设施

德国中小城市的居民享有同大城市相差

无几的公共交通、儿童活动场所以及基础教育方面的公共资源，同时比大城市居民拥有更多的活动绿地空间以及更好的生态环境。医疗资源占有率和购物的便捷性虽略逊于大城市，但很多居住在小城市和乡镇的家庭都拥有私人轿车，以方便出行（见图3）。很多德国人出于对生态环保的强烈意识而选择居住在中小城市和乡镇。在对1336名中小城市和乡镇居民的调查显示，超过50%的居民对其周边的基础设施供应情况感到满意或者非常满意，该数据普遍高于城市居民。<sup>①⑨</sup>一方面，德国中小城市和乡镇日渐完备的基础设施建设与大量的工商企业和服务业，吸引了相当多的有竞争力的企业入驻乡镇地区；另一方面，国家与行业协会协同维护竞争秩序为中小城市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外部保障，促进了当地劳动人口就业并且带动了城乡一体化。<sup>②⑩</sup>

#### 5. 健全社会福利保障体制

德国作为社会福利国家（Sozialstaat）拥有较为全面协调经济效益与社会公正的社会福利保障制度。除了包括由国家机构、企业与雇员共同承担的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事故保险和护理保险在内的法定义务社会保险之外，社会福利补贴、地区经济促进政策、企业共决权和雇员劳动保护政策共同奠定

<sup>①⑥</sup> 陈虹嫣等：《社会市场经济：经济基础与作用方式》，载《德国社会市场经济词典》（第二版），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60—267页；万喆：《避免企业恶斗，靠公平正义法则》，载《环球时报》（第7版），2012年12月11日。

<sup>①⑦</sup> Abelshause, Werner: „Wandlung der Sozialen Marktwirtschaft-Des Kaisers neue Kleider?“, Roman Herzog Institut e.V, München 2009, S. 15—19.

<sup>①⑧</sup> 哈默，艾伯哈德/黄晓艳译：《中小企业政策》，载《德国社会市场经济词典》（第二版），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33—334页。

<sup>①⑨</sup> Das Bundesinstitut für Bau-, Stadt- und Raumforschung (BBSR): “Lebensqualität in kleinen Städten und Landgemeinden-Aktuelle Befunde der BBSR-Umfrage“, Bonn 2011 /5, [http://www.bbsr.bund.de/nm\\_187652/BBSR/DE/Veroeffentlichungen/BerichteKompakt/2011/BK052011.html](http://www.bbsr.bund.de/nm_187652/BBSR/DE/Veroeffentlichungen/BerichteKompakt/2011/BK052011.html).

<sup>②⑩</sup> 丁声俊：《德国小城镇的发展道路及启示》，载《解放日报》，2012年4月27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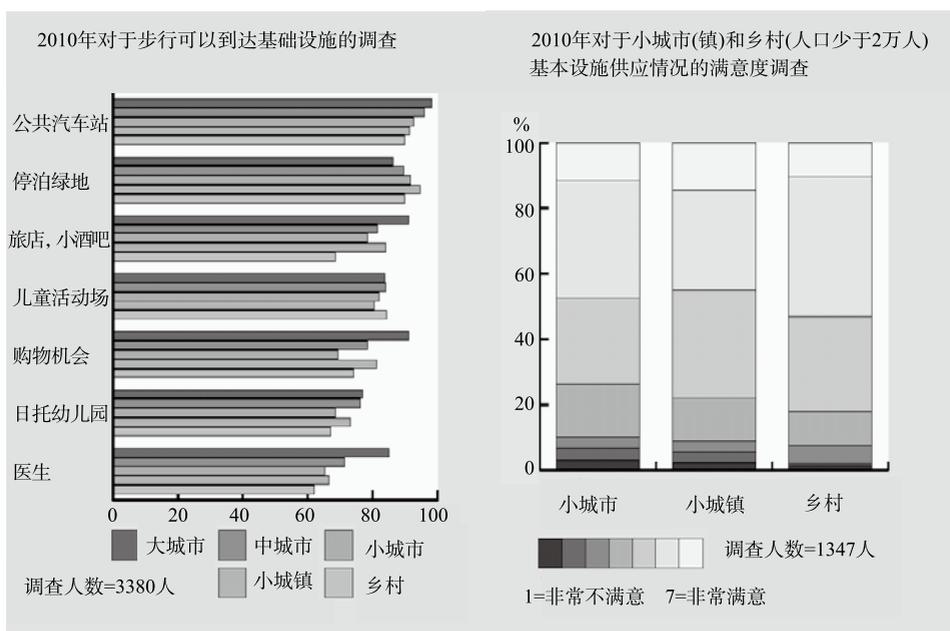


图 3

资料来源: Das Bundesinstitut für Bau-, Stadt- und Raumforschung (BBSR): Lebensqualität in kleinen Städten und Landgemeinden—Aktuelle Befunde der BBSR-Umfrage, [http://www.bbsr.bund.de/nn\\_187652/BBSR/DE/Veroeffentlichungen/BerichteKompakt/2011/BK052011.html](http://www.bbsr.bund.de/nn_187652/BBSR/DE/Veroeffentlichungen/BerichteKompakt/2011/BK052011.html).

了德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基础。<sup>①</sup> 这为城市化进程中实现公民身份平等、促进劳动力要素流动、取消城乡二元结构对立、推进城乡统筹发展、缩小城乡差距以及完善公共服务事业和促进社会公平提供了最根本且最全面的制度保障。

## 6. 保持城市历史人文气息

无论是徜徉在德国的大城市还是中小城市, 都会感受到德国浓郁的历史人文气息。很多城市都保留了铺满古老地砖和以教堂为中心的老城区(Altstadt)。德国人在惋惜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于文物和古建筑不可挽回的损

失之余, 从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不遗余力地把对历史文化建筑的保护列为市政建设的重要内容, 并于 1971 年建立了“城市建筑资助金(Städtebauförderung)”用以支持城市历史建筑保护项目以及可持续的城市发展。<sup>②</sup> 在联邦政府、联邦州以及地方的共同资金支持下, 德国的小城镇较好地保留了原有的城市格局, 历史与文化底蕴彰显于城市建筑之间, 200 年以上的建筑均列入保护之列, 只根据现代生活需要对其内部进行改造, 而保留建筑外部的原有造型。在大力投资保护城镇历史资源的同时, 基于历史遗产而发展起来的第三产业则成为当地税收的重要来源。

<sup>①</sup> 戴启秀:《德国模式解读——建构对社会和生态负责人的经济秩序》, 上海: 同济大学出版社, 2008 年, 第 41—50 页。

<sup>②</sup> 朱苗苗:《21 世纪德国可持续的城市发展》,《德国蓝皮书: 德国发展报告(2012)》, 北京: 社科文献出版社, 2012 年, 第 141—160 页。

## 7. 突出环保和可持续发展

德国社会各界对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的意识比较强烈。除了绿党坚持把环境保护政策以及可持续发展理念作为自己政策制定的基本方向以外,<sup>②3</sup>20世纪80年代,德国生态哲学家汉斯·萨克塞(Hans Sachsse)提出的“后现代生态观”以及约瑟夫·胡贝尔(Josef Huber)的“现代生态理论”为德国可持续的城市发展和工业生态化奠定了理论基础。<sup>②4</sup>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德国城市发展中的环境问题被提升至重要地位,通过国内的环境保护法律(包括自然保护法、预防性环保法和环保刑法)以及欧盟框架内的环保立法有效地协调了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关系。此外,联邦政府每四年颁布一轮生态建设计划,在建设法规中环境保护意识制约着建设全过程,其中规定任何建设项目都要保证绿地总量的平衡。<sup>②5</sup>

自从“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在1992年联合国环境大会上取得共识以来,<sup>②6</sup>联邦政府陆续提出一系列有关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文件,其中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是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德国于2002年在联合国会议上递交了《国家可持续发展报告》,由于其跨行业、跨专业的特性,联邦总理府直接负责。本着节约利用城市土地和空间、减少能源消耗、建设宜居城市生态环境以及兼顾社会弱势群体

等核心原则,最近几年德国在房屋节能减排改造、合理用地规划、加强环保低碳城市公共交通建设、实现不同交通工具的无缝衔接、支持电动车技术、开发可再生能源、缓解城市化过程中社会分化以及城市生态景观等问题,积极推动可持续的城市发展。<sup>②7</sup>与此同时,德国和欧盟也希望在节能减排,气候环保等领域发挥国际领导作用,并且通过技术创新与大力发展绿色产业寻求自身新的竞争优势,在全球经济竞争中保持领先地位。

## 四、结语

德国的城镇化在欧洲起步较晚,但是伴随着工业的迅速发展,在40年内迅速实现了城镇化。但是,仅仅从数量上追求城镇化和那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城市发展已经成为历史,德国在市场经济秩序以及较为全面的社会保障制度的框架下,实现“经济奇迹”后更多地致力于推进大中小城市的协调发展,在城镇化过程中把传统乡村转变为一、二、三产业共存的工商城镇,从而形成若干功能互补的多极分散的城市群。在城市规划过程中注重法律先行与民众广泛参与相结合原则,完善城市和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城市与乡村的铁路与公路联系,合理分配教育、医

<sup>②3</sup> 王芝茂:《德国绿党的发展与政策》,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第77—86页。

<sup>②4</sup> 戴启秀:《德国模式解读——建构对社会和生态负责人的经济秩序》,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86—92页。萨克塞把生态界定为人、自然和技术的整个体系,要求个人融入社会和自然之中,而非个体凌驾于自然之上。胡贝尔认为生态现代化是“可持续发展”的另一种表达方式,阐述了经济与生态的关系,提倡以工业生态化为主的后工业社会发展道路,要求工业生态化以可持续发展的原则为出发点。

<sup>②5</sup> 王鹏:《城镇化建设的德国经验》,载人民网,2012年12月11日, <http://theory.people.com.cn/n/2012/1211/c136457-19861273.html>。

<sup>②6</sup> 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Our Common Future or Brundtland Report)报告中首次提出“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即“既满足当代的需求,又不危及后代满足需求能力的发展”。

<sup>②7</sup> 朱苗苗:《21世纪德国可持续的城市发展》,《德国蓝皮书:德国发展报告(2012)》,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141—160页。

疗与市政公交等公共资源，为小城市和乡镇招商引资打下良好的基础，从而进一步推动城乡一体化，解决中小城市和乡镇的就业问题，缩小城乡差距。近年来，可持续的城市发展理念成为德国城市建设的新方向，联邦政府、联邦州与县市共同出资负责城市历史建筑修复与保护，通过低碳交通、新能源开发以及降低土地和空间的消耗等措施实现可持续的城镇化和城乡生态的良性循环。<sup>②</sup>此外，保持中小企业以及新能源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充分发挥企业集约化和专业化优势，对于带动中小城市和乡镇的经济发展以及促进就业有着特殊的意义。老工业基地鲁尔区也在两德统一后完成了艰难的转型，成为可再生能源、信息和生物技术等新兴产业为主的新经济区。

在结合我国具体国情的前提下，德国城镇化的经验与启示可以部分为我们克服城镇化发展中的问题提供借鉴与参考。但是，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在城镇化进程中不仅面临着发达国家曾经历过的能源供给方式落后、环境污染问题严重、基础设施保障能力不足等问题，而且还肩负着城市土地、淡水以及能源供应不断增大的压力以及城乡二元对立体制问题，承担着户籍制度改革、土地制度改革、住房制度改革等艰巨任务。<sup>③</sup>在城镇化过程中急于求成，容易造成有速度无质量、无产业支撑以及过度的城镇化。过去几年中，人员和资本要素的流动为我国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大量农村劳动力离开第一产业，涌入大城市进入第二以及第三产业，推动了我国城镇化的发展。但是，高

质量的城镇化不仅需要发展大城市，同时还要重视发展中小城市和乡镇的支撑产业和特色产业，鼓励企业引进先进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以吸引当地及周边乡村地区的劳动力，形成功能互补的城市圈，避免劳动人口大量涌入有限的几个大城市，造成大城市人口膨胀、公共资源紧张、房地产投资过热、环境恶化、居民幸福感下降等城市病。发展中小城市和乡镇不仅需要完善当地的基础设施建设、将乡镇居民纳入社会保障制度、发展与大都市相连接的交通运输以及保护当地历史文化遗产，同时还要以教育为依托，加强当地与企业挂钩的双轨制职业教育以及增加基础教育资源，为提高中小城市和乡镇劳动人口素质做好前期准备，加强中小城市和乡镇对于企业的吸引力，为当地创造就业机会，将周边地区的农业人口吸收至二、三产业，同时发展集约高效型农业，促进城乡协调发展，缩小城乡差别，为提高城镇化的质量打下坚实的基础。此外，在中小城市和乡村的发展过程中还要完善各项法律规章制度和监督机制，企业与开发商需要依法办事，有法可依，防止城镇化过程中强征农民土地行为以及加重农民工被边缘化的现象。

纵观德国的城镇化经验，其可持续的城市发展理念值得我们借鉴。在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过程中，中国要注重生态环境建设，不以自然资源为代价换取经济发展，这同样需要严格的立法监督，各职能部门依法执行，并且鼓励民众广泛参与的各方协调机制，共同提倡集约、绿色和低碳的城市发展。

**作者简介：**黄萌萌，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系博士研究生。

<sup>②</sup> 叶齐茂：《可持续发展的德国城镇化》，载《城乡建设》，2005年第1期，第73—75页。

<sup>③</sup> 陈佳贵：《宏观调控、经济发展与深化改革》，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173—177页；张玉台等：《中国城镇化：前景、战略与政策》，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10年，第145—150页。

# 德国对希腊债务的方针

罗 然

【摘要】2010年春正式爆发的希腊债务危机愈演愈烈，并已蔓延到欧元区其他国家，一场主权债务危机逐渐演变成体制危机，甚至是信任危机，这不禁引发了市场对欧元区前景的担忧。有言论甚至认为，欧元将退出历史舞台，各国恢复使用自己的主权货币。而作为欧元区最大经济体以及欧洲联盟援助希腊方案最大出资国，德国的应对政策不仅关系到希腊政府是否会陷入破产深渊，更影响着欧元区的未来。本文试图从理论和现实的角度，分析危机的本质以及不同阶段德国应对希腊债务危机的方针变化，并探讨未来的政策发展。

【关键词】希腊 债务危机 德国

2009年10月初，希腊政府突然宣布，2009年政府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预计将分别达到12.7%和113%，远超欧盟《稳定与增长公约》规定的3%和60%的上限。据此，全球三大信用评级机构惠誉、标准普尔和穆迪相继调低希腊主权信用评级，希腊债务危机正式拉开序幕。

## 一、危机出在哪里？

其实，希腊的危机本质上是欧洲模式危机的一个缩影。20世纪30年代史无前例的大萧条、大危机催生了经济理论的突破，促成了凯恩斯的经典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

论》<sup>①</sup>的出版，认为对商品总需求的减少是经济衰退的主要原因，因此主张国家采用扩张性的经济政策，通过增加需求促进经济增长。即扩大政府开支，实行财政赤字，目的是创造就业，活跃经济，由此带动消费增长和刺激私人投资增加。在该理论的影响下，欧洲各国尤其是希腊近年来发新债还旧债，欧元区成立后失去了独立货币政策的各国开始更大规模地动用财政工具，把危机财政政策变成了常态政策，其轨迹是：国家举债——人民享福——企业得利——债务危机。

1961年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蒙代尔提出最优货币区理论，这是指最符合经济金融某些条件的国家或者地区，相互之间建立紧

<sup>①</sup> 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

密联系的货币制度，如固定汇率制度，甚至使用统一货币的区域。<sup>②</sup>这一理论为欧元的诞生奠定了理论基础。蒙代尔等人的最佳货币区理论推动了欧洲货币区的建立，蒙代尔也因此被称为欧元之父。但欧盟并没有完全按他们的理论来建设，特别是缺少了统一的财政政策。一国的经济政策主要靠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现在的问题是欧元区建立以来，欧盟缺财政政策这条腿，而各成员国则是缺货币政策这条腿。

## 二、德国如何应对？

### 第一阶段：静观其变，不愿提供援助

2010年4月26日，德国表示，除非希腊出台更为严格的财政紧缩政策，否则不会“过早”伸出援手。德国不主张破坏欧盟的一些基本规则，特别是“不救助义务”。当然也是保护自身的利益，希望主权债务国家自救，即在市场发债，通过滚动债务来避免违约风险。

德国此举也是有着自己的内、外部考虑：一方面，由于欧盟《里斯本条约》第125条规定的“不救助义务”，即欧盟及其成员国没有责任和义务为成员国负担公共债务，不直接出资，德国的救援政策主要在欧盟层面上展开；另一方面，希腊债务危机具有特殊性，德国国内民众反对意见较大，不愿为希腊的“过度消费”买单。而德国政府希望倒逼希腊等国主动提出加强欧元区财政纪律和建立财政联盟，以便从根本上解决欧债危机。

### 第二阶段：积极援助

自2009年底三大国际评级机构对希腊轮

番“降级”后，希腊曾于2009年底和2010年初，试图通过大规模发债筹资和削减赤字计划实现自救，但其债务负担显然早已远超自身承受能力。希腊救助方案的不确定性成了欧元不断贬值的推手，欧元一路贬值至2005年以来的最低点，开始出现了欧元可能解体的声音。而统一的欧元是欧盟经济和政治一体化的最重要的基础，于是德国不得不一改初衷，对希腊提供援助。

### 1. 输血

为了欧元区区的稳定，德国积极推动欧盟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层面对希腊救援。2010年5月欧盟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通过对希腊的第一轮财政救援计划（以信贷担保形式提供规模1100亿欧元的救助协议，其中IWF 300亿，欧元区800亿<sup>③</sup>，其中德国224亿欧元，约占28%），期限为三年（即希腊三年内全部债务偿付的保证）。5月7日德国联邦参议院和联邦议院通过对希腊的救助并签署货币联盟财政稳定法。2012年2月21日，欧元区财长会议批准对希腊的第二轮救助计划，总额为1300亿欧元。与希腊第一次救助计划相比，本次救助计划增强了欧洲决策者在希腊救援资金的使用和效率方面的监督权和控制力，欧元区决策者将增加驻扎在希腊的督查小组的人数。

### 2. 手术：债务减记

俗称“经济五贤人”的德国专家委员会，在2011年11月发表的对经济发展的年度鉴定中，公开提醒德国联邦政府当心欧元区解

② 在此区域内，一般性的支付手段或是一种单一的共同货币，或是几种货币，这几种货币之间具有无限可兑换性，其汇率在进行经常交易和资本交易时相互盯住，保持不变，但是区域内国家和区域外国家的汇率保持浮动。——《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

③ 以双边贷款的形式。

体并尽早出台应对计划。理由是，希腊政府的紧缩政策将扼杀经济增长预期，若无法看到曙光，人们将不会接受在很多年内强制节约的条件。新的援助资金也拯救不了这个国家，最多只能避免其公共债务面临硬性重组。但“借新债还旧债”的模式不可能根本解决债务问题，只会加重包括希腊在内的高负债成员国的债务负担，违约风险不断积累。这种形同饮鸩止渴的“输血”式救助，能治标而难治本。因此德国坚持对希腊实施外科手术式的债务重组<sup>④</sup>，同意私人债权人<sup>⑤</sup>在自愿基础上参与希腊债务重组，这也意味着为希腊债务重组铺平了道路。

事实上，希腊债务重组对德国国家财政产生了负面影响，预计使德国国库负担增加300亿到400亿欧元。因为德国曾经为希腊出具了各种担保，而且还必须承担欧洲央行的部分损失。根据德国政府经济顾问拉斯·菲尔德的估计，欧洲央行在希腊债务重组中所遭受的损失最终会体现在德国政府的财政预算中。德国在此要承担大约27%的损失，涉及金额将达数十亿欧元。<sup>⑥</sup>

那么德国为何同意希腊债务减记呢？

首先，希腊一旦债务违约以及被迫退出欧元区，将使德国遭受惨重损失。根据德国德卡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乌尔里希·卡特尔的统计：如果将两次救助计划、欧洲央行购买的希腊国债以及德国央行通过欧洲央行实时结算系统购买的希腊债权全部计算在内，德国将至少损失860亿欧元；如果将国际货

币基金组织和德国地区性银行的损失一并考虑在内，德国的损失将超过1000亿欧元。其次，希腊政府使用“集体行动条款”(CACs)，强迫私人投资者承担损失。2月21日，希腊总理帕帕季莫斯政府向议会递交一份法律草案，即所谓集体行动条款。在该条款之下，所有非自愿参与债务置换的投资者都将被迫承担损失。作为援助协议的一部分，参与债务置换的希腊私人债权人将需要承受53.5%的票面价值损失，以帮助希腊减轻堆积如山的债务。而若自愿参与换债的私人债权人过少，集体行动条款将可能被触发。只要参与率超过2/3，希腊政府就可以“强迫”所有私人债权人参与债务置换。实施该条款后，希腊债务互换参与率将达到95.63%。对大多数债权人来说，接受希腊债务减记是个“两害取其轻”的无奈决定。一来希腊政府摆出了“不愿意减记债务就不还债”的威胁。二来按照欧元区财长会通过的1300亿欧元(约合1726亿美元)第二轮希腊救助计划，发放救助贷款的前提是希腊成功实施债务置换计划。鉴于希腊在2012年3月20日将有145亿欧元(约合192亿美元)的国债到期，如果得不到这笔贷款希腊将不得不宣布债务违约。血本无归的仍然是债券持有人。

2012年3月9日，希腊政府宣布实施史上最大规模的主权债务重组计划，在受希腊法律管辖的1770亿欧元债券中，约1520亿欧元债券的私人持有者将参与债务置换计划，

④ 又称债务重整，是指债权人在债务人发生财务困难情况下，按照其与债务人达成的协议或者法院的裁定作出让步的事项。债务重组的主要方式：1. 以现金资产清偿全部或部分债务。2. 修改负债条件清偿全部或部分债务，包括延长还款期限、降低利率、免去应付未付的利息、减少本金等。3. 债务人通过发行权益性证券清偿全部或部分债务。

⑤ 指以银行、保险公司、养老金和对冲基金等为主的债权人。

⑥ Schuldenschnitt kostet deutschen Steuerzahler 14 Milliarden Euro, URL: <http://www.faz.net/aktuell/wirtschaft/griechenland-schuldenschnitt-kostet-deutschen-steuerzahler-14-milliarden-euro-11678283.html>, 2012 (letzter Zugriff: 2012-09-06).

接受 53.5% 的账面损失，参与率为 85.8%。综合利息因素后，希腊私人债权人的实际损失约为 74%，债务重组计划的短期维稳效果较为显著。由于参与减记的又只是私人领域，希腊最终只摆脱了 3550 亿总债务当中的 1070 亿（约占 30%）。希腊的无序违约没有排除，只不过向后拖延。

### 第三阶段：尽力促成希腊留在欧元区

自从希腊危机爆发以来就不乏有让希腊等国退出欧元区的呼声。随着事态愈演愈烈，这已不再仅仅是人们的一种猜测。

2011 年 10 月 31 日，就在欧盟商讨援助希腊解决债务危机的方案时，时任希腊总理的帕潘德里欧无视欧洲领导人的态度宣布举行全民公投，立刻引发了市场大幅波动。帕潘德里欧此举显然把执政党的地位置于经济利益至上，引来了德国总理默克尔的强烈不满。德国表示直至全民公投结束之前，希腊不会获得新一轮国际贷款援助。鉴于希腊对欧洲伙伴国如此不负责任的举动，默克尔甚至发出了“唯一表决选项是要不要留在欧元区”的狠话。迫于压力，希腊在 11 月 3 日晚宣布取消公投，将继续留在欧元区。显然，不到万不得已，希腊和欧盟不会真的决裂；默克尔尽管怒气冲冲，但仍然强调“希腊仍是欧元区的一员”。

2012 年 5 月希腊各党派组阁失败后，德国各界对希腊可能退出欧元区的担忧骤然升温。德国总理默克尔表示，如果希腊拒不执行在当年 3 月达成的拯救协议，欧盟国家将减少对希腊的资金投入。这将意味着希腊实际上沦为破产，它将别无选择只能退出欧元区。她也同时表示，如果希腊能留在欧元区内“更好”。此后 6 月议会重新选举中，支持欧元区援助计划和承诺将继续紧缩政策的中间右翼新民主党获胜，新民主党领袖萨马拉斯 (Antonis Samaras) 支持第二轮救助协议，以确保希腊留在欧元区。默克尔对

此表示欢迎，称“有信心”看到希腊继续留在欧元区内。德国各界对这一结果表示谨慎乐观，这是因为如果希腊退出不仅会给德国造成巨大的损失，而且会引发连锁反应，形成葡萄牙等国也会退出的预期，从而引发银行挤兑和资金外逃，推高这些欧元区国家的国债收益率，甚至最终威胁到欧元区的完整以及欧元的前途。因此，一直在努力捍卫欧元区完整性的德国总理默克尔及德国财政部长朔伊布勒均表态认为，希腊应当留在欧元区内。

与此同时德国不断敦促希腊恪守承诺，兑现紧缩政策和改革的诺言，并表明这是提供新一轮希腊援助的前提。2012 年 11 月 9 日，默克尔造访希腊，承诺为希腊提供 3000 万欧元，协助建立地方行政管理机构，以及改进健康保险系统，并再次重申希望希腊留在欧元区。在“三驾马车”对希腊改革进展的评估发布这一关键时间点之前的这一表态，也体现了德国没有放弃希腊，而是需要希腊出台更强硬、更多的改革措施。

希腊获得下一笔援助贷款的先决条件是什么？默克尔称关键是看“三驾马车”的关于希腊债务持续性分析的评估报告，也就是看希腊的现状是否好于预期。评估报告的结果还未出炉，但种种迹象表明，希腊可以留在欧元区。德国财长朔伊布勒日前排除了希腊破产的可能性。据了解，下一笔希腊援助可能高达 315 亿欧元。为了避免道德风险，迫使希腊政府坚持改革，德国政府计划设立一个托管账户 (Sperrkonto)，以控制资金流向。

### 未来：不确定性尚存

笔者就欧债危机问题曾在德国海德堡进行了问卷调查，对象包括已工作人士（40 人）、失业者（3 人）和学生（72 人）。其中涉及德国民众对希腊危机看法的结果如下：近半数的受访者认为，希腊债务危机是希腊咎由自取，理由是希腊人好逸恶劳，经济结

构失衡，腐败现象猖獗。仅有约 1/5 的受访者表示，国际金融危机、欧元区仅有单一货币

而缺乏统一财政政策以及美国评级机构的推波助澜加剧了希腊的债务危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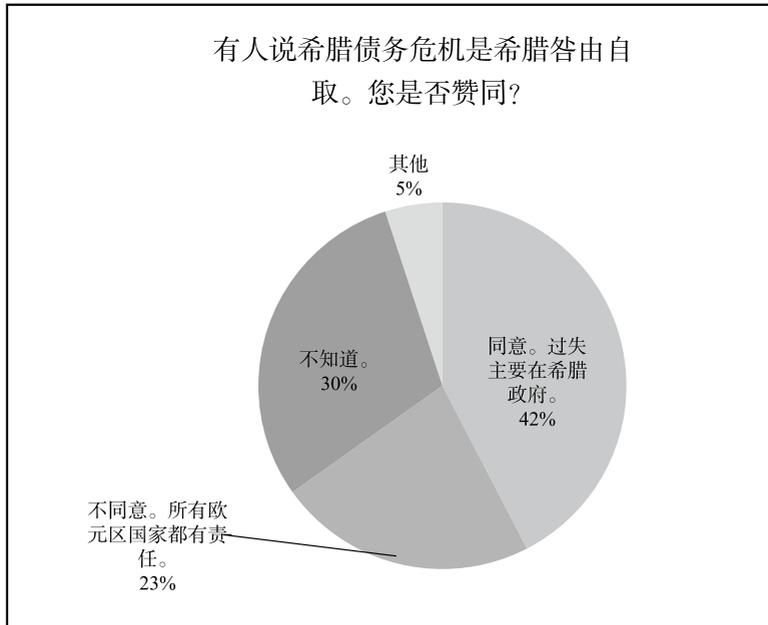


图 1

谈到希腊目前正在进行的紧缩计划和改革措施，只有少数受访者（13%）认同希腊

的努力，而大多数则称希腊的改革“不够”、“不理想”、“不具有持续性”和“问题多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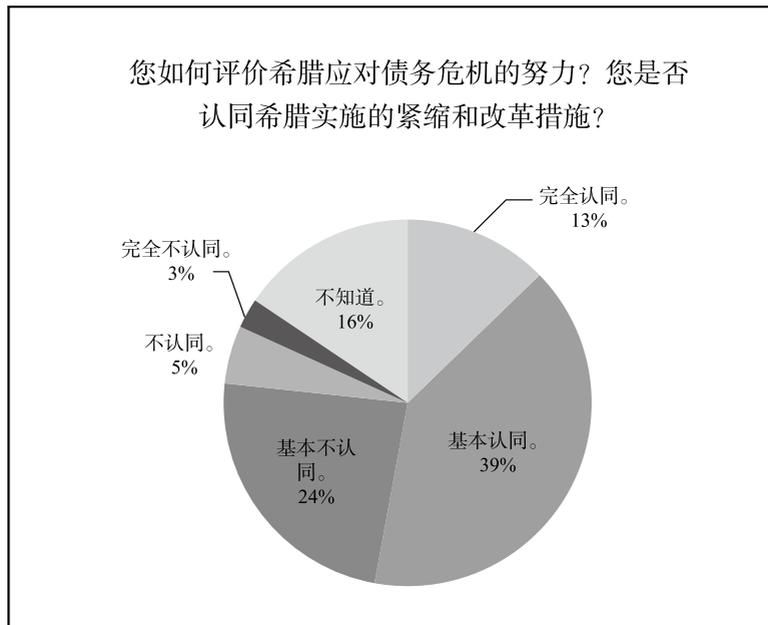


图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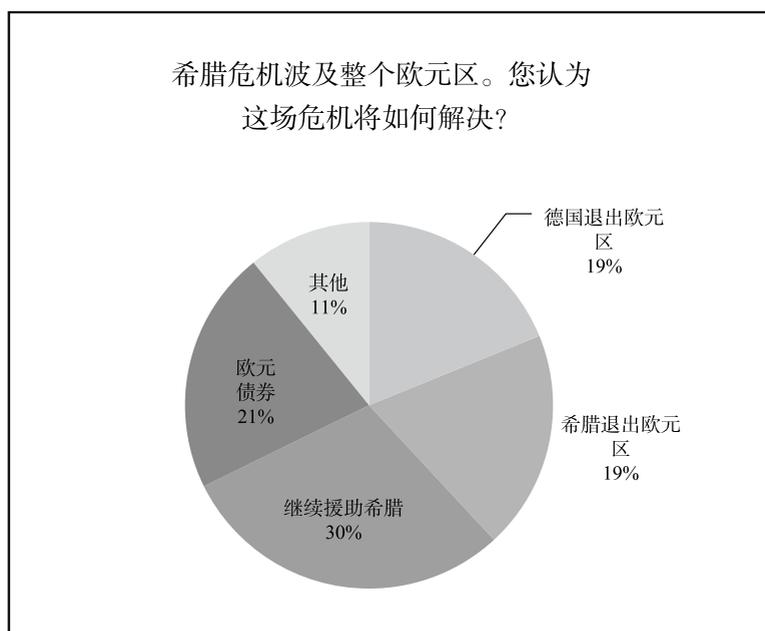


图 3

在问及希腊在欧元区的去留问题，1/5 的德国受访者希望希腊离开欧元区，在谈到德国自身时，同样多的受访者认为德国继续留在欧元区是弊大于利，欧元给德国带来更多的是负担。

可以说，德国民众对援助希腊已经越来越失去耐心。尽管默克尔和财长朔伊布勒一直强调希望希腊留在欧元区的决心。但考虑到今年德国即将迎来大选，为了争取选民的支持，各党派究竟会怎么打“希腊牌”，尚存变数。因此，德国对希腊的救助不能仅局限于希腊本身，而是要从整个欧洲债务危机的全局出发，并结合德国国内情况进行通盘考虑，防止风险继续积累。

此外，去年秋天欧洲央行宣布的无限额主权债务采购计划以及德国宪法法院 9 月 12 日有条件批准了欧洲稳定机制以及预算纪律财政契约成立的要求等利好消息，增强了市场对于克服危机的信心。根据德国联邦宪法法院的判定，欧洲稳定机制（ESM）没有违反德国宪法，但是德国参与欧洲稳定机制

必须遵守一定的条件，即德国的出资上限为 1900 亿欧元。德国作为欧元区最重要的国家之一，成为 ESM 的出资大户，在欧洲债务援助方面，德国在救谁以及怎么救的问题上，拥有了实际主导权。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欧元区的危机远不是 ESM 一项举措能够解决的，况且，它刚成立，今后的发展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究竟对希腊危机的解决能起多大作用，这个问题的答案尚在未定之天。

至于希腊危机究竟会走向何方？从理论上讲，希腊债务问题主要应通过内部改革、外部援助、债务重组、欧盟改革和退出欧元区这五个方面来考量。

一是内部改革。希腊需要拿出勇气和行动，抛开一己之利，更不能不顾欧盟一体化的大局；重视“德国模式”，通过紧缩财政政策和制度改革达到经济复苏。

二是外部援助。将欧洲金融稳定基金（EFSF）转化为永久性救助机制（EMF）；欧洲央行为最后贷款人，无限购债、无限提供流动性。

三是债务重组。进一步减免希腊债务。

四是欧盟的改革。欧元区国家加快建设政治欧盟、财政欧盟，进行根本性改革；建立高度一体化的“新欧洲”，成立欧元区经济政府，引进共同财政政策；设立紧缩委员。

五是希腊强制或自愿退出欧元区。印钞还债，执行量化宽松（QE）货币政策。但这

会带来其他的巨大困难。

无论希腊和欧洲作出何种选择，希腊债务危机的解决，必须标本兼治。只有希腊大刀阔斧进行改革，德国在具体问题上加大妥协力度，促进欧洲统一财政政策的监管，严肃财政纪律，才有望从根本上解决债务危机，以确保欧元的未来。

作者简介：罗然，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系硕士研究生。

# 文教论坛



# Deutschsprachige Anleitung der Doktoranden im Fach Deutsche Diplomatie und Ökonomie<sup>①</sup>

von YIN Tongsheng

**【 Abstract 】** Die heutige Zeit ist durch den Trend zur Multipolarität in der Politik, die Globalisierung in der Wirtschaft, Multidimensionalität in der Kultur und Chinas inzwischen wichtige Rolle auf dem internationalen Parkett gekennzeichnet. In dieser Konstellation spielen Deutschland und China sowie ihre Beziehungen zueinander eine immer größere Rolle. Zur Förderung dieser beidseitigen Beziehungen braucht China hochqualifizierte Fachkräfte, die sich sowohl in der Außenpolitik als auch der Wirtschaft der beiden Staaten auskennen. Das ist gerade die Ausgangsposition der Etablierung des Faches Deutsche Diplomatie und Ökonomie für chinesische Doktoranden. Dieser Beitrag ist in 7 Schwerpunkte unterteilt: 1. Promotion im Dienst des strategischen Bedarfs Chinas, 2. Vertrautmachen der Doktoranden mit ihrem Promotionsziel und Promotionspfad, 3. Integrierte Vorlesungen und Übungen, Literaturstudium und Aufsätze zur Förderung des Promotionsabschlusses, 4. Förderung von Kreativität und theoretischem Analysevermögen, 5. Angemessene Methodenlehre, 6. Bereicherung der Denkweisen, 7. Neue Thesen als Gerüst einer Dissertation.

**【 Schlagwörter 】** Doktoranden, Anleitung, Promotionspfad, Deutsche Diplomatie und Ökonomie

## 1. Promotion im Dienst des strategischen Bedarfs Chinas

Die heutige Zeit ist durch den Trend zur Multipolarität in der Politik, die Globalisierung in der Wirtschaft, Multidimensionalität in der Kultur und Chinas inzwischen wichtige Rolle auf dem internationalen Parkett gekennzeichnet. In dieser Konstellation spielen Deutschland und China sowie ihre Beziehungen zueinander

eine immer größere Rolle. Zur Förderung dieser beidseitigen Beziehungen braucht China hochqualifizierte Fachkräfte, die sich in der Außenpolitik und Wirtschaft der beiden Staaten auskennen. In diesem Zusammenhang sei betont, dass sich gemäß einer Studie des Chinesischen Bildungsministeriums 95% der chinesischen Wissenschaftler mit denjenigen der übrigen Welt messen können. Hinter den 5%

① Vortrag auf dem ersten Chinesisch-Deutschen Doktorandensymposium im Studienfach Germanistik der VR China.

jedoch, die die Weltspitze darstellen, bleiben chinesische Wissenschaftler zurück. Diese Lücke soll geschlossen werden. Demgemäß ist die Elitenförderung bei uns von großer Bedeutung. Eben vor diesem Hintergrund hat sich unsere Universität das Bildungsziel gesetzt, dem strategischen Bedarf des Staates gerecht zu werden. Das ist auch die Ausgangsposition der Etablierung des Faches Deutsche Diplomatie und Ökonomie für chinesische Doktoranden, also Neuland, das wir unbedingt betreten müssen.

Der Bedarf steht immer in engem Zusammenhang mit dem Angebot und das Angebot setzt stets u.a. Interesse voraus.

Ein Sprichwort bei uns lautet: „Das Wissen zu schätzen ist besser als es nur anzuhäufen. Freude daran zu finden ist besser als es nur zu schätzen.“<sup>②</sup> Interesse und die daraus entstehende Wertschätzung spielen hierbei eine wichtige Rolle. So muss das Interesse der Promovenden für die deutsche Diplomatie und Ökonomie fortwährend geweckt und aufrechterhalten werden.

Wir müssen uns dazu bekennen, dass wir seit langem aus allgemein bekannten Gründen nur ein verschwommenes und zum Teil unrealistisches Bild von der deutschen Diplomatie und Ökonomie hatten. Erst mit dem Einsetzen der Reform- und Öffnungspolitik gelang es uns, den über die Bundesrepublik gelegten Schleier zu lüften und ihren Glanz, ihren Zauber und selbstverständlich auch

ihre Probleme zu erkennen. Heute nimmt Deutschland sowohl in der Weltpolitik als auch in der Weltwirtschaft eine bemerkenswerte Stellung ein. Wir interessieren uns deshalb sehr für die Frage, wie die Bundesregierung ihre wertegebundene und interessengeleitete Außenpolitik betreibt und die „deutsche Krankheit“ behandelt.

## 2. Vertrautmachen der Doktoranden mit ihrem Promotionsziel und Promotionspfad

Konfuzius lehrte seine Schüler: „Lernt mit Offenheit, forscht mit Ernst, handelt mit Überlegung“<sup>③</sup>. „Lernen ohne zu denken ist vergebliche Mühe, denken ohne zu lernen ist gefährlich“.<sup>④</sup> Auch heute hat dies nach wie vor seine Richtigkeit.

Was die Forschung betrifft, so machte uns der berühmte Dichter Wang Guowei schon vor vielen Jahren auf drei Maximen aufmerksam:

Erstens: „Besteige allein den Turm und erkunde dann alle Wege zum Gipfel.“<sup>⑤</sup> Das heißt, dass man zunächst mit dem Promotionsziel und -pfad vertraut gemacht werden und zum Forschen entschlossen sein soll.

Zweitens: „Mein Gewand, so scheint's, ist mir zu groß geworden, doch dauert mich das nicht. Für mein kokettes Liebchen da hinzuschmelzen ist mir's wert.“<sup>⑥</sup> Das heißt, dass man fleißig sein soll und muss.

Drittens: „Plötzlich drehe ich mich um und sehe sie, die bei spärlichem Lichte

② 《论语·雍也》（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③ 《论语·子张》（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

④ 《论语·为政》（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⑤ 晏殊：《蝶恋花》（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

⑥ 柳永：《凤栖梧》（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sitzt.“<sup>⑦</sup> Das heißt, dass man letzten Endes nur durch Mühe Erkenntnisse gewinnt und zu Ergebnissen gelangt.

All das trifft auch auf die Promotion zu: Sich ein Ziel setzen und den Pfad identifizieren, beides dann mit Fleiß verfolgen und zum Erfolg führen. Um eine Promotion erfolgreich abzuschließen, muss man zielstrebig sein, fleißig studieren und unermüdlich forschen.

### 3. Integrierte Vorlesungen und Übungen, Literaturstudium und Aufsätze zur Förderung des Promotionsabschlusses

Die ganze Promotion dauerte bei uns 4 Jahre, seit 2008 ist eine Verlängerung um 2 Jahre möglich. Für die Doktoranden wurden dabei besondere Lehrveranstaltungen eingerichtet, da die auf dem üblichen germanistischen Bildungsweg erworbenen fachspezifischen Vorkenntnisse unzureichend wären. Insgesamt werden ihnen 8 Lehrveranstaltungen angeboten: Weltpolitiktheorie und -forschung (einschließlich des Realismus, Neorealismus, Idealismus und Neoidealismus sowie Konstruktivismus, insgesamt 15 Themenkreise), Theorie und Forschung zur deutschen Außenpolitik (15 Themenkreise), Theorien und Forschung in den Wirtschaftswissenschaften (einschließlich VWL, BWL, Makroökonomik und Mikroökonomik, insgesamt 36 Themenkreise) und Theorie und Forschung zur deutschen Wirtschaft (10 Themenkreise).

Die Doktoranden haben neben Publikationen, die sie für die Anfertigung der Dissertation lesen müssen, jährlich 6.000 Seiten Bücher systematisch zu lesen, insgesamt also 24.000

Seiten im Laufe der Promotion.

Pro Semester hat jeder Doktorand einen Aufsatz zu schreiben, der auch herausgegeben werden soll. Seine Promotion wird zuletzt von der Dissertation als Monographie gekrönt.

All dies dient der Befähigung der Doktoranden zur wissenschaftlichen Arbeit und zur Förderung ihrer Kreativität, zur Intensivierung ihres theoretischen Vermögens und zum kritischen Denken, einschließlich der Fähigkeit, basierend auf der durch das Studium der Literatur gewonnenen und von mir vorgegebenen Grundlagen, Initiative und persönliches Engagement zu entwickeln sowie aus eigenem Antrieb Lösungswege für die definierten Probleme aufzuzeigen.

Parallel zum Literaturstudium sammeln die Doktoranden Ideen und sollen in einem reflexiv-analytischen Prozess zur Wahl eines Themas gelangen, das akademischen Mut, hohe wissenschaftliche Qualifikation und ein hohes theoretisches Analysevermögen erfordert und gerade deswegen auch genügend Möglichkeiten zu kreativem Bearbeiten bei gleichzeitiger inhaltlicher Tiefe erlaubt.

### 4. Förderung von Kreativität und theoretischem Analysevermögen

Die Allchinesische Erziehungskonferenz hat mit Nachdruck darauf hingewiesen, dass es unseren Schülern und Studenten an Kreativität mangelt. Dies findet auch bei unseren Doktoranden seinen Niederschlag.

Kreativität ist laut Joy Paul Guilford jede neue, noch nicht da gewesene, von wenigen Menschen gedachte und effektive Methode, ein Problem zu

<sup>⑦</sup> 辛弃疾：《青玉案·元宵》（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lösen beziehungsweise die Miteinbeziehung von Faktoren wie Problemsensitivität, Ideenflüssigkeit, Flexibilität und Originalität.<sup>⑧</sup>

Das Kreativitätsdefizit ist vor allem dadurch gekennzeichnet, dass man in Aufsätzen, wissenschaftlichen Forschungsarbeiten und Doktorarbeiten neue bahnbrechende Ideen, Gedanken, Auffassungen, Analysen und Thesen vermisst, stattdessen aber Beschreibungen, Synthesen und Zusammenfassungen zu Gesicht bekommt. Dies ist eigentlich auf viele Determinanten zurückzuführen: Dem Schulsystem, das zu stark auf die Prüfung ausgerichtet ist, wird vor allem vorgeworfen, mit einer zu starken Orientierung auf Wissenserwerb und Begrifflichkeit viel zur frühzeitigen Verkümmern von Kreativität beizutragen.

Der Kreativitätsmangel ist meines Erachtens auch von der Theoriearmut abhängig. So müssen bei der Anleitung der Doktoranden stärkere Akzente auf Theorien gesetzt werden. Dies kann ihnen dazu verhelfen, den klassischen Wissenserwerb theoretisch zu untermauern. So erleben sie ihren Forschungsbereich als ein Feld voller Hürden, die jedoch mit Hilfe kreativer Lösungsansätze überwunden werden können. Da sich die Welt jedoch ständig verändert, ist es notwendig, auch kreativ weiterzudenken, bisherige Theorien zu überarbeiten, neue Ansätze zu entwickeln—also innovative Forschung zu betreiben. Daher sind wir sehr bestrebt, uns z.B. mit fast allen wichtigen Theorien in den Wirtschaftswissenschaften und in der Weltpolitik auseinanderzusetzen.

Der kreative Denkprozess kann auch durch

spezielle Kreativitätstechniken, z.B. Brainstorming-Sitzungen, Lieferung erster Grundideen, die dann zu Ideenkonzepten konkretisiert werden, sowie intuitive Methoden, diskursive Methoden, Kombimethoden, Tagungsbesuche und Expertengespräche gefördert werden, was beachtlich zur Ideenfindung und zum Ideenfluss der Doktoranden beiträgt.

## 5. Angemessene Methodenlehre

Bei der Forschung und Anfertigung der Dissertation ist der Methodik eine sehr wichtige Bedeutung beizumessen. Methoden werden häufig definiert als ein nach Mittel und Zweck methodisches Verfahren, das Fähigkeit und Fertigkeit zur Lösung theoretischer und praktischer Aufgaben stimuliert.

In diesem Zusammenhang verschafft uns die Methodologie ein vielfältiges Bild, das von Land zu Land, von Branche zu Branche, von Fakultät zu Fakultät unterschiedlich ist: In den Sozialwissenschaften sind wir Chinesen z.B. insbesondere auf das Methodensystem der Entlehnung, der Synthese, der integrierten Schöpfung und Urschöpfung angewiesen. Als Subsystem sind dann noch die folgenden Mittel zu empfehlen: Richtige Behandlung der Wechselbeziehungen zwischen Historie und Realität, Gegenwart und Zukunft, Gelingen und Misslingen, Bejahen und Negieren, Induktion und Deduktion, Synthese und Analyse, Statik und Dynamik, Qualität und Quantität, Konstituieren und Regulieren, Normativität und Positivität usw.

Die Deutschen haben im Gegensatz dazu andere Klassifikationen: In der Analyse

---

⑧ Kreativität und Ideenfindung, URL:[www.ideenfindung.de/Kreativität-Kreativitätstechniken-Seminare-Works](http://www.ideenfindung.de/Kreativität-Kreativitätstechniken-Seminare-Works).

der internationalen Beziehungen z.B. gelten vornehmlich korrelative Methoden, Forschungsstrategien nach dem Gitter-Modell, das szientifische Verfahren, das Isomorphie-Verfahren, die Input-Output-Analyse, indikatorische Methoden, holistische Methoden, verstehende Methoden (Hermeneutik), normative Methoden, Erhebungstechniken, Befragung, Ereignisanalyse (EA) und Transaktionsanalyse (TA) sowie die Spieltheorie. Außerdem wird auch den Analyseverfahren, Aufbereitungsverfahren, qualitativen Auswertungsverfahren, der Kodierung, der qualitativen Inhaltsanalyse, Programmen zur computergestützten Auswertung verbaler Daten, der Typenbildung und anderen Methoden große Bedeutung beigegeben.

Daraus resultiert dreierlei: Erstens müssen den Doktoranden angemessene Methoden vermittelt werden. Zweitens ist nach einer Originalität der Operationalisierung zu streben. Und drittens müssen Methoden neu entwickelt werden.

## 6. Bereicherung der Denkweisen

In der Forschung, insbesondere bei der Anfertigung einer Dissertation, sind wissenschaftliche Denkprozesse erforderlich. Viele Erkenntnisse reifen erst nach einer Phase des bewussten Denkens, nämlich unbewusst in einer Phase der Entspannung, wenn man Abstand zum Problem gewonnen hat. Viele große wissenschaftliche Einsichten kommen den Forschern scheinbar oft im Schlaf oder aus heiterem Himmel oder durch zufällige alltägliche Erscheinungen. Aber einem Doktoranden genügen weder ein einmaliges bewusstes oder unbewusstes Denken, noch vorbewusstes Denken. Ihm reicht auch nicht eine einzige

Denkweise aus. Er muss seine Denkweisen immer weiter bereichern. Er muss sich bemühen, analytisch, systemisch, vernetzt, divergent und holistisch zu denken. Er muss auch zu Für-Denken, Gegen-Denken und Quer-Denken fähig sein.

## 7. Neue Thesen als Gerüst einer Dissertation

Nach Wikipedia bezeichnet eine These „eine wissenschaftlich zu beweisende Behauptung oder einen Leitsatz. Eine These ist ein Gedanke oder Satz, dessen Wahrheitsinhalt eines Beweises bedarf. Eine These ist allgemein aufgefasst eine Aussage, die das Wesentliche aus einem Komplex von Aussagen pragmatisch hervorheben bzw. zur Geltung bringen soll.“

Eine Dissertation zu schreiben ist wie ein Hausbau: Die Thesen stellen Stahlbalken dar, während die Daten und Fakten mit den Ziegelsteinen verglichen werden können. Sind die Balken an der richtigen Stelle, sieht man schon die Form eines Hauses. Liegen nur die Ziegelsteine da, kann von einem Haus noch gar nicht die Rede sein. Fehlen also die Thesen, so ist die Arbeit keine wissenschaftliche. Daraus eben ergibt sich die Bedeutung der Thesen als Rückgrat der Dissertation. An den Thesen lassen sich der Ideenfindungsprozess sowie die Sammlung und Analyse von Gedanken ablesen, Kreativität, Innovation und Problemsensitivität, sowie Flüssigkeit und Flexibilität des Denkens kommen bereits in ihnen zum Ausdruck. Eben darum sind Thesen besonders mühsam und zeitraubend zu erstellen. Man hat vollkommen Recht, wenn man schon von „halb gewonnen“ spricht, sobald die Thesen aufgestellt sind. So sehe ich bei

der Anleitung auch darin meine wichtigste Aufgabe, also Priorität Nr. 1.

Mein bescheidener Beitrag besteht hier lediglich darin, einige Schwerpunkte für die Anleitung der Doktoranden angeschnitten zu haben. Es ist sicherlich auch unrealistisch, in diesem Rahmen für alle Probleme und Schwierigkeiten sowie eine grundlegende Neuorientierung innerhalb dieses komplexen Themenbereichs schlagartig Patenlösungen

zu erwarten. Wenn aber eine sachlich fundierte Analyse, wie von uns angestrebt zu dem Ergebnis führen würde, dass es aussagekräftigere Beweise, bessere Handlungsstrategien und wirksamere Lösungsmethoden gibt, so wäre schon ein deutliches Signal daingehend gesetzt, in den Bemühungen um eine konstruktive Intensivierung der Anleitung der Doktoranden nicht nachzulassen.

作者简介：殷桐生，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 对德国学生学习方式的跨文化研究

史笑艳

**【摘要】**本文在文献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对31名留德中国德语专业交换生的访谈资料，从跨文化视角对德国学生的学习方式进行了分析和论述。在资料的整理和分析过程中，本文运用了质性内容分析法。研究资料显示，从留德中国德语专业交换生上看，德国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倾向于自主性、集体式、主动参与式和按部就班的学习方式。

**【关键词】**学习方式 跨文化研究 质性研究

## 一、引言

21世纪，全球化继续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领域快速发展，推动了世界各国之间的沟通 and 交流，开始了各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相互交流和交汇的时代。在高等教育领域，国际高校之间的交流日益频繁，合作日益密切，出国留学的吸引力与日俱增。随着中国大学与德国大学建立校际关系的增多，越来越多的中国大学生在本科学习阶段就有机会前往德国留学。在跨文化学习过程中，当教师与学生来自不同文化背景时，了解对方文化所习惯的学习方式，是决定学生学习过程是否顺畅，能否实现有效学习的关键。

本文在理论文献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对31名留德中国德语专业交换生的访谈资料，从跨文化视角对德国学生的学习方式进行了分析和论述。

## 二、学习方式的概念

学习方式是学生对学习方法的定向或偏爱，它表明某特定学生在教学过程中通常喜欢采纳的方式，<sup>①</sup>是学习策略和学习倾向的总和。<sup>②</sup>其中，学习策略是指那些能促进信息加工的任何外显行为和内隐的心理活动。具体地说，学习策略是指学习者在学习活动中有效学习的程序、规则、方法、技巧和调控方式。<sup>③</sup>学习倾向(Lernpräferenzen)是指学习

① 张庆宗(主编):《外语教育心理学》，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64页。

② 同上，第65页。

③ 同上，第69页。

者在学习过程中的不同倾向，两位 Johnson 把学习倾向分为合作式的 (Kooperativ)、竞争式的 (Kompetitiv) 和个人式的 (individuell) 倾向<sup>④</sup>，在学习过程中不同的人显示出不同的学习倾向。

学习过程是一个由四阶段组成的周期活动，这四个阶段分别是“获得具体经验”、“边反思边观察”、“形成抽象的概念”和“积极试验”。<sup>⑤</sup>几乎所有人对上述学习周期的四个阶段都有不同程度的偏爱。据此，可以用具体和抽象、主动和被动两个维度区分不同的学习方式。将这两个维度相结合，可以总结出四种不同的学习方式，运用这四种学习方式的学习者分别被称为“反思者”、“理论者”、“实用主义者”和“积极活动者”。<sup>⑥</sup>

除此之外，学习立方体理论从三个维度对学习方式进行探讨。第一个维度是具体学习与抽象学习；第二个维度是指示性学习与自主性学习；第三个维度是个人学习与集体学习。这三个维度分别代表不同的学习倾向，组合在一起就构成了一个学习立方体。

借助于学习立方体模型，通过对学习立方体中的三个维度进行不同组合，可以总结出八种不同的学习方式，即指示性/抽象/个人、指示性/抽象/集体、自主性/抽象/个人、指示性/具体/个人、自主性/抽象/集体、指示性/具体/集体、自主性/具体/个人、自主性/具体/集体的学习方式。<sup>⑦</sup>

### 三、研究方法与研究设计

本文运用质性研究的方法，主要通过访谈法收集资料，同时结合学生的书面报告来了解被研究者对德国学生学习方式的真实想法和意义建构。访谈的对象是 31 名留德中国德语专业的交换生，他们分别来自北京外国语大学、天津外国语大学、青岛大学、山东大学和南京大学，在德国学习的时间为两个学期。广义意义上的交换生是指在交换国家、地区、学校或研究机构达成一致协议的情况下，经过一定的选拔程序到另外的学校进行学习的学生。从地域范围看，交换学习可以是国际性的，也可以是国家内部的交换；从学习时间看，交换学习主要是短期的，一般为半年至一年左右，主要在于进行国际理解、语言、文化、风土人情以及专业方面的学习和了解，不是为了取得学位或证书；从交换对象看，可以是中学生、大学生或研究生。<sup>⑧</sup>国外一般将根据学校之间的交流合作协议把合作学校交流学习的学生称为 exchange student (Austauschstudent)。在中国大陆，这一类学生也已在各高校广泛存在。然而，由于国内学术界及官方对这类学生还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界定，因此，目前社会各界对这类学生的称法并不统一，有的称为交换生，有的称为交流生，有的称为交换留学生。<sup>⑨</sup>本论文的

④ Johnson, David W./Johnson, Frank P.: Joining together and alone. Englewood Cliffs: Prentice-Hall. 1975, S.27.

⑤ Hanisch, Detlef A.: Managementtraining in China—Neue Erkenntnisse über Akzeptanz und Relevanz westlicher Managementtheorien und Trainingsmethoden, Frankfurt am Main: Europäischer Verlag der Wissenschaften, 2003, S.77.

⑥ Hanisch, Detlef A.: Managementtraining in China—Neue Erkenntnisse über Akzeptanz und Relevanz westlicher Managementtheorien und Trainingsmethoden, Frankfurt am Main: Europäischer Verlag der Wissenschaften, 2003, S. 152.

⑦ Ebenda, S.47.

⑧ 高玉蓉, 李晓培:《开展交换生项目促进高等教育国际化》, 载《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11年第1期, 第8—10页。

⑨ 陈青, 曾毅斌, 何洪, 邓少芝:《试析交换生与留学生的差异》, 载《高等理科教育》, 2011年, 第3期, 第57—60页。

访谈对象全部来自中国高校德语专业的学生,根据高等学校之间的校际合作培养协议,他们是在结束两年基础阶段的德语语言学习之后,被学校派往德国高校完成大学三年级学业的本科学生,他们在德国学习的时间为两个学期,之后要回到中国继续完成大学四年级的学业。在本论文中,笔者将这些学生称为交换生。

在2010年6月和2011年6月交换生留学期间,笔者先后几次前往德国与学生进行了深入访谈。在学生回国后,笔者让他们各自撰写了反思报告,全面了解了他们对德国学生学习方式的认知。

在资料的整理和分析过程中,笔者运用了质性内容分析的方法。通过对资料的转写和反复阅读,对原始资料进行了逐级的编码和归类,在对信息进行逐步加工处理的基础上,使研究结果得以呈现。

#### 四、研究结果

在访谈时,当交换生讲述其对德国学生学习方式的认知时,经常是在对自身的学习方式进行反思,对两国学生不同的学习方式进行比较进行描述。因此,本文对德国学生学习方式的分析和论述体现了留德中国德语专业交换生的跨文化视角。

本文的研究资料显示,在留德中国德语专业交换生看来,德国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倾向于自主性的、集体式的、主动参与式的和按部就班的学习方式。

##### 1. 自主性的学习方式

在访谈时,交换生普遍认为,与中国学生相比,德国学生的学习方式较为独立自主,“学生自己的空间很大”(赵佩佩语)。徐思一观察到德国学生“是以自己的学习安排为准,

老师会在开学初就发教学计划给学生,允许学生这个学期有权利翘课三次,学生会根据自己的喜好和发展研究的兴趣去选择翘课”。关于这一点王欣悦总结道:“在德国学习,你就必须自己选择性的去吸收自己想要的东西,就是自主性要强一点。”

在具体选择专业的时候,张虹提到“德国学生都是按照自己的兴趣来选,就会自发去做好多东西。比如有一些学生自己真心地喜欢文学,除了老师要求的那些东西之外,还会看作者的其他作品。”,还有她的室友“是学农业的,他就会自发去做很多的实验,然后得出结果写报告,就是很自主性地去学习”。

在学习的自觉性方面,杨洋认为“在德国学习靠自觉,真的是靠自觉,你怎么选课也没人管你,你不交作业也无所谓,没人管你就只能靠自己了”。

此外,自主性的学习方式也体现在德国学生在学习知识的过程中是更加喜欢通过讨论解决问题,而不是一味地强调记忆书本知识。学生们谈到,德国学生“思考的深度和方式与中国学生不一样”(吴睿语),“他们的发散性思维要强一些,会想到很多东西,很多奇思妙想,他们虽然没有我们刻苦,但理解的会比我们更深层一些”(李蕊语)。在讨论方面,刘宇波认为“德国学生很喜欢讨论,这也可能是一种习惯,他们如果有不同意见就一定要讨论出个结果,思维可以活跃,大家都把思维调动起来,讨论完了之后思维有种集合,可能得出一个更好的结果来”,而且德国学生“对自己的意见是比较坚持的”。孙妮娜发现“德国学生挺能说的,挺能辩的,经常相互辩来辩去,很容易一节课就让他们辩过去了,而且他们总是能想出一些自己意想不到的观点,他们的论证也有一套自己的逻辑”。

体现在考试方面,郭莎莎觉得和中国学生相比,“德国学生做闭卷考试的话,还没有

特别一体化的方法，他们更擅长写学期论文，就是自己下去要翻很多的资料，自己提一个问题出来，他们在自主性的、发散性的那些方面比较擅长”。高强也提到“德国学生的思维特别奇怪，而且他们不听你的，他们有自己的想法，想法比较多而且发散”，他认为造成这一差异的原因是“在德国，那种开放一点的问题比较多，而在中国以前高考、中考，什么东西都要求一个答案，一个标准答案，中国学生虽然很勤奋，很乐于去学习，但是有时候就有一点死板”。

## 2. 集体式的学习方式

在个人学习和集体学习这一点上，交换生认为德国学生“更喜欢小组一起学习”（张虹语），“好多人围在一起讨论，不停地说话”（魏文娟语）。张虹经常看到她的“室友会找同学一起到家里来学习”，李蕊去图书馆自习的时候，也会看到“在图书馆三楼那里有很多很多人在小组学习，一上去以后就一片吵，在学生宿舍的自习室也是，经常看到一伙德国人聚在一起讨论问题”。谢佳提到自己在德国学习的感受时也讲道：德国学生很重视小组合作式的学习，真的是把这个当做一个学习方式。我觉得他们可能从小就是这样的，他们习惯了这个模式，很多事情都是讨论得出的，而且他们还会有一个老师去教他们，比如说在一个学习小组里面，这个学生学习特好，但他也不会介意自己跟学习不好的同学坐一起。他们觉得自己学习好就有愿意教别人的感觉，就是你不会我教给你。我觉得好像我每次看到那里总是有一个人在主导的，有一个人会说，我认为这个事是怎么样的，这道题是怎么样的。

对于德国学生习惯集体式学习方式的原因，同学们认为“德国老师出的练习很多是没有答案的，你不知道你做这个练习有没有做对，你又不可能一个一个问题都去问老师，

那就需要两个同学一起对比一下答案，不会的来讨论。因为没有答案，自己查不到的情况下就是同学讨论对比，如果再有问题再去问老师，不发答案这是老师的一个策略。”（赵佩佩语），而且“德国老师布置的作业，还有上课做的一些练习基本上都是小组合作式的学习”，而不是“老师发一张题给大家，大家各做各的，做完了对答案”（陈静语）。

## 3. 主动参与式的学习方式

通过在德国两个学期的学习，交换生们认为与中国学生相比德国学生比较外向，“老师抛一个问题出来，学生就开始抢着回答，发言的积极性比国内高很多，一节课上几乎就是没停过”（孙妮娜语），而且“德国学生上课比较敢讲，说错了没关系，老师会知道你在学”（许安然语），韩依依认为“德国大学生的学习方式很像中国的小学生时期，积极、认真，真的是想去学，有一种自主的能力，课堂上会积极地和老师回应，会举手回答问题”，谢佳谈到了自己在德国课堂上的感受：德国学生特别愿意说自己的想法，他们课堂上一般不会冷场，大家都会来回说自己想的是什么。就算有时候你觉得他说的特可笑，比如说我们上语言学，就会比他们有优势。因为我们本来就是外语，我们知道格是什么，他们可能都不知道，因为他们是母语者，但是他们也讲，他们想到他们就讲。有时候你觉得他们怎么这都讲，但是他们真的是特别勇于跟老师交流。他们就是想学东西。他们有什么问题就会问，老师也会问，你们对这个有什么问题。他们就是不知道也说，就是想知道这个事，他们就会讲，跟我们不一样。

除了在回答问题方面交换生们感受到德国学生与自己有不同的表现之外，他们还观察到两国的同学在向老师提问的时候也有一些差异。在中国，学生“喜欢下课单独问老

师”(孙妮娜语)，“上课的时候，从小学一直到大学，有问题大家一般都课后问，上课也不敢说什么，突然站起来跟老师说有问题，好像就没有过这种情况”(刘丽丽语)。可是在德国“大部分学生都是上课问问题的”(孙妮娜语)，“不会在下课之后缠着老师问”(赵佩佩语)，而且“在课堂上有什么问题就可以直接讲，德国学生就可以直接打断老师说自己有一个问题之类的”(刘丽丽语)。

#### 4. 按部就班的学习方式

在具体的学习策略方面，交换生们认为“德国学生不像中国学生那么灵活，会有一些小技巧，小办法什么的，更好、更快的一下子就学会，比较不会变通”(陈静语)。对此，王雨涵举例到：“比如说这个词我不懂，我马上就查字典，查完字典我们记住它，这件事儿就结束了。体现在考试上，中国学生比较适应考试，而德国学生就不那么灵活”。对此，陈静也有同感，她讲道：“德国学生还是相对比较严谨，可能比中国学生更严谨，比如说上课学一个什么东西，德国学生必须按部就班的，一完了是二，二完了是三，不会说中间哪一步会省略。他们很少变通的”(陈静)，同样是遇到生词，王雨涵观察到“如果德国学生说这个词不懂，那大家就来讨论一下，你觉得它有可能是什么意思，大家怎么想，根据这个词你想到了什么，大家记住了吗，大家再查字典吧，时间会拉得很长”。谢佳在回国后报告里写道。

值得一提的是，他们每节课配套的练习课是我一生遇到的最事无巨细的练习课，连一加一等于二这个等式都会不厌其烦地写上，

这点我真的很同情做事较真的德国人。

在学习习惯方面，德国学生也有很相近和相像的地方，例如“很喜欢用A4的笔记本纸，把东西整理得很清晰，然后用卡片复习”(梁青语)，而且“有一套记笔记或者说是文档整理的系统”(徐思一语)。对此，梁青的感觉是德国学生“比较执拗”，韩依依觉得他们过于“按部就班，不够高效”，“没有中国学生那种要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一个任务的能力，有时回答问题也说不到点儿上”。

## 五、总结与展望

本文从留德中国德语专业的交换生在跨文化学习过程中的切身感受出发，对德国学生的学习方式进行了论述。研究表明，德国学生的学习方式较为独立自主，更加重视独立思考，发散性思维比较强，喜欢小组合作学习，在课堂上发言的积极性比较高，有了问题也会随时打断老师直接提出来，有自己的一套按部就班的学习策略和系统，与中国学生相比更加擅长写学期论文。

任何教育模式和学习文化都是特定民族文化的产物，具有极大的丰富性，而学习方式作为学习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同样具有多样性。本论文是笔者对德国学生的学习方式进行跨文化研究的一个开端，今后笔者将继续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更加丰富的资料收集方法，例如参与观察法等对论文的结论作进一步的实证调查和研究，并且对隐藏在学习方式差异背后的民族文化因素进行跨文化探究。

作者简介：史笑艳，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系讲师，博士研究生。

# 维也纳大学孔子学院 ——中奥两国教育合作的典范

王 静

【摘要】维也纳大学孔子学院经过六年来的发展，在汉语教学、中国文化推广及教材和文化读物出版领域均取得了显著成绩，成为奥地利汉语教育领域和中国文化推介的重要机构。本文主要介绍该孔子学院的发展现状及其突出的工作特色。

【关键词】孔子学院 汉语教学 文化推广

维也纳大学孔子学院也许是中国和奥地利两国教育合作方面最值得一提的项目：作为奥地利第一家孔子学院，它是中国国家汉办/孔子学院总部、中国最具权威的外语类学府北京外国语大学与奥地利最古老、规模最大的大学维也纳大学之间卓有成效的合作。维也纳大学孔子学院不仅仅是中奥两国文化和教育交流合作的桥梁，也尝试着给文化合作冠以“平衡”的方式。中方和外方院长平行合作管理孔子学院的方式，在跨文化对话领域可以为两国间的其他合作项目作出示范。

## 一、维也纳大学孔子学院概况

维也纳大学孔子学院于2006年9月挂牌成立，2007年4月正式投入运营。学院实行理事会指导下的院长负责制，维也纳大学校长任理事长。学院成立以来奥方院长一直是维也纳大学东亚研究院汉学系副教授 Richard

Trappl（中文名：李夏德）担任，中方选派的首任中方院长为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系周惠副教授。

与德语地区其他海外孔子学院相比，维也纳大学孔子学院机构组建方面特色明显，下设在维也纳大学全资子公司维也纳大学革新中心有限公司，既确保学院运作的灵活性，又能同时享受教育培训领域的各项优惠政策。

截至目前学院成立六年多以来，不论在汉语教学方面，还是在中国文化推广领域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2010、2012年维也纳大学孔子学院两次荣获“先进孔子学院”称号，第二任中方院长王静也在2011年受到“孔子学院先进个人”的表彰。

## 二、汉语教学开展情况

奥地利的汉学教育起步较早，始于1843年维也纳大学聘任通晓多种外语的费之迈

(August Pfizmaier) 开设汉语言文学课, 可惜 1848 年席卷欧洲的大革命迫使教学中断。19 世纪末恢复汉学课程, 但直到 1972 年维也纳大学才设立了奥地利第一个汉学教席。经过几十年的发展, 目前维也纳大学汉学系的规模处于欧洲前列, 在读学生人数超过 800 人, 培养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

鉴于维也纳已有一定的汉学规模, 维也纳大学孔子学院将汉语教学定位于对汉学的补充, 学生来源主要有如下几类: (1) 在校的非汉学学生; (2) 社会从业人员; (3) 其他对汉语感兴趣的学习者; (4) 受各类院校和机构委托的汉语教学, 如: 奥地利国防大学、维也纳外交学院、维也纳技术大学、维也纳莫杜尔旅游大学、维也纳国际学校、维也纳多瑙国际学校、维也纳第四国立中学、奥地利儿童大学等, 尤其是奥地利国民议会、奥地利外交部、奥地利多个州市的劳工局都委托孔子学院提供定制课程。

维也纳大学孔子学院的汉语课程参考《欧盟语言框架》的课程体系, 提供从 A1 (初学) 至 C2 (接近母语) 水平各个等级的汉语课程。学生在达到一定出勤率的基础上, 允许参加结业考试, 考试评估分听、说、读、写四方面技能, 各项技能均合格者, 可以获得孔子学院颁发的欧洲学分互认体系 (ECTS) 框架下的成绩证明。该证明在奥地利各大高校均被认可, 可以根据学生所学专业计入学生的学分体系。

此外, 维也纳大学孔子学院还是目前奥地利唯一具备举办三种国际汉语考试资质的考点: 汉语水平考试 (HSK)、商务汉语考试 (BCT) 和青少年汉语考试 (YCT), 除了维也纳之外, 还开设了林茨和因斯布鲁克两个分考点。考生来源除奥地利之外, 还有来自捷克、波兰、匈牙利的汉语学习者。

为促进奥地利汉语学习和教学水平, 孔子学院每年均提供赴华留学“孔子学院”奖

学金, 并不定期组织汉学教师培训, 每年暑假还组织青少年来华夏夏令营。

目前维也纳大学孔子学院已为奥地利培养了一大批汉语人才, 2011 年 8 月维也纳大学孔子学院选派的选手 Thomas Plessner (中文名: 吴家齐) 在第十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中一路过关斩将, 在来自 68 个国家的 118 名选手中脱颖而出, 成为第十届“汉语桥”的总冠军。

### 三、中国文化推广活动情况

维也纳大学孔子学院借助维也纳的多元文化和国际大都市的环境, 在六年内先后组织并且举办了 200 多场次以中国文化为重点的活动。仅 2012 年内, 孔子学院与奥国各界携手合作, 举办备受关注与好评的社会文化活动共 50 余场, 除“中国民间传统节日”、“中国民俗”、“新的视角看孔子”、“中国歌曲一百年”、“新丝绸之路”、“中国印”、“中医保健与养生”等内涵丰富的文化讲座之外, 音乐相关文化活动一向是地处“音乐之都”的维也纳大学孔子学院的特色。2012 年举办多场特色音乐会, 如“新春二胡音乐会”、“茉莉花”扬琴音乐会、草原艺术团乌兰牧骑专场演出、中国古琴大师金蔚在金色大厅的古琴独奏会、琵琶与古典诗词音乐会等, 为当地观众呈现了不计其数的中西合璧的视听盛宴, 使孔子学院真正成为中奥文化交流的桥梁。

2012 年 10 月 14 日, 维也纳大学孔子学院举办《芬妮的微笑》电影再映活动。这部影片是为纪念中奥建交 30 周年制作的一部合拍片。影片取材于生活在浙江东阳一个小村庄里的奥地利籍女士格特鲁德·瓦格纳 (Gertrude Wagner-Du) 的真实故事。影片女主角的原形格特鲁德·瓦格纳女士的五位孩子从中国赶来维也纳参加放映活动, 影片中

女主人公的扮演者奥地利当红女星妮娜·普罗尔(Nina Proll)和奥方制片人约瑟夫·考设尔(Josef Koschier)也亲临播映现场。维也纳市议会议员代表致辞,并代表维也纳市长将五枚特色纪念勋章赠送给五位兄弟姐妹。影片放映了一个半小时,这段至死不渝的跨国爱情,感动了在场所有观众。

据悉,维也纳大学孔子学院2013年继续策划一系列中国文化推广活动,如:中国宗教系列讲座、王家新与顾彬朗读会、民乐“爵士风”音乐会、昆曲演出“牡丹亭”,尤其是今年推出的新系列“作客帕尔菲宫”,将先后邀请国际知名汉学家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考林·麦克罗斯(Colin Mackerras)教授、托马斯·拉贝(Thomas Rabe)教授(被称为“中国辛德勒”的拉贝爵士的孙子)等进行主题演讲。

#### 四、教材和文化读物出版项目

为推动汉语教材本土化的发展,维也纳大学孔子学院已出版教材《人人汉语》(外文出版社,2011)、《回见》(*Bis Bald*)(第一册课本和练习册)(德国CBT出版社,2012),辞书《学汉语小词典》(外文出版社,2011),合作编写《德汉汉德经济术语词典》(*Lexikon der Wirtschaftsbegriffe*)(奥

地利echo-media出版社,2012)和《奥地利国防军德汉实用语手册》(*Sprachfibel Deutsch-Chinesisch, für Bedienstete des Österreichischen Bundesheeres*)(奥地利联邦国防与体育部,2011),并推出系列文化读物《中国集萃》(*China Erlesen*)(奥地利Wieser出版社,2009/2011),2012年出版有声书《中国制造——7个传说故事》(*Made in China—7 chinesische Märchen*)(奥地利Letter P.出版社)。此外,《孔子这样说》(德汉双语)和《奥地利与中国》两部著作也即将通过奥地利Bacopa出版社出版发行。

#### 五、结语

自孔子学院成立以来,维也纳大学孔子学院经历了发展初期的种种困难,逐步在奥地利树立起特有的品牌,成为奥地利汉语教育领域和中国文化推介的重要机构,影响力也远远超越了学院所在地首都维也纳,被社会各界誉为中奥合作的典范,目前已步入良性上升发展阶段。更好地融入所在国社会,更多地服务社区,成为名副其实的奥地利“中国语言文化之友的第一地址”(Die erste Adresse für Freunde der chinesischen Sprache und Kultur),为维也纳大学孔子学院指明了未来的发展道路。

作者简介:王静,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系讲师,奥地利维也纳大学跨文化交际专业博士候选人。

# Verschiedene Ansätze in der Landeskunde

von PAN Xuefan

**【 Abstract 】** Ausgehend von der Vermutung, dass Landeskunde im Fremdsprachenunterricht stets eine wichtigere Rolle spielt, als gemeinhin angenommen wird, versucht dieser theoretisch ausgerichtete Beitrag, die folgenden drei Fragestellungen zu beantworten: Was ist eigentlich Landeskunde? Welche Ziele hat sie bezüglich der Sprachlernenden? Welche Ansätze gibt es in der Unterrichtspraxis? Dabei soll gezeigt werden, wie problematisch der Landeskunde-Begriff ist und wie sich die Wandlung der Ansprüche an die Landeskunde (gleichzeitig mit der Veränderung in der Fremdsprachendidaktik) vollzogen hat. Zum Schluss zieht die Autorin das Fazit, dass sich die Ziele und Aufgaben der unterschiedlichen landeskundlichen Ansätze trotz der Verschiedenheiten nicht messerscharf voneinander trennen lassen. Der Lehrperson sollte bei der Unterrichtskonzeption klar sein, welche Ziele durch die Vermittlung angestrebt werden und welche Ansätze für diese Vermittlung am besten geeignet wären.

**【 Schlagwörter 】** Landeskunde, Begriffsbestimmungen, Ziele, Ansätze

## 1. Unterschiedliche Ansichten zur Landeskunde

Landeskunde spielt nach wie vor eine sehr wichtige Rolle im Fremdsprachenunterricht. Zur Frage, was Landeskunde jedoch eigentlich ist, gibt es verschiedene Ansichten. Um zu zeigen, wie problematisch der Landeskunde-Begriff tatsächlich ist, soll daher kurz auf folgende zufällig ausgewählte Ansichten eingegangen werden.

S. J. Schmidt beschrieb „Landeskunde

als Kontextwissen“. Wobei Kontextwissen als „Gesamtheit der politischen, sozio-ökonomischen und kulturellen Gegebenheiten, die für die Produktion und Rezeption sprachlicher Äußerungen maßgeblich sind/waren“ verstanden wurde. Ein auf diesem „Kontextwissen“ basierender Landeskundeunterricht orientiert sich stark an Faktenwissen und ist weitestgehend objektiv.<sup>①</sup>

Im *Handbuch Fremdsprachenunterricht*

① Pauldrach, Andreas: „Eine unendliche Geschichte. Anmerkungen zur Situation der Landeskunde in den 90er Jahren.“, *Fremdsprache Deutsch*, Heft 6, 1992. S. 6.

hat Buttjes Landeskunde folgendermaßen dargestellt: „Landeskunde meint alle Bezüge auf die Gesellschaften, deren Sprache im Fremdsprachenunterricht gelernt wird. Solche soziokulturellen Bezüge treten im fremdsprachlichen Curriculum immer dann auf, wenn den Lernenden die fremde Sprache in ihrem ursprünglichen Verwendungszusammenhang vorgestellt wird.“<sup>②</sup> Unter dieser Definition wurde Landeskunde nicht nur auf die „hohe Kultur“<sup>③</sup> bezogen, denn Begriffe wie „Alltagskultur“<sup>④</sup> und „Leutekunde“ wurden hier ebenfalls mit eingeschlossen.<sup>⑤</sup> Im Gegensatz zum objektiven und allgemeingültigen „Kontextwissen“ beinhaltet ein auf diesem erweiterten Kulturbegriff basierender Landeskundeunterricht subjektive Erfahrungen, Reaktionen sowie die Berücksichtigung der kulturspezifischen Wahrnehmung der Lernenden.

Parallel zum interkulturellen Lernen<sup>⑥</sup> hat sich die Vorstellung von einer interkulturellen Landeskunde gegenüber der traditionellen

Landeskunde durchgesetzt. Der Bezug zum jeweiligen Lernenden und die Mitberücksichtigung der interkulturellen Verstehensproblematik kommen in folgender moderner Landeskundedefinition zum Ausdruck:

*„Die Gesamtheit aller Informationen und Deutungstheoreme, die dazu dienen, das Interaktionswissen (z.B. Begrüßungsformeln, Wahrnehmungs- und Mentalitätsunterschiede) eines jeweiligen Sprachlerner zu optimieren, sein Verständnis der Zielkultur und ihrer historischen und gesellschaftlichen Bedingungen zu verbessern und ihn darüber hinaus in die Lage zu versetzen, sich der verschiedenen Mechanismen der fremdkulturellen Lern- und Wahrnehmungsprozesse bewusst zu werden.“*<sup>⑦</sup>

Das bedeutet, dass die interkulturelle Sensibilisierung der Lernenden im Umgang mit der fremden Kultur und die Fähigkeit, die fremde Kultur mit der eigenen Kultur zu vergleichen, im Vordergrund stehen.

Durch die obigen Begriffsbestimmungen sieht

② Buttjes, Dieter: „Landeskunde-Didaktik und landeskundliches Curriculum.“ In: Bausch, Karl-Richard/Christ, Herbert/Hüllen, Werner/Krumm, Hans-Jürgen (Hrsg.), 1989. Handbuch Fremdsprachenunterricht. Auflage 1. Tübingen [u.a.]: A. Francke, 1989. S. 112.

③ Unter der „hohen Kultur“ versteht man „die hohen Leistungen geistiger und schöpferischer Tätigkeiten aus den Bereichen Musik, Literatur, Wissenschaft usw.“ (Biechele, Markus/Padrós, Alicia: Didaktik der Landeskunde. Fernstudienprojekt zur Fort- und Weiterbildung im Bereich Germanistik und Deutsch als Fremdsprache, Berlin [u.a.]: Langenscheidt, 2003. S. 22).

④ Alltagskultur bezeichnet „die alltäglichen, meist unbewusst ablaufenden Verhaltensweisen von Menschen im täglichen Umgang“ (vgl. Huneke, Hans-Werner/Steinig, Wolfgang: Deutsch als Fremdsprache. Eine Einführung. Auflage 5, Berlin: Erich Schmidt, 2010. S. 88).

⑤ Pauldrach, Andreas: „Eine unendliche Geschichte. Anmerkungen zur Situation der Landeskunde in den 90er Jahren.“, Fremdsprache Deutsch, Heft 6, 1992. S. 5.

⑥ „Lernprozesse, die zu einer toleranteren Einstellung Fremden gegenüber, aber auch zu einer kritischen Einschätzung der eigenen Kultur führen können, bezeichnet man als interkulturelles Lernen“ (Huneke, Hans-Werner/Steinig, Wolfgang: Deutsch als Fremdsprache. Eine Einführung. Auflage 5, Berlin: Erich Schmidt, 2010. S. 87.).

⑦ Landeskundliche Gegenstände I: Standpunkte, in: Deutsch als Fremdsprache. S. 1160, URL: books. Google.de.

man: Was die Definitionsversuche so schwierig macht, ist offensichtlich ihre Grenzenlosigkeit und die daraus resultierende Problematik bei der Gestaltung der landeskundlichen Anteile in der Unterrichtspraxis.<sup>⑧</sup> Meiner Meinung nach sollten bei der Auswahl von landeskundlichen Themen vor allem die Themen, die für die Zielgruppe interessant und relevant sind, im Mittelpunkt stehen.<sup>⑨</sup> Daneben sollten auch die Lernorte, das sprachliche Niveau und auch die Konzeption der Materialien berücksichtigt werden. Die kulturellen Besonderheiten und die alltagsbezogene Kommunikation sind für die Lernenden im Zielland relevanter als für die Lernenden im Ausland, da Letztere nur allgemeingültige Informationen über das Zielland erfahren wollen. Ein Thema wie das politische System Deutschlands könnte den Lernenden mit niedrigem sprachlichem Niveau schwerer fallen als den Lernenden, die die deutsche Sprache bereits gut beherrschen. Außerdem sollten die Materialien für den landeskundlichen Unterricht möglichst korrekt und aktuell sein.

Trotz der Schwierigkeiten bei der Begriffserklärung nimmt Landeskunde im Fremdsprachenunterricht heutzutage eine wichtige Rolle ein. Welche Ziele Landeskunde in Bezug auf den Sprachlernenden hat, soll im folgenden Kapitel näher betrachtet werden.

## 2. Ziele der Landeskunde

Heutzutage steht im Landeskundeunterricht

das subjektbezogene Erfahren einer fremden Kultur im Mittelpunkt, wobei die primäre Aufgabe der Landeskunde nicht die Wissensvermittlung ist, sondern die Wahrnehmung der jeweiligen Lernenden im Umgang mit der fremden Kultur. Das heißt aber nicht, dass Landeskundeunterricht ohne Fakten und Daten möglich ist, denn die Sprache als Kommunikationsmittel kann nicht ohne Bezug zu der Gesellschaft, in der die Sprecher dieser Sprachen leben, vermittelt und erlernt werden. Daher ist die Vermittlung der Kenntnisse heutzutage immer noch eine Funktion, die die Landeskunde erfüllt. Darüber hinaus ist zu erwähnen, dass Landeskunde die Motivation der Lernenden beim Erwerb einer Fremdsprache unterstützt. Wenn aufgrund dieser Informationen das Zielsprachenland den Lernenden näher und vertrauter gemacht wird, dann werden auch gleichzeitig das Interesse an der Sprache und die Lernmotivation größer.<sup>⑩</sup> Durch Realisierung von Themen, die sich auf die alltägliche Wirklichkeit beziehen, kann eine höhere Effektivität des Sprachenlernens erreicht werden. Reines Faktenwissen kann hingegen das Interesse der Lernenden nur schwer wecken, denn es hat geringen Bezug zum Handeln in der Alltagskommunikation. Außerdem erwartet man von der modernen Landeskunde, dass sie Vorurteile abbaut, über das Verstehen des Fremden die Selbsterfahrung der Lernenden schärft und dadurch eine positive Einstellung der

⑧ Pauldrach, Andreas: „Eine unendliche Geschichte. Anmerkungen zur Situation der Landeskunde in den 90er Jahren.“, Fremdsprache Deutsch, Heft 6, 1992. S. 5.

⑨ Ebd.

⑩ Huneke, Hans-Werner/ Steinig, Wolfgang: Deutsch als Fremdsprache. Eine Einführung. Auflage 5, Berlin: Erich Schmidt, 2010. S. 87.

fremden Kultur gegenüber herausbildet.

Von hier aus werden heute an den Landeskundeunterricht komplexere Anforderungen gestellt als zu Beginn der landeskundlichen Didaktik. In der Unterrichtspraxis sollte eine zeitgemäße Landeskundekonzeption in Verbindung mit Sprachunterricht einerseits dazu dienen, den Lernenden mit der politischen Struktur, den Institutionen, der Geschichte, den sozialen und kulturellen Verhältnissen eines jeden Zielsprachenlandes vertraut zu machen; andererseits soll Landeskunde das Verstehen der Mentalität der Menschen, deren Sprache erlernt wird, fördern.<sup>①</sup> Natürlich ist es unmöglich, allen diesen Forderungen in der Praxis immer gerecht zu werden, aber sie können als Orientierungshilfe bei der Gestaltung des Landeskundeunterrichts dienen.

### 3. Verschiedene Ansätze in der Landeskunde

Bei der Darstellung von verschiedenen Ansätzen des landeskundlichen Lehrens und Lernens unterscheiden beispielsweise Weimann/Hosch (1993) zwischen einem kognitiven, einem kommunikativen und einem interkulturellen Ansatz. Trotz der Verschiedenheiten lassen sich die Ziele und Aufgaben der verschiedenen landeskundlichen Ansätze nicht messerscharf voneinander trennen. In der Unterrichtspraxis kann man häufig Elemente der verschiedenen Ansätze in bunter Mischung finden und die Ansätze werden selten klar differenziert.

Bei dem kognitiven Ansatz der Landeskunde handelt es sich um die Vermittlung faktenbezogenen Wissens über eine fremde Kultur, wohingegen die kommunikative Landeskunde sich bei der

Auswahl von landeskundlichen Fragen und Themen am nötigen Wissen für eine erfolgreiche Kommunikation im Alltag orientiert. Der zurzeit viel diskutierte Ansatz einer vergleichend-interkulturellen Landeskunde beruht auf der Zielsetzung, Kenntnisse über ein fremdes Land und seine Menschen zu vermitteln und damit die Möglichkeit zu bieten, die Verschiedenheiten von Kulturen und entsprechenden Verhaltensweisen wahrzunehmen und somit eine Offenheit für die Begegnung mit einer anderen Kultur zu schaffen. Im Folgenden Kapitel werden die drei „Herangehensweisen“ näher betrachtet und diskutiert.

#### 3.1 Kognitiver Ansatz

Im kognitiven Ansatz sollen die Lernenden die Kultur des Zielsprachenlandes im Rahmen der Realienkunde kennenlernen. Dadurch werden systematische Kenntnisse über die Zielkultur und Gesellschaft vermittelt. Themen wie Geographie, Politologie, Geschichte oder Literaturwissenschaft stehen im Mittelpunkt, während das alltagsbezogene Wissen keine Rolle spielt. Dabei zielt der Lernprozess vor allem auf die Aneignung von Wissen in Form von verallgemeinerten, objektivierten Daten und Fakten durch sachliche Beschreibung im lehrerzentrierten Frontalunterricht. Auch bei kulturellen Themen wird die Form der sachlichen Beschreibung ausgewählt, sodass der Eindruck der Objektivität und Allgemeingültigkeit erweckt wird.<sup>②</sup> So können auch typische Globalaussagen wie etwa „So feiern die Deutschen Weihnachten“, „So isst man in Deutschland“ entstehen.

Landeskundliches Lernen wird in diesem

---

① Erdmenger, Manfred: Landeskunde im Fremdsprachenunterricht, Ismaning: Hueber, 1996. S. 25.

② Biechele, Markus/Padrós, Alicia: Didaktik der Landeskunde. Fernstudienprojekt zur Fort- und Weiterbildung im Bereich Germanistik und Deutsch als Fremdsprache, Berlin [u.a.]: Langenscheidt, 2003. S. 21.

Ansatz nicht aus dem Prozess des Spracherwerbs entwickelt, sondern als ein eigenes Fach betrachtet und oft Kulturkunde genannt.<sup>13</sup> Es ist dem Sprachunterricht untergeordnet und wird erst im Sprachunterricht für Fortgeschrittene unterrichtet.

Am kognitiven Ansatz wird vor allem der enzyklopädische Anspruch kritisiert, seine Totalitätsproklamation, das Ganze fremder Kulturen in seinen einzelnen Teilen erfassen zu wollen, deshalb leiden die Lehrenden wie die Lehrbuchautoren unter der Qual der Auswahl an Themen.<sup>14</sup> Diesbezüglich kommentieren Weinmann und Hosch:

*„Bei allem enzyklopädischen Anspruch, die Zielkultur in ihrer Gesamtheit zu erfassen, stehen die Lehrenden sowohl aufgrund der im Sprachunterricht zur Verfügung stehenden Zeit für landeskundliches Lernen als auch aufgrund der mangelnden sprachlichen Kompetenz der Lernenden vor der Qual der Auswahl.“*

Im Allgemeinen geht man davon aus, dass die Landeskunde als Tatsachenvermittlung nicht mehr modern ist. Aber auch heute, im Zeitalter des interkulturellen Lernens, findet man noch Elemente des faktischen Ansatzes in DaF-Lehrwerken. Meiner Meinung nach

sollte die Tatsachenvermittlung nicht aus dem Fremdsprachenunterricht verbannt werden, da interkulturelles Lernen ohne Wissen über das Land kaum möglich ist.<sup>15</sup> Ich halte es für wichtig, dass im Sinne des D-A-CH-Konzepts<sup>16</sup> landeskundlicher Stoff über alle deutschsprachigen Regionen bearbeitet wird, dabei sollten nur wesentliche Informationen eines Landes vermittelt werden, die dann interessant und anregend im Unterricht integriert werden. Um bei der Auswahl der Themen Probleme zu vermeiden, hat die Landeskundedidaktik im Zusammenhang mit der „Lernorientiertheit des Unterrichts“ einen Weg eingeschlagen, wie ihn Pauldrach (1992) beschrieben hat: „Was unsere Schülerinnen und Schüler wirklich interessiert, soll Gegenstand des Unterrichts sein“<sup>17</sup>.

### 3.2 Kommunikativer Ansatz

In den 70er Jahren des 20. Jahrhunderts gab es eine Reihe von gesellschaftlichen Veränderungen und wissenschaftlichen Neuerungen, wie etwa Massentourismus, Fremdsprachenunterricht für alle, Bedarf der Wirtschaft an fremdsprachlich qualifizierten Arbeitskräften sowie Bildungsreformen.<sup>18</sup> Solche Veränderungen führten dazu, dass immer mehr

<sup>13</sup> Der kognitive Ansatz versteht unter Kultur zumeist die Errungenschaften einer schöngestigen „hohen Kultur“ (vgl. Biechele/ Padrós 2003, S. 22).

<sup>14</sup> Biechele, Markus/ Padrós, Alicia: Didaktik der Landeskunde. Fernstudienprojekt zur Fort- und Weiterbildung im Bereich Germanistik und Deutsch als Fremdsprache, Berlin [u.a.]: Langenscheidt, 2003. S. 22f.

<sup>15</sup> Majjala, Minna: „Integration und Vermittlung landeskundlicher Inhalte im Fremdsprachenunterricht“, <http://www.doria.fi/bitstream/handle/10024/62951/AnnalesB328Majjala.pdf?sequence=1> (10.07.2011). S. 52.

<sup>16</sup> Das sogenannte D-A-CH-Konzept hat sich aus den ABCD-Thesen entwickelt. D-A-CH ist die Zusammenziehung der ersten Buchstaben der Länder **D**eutschland, **A**österreich (**A**ustria) und **S**chweiz (**CH**).

<sup>17</sup> Pauldrach, Andreas: „Eine unendliche Geschichte. Anmerkungen zur Situation der Landeskunde in den 90er Jahren.“, Fremdsprache Deutsch, Heft 6, 1992. S. 5.

<sup>18</sup> Biechele, Markus/ Padrós, Alicia: Didaktik der Landeskunde. Fernstudienprojekt zur Fort- und Weiterbildung im Bereich Germanistik und Deutsch als Fremdsprache, Berlin [u.a.]: Langenscheidt, 2003. S. 28.

Leute begannen, Fremdsprachen für die Praxis zu lernen. Daher wurde Ende der 1960er Jahre und Anfang der 1970er Jahre der Alltag in dem Zielsprachlichen Gebiet stark in den Unterricht einbezogen. Zu dieser Zeit spielte die sogenannte „hohe Kultur“ keine Rolle mehr, ausschließlich die „Alltagskultur“ stand im Mittelpunkt.<sup>19</sup>

Bei der Auswahl der landeskundlichen Inhalte werden Erfahrungen, Kenntnisse und Einstellungen der Lernenden statt der „Gegenstände“ der Zielkultur berücksichtigt.<sup>20</sup> Zu dieser Zeit waren die Basis des Unterrichts möglichst authentische kommunikative Situationen wie „wie Menschen wohnen, arbeiten, sich bilden, essen usw.“, anhand derer die Lernenden sprachliche und kulturelle Besonderheiten des Zielsprachenlandes lernen und üben sollten.<sup>21</sup>

Wie oben bereits erwähnt, entwickelte sich das Konzept des kommunikativen Fremdsprachenunterrichts aus den praktischen Bedürfnissen, die die gesellschaftliche Veränderung mit sich brachte, daher hatten von den sprachlichen Fertigkeiten vor allem Hören und Sprechen den Vorrang. Diese wurden anhand von alltäglichen Modelldialogen geübt und manchmal sogar auswendig gelernt.<sup>22</sup> Zu beobachten ist auch der Wechsel vom lehrerzentrierten Landeskundeunterricht zur lernerzentrierten Landeskunde Vermittlung, wobei Landeskunde „Leutekunde“ genannt wird. Das Lernziel im kommunikativen

Ansatz ist die sprachliche und soziokulturelle Handlungsfähigkeit in der Zielsprache. Durch die Vermittlung der Landeskunde sollen die Lernenden sich im Alltag der fremden Kulturen zurechtfinden und kulturelle Missverständnisse aus dem Weg geräumt werden. Darüber hinaus hat Zeuner (2001) „die Entwicklung von Offenheit, Toleranz und Kommunikationsbereitschaft“ als ein übergreifendes Ziel des kommunikativen Ansatzes ergänzt.

Landeskunde wird in diesem Ansatz sowohl informations- als auch handlungsbezogen verstanden. Die faktenbezogenen landeskundlichen Inhalte sind dabei meistens in alltägliche Dialoge eingebettet. In den Lehrwerksdialogen unterhalten sich die Figuren über landeskundliche Themen und geben in diesem Zusammenhang landeskundliche Informationen. Aus diesem Grund ist Landeskunde in diesem Konzept kein eigenständiges Fach, sondern im Fremdsprachenunterricht bereits bei Anfängern integriert.

### 3.3 Interkultureller Ansatz

Mit dem interkulturellen Lernen hat sich Ende der 1980er Jahre die Vorstellung von einer interkulturellen Landeskunde gegenüber der traditionellen Landeskunde durchgesetzt. Landeskunde erhielt dabei eine Aufwertung, denn die eigene und die fremde Kultur besser begreifen zu lernen, trat als gleichberechtigtes Lernziel neben das Ziel der fremdsprachlich-

---

<sup>19</sup> A.a.O., S. 33.

<sup>20</sup> Pauldrach, Andreas: „Eine unendliche Geschichte. Anmerkungen zur Situation der Landeskunde in den 90er Jahren.“, Fremdsprache Deutsch, Heft 6, 1992. S. 7.

<sup>21</sup> Maijala, Minna: „Integration und Vermittlung landeskundlicher Inhalte im Fremdsprachenunterricht“, <http://www.doria.fi/bitstream/handle/10024/62951/AnnalesB328Maijala.pdf?sequence=1> (10.07.2011). S. 53f.

<sup>22</sup> Ebd. S. 54.

kommunikativen Kompetenz.

Es lässt sich feststellen, dass die Wahrnehmung vom Vorwissen und den kulturspezifischen Werten und Prägungen geleitet wird; gleichzeitig entstehen jedoch auch Stereotype und Vorurteile<sup>23</sup> gegenüber anderen Ländern und Kulturen. Der bewusste Kulturvergleich, die Auseinandersetzung mit der eigenen Kultur zur Erkennung von Klischees, kann dazu führen, für das Fremde sensibilisiert zu werden, eigene Stereotype und Vorurteile abzubauen und anschließend Toleranz gegenüber anderen Kulturen zu kultivieren.<sup>24</sup> Aber es ist zu beobachten, dass „Stereotype nicht einfach abgebaut bzw. ihre Entstehung [...] nicht vermieden werden (kann). Das Ziel ist viel mehr, sich ihre Funktions- und Wirkungsweise zu vergegenwärtigen und bewusster damit umzugehen“.<sup>25</sup> Daher ist die primäre Aufgabe des interkulturellen Landeskundeunterrichts meiner Ansicht nach die Sensibilisierung sowie die Entwicklung von Fähigkeiten, Strategien und Fertigkeiten im Umgang mit Kulturen<sup>26</sup>, damit die Lernenden auf das Leben in multikulturellen Gesellschaften vorbereitet werden.

Wissen über eine fremde Kultur ist in diesem Ansatz auch relevant, denn ohne Wissen kann man nichts begreifen. Aber anders als beim kognitiven Ansatz, in dem man möglichst vollständige Landesbilder erfassen sollte,

werden im interkulturellen Ansatz andere Selektionskriterien für seine Inhalte genutzt. Während bei der Vermittlung der traditionellen Landeskunde das gesellschaftliche System, die Zahlen und Fakten im Mittelpunkt stehen, sollte interkulturelle Landeskunde von dem „konkreten Fall“, hier dem konkreten Menschen, der konkreten Situation in einem gesellschaftlichen und ideologischen System ausgehen, wobei die isolierten Fakten und sachlichen Daten sowie auch die gesellschaftlichen Strukturen zum Verständnis des „konkreten Falls“ dienen. Auf diese Weise können sich die Lernenden besser in die jeweiligen Situationen hineinversetzen, es geht dabei vor allem um die Sensibilisierung der Lernenden für die Begegnung mit der fremden Kultur und die Fähigkeit, die eigene Kultur mit der fremden Kultur zu vergleichen. Es ist besonders wichtig, dass bei der landeskundlichen Stoffauswahl die Interessen der Lernenden, ihr sprachliches Wissen und ihre kommunikativen Fähigkeiten berücksichtigt werden.<sup>27</sup> Zu den Auswahlkriterien gehören auch die eigenkulturelle Prägung der Lernerkultur und die soziokulturellen Unterschiede zum Zielsprachenland. Themen, die sowohl die Lernerkultur als auch die Zielkultur tangieren, sind besonders fruchtbar für das interkulturelle Lernen.

<sup>23</sup> Man bezeichnet damit feste Verallgemeinerungen, die außerdem oft negativ, diskriminierend oder falsch sind (dann spricht man von einem Vorurteil).

<sup>24</sup> Althaus, Hans-Joachim: „Fremdbilder und Fremdwahrnehmung.“ In: Helbig, Gerhard/Wiegand, Herbert (Hrsg.), 2001. Deutsch als Fremdsprache. Ein internationales Handbuch. Band 2, Berlin [u.a.]: de Gruyter, 2001. S. 1172.

<sup>25</sup> Biechele, Markus/Padrós, Alicia: Didaktik der Landeskunde. Fernstudienprojekt zur Fort- und Weiterbildung im Bereich Germanistik und Deutsch als Fremdsprache, Berlin [u.a.]: Langenscheidt, 2003. S. 80.

<sup>26</sup> ABCD – Thesen zur Rolle der Landeskunde im Deutschunterricht “, Deutsch als Fremdsprache, Heft 5, 1990. S. 306.

<sup>27</sup> Maijala, Minna: „Integration und Vermittlung landeskundlicher Inhalte im Fremdsprachenunterricht “, <http://www.doria.fi/bitstream/handle/10024/62951/AnnalesB328Maijala.pdf?sequence=1> (10.07.2011). S. 14.

Im interkulturellen Ansatz des landeskundlichen Fremdsprachenunterrichts hat sich die Rolle der Lehrenden vom „wandelnden Lexikon“ zum Moderator entwickelt.<sup>28</sup> Neben neuen Formen von Aufgaben und Übungen, wie etwa Projektarbeit, hat die veränderte Didaktik auch neue Evaluationsformen (Selbstevaluation, Reflexion) mit sich gebracht. Mehr Anforderungen werden dabei an den Lernenden gestellt, weil nach den Prinzipien des autonomen Lernens Landeskunde mehr und mehr forschend betrieben wird. Zum einen sollten die Lernenden über die Fähigkeit verfügen, sich landeskundliche Informationen selbst zu beschaffen und zum anderen sollten sie in der Lage sein, selbständig die Aufgaben den eigenen Bedürfnissen anzupassen.<sup>29</sup>

#### 4. Ausblick

Wie schon erwähnt, ist die Vermittlung der Landeskunde schwierig. Denn einerseits ist

der Umfang des Faches sehr groß und somit ist es schwer, alle dazugehörigen Teilgebiete zu benennen, andererseits müssen die Lehrenden in jeder Unterrichtsstunde erneut eine Auswahl treffen. Die Antwort auf die Frage, ob Landeskunde ein integrierter oder eigenständiger Teil des Fremdsprachenunterrichts sein soll, hängt von mehreren Faktoren ab, wie z.B. welche Ziele durch die Vermittlung erreicht werden wollen oder welcher Ansatz für die Vermittlung gewählt wird.

Die Entwicklung der Landeskunde steht in engem Zusammenhang mit den gesellschaftlichen Veränderungen und wissenschaftlichen Neuerungen. Auf Grund der jeweiligen Neuorientierungen der Fremdsprachendidaktik entstanden drei Ansätze der Landeskunde, die diese Entwicklung widerspiegeln. In der folgenden Tabelle sind diese Ansätze der Landeskunde Vermittlung zusammengefasst.

Tabelle: Landeskunde in verschiedenen Ansätzen

	Faktischer bzw. kognitiver Ansatz	Kommunikativer Ansatz	Interkultureller Ansatz
Didaktischer Ort	Landeskunde ist eigenständiges Fach/selbständige Unterrichtseinheit.	Landeskunde ist in den Sprachunterricht integriert.	Landeskunde ist in den Sprachunterricht integriert.
Übergeordnetes Ziel	Wissen als Erwerb und Wiedergabe von Faktenwissen	Kommunikative Kompetenz: angemessenes (sprachliches) Verhalten in Alltagssituationen des Zielsprachenlandes	Orientierungsfähigkeit in einer fremden Kultur; kommunikative Kompetenz in interkulturellen Situationen

( 待续 )

<sup>28</sup> Hackl, Wolfgang: „Die Rolle der Landeskunde in der Deutschlehrausbildung. Grundlagen und Beispiele einer differenzierten Landeskunde der deutschsprachigen Länder“, Materialien Deutsch als Fremdsprache, Heft 46, 1997, S. 241f.

<sup>29</sup> Ebd.

(续上表)

	Faktischer bzw. kognitiver Ansatz	Kommunikativer Ansatz	Interkultureller Ansatz
Inhalte	Inhalte kommen aus Soziologie Politik Wirtschaft Kultur Geschichte usw.	„Leutekunde“: - wie Leute sich erholen - wie Leute wohnen - wie Leute miteinander in Verbindung treten - wie Leute am Gemeinwesen teilnehmen - wie Leute arbeiten - wie Leute sich bilden usw.	Begriffe und Themen (aus der Zielkultur) und deren Bedeutung in der Zielkultur
Wozu führt das?	„Objektives“/ umfassendes Bild eines Landes	Alltagskultur Gesprächsthemen	Fremdverstehen Kulturverstehen

Obwohl die drei Ansätze sich nacheinander entwickelt haben, treten sie selten in ihrer „reinen“ Form in der Unterrichtspraxis oder in den Lehrwerken auf, sondern sind immer mehr oder weniger gemischt zu finden. Zu beachten ist dabei, dass das Faktenwissen weiterhin eine Rolle spielt, in erster Linie als Hintergrundwissen, um die jeweilige „konkrete Situation“ besser

zu verstehen. Die kommunikativen Elemente dienen als Unterstützung, damit die Lernenden sprachlich und kulturell die Alltagssituationen im Zielsprachenland besser bewältigen können. Interkulturelle Faktoren haben des Weiteren das Ziel, die Gemeinsamkeiten sowie die Unterschiede der Kulturen zu erkennen und zu erarbeiten um letztlich zum Erwerb interkultureller Kompetenz zu führen.<sup>⑩</sup>

作者简介：潘学范，上海外国语大学贤达学院教师。

<sup>⑩</sup> Lenger-Sidiropoulou, Renate M.: „Landeskunde und Geschichte im interkulturellen DaF-Unterricht am Beispiel des Themenbereichs Migration“, Zielsprache Deutsch, 35/1, 2008. S. 24f.

# 谈译者的跨文化沟通能力

张彦娜

**【摘要】**当今世界存在着两种对立的潮流和现象：经济的全球化与区域化及其背景下的文化趋同化和文化多元化。笔者从当代翻译学视角探讨“文化”这一概念，并以中国文化和德国文化为例，分析从属于不同大文化圈的社会成员在百科知识（常识和专业知识）、行为方式、价值标准和情感感受等方面的文化差异，以及这些差异对译者跨文化沟通能力的影响。

**【关键词】**全球化 区域化 文化 译者的跨文化沟通能力

## 一、全球化与区域化；文化趋同化与文化多元化

在当今世界上，并存着两种对立的潮流：经济的全球化与区域化。就全球化与区域化条件下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也存在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看法认为，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各种文明将日益趋同并出现同质化倾向，由此产生一种普遍的“全球文明”而取代现存的不同文明，这是“普适文明取代论”的观点。另一种看法则认为，经济全球化的影响固然使现有的各种文明增添了一些共同性的成分，带来诸如全球性文化市场和文化产业那样的新事物，但是并不能从根本上消除各种文明之间的差异。相反地，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我们同时也看到强劲有力的文化多元化发展的趋势，文明的多样性并不会因为经济全球化而消失。这是“多元文明共同

发展论”的观点。

经济全球化已成为当今世界经济的主要特征，它体现在经济领域的方方面面：贸易全球化、投资全球化、金融全球化和跨国公司生产经营全球化。

贸易全球化主要体现在：第一，国际贸易增长率高于世界生产总值增长率；第二，国际贸易规模庞大，世界贸易依赖度高。国际直接投资全球化表现在：国际直接投资增长率高于国际贸易增长率和世界生产总值的增长率。金融全球化是指一国的金融活动跨越国界日益与国际间的金融活动融合在一起，即资金的筹集、分配和运用，超越国家疆界，在全球范围内进行。金融全球化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水平的相互依赖关系，即国际资本流动的规模和状况；二是垂直的相互依赖关系，即利率和汇率的国际联动和影响。跨国公司生产经营全球化的表现在当今

约 90% 的国家都有跨国公司的子公司或分支机构，其足迹已几乎遍及全球。全球化无疑促进了世界经济整体成长，但全球经济利益的分配却是不成比例的，从而使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在全球范围内解决政治、军事、环保等问题已成为一种趋势，与此同时也促进了一批国际组织和洲际组织的成立。而所有这些跨国交流以及国际性交易的实现不外乎通过两种途径：通过日益繁多的翻译活动，或通过使用一种日渐变为共同语的语言——英语来实现。

面对经济全球化这个不可逆转的世界大潮，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不管其是否愿意，都要自觉不自觉地融入其中，否则就会失去生存的空间。一定的文化是与一定的经济发展水平相联系的，经济全球化必然会给全球文化带来深刻的影响，使各种文化都在经济全球化这个巨大推动力的作用下发生重大变化。“全球资本主义既促进文化同质性，又促进文化异质性，而且既受到文化同质性制约，又受到文化异质性制约。”这是美国著名社会学家罗兰·罗伯森对经济全球化影响全球文化态势的宏观描述。关于全球文化具体的发展趋势，目前国内外学术界主要有三种观点：一是承认文化全球化；二是认为全球文化会多元化；三是主张全球文化多元一体化。

“文化全球化”论者认为全球化是全方位的，如果只承认经济全球化而排斥文化全球化，那就违背了基本逻辑，它强调经济对文化的决定作用，认为经济全球化会产生相应的普世文化。“全球文化多元化说”则认为，文化这一概念本身就是建立在人与人不同的前提之上的，因此，文化全球化从任何意义上说都根本不能成立，它强调各种文化之间的差别，认为经济全球化并不构成文化走向趋同或一体化的条件，相反，由于全球化条件下的差异性加剧或利益多元化格局的存

在，反而会使文化发展的多样化有了更为牢固的基础。“瑞典人会更瑞典化，中国人会更中国化，而法国人也会更法国化。”显然，上述文化全球化说和文化多元化说均有其合理性与片面性，于是，为克服两说各自的片面性，就出现了“多元一体化说”，此说综合了上述两说的合理成分，给出了一个折中的方案，认为全球文化一体化和多元化会同时加强。

与全球化趋势相对，区域化及其背景下的文化、宗教、种族等方面的多元性与之并存。文化多元化的含义是多层次的，它不仅是指在全球范围内不同民族文化的共存共荣，而且它也意味着在某一单一民族国家中的传统文化对其他民族文化的宽容以及必要时的吸收，最重要的是，文化多元化还是一种新思维，它要求人们从传统的一元式思想方法转变到多元式思想方法，从绝对论转变到相对论。具体表现如下：世界性宗教的影响依然根深蒂固；国家内部和种族之间的分歧与矛盾与日俱增；不同的政治团体、音乐、体育、教育、饮食界等社会团体，都拥有并发展着各自特有的文化。值得一提的是，即使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各国各地区在经济、法制、行政、教育等领域依然保持着自身的个性，沿用着固有的规章制度。而翻译的困难之处正源于此，例如不同法系间的法律翻译。各国现行使用的法律体系不尽相同（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翻译活动使译语文化的读者了解到另一种不同于本国法律体系的法律制度，而不至于误认为源语中的法律概念与本国的法制文化相似或相同。

此外，还有一潜在趋势不容忽视：语言使用者在日常生活以及使用语言的过程中都在有意识或无意识地适应其所属的社会和文化。2000 年秋，围绕着“主导文化（Leitkultur）”这一主题在德国进行了一场激

烈的公众讨论。许多政论家极力反对文化在多元化背景下依旧具有各国自己的特色，其持此观点的原因在于，在讨论中没有充分考虑语言与文化的作用。很多时候，我们只留意到事物好的一面，只看到许多跨国集团在全球化背景下强强联合，融资兼并。但却忽视了一点——许多企业在跨国合并后由于文化差异纷纷倒闭，最终均以失败告终。文化差异不仅体现在不同的国家和民族间（Para-/Ethno-bzw. Nationalkultur），即使在同一个大文化圈内部还能根据社会成员的不同职业、年龄、兴趣、受教育程度、家庭、生活环境等因素划分出许多小文化圈（Dia-/Subkulturen）。文化这一概念可以涉及不同层面和不同团体。

需要指出的是，大文化圈和小文化圈之间并不矛盾，并不互相排斥。一个属于某个大文化圈的社会成员也可能同时属于某个小文化圈。正如一个社会成员身上不仅体现出其民族性格，同时也体现出许多其他小文化圈的特征，这些文化特征在不同的交际场合表现也有所不同。因此，我们经常能看见这样一种现象：一家跨国集团内部从属于不同大文化圈的社会成员（例如：中国人、德国人、英国人、日本人等）在工作上可以合作融洽，但在其他领域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可能大相径庭，因而可能在交际中产生摩擦，甚至彼此误解。社会成员在小文化圈中所体现的文化特征可以和在大文化圈中所体现的文化特征完全相同，甚至取代大文化圈居于主要地位。但是，社会成员在大文化圈中所体现的文化特征不会因此而消失，反而会始终存在。

本文以中国文化和德国文化为例，分析从属于不同大文化圈的社会成员在百科知识（基础知识和专业知识）和行为方式、价值标准、情感感受等方面的文化差异以及这些差异对翻译人员跨文化沟通能力的影响。

## 二、知识的文化属性以及对译者跨文化沟通能力的影响

### 1. “文化”的定义

文化一词现在已被人们广泛使用，它的含义和范围非常丰富。因此对于文化的定义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从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学科可以给出不同的定义。文化（Kultur）一词来源于拉丁语的“colere”，在拉丁语中表示耕种、维护。文化一词首先是指人类利用其思想和创造的“成果”来塑造生活的方式和方法。大约在17世纪以后，人们利用“文化”的概念来与“自然”的概念对应起来，用“文化”来指人通过其意愿和能力所创造的，而“自然”则是指天然所赋予人的。从人类学的研究角度来看，人类学家更侧重文化的社会属性。英国杰出的人类学家泰勒（E. B. Tylor）对文化的界定是这样说的：“文化或文明是一种复合体，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获得的其他任何能力和习惯。”此意义是否合理，W. H. Kelley对它提出了以下的批评：1）定义的方式有毛病，这种方式永远不能将概念所包含的全部内容都罗列出来，“其他”虽可概括未罗列出的东西，但如果没有被罗列出来，就容易被人忽略。例如：定义中没有列出“语言”，而语言是文化中重要的部分。2）整体一词不合适，文化的组成部分之间是有矛盾的，强调整体就只突出了和谐。3）人类创造出的文化，不一定是为了改善生活，也有破坏的一面，例如：核武器。

美国社会学家David Popenoe则从抽象的定义角度对文化作了如下的定义：一是一个群体或社会就共同具有的价值观和意义体系，它包括这些价值观和意义在物质形态上的具体化，人们通过观查和接受其他成员的教育而学到其所在社会的文化。此定义的前两句

概括了泰勒的第一句，文化对于人类来说，就像是本能对于动物一样，都是行为的指南。

现代翻译学将翻译视为“一种跨文化沟通”，将文化视为行为导向/行为标准，因而现代翻译学中的文化概念强调社会成员的行为方式、价值判断、感知、知识、语言以及语言的使用都受文化背景的影响，因而具有文化特色。一些没有专门从事翻译学研究的学者，如 Hansen（1995）和 Maletzke（1996），对文化这一概念也持相似的见解。如果在翻译过程中忽视这些文化特性和文化差异，将会引起不必要的误会，以致交际双方无法沟通而导致交际活动走向失败。本文将从跨文化的角度，阐明源语文化和译语文化的读者由于文化差异而具有不同的百科知识，了解这些差异也是译者跨文化沟通能力的要求。

Maletzke（1996）沿用了人类学对文化的定义，同时提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对每一种文化的特征进行归纳：民族性格、感知、时间概念、空间概念、思维、语言、非言语交际、价值取向、行为模式、社会关系、文化载体的自我写照及其对其他文化的关系。关于民族性格，Maletzke（1996：46）提出假设：属于同一民族的社会成员在行为方式、思维方式和性格上相同或相似，因而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社会成员。例如同一个时代不同国家的话剧或电影其基本内容是不同的。关于感知，Maletzke 从视觉、触觉和嗅觉等层面进行说明，不同文化对不同颜色的感知、命名方式以及赋予颜色所代表的含义都不尽相同；不同文化中的社会成员所使用的肢体语言，以及对身体可允许接触范围的规定也存在很大差异。例如，接吻是闪米特人常有的一种打招呼方式，而在另一文化中却完全禁止用接吻这种方式来打招呼；嗅觉方面，不同文化对异常体味的接受程度和容忍度也不相同。

“文化”这一概念，因其内涵、外延差异很大，故文化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

“文化”指人类在生存、繁衍、发展和社会实践的历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合。它是人类在生活、生产和生存的实践活动中创造的各种形态的事物所组成的有机复合体，它标志着一定社会区域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水平、人们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特定的组织结构和生活方式。狭义的“文化”指社会意识形态（即政治、法律、知识、信仰、艺术、道德等）及与之相适应的各种社会制度和组织结构，如政府、政党、社团、法庭和学校等。Hansen（1995）从广义的文化出发，认为文化体现在标准和规范中，而标准和规范体现在交际过程、思维方式、感觉知觉和行为方式中。具体解释如下：1）交际方式之所以存在文化差异，源于文化中的社会成员使用不同的方言、社会方言或有效的言语方式进行交流和沟通。不同的文化圈，其交际标准和交际规范也不相同。2）文化差异还体现在思维方式上，例如：生活在不同文化圈的社会成员对考试失败这一现象的解释也不同。科学的思维方式会仔细分析考试失败的原因，是准备不充分还是过度紧张，或是由于其他原因而造成。而教徒或迷信者则认为考试失败的原因是上帝或神灵的惩罚（1995：71）。3）人的情感（感受）也具有文化差异，同时也受历史和社会发展的影响。例如，18世纪文学流派中的“感伤主义”，直到18世纪人们才将家庭看作内在情感的需要，而在此之前人们只是出于经济、社会规约等因素的考虑去结婚并组建家庭。Hansen 还指出，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中的社会成员对于情感的理解和感受的程度也不相同（1995：98）。4）文化差异还体现在社会成员的行为方式中。在人类社会初期，一个家庭中的丈夫负责外出打猎，养家糊口，而妻子则负责相夫教子，妻子和孩子也习惯于遵从丈夫。而在母系氏族文化为主导的社会，妇女则占据主导地位，同样要负责耕种畜牧，

维持生计 (1995 : 102)。

翻译学领域也有众多学者对文化这一概念进行了广泛的界定, 例如 Grucza 和 Wotjak。Gruaza 将文化定义为“行为规则 / 行为模式”, 这些规则和模式只是所有由人们后天制定的规则和模式的一部分。其余部分的规则和模式则是与生俱来的, 但两者之间的界限很难界定。事实证明, 将不同的语言单纯的局限在语言学的范畴内去研究是远远不够的, 因为语言的组成部分 (词和词义) 及其表现形式 (句子和篇章) 也受文化因素的影响。单纯的语言教学、双语词典以及种类繁多的风格学研究都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语言的文化特性。

Wotjak 则更多地强调文化知识 (das kulturelle Wissen)、百科知识 (das enzyklopädische Wissen)、交际知识 (das kommunikative Wissen) 和语言知识 (das linguistische Wissen) 之间的关联。Wotjak 认为, 交际知识和百科知识是进行交际的两个基本要素, 交际知识包括交际规约性知识和语言知识。文化知识会“渗入”到交际知识的两个元素 (交际规约性知识和语言知识) 和百科知识中。Wotjak 同时指出, 译者应该同时具备语言知识、百科知识、交际知识和文化知识 (Wotjak, 1999:543)。

Wotjak (1993:61/62) 还就词汇层面、句法层面和篇章层面的文化差异分别作了描述。以中国文化和德国文化为例, 词汇层面的文化差异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源语中的词汇在译语中没有对应的词汇 (Realia), 这样的词语通常是某个民族和文化所特有的。在这种情况下, 通常采取音译和意译相结合的办法, 例如一系列度量衡名词、食物名称以及政治经济方面具有民族或文化特色的词语。

2) 评价性义素的差异, 例如中国人把“龙”看作吉祥的动物, 所以跟“龙”有关的词语多半为褒义词, 而“龙”在德国人的心

目中则是一个“怪物”, 是个“不祥之兆”, 因此跟 Drachen 组成的词语多为贬义词。

3) 词的内涵和外延差异, 例如“面包 (Brot)”一词在不同文化中的内涵就不完全等同, 面包可以由不同的面粉制成, 其形状也会不同。“晚餐 (Abendessen)”在不同文化中的所指也会不同, 可以是冷餐, 也可能意指热餐。

4) 不同语言对同一事物描述的精确度不同, 例如爱斯基摩人描述雪的词汇就较为精确。

5) 颜色所象征的含义在不同文化中也存在差异。

就句法层面的文化差异, Wotjak 作了如下说明: „Auf der Ebene der Syntax lassen sich in den Sprachen mit Sicherheit unterschiedliche Mittel ausmachen, die für bestimmte Textsorten bzw. in bestimmten Situationen ausschließlich oder bevorzugt verwendet werden“。(Wotjak, 1993:63)

除了词汇、句法和交际行为领域之外, 篇章的宏观结构也体现出文化差异: 从内容的编排、文字与图片的比例安排到版面设计和装订规格无不体现文化差异。除此之外, 交际知识层面的文化差异更是明显, 交际活动中的言谈举止无一不受文化规约的影响。例如, 谈话时应该与他人身体保持多少距离, 什么时候应该沉默, 什么时候应该打破沉默以避免尴尬局面的产生, 什么时候应该谈什么话题, 什么时候应该拒绝对方的请求, 什么时候该提出建议或批评, 该以何种方式说服对方……对于这些问题的解答都因文化的差异而改变。因此, 翻译人员必须提高对文化差异的敏锐性, 准确把握这些由于文化差异引起的语言层面和交际行为等方面的差异, 提高跨文化沟通能力。

## 2. 译者的跨文化沟通能力

从 Wotjak 对文化的阐述可以看出, 译者的跨文化沟通能力不仅包括语言能力, 同时还要求译者掌握丰富的百科知识, 具体包括

源语文化成员和译语文化成员在政治、经济、法制、行政、技术等专业领域以及日常生活中的行为方式和交际规范。除此之外，译者还需要了解与源语文化和译语文化相关的人文、历史、文学、宗教等相关学科的知识，以便对源语文化和译语文化成员的言行举止作出正确的判断和评价。具体来讲，如何安排每一天的日常活动，甚至具体到如何开始和结束每一天，在固定的时间从事何种工作，业余时间如何度过，不同的场合如何着装，所有这些都受文化背景的影响。只有了解和掌握广博的百科知识，才能在跨文化交际和日常生活中作出恰当的行为举止和正确的判断和评价。

跨文化交际学领域的专家 Göhring 对文化的定义和译者跨文化沟通能力的阐述与 Wotjak 有相似之处，“即所有一切人们必须知道、掌握并感知的，以便能判断本地人的各种行为是否符合大众预期，同时也使自身的行为能够符合社会规约（Göhring, 1978:10）。”换言之，如果当事人不愿意承担由于自身行为违背社会规约而带来的后果，那么其行为就必须做到像本地人的行为那样符合大众期待。因此，戈林要求译者必须具备一个人种学者的能力，能够全面了解并适应另一种文化。简言之，译者的跨文化沟通能力是一个广泛的概念，涉及不同类型的知识，具体包括受文化背景影响的语言知识、交际知识和百科知识。作为译者，需要了解和掌握的百科知识大致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 1) 具有文化特色的一般性知识：

- 特有的、在其他文化中不存在的事物、现象、风俗和习惯等
- 具有文化特色的日常现象
- 词义原型<sup>①</sup>
- 流行语、标语、口号等
- 国际经济和政治概况
- 民族文化及其特征
- 民族历史及其特征
- 宗教信仰

### 2) 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行为差异：

- 商务谈判中的餐桌礼仪
- 谈判策略
- 言语行为（批评、质疑、拒绝等）的表达以及相应的反应
- 邀请，拜访，送礼
- （宗教迷信或社会习俗方面的）禁忌和戒律
- 业余爱好，度假方式
- 交友标准
- 宗教礼仪
- 礼貌用语
- 问候语和招呼语

### 3) 评价标准的差异：

- 对颜色和气味所代表含义的评价标准
- 节俭、吝啬以及大方的评价标准
- 人文历史中的价值标准

① Inwieweit die semantischen Prototypen ein translatorisches Problem darstellen, hat Schmitt (1999: 244) anhand des Begriffs „Hammer“ gezeigt. Nach Schmitt rufen der deutsche Ausdruck Hammer und der englische Ausdruck hammer in betreffenden Kulturen unterschiedliche Vorstellungen hervor, weil der Prototyp eines Hammers in Deutschland ein Schlosserhammer, in Großbritannien und in den USA aber ein Klauenhammer sei. Der Unterschied zwischen diesen Hammertypen besteht darin, dass es mit dem typischen englischen Hammer möglich ist, Nägel nicht nur einzuschlagen, sondern auch herauszuziehen, mit dem typischen deutschen Hammer ist das Herausziehen der Nägel jedoch nicht möglich.

4) 具有文化特色的专业知识:

- 政治、经济、法律、行政等领域的专业知识
- 技术领域的专业知识和标准
- 产品使用说明书中的产品介绍
- 家用电器说明
- 专业术语的差异

3. 翻译的跨文化特性

翻译是两种语码之间的转换,旨在使目的语读者能准确地领会原作的精神。在语码转换过程中,我们要依靠很多因素,不仅是词汇的字面意思,而且还有信息发生的环境和情景等等。从跨文化交际的角度讲,我们可以把翻译理解为这样一种过程:它是两种文化信息间的转换,而这两种文化信息间的转换又是靠语际间的转换进行的。所以翻译既是一种跨语言的交际活动,同时也是一种跨文化的交际活动。P. A. Schmitt (1998, 1999) 认为,如果我们把语言看作文化的一部分,那么翻译就是跨文化交际的一种特殊形式。跨文化知识在翻译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翻译工作者必须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人,精通跨文化交际的知识,具备跨文化沟通的能力。只有这样,才能不仅做到语言意义上的等值,而且做到真正文化意义上的等值。概括说来,翻译的跨文化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 语言中的很大一部分词汇体现出文化特色,有些词汇甚至是这个民族和文化所特有的,因而出现了“文化缺省”的现象
- 同一语篇类型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也表现出宏观结构和微观结构上的差异
- 经济、政治、法律、技术等专业领域也表现出文化差异性
- 源语读者和译语读者由于受不同文化背景的影响,同时基于不同的背景知识、道德标准、价值观和行为方式,因而对

同一语篇的理解、阐释和评判也不相同

- 言语行为(问候方式、拒绝、批评、质疑等言语行为)以及非言语交际也存在跨文化差异

究其根源,以上五个方面所列举的差异性其根源在于,各民族在历史文化、宗教文化、环境文化和风俗习惯上存在相当大的差异。历史文化是由特定的历史发展进程和社会遗产的沉淀所形成的文化,不同的历史渊源使各民族间形成了相互不同的性格气质和生活方式。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自成一体。而西方文化主源则是希腊罗马神话和圣经。每个国家的历史都会给后人带来无尽的回忆和启示,这种领悟也反映在语言中。如一些典故具有浓厚的民族色彩和鲜明的文化个性,只有掌握它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并运用恰当的翻译方法,才能贴切地传达作者的意图。如“三个臭皮匠,抵上一个诸葛亮”,诸葛亮在中国家喻户晓,他是智慧的象征。但西方人未必知道他。因此,翻译者需采取意译的方式,该句应译为 *Vier Augen sehen mehr als zwei*。与中国丰富的成语和历史典故一样,西方也蕴藏着大量的历史文化瑰宝。《圣经》中被收入辞典的典故就有 700 多条。

宗教文化是人类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它指的是民族的宗教信仰、意识等所形成的文化。表现不同民族在崇尚、禁忌等方面的文化差异。儒教、道教、佛教是中国的三大宗教。它们在中国民众中有着深远的影响。当有灾祸时,人们会期望菩萨保佑;生意兴旺时,人们感谢有财神相助;大家相信好人有好报,坏人下地狱。而欧美人多信仰基督教,认为世上一切都是上帝的安排。伊斯兰教给阿拉伯语染上了浓重的宗教文化色彩。在阿拉伯语中,《古兰经》有 55 种名称,安拉有 99 个尊名,等等,翻译者要尤其当心。

中国文化发祥地是黄河流域,气候属温

带,这就使中华民族发展了以农业为主的经济,并养成与其相适应的生活习惯。中国古代人有本末之别,“本”指农业,“末”指商业,“重本轻末”根深蒂固。中国人一直尚农轻商,靠土为生,导致国家家庭化,因此发展了“君臣,父子,兄弟,夫妻,朋友”的不平等的社会关系及严格的身份制度以及制约人们行为的价值观念、礼制、礼貌规范等社会规范和独特的思维方式也就应运而生了。西方文化发源于希腊神话,而希腊是个岛国,在海洋国家中最早发展了商品经济,商人住在城里,发展了与其相适应的与家庭式或家邦式截然相反的社会组织。他们首先建立了较民主的社会——契约社会,因为他们活动在海上,养成了好“动”的取向,“求变、好奇”成为海洋文化的特点,也养成了好“动”的民族性格、与其相适应的价值观念及社会规范。

民俗文化是指贯穿于日常社会生活和交际活动中由民族的风俗习惯形成的文化。个人主义取向的德国人非常崇尚“私有”这个词。他们拥有私人汽车、私人医生、私人房间、私人电话,而且与别人交往,在街上行走,排队买东西都有一个私人区域。他们可以完全按自己的意志安排生活,无需别人干涉,甚至父母,而且这些私事完全受到法律保护。然而这些属于德国文化隐私范畴的事情,在中国却不同程度上具有“公共性”。他们往往受到社会、他人的关切,人们允许涉足他人的生活领域,不仅不为过,反而天经地义,是关系亲密、互相关心的表示。类似“多大岁数了?”“工资多少?”“天凉了,多穿些衣服”,等等,都是表示对别人的关怀。这种话使人感到温暖、安全、人情味十足,绝无多事之嫌。因为这些言语行为已是群体取向,重关系的中国文化的必要组成部分,但对于德国人就是对他们隐私权的侵犯,难怪他们听了这些话后会不高兴。因此,我们

翻译时应具体情况具体对待,将他们改为德语惯用语。在德国文化中,恭维言语行为可用来完成诸如“评价”、“欣赏”、“开始谈话”等多种功能,同时,它又是建立平等关系的手段。但中国的恭维言语行为可能体现在反应方略、使用频率、所涉及的话题以及协同过程。

当今世界,全球化浪潮势不可挡。在这种全球化语境下,世界各民族文化经历了历史以来最为广泛的且深刻的相互冲击、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和相互交融的历程,人类各种文化差距的逐渐缩小,现已呈现出全球文化朝着强势文化(英语文化)为主导的文化趋同现象。世界文化何时完全走向一体化,我们将拭目以待。至少在目前的情况下,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多元化依然存在,翻译作为一种跨文化交际活动依旧有其必要性,其地位不可替代。

#### 4. 译者跨文化沟通能力的培养

根据经验,在翻译教学以及翻译人员的专业培训中纳入与翻译相关的文化对比研究课题显得尤为必要。具体的课题内容建议如下:

- 与源语文化和译语文化相关的语言知识、交际知识和百科知识
- 源语文化和译语文化对各自语言组成部分和篇章类型的影响
- 源语文化和译语文化中的熟语学研究
- 源语文化成员和译语文化成员在跨文化商务谈判中的行为差异
- 自然环境对源语文化成员和译语文化成员的影响
- 历史传统和生活方式对源语文化成员和译语文化成员的影响
- 人文历史,尤其是近代人文历史对源语文化成员和译语文化成员的影响
- 宗教传统对源语文化成员和译语文化成员的影响

- 民族文学对源语文化成员和译语文化成员的影响
- 源语文化成员和译语文化成员在历史发展中的文化、政治和经济领域的交流
- 源语文化成员和译语文化成员在彼此眼中的形象

作为翻译工作者，掌握以上这些百科知识是具备跨文化沟通能力的前提。只有精通跨文化交际知识，才能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

的文化人。只有这样，才能不仅做到语言意义上的等值，而且做到真正文化意义上的等值。因为翻译已从单纯的文本转换研究，变为更为宏大的文化语境下进行文化转向的研究。翻译不仅是一种语言符号的转换，更是一种思想文化的交流。在跨文化交际过程中，也只有通过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碰撞，翻译才可能构建起对源语文化的再现，即“语言的翻译就是文化的翻译”（陈定安，1998）。

作者简介：张彦娜，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德语系讲师，博士。

# 《德语国家资讯与研究》稿约

一、本刊是由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系主办，研究德语国家政治、外交、经济、社会和文教问题的刊物，但凡上述内容的稿件，一概欢迎。

二、请用电子邮件投稿。来稿一律投编辑部邮箱。

三、正文使用 Word 文档，五号宋体，注释用小五号宋体。

四、来稿请在正文之前附上 300 字以内的中文提要或 150 字以内的德文摘要和 5 个以内的关键词，并附上中文及外文标题和作者简介。资讯稿件总篇幅以 1000—5000 字为宜，研究稿件以 5000—8000 字为宜（包括注释）。

五、文中第一次出现不常见的外国人名、地名及机构名称或专业术语时，请在中文译文名称后加圆括号注出原文。

凡涉及引文或引证的观点，请注明出处，体例如下：作者（外文姓名也是姓在前，名在后，但用逗号隔开）：书刊名，期刊号，出版地：出版社，出版年份，页码等。引用外文著作的注释请用原文，无须译成中文。引用网络资源，请注明具体网址和访问日期。

每篇文章注释一律采用脚注，脚注编号通篇连续。

六、本刊编辑部可能对来稿作一定的修改或删节，作者如不同意，请在投稿时声明。

七、本刊编辑部在接稿之日起三个月内将通知作者有关处理意见，在此期间请勿一稿两投。未被采用的稿件本刊不负责退稿，请作者自留底稿。

八、凡作者在本刊发表的文章，一律文责自负。

九、来稿需注明作者的真实姓名、单位、地址、邮编、职务、专业等信息，写明电子邮箱及电话以便联系。凡学生来稿请务必注明学校、专业和年级。发表时可用笔名。来稿一经采用，即付相应稿酬。

十、本刊亦有电子版，请上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系网站（<http://de.bfsu.edu.cn>）上阅看。

十一、《德语国家资讯与研究》编辑部地址：北京西三环北路 2 号，北京外国语大学 24 号信箱。邮政编码：100089，电话：(010) 88816516, 13641271934, E-mail: dygjzxyj@bfsu.edu.cn。